【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沈志华 主编

冷战年代的危机和冲突

翟强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本书充分利用新近解密的多国档案，从“国际史”的多维角度探索冷战中的中美对抗，考察中美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讨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分析了中共对美国压力的反应，揭示了国际第三方对中美互动的影响和牵制。


ISBN 978-7-5108-2475-3

定价：59.00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沈志华 主编

冷战年代的危机和冲突

翟强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年代的危机和冲突 / 翟强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08-2475-3

Ⅰ. ①冷… Ⅱ. ①翟… Ⅲ. ①中美关系—研究—现代 Ⅳ. ①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3007号

冷战年代的危机和冲突

作　　者　翟 强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25
字　　数　39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8-2475-3
定　　价　59.00 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在兴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涌现，国际和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接连举办，从而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镇。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我们请中国冷战国际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主编了这套《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丛书。丛书邀请该领域海内外优秀的华人学者，把自己多年来的代表性论文，编选成册，以期从各个方面反映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果。

九州出版社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

沈志华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①]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二十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②] ——毫不为过。在笔者看来，可以进一步指出，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前沿性、跨学

---

* 本文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为2010年10月16—17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年会所作的论文。

① 人们也曾使用过“新冷战史”这一概念。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重新考察和评估冷战历史的现象称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见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2。

② 徐思彦：《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

科研究领域，当前在世界主要国家已成为发挥重要影响的学术潮流，并受到很多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本文打算从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谈谈冷战国际史的研究状况及其在中国的表现。[①]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项目通过出版刊物和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大量收集、整理、翻译并公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还接受各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为他们提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参与讨论的机会。目前，该项目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莫斯科转向北京，并已同中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或出版中国档案的协议。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

---

① 主要参考资料：Odd Westad（ed.），*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Wilfried Loth，“General Views on the Cold War”，*Cold War History*, Vol. 3，No. 2，January 2003，pp.157-165；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140–150 页；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3–22 页；*Зубок В.М., Печатнов В.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3，№ 4，5；翟强：《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2008 年 4 月 29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演讲；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ИВИ РАН “Феноме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XX века：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6，№ 6，с.73-100。

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 2001 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

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在冷战格局演变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决策两次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在于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就参与了国际舞台上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讨论。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各级档案馆的陆续开放，中国学者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其中，重要的突破就在 1996 年 1 月美国 CWIHP 在香港召开"冷战在亚洲"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不仅提交了多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而且就国际学界当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的电报的真伪问题，回答了俄国学者的质疑，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和好评。[①] 以后不久，凡是涉及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冷战史国际会议，都会有许多中国学者受到邀请。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被大量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他们的看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4 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评估中央情报局（1948—1976 年）对华情报工作时，专门聘请了 4 位中国冷战史学者出席会议，与中情局官员展开了颇具特色的对话。

客观地讲，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队伍一开始是学者自身在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笔者那时刚刚从商界返回学术界，感到有两个新事物值得重视：一是俄国档案大规模的解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无限机会；一是冷战史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领域、思路和方式。于是，笔者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方面积极组织收集、整理俄国档案，一方面开始有意识地集合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我们差不多每年自费组织一次国内学者的讨论会，不分地区，不论单位，不要会务费，只要论文水平高，使用了新的档案文献，谁都可以参加。每次会议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参加。几年下来，这支研究队伍便自然形成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是，第一，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较少，能够用于基础学科研究的资金更是短缺；第二，从传统的观点看，冷战史是否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还受到质疑，甚至"冷战"一词的出现都令人敏感。所

---

① 该文后来在美国发表，见 Shen zhihua，"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 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37-242。

以，没有民间自发的渠道，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很难起步。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情况大大改观。华东师范大学在陈兼教授的倡议下，在国内首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几年后，学校领导投入大量资金，中心不断引进人才，连续开发项目，招收研究生，开设专业课，还办起了专业杂志和网站，从国外购买了大量档案文献，并加强了国内学者之间以及同国外学者的交流。这时，"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2009年夏，各校冷战史研究者在张家界会议上提出：共建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论坛，共同加强杂志和网站的建设。相信这支队伍将继续活跃在冷战史国际学界的前沿。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论"，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目前，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已经相继解密了冷战时期从杜鲁门到福特各位总统的档案。弗杰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总统录音项目则收集了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六位总统大约5000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其中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和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将大批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其中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由莱斯公司（LexisNexis）负责全球统一销售。[①] 此外，上述各冷战研究机构的网站，以及一些专业网站——如圣塔·克劳拉大学的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也

① 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已购买近2000卷缩微胶卷，目前正在整理目录，并将在网站公布。

大都发布各种档案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为督促政府解密档案所做出的努力，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有关中美缓和的基辛格文件、尼克松文件，就是在他们的催促下得以及时解密的。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蒋介石日记，也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至于学者最常使用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系列文献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目前已经陆续上网，研究者可以自由下载。

英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解密，外交部编辑出版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8卷（1945—1950）；第二系列4卷（1950—1960）；第三系列5卷（1960—）。在意大利，备受关注的是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并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①]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②]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俄国档案的收集和使用主要依靠三个来源。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披露者的主观色彩，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1960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

---

① 关于俄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 Mark Kramer，“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Progress and Pitfalls”，*CWIHP Bulletin*，Issue 3，Fall 1993，pp.18-39；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

② 参见 *Чубарьян А.О.*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7，№.6，с.3-22。

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这些文件集对于冷战史专题研究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编者的选择未必全面，有些关键性档案还要研究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此外，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献虽然显得分散零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

在俄国档案馆收缩的同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馆开始陆续对外开放。笔者最近去东欧和中欧七国访问，参观了二十多个档案馆。那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在几年前已全面开放，特别是前共产党的档案，没有解密期限制。这种状况，对于研究者了解冷战时期铁幕另一边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东欧各国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俄国和中国档案管理政策紧缩的不足。目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较多利用的有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档案，以及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东德档案。一些国家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也收藏和整理了大量专题档案，如匈牙利中欧大学社会档案馆收藏的自由欧洲电台档案，匈牙利冷战研究中心所从事的项目：1945—1991年苏联集团活动年表、1988—1991年共产主义瓦解与冷战结束、匈牙利与东西方关系等。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与冷战国际史项目或平行历史项目（PHP）合作，在这两个中心的网站或杂志上经过公布他们整理的各国档案，其内容涉及共产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苏南关系、阿南关系、中朝关系，以及罗马尼亚与华约关系、罗马尼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南斯拉夫与冷战、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事件的专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东欧各国档案的开放将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意义不亚于90年代俄国档案的解密。这一点，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收集、整理和翻译东欧档案的项目。

在亚洲，经过若干年的整顿，目前台湾的档案开放最为规范，使用也十分便利。应广大学者要求，内容丰富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几年前已从台北郊区的

北投外交部档案馆移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数位化整理，至 1975 年以前的所有档案均制成可供下载的 PDF 格式，使用者也可以上网查询目录。此外，“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目录中也有大量涉及冷战历史的档案，为了方便使用者，“国史馆”今年已在台北市内开设阅览室。香港大学的主图书馆则是亚洲地区收藏美国、英国档案（缩微胶卷和缩微胶片）最多的地方。

根据《国家公文书公开法》，自 1976 年以来，日本政府分 21 批陆续解密了外务省所藏战后的档案。目前档案的解密时间已到 1972 年，从解密的卷宗主题看，首先是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美关系的文件，其次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政策、对中国海峡两岸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以及日本与阿拉伯世界各国、拉丁美洲各国和欧洲各国关系的档案，都已基本解密。[①] 此外，日本学者还注重整理和出版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对日政策档案。

韩国的国家档案馆也是对外开放的，但很少看到韩国学者直接引用韩国档案，据说是因为卷宗管理混乱，不易查找，外交通商部也没有专门的档案馆。不过，韩国学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有关朝鲜战争及此前的档案，韩国本身的文件大部毁于战火，但学者们注意收集和编辑了主要参战国的档案。如美国文件：原主文化社 1993 年编辑、出版的《1945—1948 年驻韩美军军政厅官报》、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 1995 年编辑、出版的《美军政期情报资料集（1945—1949 年）》等。中国文件：将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文献集。俄国档案：把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 900 余件档案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此外，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人，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 2009 年 5 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的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① 有关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的卷宗目录及各批解密档案的数量，可以在日本外务省网站浏览。其网址是：http：//www.mofa.go.jp/。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也公布了档案法，解密年限为30年。但是迄今为止，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近年来的俄国相比，中国大陆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开放程度极其有限，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各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档案，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开放。据说在1998年档案法修订和公布以后，有关机构还下达了“十不准看”的内部规定，照此排列下来，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就所剩无几了。甚至南京的第二档案馆，尽管都是民国时期的文件，一般学者也很难看到。省级档案虽然好一些，但也有类似现象，而且很具中国特色——人际关系超于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主管部委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是无从了解的。不过，也有例外，外交部的档案已于2004年对社会公开，到目前为止已经分三批解密了1949—1965年的档案。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

其二，中国的高层档案文献主要是经专门机关挑选和编辑后出版的，其优缺点如上所述，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的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一文件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为可怜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

中国限制档案开放的做法，最终受害的是中国自己。同一个事件，你不解密，人家解密，结果是研究者只能利用国外档案进行研究，不仅话语权旁落，也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历史真相。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还是重在为社会提供和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

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学者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地方档案进行个案研究，就是一个突破口。面对21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公开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也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的。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都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如果这些单位联合起来，对于中国学者利用档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自不待言，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至于研究冷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危机，就更离不开对多边档案的利用了。以朝鲜战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所发表和披露的各国档案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惟其如此，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其他像研究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总之，对于读冷战国际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没有档案文献的题目是不会去做的，做了也不会通过。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重建历史事实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

构建历史事实。

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区别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淡漠了，人们才发现，原来冷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例如，过去研究者以为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 1950 年 1—2 月曾在莫斯科秘密会面，从而产生了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共谋论”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金日成 4 月 10 日到达莫斯科，而毛泽东在 2 月 17 日已经离开了那里。没有这种对史实的重新认定，研究者就无法了解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过程和真正原因。还有，过去人们都认为，在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是毛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周围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了，在 10 月 19 日和 20 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新的史实认定并不否定中国后来在促成苏波关系缓和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却很可能导致对中、苏、波三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类似的案例在新冷战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整个冷战历史的过程正在重建，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在史实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也不排除会发生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其总体目标是澄清史实，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和准确的判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观点方面的辩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由于新的档案文献大量地、成系统地涌现，冷战史研究不得不着力于重构历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档案正在不断地、陆续地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

4. 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中盛行的国际合作

冷战国际史研究国际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决定的。

冷战史学者的国际合作首先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面。凡是参加冷战国际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带来了什么新的档案，会议组织者也经常要求各国学者带来相关的档案或信息。休会和茶歇时，会场内外见到的都是学者们在交流档案资料。这种景象在冷战史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均可见到。有些会议的主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最新解密的档案，如 2006 年 2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与亚洲冷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在国际学界亮相。还有的会议则是专门为了促进某一国家的档案开放，如 2000 年 1 月在河内、2003 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及 2009 年 6 月在威尔逊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印度与冷战”，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上述活动，并广泛邀请国外学者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讨论。一般说来，冷战史的学术讨论会只要稍具规模，就一定是国际会议。

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中苏同盟破裂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大改组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美关系缓和造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其对多重双边关系的影响，还有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匈事件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了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如威尔逊中心与乔治·华盛顿大学每年夏季组织的档案培训班，华东师大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连续举办的两次冷战史中美博士论坛，都极受各国学生欢迎。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同国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项目，如威尔逊中心组织的北朝鲜国际文献开发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华东师大最近设计的关于社会主义同盟理论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项目，都邀请了多国学者参与，组织了国际团队。此外，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与威尔逊中心商谈，准备明年在华盛顿设立驻美国的常设联络机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那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都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成果，因其对当代人记忆中的历史所进行的颠覆性描述和阐释而备受世人关注，甚至学术著作也能成为畅销书。不仅如此，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里重点介绍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关注和参与较多的学术成果。

1. 关于冷战起源和结束的讨论持续不断

冷战结束的最初几年，美国学术专著、报刊杂志甚至国家领导人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冷战的起源，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传统派的观点，认为苏联应对冷战的出现承担责任。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美国和西方所取得的胜利。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最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盖迪斯在 1997 年出版的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作者是以胜利者的心态和姿态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认为冷战的形成都是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冷战的结束则是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像里根、撒切尔这样强硬派和保守派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①] 盖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在中国也颇有影响。不过，冷战史研究学者中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学者对他提出批评，如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斯大林有失偏颇；把冷战的结束看成是正义战胜邪恶则忽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现象；认为 70 年代美苏缓和只是维持战后的均势就低估了西欧国家的重要性；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如何影响冷战的进程缺乏关注和认识等。[②]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9·11”

① John Gaddis, *We Now Know*. 关于这种看法还有一部比较典型的著作：Norman Friedman, *The Fifty Year War:Conflict and Strategy in the Cold War*,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0。

② Carolyn Eisenberg, “Review of We Now Know by John L. Gaddi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4, No. 4, March 1998, pp.1462-64; David Painter, “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 6, No. 4, November 2006, pp.527-34; Geir Lundestad, “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John Lewis Gaddis”, *Cold War History*, Vol. 6, No. 4, November 2006, pp.535-42.

事件的发生使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顿时消失，“历史终结论”也很快被人遗忘，人们需要再次重新审视冷战。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 2007 年出版的弗杰尼亚大学教授莱夫勒的专著《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作者强调：导致冷战爆发和延续的主要因素在于美苏的国内体制及国际机制，对美国政策提出了更多的批评；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个人起了主要作用。[①] 中国学者对于冷战的起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角度提出了新看法[②]，有的认为苏联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斯大林的冷战战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③]。

2. 关于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引人注意

俄国档案馆开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界掀起了引人注意的热潮。在英语世界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马斯特尼的《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他的观点与盖迪斯比较接近，认为斯大林由于从不相信别人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不断寻求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苏联的周边地区。[④] 旅美俄裔学者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合著的《克里姆林宫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充分利用了大量公布的俄国档案，重点在于描述战后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强调领袖个性、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在冷战初期的重要性。[⑤] 祖博克的新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冷战》，则全面地考察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及社会走向。[⑥] 在这方面，俄国学者自然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对苏联参与冷战的研究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冷战结束初期，俄国学者依靠集体的力量，侧重于利用新档案比较全面地描述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研究很快就扩展开了，有的讨论冷战起源，有的研究缓和年代，有的专

---

① Melvyn 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Hill and Wang，2007.

② 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世界历史》，2003 年第 6 期。

③ 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5、6 期；《斯大林与 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探索与争鸣》，2008 年第 2 期。

④ 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⑤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⑥ Vladislav Zubok，*A Failed Empire: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

门考察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还有的集中探寻苏联的核计划和核政策。俄国学者研究最深、成果最多的主要体现在战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领域。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俄语人才短缺。现有比较重要的成果主要是张盛发的一部专著和笔者的几篇论文。[①] 最近几年年轻学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从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即可看出，其中涉及苏捷关系、苏以关系、特殊移民、犹委会案件、阿富汗战争等等。

3. 对于中美关系的考察经久不衰

中美关系是冷战国际史最早吸引研究者的领域之一，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到期解密的档案逐渐增多，人们的关注点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冷战结束后不久，在中美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最初比较感兴趣的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初中美关系是否有可能实现正常化的问题，即以往美国冷战史各学派有关“失去的机会”的争论。研究者根据新的史料再次进行了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失去机会”。他们强调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已经建立的良好关系使毛泽东在 1949 年不愿意去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有限的外交及贸易联系不足以构成中美和解的契机。[②] 随后，人们较多研究的是 50 年代的中美冲突问题。学者们对中美冲突的起源、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台海危机等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著。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档案解密后，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开始转向中美和解的进程。吴翠玲的专著讨论从 1961 年到 1974 年美国关于中美和解政策的实施过程，认为美国官场在 60 年代就开始提出并讨论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③] 朗巴斯的新著则考察约翰逊政府为改善对华关系所采取的一些新举措，并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的思想是建立在约翰逊政府对华新尝试的基础上的。[④] 伯尔、詹姆斯曼、唐奈心、夏亚峰以及麦克米伦等学者的著作，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对 70 年代初

---

① 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

② Warren Cohen，Chen Jian，John Carver，Michael Sheng，and Odd Arne Westad，“Rethinking the Lost Chance in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 21，No. 1，Winter 1997，pp.71-115.

③ Evelyn Goh，*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④ Michael Lumbers，*Piercing the Bamboo Curtain: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during the Johnson Year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8.

中美关系缓和进程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1] 中国学者最早参与国际讨论的课题就在这一领域，领衔者是资中筠、陶文钊等，跟进的有章百家、时殷弘、牛军等，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有一批优秀成果问世。那时中国中美关系研究完全可以同美国学者媲美。[2]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中美缓和时期的美国档案继续开放，而中国档案很少见到，所以中国的研究人数虽然很多，但基本上是跟在美国学者的后边走。即使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发表，其作者也是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3] 无疑，中美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

4. 对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迈上新台阶

由于以往难以见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大量披露，冷战国际史学者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进行了详尽讨论[4]，旅美华人学者张曙光、在加拿大教书的瑞士籍学者吕德良和在中国工作的俄国学者拉琴科从不同的角度和时段，集中研究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5]；美国学者陈兼讲述毛泽东的对外政策，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政策，但主要落脚点都是中苏关系。[6] 此外，笔者还看到一部英文的博士论

---

①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James Mann, *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William Kirby, Robert Ross, and Gong Li (eds.),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Nancy Tucker, "Taiwan expendable? Nixon and Kissinger go to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2:1 (2005), pp.109-135; Xia Yafeng,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n House, 2007.

② 最近发表的重要成果有何慧的《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版)、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③ 如张曙光的《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版)。

④ 原文为德文，中译本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年版。

⑤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⑥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Eliza 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文，作者利用了大量俄国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材料，讨论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①] 在俄国，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党内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政策进行辩护。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②] 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关于中苏边界问题。[③] 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④] 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目前已经走到世界前列，其中特别是杨奎松、李丹慧、牛军和笔者本人的研究，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很多论文和专著已经或正在译成英文。[⑤] 中国学者的突出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使用中国和俄国的双边档案，这就比西方学者占了先机；二是中国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和对史料的解读要胜过西方学者，毕竟中国人对苏联的理解更为深刻。例如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的讨论，中国学者的看法对现在通行的国家关系理论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挑战。[⑥]

5. 朝鲜战争仍然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课题

朝鲜战争不仅在东亚各国脍炙人口，在美国也是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各有关

---

① Douglas Stiffler，*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7*. 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2002.

② *Брежнев А.А.* Китай：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Москва：НИМ，199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 РАН，2000；*Рахманин О.Б.* 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XX веке，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2.

③ *Ткаченко Б.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Владивосток：Уссури，1999；*Мясников В.С., Степанов Е.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1；*Попов И.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300 лет на грани войны，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4；*Рябушкин Д.С.* Мифы Даманс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4；*Ивасита А.* 4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АСТ，Восток-Запад，2006.

④ *Бармин В.А.*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гг.，Барнаул：Изд-во БГПУ，1999；*Зазерская Т.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ИИХ СПБГУ，2000；*Мартыненко В.П.(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г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РАН，2005.

⑤ 详见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清华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

⑥ 详见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 年版）的跋。

国家的档案大量解密，为新的研究注入了活力。除了比较全面地讲述战争过程的专著[①]，学者们还充分利用新档案、新史料考察了美国以外的国家参与这场战争的情况。关于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学者们不仅讨论了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及苏联在战争起源和停战谈判中的作用，还描述了苏联空军参战的情景。[②] 至于中国与朝鲜战争，讨论比较集中在中国出兵及其在战争中的形象等问题上。[③]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美国的盟国与战争的关系，如日本、英国、土耳其等。[④] 即使在朝鲜战争研究中最为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战俘、细菌战等问题，也有不少学者涉

---

① 其中比较有影响著作包括：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蔡汉国、郑锡均、梁宁祚：《韩国战争》（三卷），首尔：国防军史研究所印行，1995—1997 年；*Валковский Н.Л. гла. ред.*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1950-1953，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ПОЛИГОН，2000；*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William Stueck，*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和田春树：《朝鲜战争全史》，东京：岩波书店，2002 年版；Alan J. Levine，*Stalin's Last War:Korea and the Approach to World War III*，Jefferson，North Carolina，and London：McFarland & Company，Inc.，Publishers，2005。

② 如 Kathryn 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New Documentary Evid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1993，Vol. 2，No. 4，pp.425-457；"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No.8，1993；"Korean，1949-50：To Attack，or Not to Attack? Stalin，Kim Il Sung，and the Prelude to War"，*CWIHP Bulletin*，Issue 5，Spring 1995，pp.1-9；*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21-146；*Волохова 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c.96–110；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2002。

③ 全面研究的有陈兼和张曙光的专著，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Shu Guang 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还有一些论文也值得注意：Thomas Christensen，"Threats，Assurances，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2，Vol. 17，No. 1，pp.122-150；Philip West，"Confronting the West：China as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1993，Vol. 2，No. 1，pp.5–28；V. Petrov，"Mao，Stalin，and Kim Il Sung：An Interpretative Essay"，*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1994，Vol. 13，No. 2，pp.3–30；Michael Sheng，"Mao，Tibet，and the Korean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8，No. 3，Summer 2006，pp.15-33。

④ Roger Dingman，"The Dagger and the Gift：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Japan"，*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 2，No. 1，1993，pp.29-55；Michael Hopkins，"The Price of Cold War Partnership：Sir Oliver Franks and the British Military Commitment in the Korean War"，*Cold War History*，Vol. 1，No. 2，January 2001，pp.28-46；Çagdas Üngör，"Perceptions of China in the Turkish Korean War Narratives"，*Turkish Studies*，Vol. 7，No. 3，September 2006，pp.405-420.

猎。[①]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关于铁幕另一边的故事，西方人如雾里看花，很难说清。在原来的东方阵营中，朝鲜学者闭目塞听，基本看不到他们的成果，俄国学者大多囿于传统，很少有所创建。[②] 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早在 80 年代末就开始突破了以往的传统看法。[③] 随着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对于中、苏、朝一方参与战争的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在战争起源、中国出兵、中朝关系、停战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④]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还有很多，如核武器的研制与核政策问题、马歇尔计划、苏南冲突、共产党情报局、柏林封锁危机、东柏林骚动、波匈事件、华约与北约的对抗、台湾海峡危机、柏林墙的建立、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阿富汗战争、波兰团结工会等等，无论是老题目，还是新领域，由于这些研究主要依据的是冷战结束后各国解密的档案文件，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学者对于其中某些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⑤]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冷战国际史在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

---

① Laurence Jolidan，“Soviet Interrogation of U.S. POWs in the Korean War”，*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23-125；Kathryn Weathersby，“Deceiving the Deceivers：Moscow，Beijing，Pyongyang，and the Allegations of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Use in Korea”，*CWIHP Bulletin*，Issue 11，Winter 1998，pp.176-185；Milton Leitenberg，“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Background and Analysis”，*CWIHP Bulletin*，Issue 11，Winter 1998，pp.185-200；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Milton Leitenberg，“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eapon Allegations：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Disclosures”，*Asian Perspective*，24（3），2000，pp.159-172. 笔者在台湾冷战时期海峡两岸的历史发展研究生工作坊（2008 年 8 月）还看到一篇专门研究中国战俘的论文，David Chang，“Huijia（To Return Home）：The origins of the forcible screening for voluntary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POWs during the Korean War”。

② 值得注意的成果见 *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

③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版。

④ 参见邓峰：《朝鲜战争研究在中国：十年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 第 9 期，第 116—125 页。

⑤ 值得提及的是年轻学者也开始加入了讨论，如对美国外层空间政策（张扬）、美国核战略（詹欣）、苏联核武器研制（刘玉宝）、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肖瑜）、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姚百慧、丁祖煜）、波匈事件（胡泊、郭洁）、阿富汗战争（李琼、李晓亮）、美国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反应（葛腾飞、汪婧、樊百玉）等问题的研究。

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1. 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两极结构，所谓冷战就是以美苏各自为首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集团）的对抗，所以冷战国际史研究始终笼罩在大国关系的光环下，学者们很自然地也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考察美苏两国关系或两大阵营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结果。“9·11”事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西方集团中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丹麦、芬兰、冰岛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对于第三世界众多处于冷战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目前，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大国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的角度从事考察，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当前这些地区动荡的根源。或者说，是研究冷战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和结果。不久前文安立出版的专著《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作者研究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了这种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文安立认为，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对抗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则代表了冷战中最主要、最核心问题，第三世界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他们在这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①

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还有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如果说前者倾向于讨论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在两极世界格局的影响下被动地卷入冷战的，那么后者的出发点则在于

---

① Odd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还可参见：Jeremi Suri，*Power and Protest: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Jeffrey Engel（ed.），*Local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Cold War*，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考察边缘地区和国家是如何向两极世界挑战，从而影响了美苏两国的政策。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著《解放的制约——蒙古独立、中国领土属性和大国霸权的历史纠葛》的导言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始终保持“冷战”的状态，而在边缘地区则“热战”连绵不断。[①] 另一部受到关注的著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康纳利教授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作者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之间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仅用传统的冷战眼光来看待 1945 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和不全面的。[②] 中国学者对第三世界的研究主要是由年轻一代完成的，他们很多人一进入冷战史研究的大门便选择了这一新的领域，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虽然还不是很多、很成熟，但从这几年博士论文的选题看，中国在冷战与第三世界这个领域的研究必将迅速发展起来。[③]

其实，正是这种对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才会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

2. 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发展趋向就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事跨学科的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纳兹在其所著《一个被分割的世界：1945 年以来的全球

---

① Liu Xiaoyuan，*Reins of Liberation: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② Matthew Connelly，*A Diplomatic Revolution: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③ 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可见戴超武的《1965 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世界历史》，2008 年第 2 期)、《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赵学功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简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计划》(《南开学报》，2007 年第 5 期)，姚昱：《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舒建中的《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 年第 6 期)，刘莲芬：《1960—1962 年老挝危机与美泰关系》(《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1 期)，孙德刚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与美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代兵的《日内瓦会议与老挝、柬埔寨的中立》(《社会科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王延庆的《美国对南非核政策的演变》(《历史教学》，2008 年第 20 期) 等。

史》一书中提出，战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全部装在冷战这个盒子里的”，美苏冷战“分割”了世界，但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经济、民族、文化、宗教、南北差别、性别差异等问题，冷战的出现无疑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但同时又反过来深受这些社会问题的影响。他在书中系统地描述了一些与冷战根本不相关的事情，如非殖民化进程、科技发展、文化趋向、社会变革以及所有这一切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后强调：“冷战只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而非时代本身。”① 作者是要提醒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冷战本身，不能把研究的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史范畴，还必须全面考察在这一时代发生的其他事件和问题。

当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无法取代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各类专门史研究，但重要的是，关于战后以来这些问题的考察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冷战这个核心问题，因为它们都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的框架下发生和发展的；同样重要的是，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溶合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时代本身。在这方面，目前已有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成果中比较多的是关于“经济冷战”、“文化冷战”以及“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并以此为书名，讲述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及其对中苏同盟造成的经济压力。②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西蒙诺夫的研究对象是苏联的军工综合体组织，论证了苏联制度下的这一特殊经济部门如何担负着国家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职能，决定着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同时又成为国家安全系统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武装力量军事技术组织的性质。③“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④，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

① David Reynolds，*One World Divisible: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New York：Norton，2000.

② Zhang Shu Gu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③ *Симонов Н.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оды：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структура，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6.

④ Walter L. 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7；Jessica C.E. Gienow-Hecht，*Transmission Impossible: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Baton Rouge：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Volker Berghahn，*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Shep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果[①]，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②]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开展"舌战"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③]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

中国学者对经济冷战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美日、美韩、中苏关系方面，成果比较显著。[④]于群集中研究心理冷战，取得不少成果。[⑤]对于文化冷战的研究相对比较落后，成果还很少见到。[⑥]

---

① John E. Bowlt and Dmitrii Sarab'yanov, "Keepers of the Flame: An Exchange on Art and Western Cultural Influences in the USSR After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4, No. 1, Winter 2002, pp.81–87; Victor Rosenberg,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53–1960,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Jefferson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5; Jeffrey Brooks, "Stalin's Ghost: Cold War Culture and U.S.-Soviet Relations", in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pp.115–134.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 ред.)* Восток-Россия-Запа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р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Tony Shaw, "The Politics of Cold War Culture"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3, Fall 2001, pp.59-76; Patrick Major and Rana Mitter,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Toward a Comparative Socio-Cultur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 4, No. 1, October 2003, pp.1-22.

③ *Наджафов Д.Г.* Сталинский Агитпроп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о архивным фондам ЦК ВКП (б) и МИД СССР// *ИВ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 1998, с.205-227; *Фатеев 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Москва: ИРИ РАН, 1999; James B. Critchlow, "Western Cold War Broadcasting",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 No. 3, Fall 1999, pp.168-175; V. Pechatnov, "Exercise in Frustratio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5-47", *Cold War History*, Vol. 1, No. 2, January 2001, pp.1-27; *Рукавишников В.О.*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холодный мир: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в США и Европе о СССР/Росс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Запада,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Ira Chernus, "Meanings of Peace: The Rhetorical Cold War after Stalin", in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pp.95–114.

④ 其中最突出的是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他还有沈志华的《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版）、邓峰和杜宇荣的《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美国对华政策与中日贸易（1950—1952年）》（《日本研究》，2008年第2期）、姚昱和郭又新的《1953—1956年美国的橡胶政策与国内政治》（《世界历史》，2007年第6期）、梁志的《美国对外开发援助政策与韩国的经济"起飞"》（《当代韩国》，2009年春季号）以及谢华的《冷战时期美国粮食外交的历史演变（1954—1969）》（《历史教学》，2009年第6期）等。

⑤ 于群：《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略计划项目初探（1951—1960）》，《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第83—90页；《"特洛伊计划"——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探微》，《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第5—12页；《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68—82页；《论美国在伊拉克进行的心理战（1945—1958）》，《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第47—53页。

⑥ 在这方面尝试的有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美国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总第79期）；于群：《战后初期美国在伊朗开展的冷战电影宣传战略（1945—1953）》，于群主编：《美国国家安全与冷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3—293页。

3.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为国际关系史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开拓空间，那么这一结果的突然来临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专家而言，遇到的则是严峻的挑战。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① 正像文安立所言，冷战国际史（新冷战史）"是一个让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迎头冲撞的领域"，现实主义固然因为国际体系的变化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解释能力，结构主义也由于受到某些固有模式的束缚而很难对冷战进程中复杂的现象做出更好的说明。②

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兴高采烈地找到的大量渴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中，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其数量多的惊人，不仅大量有关中苏两党高层内部的讨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已经为人所知，甚至像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的卧室专门改建厕所、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在北京机场发表讲演时扩音器突然中断这样的细节，都可以得到确实的考证。面对越来越清楚的史实，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使用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利益说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了。正是依据同盟是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一框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在 1950 年代初认为既然中苏已经结盟，那么就是铁板一块了——殊不知恰恰此时，斯大林因在中苏条约谈判中被迫向毛泽东让步而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怀疑；在 1960 年代初他们又认为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的同盟是不会破裂的——殊不知时隔不久，中苏两国便分道扬镳了，而导致他们分裂的并非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③ 显然，维系中苏关系的不仅仅是利

---

① 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质疑，主要见 John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7，No. 3，Winter 1992/1993，pp.5-10；Jeffrey Checkel，"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50（1998），pp.324-348；William Wohlforth，"Reality Check：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50（1998），pp.650-680。

② Westad（ed.），*Reviewing the Cold War*，pp.7-10.

③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报告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 9、12 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版。

益，甚至主要不是利益，那么应该如何来解释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呢？于是，冷战史研究者开始尝试建立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有学者提出了国内政治需要说，如陈兼就认为，中国革命的国内使命决定了其国际使命，外交政策是“国内动员的源泉”，为此，“毛泽东在国际关系方面故意制造敌人”。[①]还有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分歧说，如吕德良认为，莫斯科和北京在关于如何“正确”解释和实践共产主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中苏双方由此相互指责对方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没有意识形态之争，中苏也不可能分裂。[②]甚至有学者从性格和心理状态的角度分析毛泽东的对苏立场，如盛慕真就用精神分析法来描述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认为领袖的个性缺陷和心理障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因素。[③]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中苏关系的兴衰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历史学家正在尝试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意。笔者和李丹慧即将出版的《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一书，会提出一个对中苏分裂过程和原因的新的分析框架，也许有益于推动这一讨论。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及同盟理论研究，也将从事这方面的尝试。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在出版的由莱夫勒和文安立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④]该书的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际史，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外交史，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之外，还要说明的是冷战时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

①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8、180.

② Lorenz Lüthi，*The Sino-Soviet Split*，pp.46-50，63.

③ Michael M. Sheng，“Mao Zedong's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China's Road to Disaster”，in Ofer Feldman and Linda Valenty（eds.），*Profiling Political Leaders: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Lond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1，pp.111–128；“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Modern China*，Vol. 34，No. 4，October 2008，pp.477–507.

④ Melvyn Leffler and Odd Westad（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I: Origins, 1917–1962; Vol. II:Conflicts and Crises, 1962–1975; Vol. III., Endings, 1975–199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2010.

最重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了解经济、思想和文化互动是如何影响政治话语、外交事件、战略决策的，才能理解冷战的起源和结束。这部巨著的大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方法论方面，该书力图做到综合性、比较性和多元性的结合。可以说，这部著作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最前沿、最权威的学术成果，也反映了这一研究的发展趋势。

近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和权力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冷战年代。[①] 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今后又将如何发展和演变？回答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思考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历史运动规律、应对现实国际问题提供必要的战略性思考和历史借鉴。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把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

① 关于“新冷战”问题的集中讨论，见《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5 期“热点聚焦”栏目。

序　言

这个文集收录了我过去所写的有关冷战史的13篇中文文章，其中多数曾经在专业期刊和学术论文集中发表过。除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西方冷战史研究状况的述评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基于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实证性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对冷战在亚洲的起源和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反映了我多年来力图从“国际史”的多维角度探索冷战时期中美对抗关系的学术追求和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冷战初期作出的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对冷战在亚洲地区的蔓延和扩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与苏联结盟？要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既要重视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中国革命内在逻辑的作用，又不能忽视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对中共领导人决策的影响，因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决策人头脑中已经具有的观念与国际事态之间互动的产物，外部事态的发展可以印证或者改变外交决策人头脑中的认知和看法。本书第1章通过分析战后美国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来说明美日反共同盟的形成是如何影响毛泽东的冷战思维和决策的。

中苏同盟的缔结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重大冲击和挑战。如何制造中苏矛盾和分化中苏同盟是美国官员经常思考的问题。本书第2章勾勒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所谓“楔子战略”的产生和发展轨迹，比较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为实施此战略所采取的不同手法和策略。中美对抗是亚洲冷战中的突出矛盾。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我们不仅要解读美国外交决策人的观念、信仰、看法和对历史的记忆，不仅要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作用，还应该重视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同盟关系的制约。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探究：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与其主要西方盟国是如何互动的？美国的西方盟国在中国问题上是如何牵制华盛顿的？本书第3至第7章回顾了美国与英法在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所产生的诸多分歧，并分析了导致这些分歧产生的原因。美国同英法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龃龉和步调不一，反映了冷战中西方阵营内部在协调

对华政策方面的困难和窘境，折射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曲高和寡。分析美国同英法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将美国对华政策置于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复杂国际因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作用。

越南战争是亚洲冷战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它对中美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而又令人意外的影响。1960 年代初期，美国领导人之所以急于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就是因为他们视中国为对东南亚安全的最大威胁，他们要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但是，到了 1960 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随着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领导人转而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借中国之力从印度支那脱身。于是，越南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 1960 年代上半期，美国为了遏制中国而大规模干涉越南，越南问题使中美对抗进一步加剧；而到了 1960 年代下半期，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转而希望中国帮忙终止印度支那冲突，越南问题又成为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和助力。套用一句中国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不妨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说成是：兴也越南，衰也越南。本书的第 8 章和第 9 章剖析了美国约翰逊政府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的决策过程，讨论了影响约翰逊总统的越南决策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记述了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解释了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调整之间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既是方针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还是主要谈判代表。本书的第 10 章和第 11 章通过考察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对中越关系的处理，来揭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领域里的独特作用和贡献。

冷战时期，中国和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一度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1964 年中国领导人甚至向柬埔寨作出安全承诺，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史上是极其少见的（1964—1965 年中国同巴基斯坦建立的准同盟关系是另一个罕见案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的“特殊关系”。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对一个东南亚小国予以如此高度的关注？为什么柬埔寨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本书第 12 章解析中柬“特殊关系”形成的由来，梳理 1954 年至 1965 年中柬关系发展的脉络，揭示影响中国对柬政策的主要考虑，并用中柬关系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冷战外交的一些特点。本书最后一章介绍和分析了苏联解体以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冷战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势和特点，评价其成就和不足。

目 录

美日同盟与毛泽东的“一边倒”决策（1947—1952）

1949 年夏，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做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明确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在美苏冷战对抗中将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少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强调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念以及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对共产主义抱有强烈的信仰，信奉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学说，同情并认同斯大林与苏联共产党，仇视资本主义制度，把中国革命视为俄国革命的继续。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取向的影响，在面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自然地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与苏联结盟。[①] 强调中共领导人的革命信仰和价值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外交政策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源，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共的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斗争的关系。但是，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是决策人头脑中已经具有的观念与国际事态之间互动的产物。国际事态的发展可以印证或者改变外交政策制定人头脑中的认知和看法。比如，美国战后在亚洲采取的遏制革命的政策，特别是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对毛泽东的冷战思维和决策就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证实并强化了毛泽东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对美国威胁的认识，勾起了他对历史上日本侵华罪恶的回忆，加剧了他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敌视，坚定了他要与斯大林合作的决心。但是，浏览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冷战初期中共外交政策的著作，却很少能看见有作者论述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如何

①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影响中共外交政策的制定的。

本文认为，在解释中共外交政策形成原因时，既应分析中共决策人的意识形态理念与看法，又应考察国际事态是如何作用于这些理念与看法的。在目前的中美关系研究中，存在着忽视美国政策对中共外交战略的影响的倾向。为了纠正这一缺陷，本文将着重论述日本在中美对抗的产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冷战初期日本在美国遏制东亚革命的战略中起什么作用？美国重新扶植日本并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做法是如何影响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意图的看法的？美日同盟的出现与中苏联盟的产生有什么关系？美国通过日本来遏制东方革命的做法是如何影响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的？

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

1945 年日本战败，美国占领日本并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占领当局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领导下，以美国民主模式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具体措施包括：惩罚战争罪犯；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治犯，包括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制定新宪法，剥夺天皇的实际作用，树立“主权在民”的思想；废除贵族头衔，实行全民普选；开展土地改革，纠正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的状况，减少佃农的数量；解散大垄断财团，削弱金融和工业巨头；颁布有利于劳工的法案，允许工人自由结社和罢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女工和童工；改革教育制度，删除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和神道教内容，开除教师队伍中的右翼分子；用美国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改造日本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忠君尚武文化。[①]

从 1947 年开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变化，政策重点从民主改革转向扶植日本经济的发展。导致美国政策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美苏冷战的加剧。1947 年 3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国会拨款，以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抵抗共

---

① 有关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民主改革的详细论述，参见 W.G. Beasley,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Since 1850*,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213-226;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Hiroshi Kitamura, *Screening Enlightenment: Hollywood an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Defeate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有关战后美国对日本看法的变化，参见 Naoko Shibusawa,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有关美国占领日本的史学史述评，参见 Laura Hein, “Revisiting America's Occupation of Japan,” *Cold War History*, Vol. 11, No. 4 (2011), pp.579-599。

产主义威胁。“杜鲁门主义”随之诞生，并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宣言书。它表明美国决心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协助处于苏联周围的国家抵抗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很快影响到其对日政策。为了在东亚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需要重新扶植日本的经济，把日本的经济资源和力量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去，使日本成为美国的坚定伙伴。

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改变对日政策的官员主要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Kenneth Royall）等。凯南是始作俑者，他非常重视日本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他反复强调，世界上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五个中心是：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以及日本；美国必须防止苏联控制这五个中心中的四个中心，即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以及日本。[①] 凯南认为，战后苏联对西欧和日本这些关键地区的威胁，不是直接的军事入侵，而是利用这些地区的政治瘫痪、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来操纵民怨，支持当地的共产党进行渗透和颠覆，直至夺权。[②] 凯南批评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削弱垄断资本、支持劳工权利、限制军事力量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做法，不利于日本的稳定和繁荣。他指出，麦克阿瑟的改革措施已经在日本造成社会动荡，引起日本经济的萧条和通货膨胀。一个政治上混乱、经济上崩溃、军事上软弱的日本只会给共产主义扩张以可乘之机。因此，凯南要求结束麦克阿瑟的政策，并建议推迟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等到日本建立了稳定的、有自信心的、亲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后再签；否则，一旦和平条约签订，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美军撤离。凯南的建议得到艾奇逊、马歇尔、福雷斯特尔、罗亚尔等官员的支持，并最后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9-30;Nicholas Thompson, *The Hawk and the Dove: Paul Nitze, George Kenn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icador, 2009), p.95.

②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255-256；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年，第 117 页。

获得杜鲁门总统的赞同。[①]

1947 年 5 月 8 日，副国务卿艾奇逊声称，美国必须协助日本经济发展，把日本建成亚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基地，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②] 1948 年 1 月，陆军部长罗亚尔表示，要重建日本的经济，使日本成为在远东遏制集权主义侵略的屏障。[③]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节节失利，美国官员急于扶植日本，把日本变成在亚洲维护美国利益、阻挡共产主义洪水的防波堤。1948 年 10 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3/2 号文件”指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是发展日本经济，扩大日本出口，将日本建成东亚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④]

从 1947 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停止解散日本大企业集团，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右翼战犯，允许他们重返政坛。为了阻止日本左翼势力的发展，美国占领当局开始限制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允许厂方开除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尽快复苏，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减少拆除和运走日本企业的设备（战后美国曾规定日本用其工业设备作为给受害国的战争赔偿）。[⑤]

日本是一个缺乏原料和市场的岛国。要使日本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为日本工业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这是一个使美国官员十分头痛的难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东北亚市场，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尤其依赖中国的市场。虽然有些美国官员一度曾设想用恢复中日贸易的办法来解决日本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同时诱导中共向西方靠拢，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但是，1950 年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随后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使得这些官员不得不放弃这一已经变

---

①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8-104；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19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Howard B.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2;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Aaron Forsberg,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Cold War Context of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Revival, 1950-19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②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97. 关于艾奇逊在美国对日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参见 Ronald L. Mc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 Dean Aches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1993)。

③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118–119.

④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132, 136–138.

⑤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得不现实的设想。为了给日本的产品寻找替代市场，他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杜鲁门政府此时积极支持法国,反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的原因。[①]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贫穷落后，经济基础设施薄弱，再加上那里的人民因为过去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抱有强烈的仇日情绪，美国想把东南亚变成日本产品新市场的希望未能实现。最后，美国不得不为日本产品打开自己的国内市场，以维持日本经济的繁荣，从而种下日后美日贸易摩擦的种子。

中共对美国扶日的反应

中国人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他们在强敌侵略面前不屈不挠，英勇反抗。还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必须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以保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阐明了中共对战后处理日本的意见。他说："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以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②]

中共领导人对美国重新扶植日本的做法十分警惕。他们担心美国帮助日本重建工业是为日本恢复军国主义创造条件。为此，他们坚决反对美国的对日政策。1947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提到中共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势力复兴。[③]很显然，毛泽东是把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和复兴日本力量的做法联系在一块考虑的。美国的援蒋和扶日行为证实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判断，加深了对美国企图破坏中国革命的担忧，坚定了要联合苏联、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必须指出的是，对美国扶日的抗议和谴责，在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分

---

① 关于美国为了确保东南亚为日本产品的市场而干涉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论述，参见 Andrew J. Rotter, *The Path to Vietnam: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29;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44–45 页。

③ 同上，第 63 页。

子、学生团体以及舆论界中，是一种普遍的情绪和反应。1948 年 5—6 月间，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学生们的行动得到了校方和教授们的支持。6 月初，347 名上海的大学校长和教授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扶日。在舆论界，《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反对美国扶日的社论和文章。① 因此，中共对美国扶日的反对，不仅是出于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 年以后的中美对抗，不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它还有更深刻的反美民族主义根源。

随着中国革命日趋接近全国胜利，毛泽东越加担心美国干涉中国革命。他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记忆犹新。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在新一年中的任务，包括渡江南进、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中央政府等。毛泽东在会上提醒全党要警惕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和实施“内部破坏”政策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关于美国出兵的问题，不去讲它不出兵，而是准备它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而不至于手足无措。②

美国扶日加深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政策的敌视。他们担心美国会联合日本的力量来破坏中国革命。麦克阿瑟总部促使蒋介石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举动加深了他们对美国企图扶植日本侵华势力的担心。1949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声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时中国国防上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最后严厉谴责美国的政策，指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③ 与此同

---

① 有关中国学生反对美国扶日运动的详细论述，参见 Hong Zhang, “Fan Meifuri: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Opposing the U.S. Rehabilitation of Japan, 194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Summer 1996), pp.183-208；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4。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536–537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民党卖国政府将日本侵华战犯遣回日本的声明》，1949 年 2 月 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110–112 页。

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在沈阳告诉苏联顾问科瓦廖夫（I. V. Kovalev）：他获得了一些有关美国军事计划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美国计划联合日本和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发动对中共和苏联军队的进攻，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①]不管刘晓掌握的情报是否属实，中共领导人对美日军事结盟的担心是显而易见的。

对美日威胁的忧虑促使毛泽东加快与斯大林合作的步伐。早在1947年中国内战全面展开时，毛泽东就曾计划访问苏联。但是，斯大林因为欧洲外交缠身，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4月和7月，毛泽东又两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斯大林因为忙于苏南冲突和苏美谈判，再度要求毛泽东推迟访问。后来中苏两党同意：毛泽东于1948年11月下旬访苏。但是，由于中国内战进程的飞速发展，毛泽东一时难以脱身。最后，经过协商，中苏两党决定由苏联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会谈。1949年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在和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米高扬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听了米高扬的话后，都颇感惊讶。他们表示，苏联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考虑。在谈到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时，毛泽东希望把苏联在那里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因为苏联可以保卫旅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在旅顺的基地了，就可以从旅顺撤军了。[②]毛泽东的这番话清楚地

① S.N. Goncharov, “Stalin’s Dialogue with Mao Zedong,” *Th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Winter 1991), pp.45-76. 刘晓所说的美国军事计划尚未在美国政府档案中得到证实。

关于4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详细论述，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袁明、[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William Whitney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列多夫斯基编著：《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李玉贞等译，《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1–84页；1996年第1期，第90–96页；1996年第3期，第77–83页。又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281页。

表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是促使他寻求苏联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加强中苏两党合作并取得斯大林的信任，毛泽东开始积极配合和响应苏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斗争。1949 年初，在莫斯科提出的裁军建议遭到美国拒绝后，新华社于 3 月 18 日发表社论，谴责美国是“战争挑衅者”。社论指出，美国政府拒绝与苏联进行和平谈判，拒绝苏联关于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建议，积极进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积极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这一连串的行为，把新的世界战争挑衅者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社论说，1945 年中苏为了反对和防止日本侵略而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关于旅顺大连的协定，“乃是对于远东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打击，和对于中国人民反侵略利益的远大保证。在中国人民今天和将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发展自己的人民民主建设的伟大的胜利的斗争中，苏联的友谊毫无疑问地是一个重大的极为宝贵的因素”。[①]

1949 年夏，蒋介石和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举行秘密会谈，讨论成立“太平洋反共联盟”，并计划邀请南朝鲜的李承晚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参加。[②] 中共领导人对这一动态十分关注。他们认为，“太平洋反共联盟”计划的出笼是美国一手操纵的，是美国企图破坏东亚革命的阴谋。7 月 17 日，新华社发表题为“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和远东人民的新阴谋”的短评，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短评指出，“蒋介石、季里诺和李承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季的这次会谈及其进行中的新阴谋，显然是由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在谈到“太平洋反共联盟”的目的时，短评认为，美国策划组织这个同盟，“为的是想利用这种较不露骨的方式，假季里诺等傀儡之手，援助国民党残余匪帮作垂死的挣扎”。“太平洋反共同盟”是一个“罪恶勾当，不仅是为了反对中国人民，而且还为了反对菲律宾、朝鲜、日本以及远东其他国家的人民”。短评最后呼吁远东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反对美国及其走狗的阴谋。[③]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宣告中共在美苏对

---

① 新华社社论：《全世界和平力量动员起来粉碎战争挑衅者的阴谋》，1949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500–503 页。

② David W. Mabon, “Elusive Agreements: The Pacific Pact Proposals of 1949-195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8), pp.147-177;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pp.72-73; 吕芳上：《总裁的“首脑外交”：1949 年蒋中正出访菲韩》，载吕芳上主编：《蒋中正日记与民国史研究》上册，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上册，第 351–370 页。蒋介石很害怕美国会放弃台湾。他在和美国官员谈话时，用日本对台湾的大米依赖，来强调保卫台湾的重要性。McGlothlen, *Controlling the Waves*，p.112.

③ 新华社短评：《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和远东人民的新阴谋》，1949 年 7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第 534–535 页。

抗中将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既是中国革命本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领导人对他们视为美国威胁的反应。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对日本反共力量的扶植使中共领导人坚信，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正在重新聚集力量，摩拳擦掌，磨刀霍霍，试图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8 月 22 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残余，决不甘心在中国失败。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为着保持在中国的特权及实现独霸世界的美梦起见，已经公开宣称，它将继续协助中国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从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内部来实现分裂叛变，并配合它所指使操纵的所谓‘太平洋反共联盟’，从中国外部来实行封锁干涉。”[①] 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讲话中，周恩来谴责蒋介石、南朝鲜的李承晚、越南的保大和日本的吉田是投靠美国的“卖国贼”，甘当美国侵略亚洲阴谋的马前卒。[②]

面对美国的敌视和威胁，毛泽东感到，为了防范美国的干涉和保卫中国革命，他需要一个“好帮手”。这个“好帮手”就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启程赴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商谈中苏合作。在与斯大林讨论缔结中苏同盟问题时，毛泽东建议，两国的同盟条约应该包含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山再起的条款，斯大林表示同意。[③] 在随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两国表示要加强“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④]

为了打击日本的反动势力，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放弃议会斗争的道路，转而采取强硬政策，抗议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但是，以日共政治局委员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为首的日共中央起初不愿接受这一建议，主张继续执行温和路线，继续以“可爱的共产党”的形象，争取选票，搞议会斗争。1950 年 1 月 4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强调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经验对其

① 周恩来：《〈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1949 年 8 月 22 日，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93 页。

② 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50 年 6 月 16 日，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 册，第 485 页。

③ 《毛泽东一斯大林谈话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载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7-9。

④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2 页；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2.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31–245 页（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增订版，第 111–126 页。

它亚洲国家（包括日本）的借鉴作用。[1] 两天以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又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对日政策，并批评冈野进所执行的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路线。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正和美帝国主义勾结，压制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恢复日本军国主义。文章批评冈野进的理论“美化帝国主义，欺骗日本群众”。[2]

1950 年，斯大林在日本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态度是他在亚洲奉行积极推动革命新战略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斯大林欢欣鼓舞。他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东移至亚洲。和欧洲相对稳定的形势相比，亚洲是更充满革命潜力的地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正在那里风起云涌。斯大林要为亚洲的革命推波助澜。他开始积极支持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为朝鲜共产党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他还鼓励中共援助越南胡志明的抗法斗争。[3]

毛泽东积极配合斯大林的亚洲新战略。在朝鲜问题上，他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在越南问题上，他全力援助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向越南共产党派去军事顾问，并提供武器弹药；在日本问题上，他完全赞同斯大林对日本共产党的批评。1950 年 1 月 6 日，情报局对日共的温和议会斗争路线提出批评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于 1 月 14 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发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发表意见，支持情报局刊物对冈野进的批评，而对于日共政治局未能接受此批评表示惋惜，希望日共采取适当步骤纠正冈野进错误”。[4] 1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终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才是日本人民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5]4 月 1 日，周恩来在一次中共情报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世界和平，制止武装日本和德国。目前中心是在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

---

① 引自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1。

②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6.

③ 1949 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党分工合作。他希望中共今后多承担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支持，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收。而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12 页；朱元石：《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4–80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 册，第 237 页。

⑤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17 日。

石，援助东南亚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①]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日本的工作，通过苏联搜集日本报纸，特别是日共的报纸，中共领导人加强对日本情况的了解和研究。1950 年 2 月 4 日，刘少奇给中共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发电报，指示他每次从苏联同志那里获得日本报刊时，“应即全部迅速寄交北京刘少奇亲收，不要差误”。[②]1950 年代初，苏共与日共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北京中转的，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转交的。[③]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日共最后不得不放弃和平路线。1950 年 3 月，日共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号召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以争取日本真正的独立。5 月，日共组织反美示威。6 月，麦克阿瑟将军发布法令：禁止日共中央委员会全体 24 名成员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日共刊物《赤旗报》的主要编辑人员上班工作。总书记德田球一和冈野进等日共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久，他们又离开日本，移居中国。[④]

毛泽东对日共领导的反美运动非常满意。他在 1950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高度赞扬日本国内的反美群众斗争。他说：“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⑤]

50 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对待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上，保持经常磋商。1951 年，日共领导人内部在党的路线问题上发生重要意见分歧。4 月，斯大林把日共主要负责人德田球一、冈野进、侉田里见等从北京召到莫斯科，以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陪同这些日共领导人乘火车去苏联，并参加了斯大林和他们的

① 周恩来：《在全国二、五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0 年 4 月 1 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50 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373 页。

③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主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

④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p.254-273；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35–136 页。

会谈。[①] 1952 年 10 月，刘少奇到苏联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斯大林就日共问题交换意见，并研究了日共针对时局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②]

朝鲜战争和日本

1950 年初，亚洲局势的焦点很快转到朝鲜半岛。在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后，金日成加快了武装统一朝鲜的步伐。毛泽东在分析朝鲜形势时，主要担心的是日本的军事力量。5 月，金日成访问北京，与毛泽东商谈朝鲜统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一旦战争打起来，美国不会为了朝鲜这一弹丸之地而出兵，但日本则可能派兵援助南朝鲜。[③] 虽然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美国的意图，但他对朝鲜局势会变得复杂化的判断却是有远见的。正因为如此，他不得不考虑一旦金日成在统一朝鲜遭受挫折时，中国应当采取的对策。[④]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官员认为，这场战争是苏联在亚洲发动的共产主义攻势，其最终目标是日本。凯南指出，美国重新扶植日本是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一个原因。负责谈判对日和约的杜勒斯认为，北朝鲜的进攻旨在破坏美国对日和约的准备。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讲话中说，如果苏联控制了朝鲜，那么，它就可以北从沙哈林岛，南从朝鲜，两面夹攻日本。[⑤]

正如美国官员在审视朝鲜局势时经常强调战争的国际背景一样，中共领导人在追踪朝鲜战争的发展时，关注的往往不仅是朝鲜半岛局部的形势；他们的目光更集

---

① Nikolai Adyrkhayev, "Stalin's Meetings with Japanese Communists in the Summer of 1951," *Far Eastern Affairs*, No. 3 (1990), pp.124-134. 这篇文章的作者曾担任斯大林的日文翻译。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531 页。1955 年，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在中国去世。9 月 13 日，北京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德田球一大会，刘少奇担任公祭，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44 页。

③ Kathryn Weathersby, "New Findings on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3 (Fall 1993), p.16；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11–113 页。

④ 毛泽东对日本军队可能出兵援助南朝鲜的担心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因为后来美国在干涉朝鲜时确实秘密使用了日本军舰。1950 年 10 月，美军在元山港扫雷时动用了日本海军的扫雷舰。负责指挥这次日本扫雷行动的日本海军将军说，日本在朝鲜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是促使 1951 年美国决定与日本签订和约并恢复日本主权的一个原因。参见 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Korea: The Unknown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pp.115, 165；Akira Iriye, *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2;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4, 195。

⑤ 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A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p.285.

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反应上。他们担心，美国会利用朝鲜冲突，重新武装日本，在东方压制革命。8 月 26 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朝鲜战争的国际意义。他说，朝鲜“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美帝国主义利用朝鲜战争，将联合国旗帜拿到手，以对付和平阵线。对其国内也企图利用朝鲜战争进行动员。美国的战略虽然以欧洲为主，但也尽量利用朝鲜战争来动员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使它们服从美国支配。美国另一企图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将日本和西德武装起来，并取得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意。同时，美国如果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服。因此，朝鲜战争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①] 很多学者在研究美国冷战政策时，都注意到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美国领导人思维的影响，即美国决策者经常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胜利会波及邻近国家，引发那里的类似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在分析朝鲜局势时，用的也是多米诺骨牌逻辑。他们认为，革命运动在一个亚洲国家的失败，会危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

1950 年 9 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美军在朝鲜南部消灭了金日成部队的主力后，迅速向北推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10 月，毛泽东在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派志愿军去朝鲜，援助金日成，抗击美军。毛泽东的决定不仅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打掉美国的气焰，挫败美国扶植日本、压制东方革命的计划。10 月 24 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解释中国决定出兵朝鲜时说：“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利用日本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②] 周恩来的话清楚地表明，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在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进攻北朝鲜并直逼中国边界的行动强烈地勾起中共领导人对过去日本通过朝鲜侵略中国那段历史的回忆。

因此，中国强烈抗议并谴责美国利用日本军事基地支持其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行为。1951 年 3 月，《世界知识》发表社论，指出“日本已成为美国侵朝和轰炸我东北边境的海空基地，成为美军的补给基地，而且有不少日本人直接参加了侵朝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43–44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52–53 页。

争。美国武装日本的行动正在加速。我们必须百倍地警惕，加紧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斗争，用一切方式动员并联合我们可以动员和联合的力量，以孤立敌人，加深敌人的困难”。[①]

中共与对日和约

中共领导人在援助金日成抵抗美国进攻的同时，还十分关注美国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从 1950 年 6 月开始，杜勒斯先后访问日本和英国，策划召开对日媾和会议，并意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会议之外。为了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英国主张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但是，杜勒斯为了孤立和遏制新中国，坚决反对英国的建议。最后，为了争取英国支持对日和约，美国提出妥协方案，即在召开对日媾和会议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都不发邀请；将来由日本择一签约。美英就此达成默契。[②]

1950 年 6 月，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上强调对日和约是目前“远东斗争中心”，谴责美国搞“单独和约”的阴谋，主张“否认蒋匪代表”，要求迅速缔结“全面和约”。[③]12 月 24 日，他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④]

在反对美国垄断对日和约的准备与签订的问题上，中苏保持密切磋商，统一步调。1951 年 5 月 6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复文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

---

① 社论《坚决粉碎美国武装日本的阴谋》，《世界知识》，第 10 期（1951 年 3 月 17 日），第 23 页。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56–157 页。关于美英在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会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参见 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9;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p.430-431; Peter Lowe, *Containing the Cold Wa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Japan, China and Korea, 1948-53*(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chapters 1-4; Roger Buckley, “From San Francisco to suez and Beyond: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52-1960,”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73。

③ 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上的讲话提纲》，1950 年 6 月，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 册，第 515 页。

④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56–157 页。

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英、美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宣言》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的独立国家，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同一天，毛泽东回电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①]

1951 年 7 月，美英发表对日和约草案。7 月 20 日，美国向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国家发出参加将于 9 月 4—8 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的邀请，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台湾国民党政府，但没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8 月 12 日，苏联外交部指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苏联已经决定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以及苏联在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②]8 月 15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英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项破坏国际协定的草案，而将于 9 月 4 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并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并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会议。同日，周恩来还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美英对日和约的目的在于分裂亚洲并威胁亚洲安全。只要大家一同努力阻碍美国阴谋的实现，美国对亚洲的侵略便无法得逞。[③]

9 月 8 日，旧金山会议签订对日和约。[④] 9 月 18 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起草和签订，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因而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⑤] 在中共领导人眼里，美国的对日和约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文件，而是一个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东山再起的批准书。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又缔结《美日安全条约》。该条约允许美国在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为了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逼迫日本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杜勒斯威胁日本首相吉田茂说，如果日本拒绝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那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274 页。

② David Wolff, “One Finger’s Worth of Historical Evidence—New Russian and Chinese Evidence o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Split, 1948-195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30, p.43.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28–29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56–157 页。

④ 关于对日和约对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参见 Roger Dingman, “Truman’s Gift: The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in James I. Matray, ed.,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Japan,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Kirksville: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46-72.

⑤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56–158 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29 页。

么，美国国会将不批准对日和约，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将继续下去。在美国的高压下，吉田茂不得不就范。他于1951年12月24日致函杜勒斯，保证日本将同“中华民国政府”缔约。1952年1月2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就吉田茂致杜勒斯函件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日本政府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和最露骨的挑衅行为，也是同日本爱国人民争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战争状况并恢复和平关系的愿望绝对不相容的。4月28日，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并建立外交和经贸关系。5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吉田茂—蒋介石“和约”。[①]

中国是日本的传统贸易伙伴。4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要求恢复日中贸易的呼声一直很高。1949年，吉田茂首相说：“我不管中国是红色，还是绿色。中国是一个自然市场，日本必须考虑市场问题。”[②]吉田茂的言论代表了日本工商界广泛的共识。日本企业界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贸易协定。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在经济上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迫使日本参加由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的对华贸易禁运。朝鲜战争结束后，吉田茂曾考虑恢复日中贸易，但是，美国极力阻拦。对华贸易成为50年代美日关系中经常争吵不休的问题。[③]美国不但重新扶植日本，还在政治和经济上将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绑在一起，阻挠中国的统一。这一做法无疑是在中共领导人的仇美情结上火上浇油。

结　论

日本在冷战初期中美对抗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开始在东亚建立反共屏障。日本由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工业资源，被美国决策者视为这一屏障中关键的一环。从1947年开始，美国在日本采取措施，恢复经济，稳定局势，扶植亲美势力，压制左翼运动。美国的这些做法对中共领导人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自从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努力失败以后，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就不抱任何幻想。美国援蒋反共的政策使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充满敌意，而美国扶日的做法更加深了他们对美国的仇视。美国的日本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57–158页；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294-295.

②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p.35.

③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52-81.

政策证实并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威胁的认知，使他们更加感到有必要与苏联结盟。1949年，毛泽东做出向苏联“一边倒”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合苏联力量来抗衡美日同盟。1950年，中共做出抗美援朝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用支持朝鲜革命来对抗美国用扶植日本来压制东方革命的战略。50年代初，毛泽东在对日问题上，始终和斯大林保持一致。中苏两党经常协商，互相配合。他们共同促使日本共产党采取反美强硬立场，并一致反对美国的对日和约计划。

［本文最初发表在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收入本书时，做了补充和修改。］

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1948—1954)

最近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表明，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中有一个比较隐蔽，但又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利用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矛盾，破坏中苏团结，在中苏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美国对手的力量，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利益。不管是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的内部讨论中，都曾把如何分裂中苏，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和政策考虑。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同，两届政府在具体实施分裂中苏这一政策考虑时，采取的却是不同的策略。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中离间中苏关系的这一政策企图，美国学者已作了不少研究。[①]但是，他们的论述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们有过分强调美国领导人在私下场合的政策考虑的倾向，忽视美国在公开场合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敌视立场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旨在根据美国最近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文件，追溯冷战时期美国对中苏的所谓“楔子战略”的产生和发展，比较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为实施此战略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并对这一战略作一评价。

---

① 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希望中共走铁托的路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华盛顿对战后东亚地缘政治结构中出现的势力真空极为关注，因为美国今后在亚洲的地位将取决于何种势力来填补这一真空。美国领导人担心苏联在东亚的势力扩展，因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了影响。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西欧复兴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在亚洲发挥作用的能力有限。有鉴于此，美国决策人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能够抗衡苏联的亲美势力。

二战结束后，美国官员曾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指望扶植蒋介石集团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阻止共产党势力坐大，维护美国利益。但是，从 1948 年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统治的江河日下，华盛顿对国民党的信心越来越小。无可奈何之中，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开始考虑不同的政策选择。他们觉得，美国不应该把鸡蛋都放在蒋介石一个篮子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应该保持灵活性。因此，杜鲁门政府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同时，也开始物色所谓自由主义“第三种势力”，并盘算是否能在中共和苏联的关系上做文章。他们希望挑拨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在中国复制南斯拉夫和苏联分裂的局面，从而使中共疏远苏联，削弱苏联在东亚的影响，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国务院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们研究了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将会对美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有鉴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苏联决裂的例子，他们希望中共也能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铁托的道路，从而削弱苏联阵营的力量。①

在美国国务院内，由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牵头的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认为，蒋介石政权太腐败无能，失败已成定局，美国应该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乱局，保持政策的灵活性，第一步就是和蒋介石政权脱钩。政策计划室内的主要中国事务专家是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s，Jr.），他深受凯南的赏识。由于凯南是苏联问题专家，对远东事务知之甚少，所以，他在处理和中国有关的问题时，总是听戴维斯的意见和建议。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出生，父母是美国传教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戴维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并为中缅印

①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pp.176-179.

战区司令官约瑟普·史迪威（Joseph Stiwell）将军服务。在中国任职期间，戴维斯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写了批评国民党的报告。他主张美国加强和中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当凯南在二战结束后筹组政策计划司时，他首先想到戴维斯，很快把他延揽入内。[①]

戴维斯认为，美国不应该在中国的内战中陷得太深，应该逐步减少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动向的关注，等待中共和苏联的矛盾的出现，并加以利用。他深信，中共完全是独立制定自己的政策的，没有对莫斯科言听计从。凯南基本同意戴维斯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和对中共与苏联关系性质的分析。凯南认为，世界上有五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五个中心是：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以及日本。[②]他强调，中国贫穷落后，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并且在近期内也不会成为工业强国，中国要在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炫耀武力的日子，遥遥无期，因此，中国发生的事态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他怀疑中共是否有能力建立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怀疑苏联操控中国事务和未来走向的能力。[③]鼓励和利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歧，促使中共和苏联分道扬镳，是凯南遏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战略有很大影响。[④]

和凯南一样，国务院政治事务司（Office of Political Affairs，UN Desk）司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也对中共能否在中国长期掌权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国地域辽阔，长期一盘散沙，军阀割据，任何政治势力要想有效控制中国都很难。同时，他又强调，如果毛泽东上台，美国应该鼓励他奉行一个独立于苏联的政策，促进中国的铁托主义倾向。他也主张，美国对蒋介石政权采取脱离的政策。[⑤]腊斯克

① 有关凯南和戴维斯的关系，参见 Wilson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8, 212-218。

②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9-30; Nicholas Thompson, *The Hawk and the Dove: Paul Nitze, George Kenn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icador, 2009), p.95.

③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194 页；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5-66;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8; William Stueck, *The Wedemeyer Missi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pp.120-121;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0.

④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年，第 118 页。

⑤ 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205.

和凯南的区别是：他更重视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和更强调美国价值观的作用。[①]

1948 年 7 月，美国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华盛顿增加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引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的代表反对军方的建议。[②] 为了更明确地阐述自己的立场，9 月 7 日，政策计划室出台了一份由戴维斯起草的《政策计划室第 39 号文件》，文件的标题叫《审视和定位美国对华政策》(PPS/39 paper，“To Review and Defin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文件重申了政策计划室关于蒋介石政权已经不可救药的判断，指出，唯一可以挽救国民党在中国内战中失败的办法就是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但那样做的代价太大，后果太不堪设想，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文件强调，“中国的命运在中国自己手中”，美国对中国应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不应只支持中国内战中的一方，不应把自己拴在一棵树上。文件特别提到中共可能出现铁托主义的倾向，认为苏联要实现对中共的完全控制并非易事，因为毛泽东在中国拉起自己的队伍、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的时间已经很长，这个时间要比铁托掌握权力的时间长十倍。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是其民族主义诉求，一旦中国内战结束，民族主义就会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引起矛盾和纠纷，这样的结局将会给美国提供很多机会，只要美国保持自己的政策灵活性。[③] 文件并没有建议美国对中共采取任何示好的具体举动，只是呼吁美国静观中国事态发展，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等待中国出现美国可以利用的机会，特别是等待中共与苏联交恶的机会的露头。

必须指出的是，杜鲁门总统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并不只是听国务院一方面的建议，他还得照顾军方以及国会内外亲蒋势力（即院外援华集团）的态度。国会内的挺蒋保守派议员对杜鲁门总统施加很大压力，威胁说如果杜鲁门总统不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那么，他们在国会讨论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有关欧洲的议案时，不投赞成票。为了平衡国务院和亲蒋势力的立场，杜鲁门总统不得不采取了对国民党政府若即若离的做法，使美国对华政策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经常向外界发出矛盾的

---

① Thomas W. Zeiler, *Dean Rusk: Defending the American Mission Abroad* (Wilmington, Delaware: SR Books, 2000), p.16.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pp.118-122, 131-135, 146-155.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pp.146-155. 又见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年，第 59–60，118 页。

信号。[1]

进入1949年以后，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美国驻外大使馆的外交官都在继续跟踪和观察中苏关系的发展，盼望中共和苏联之间矛盾的出现。1949年1月25日，戴维斯向凯南报告说，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发出“臭鱼那样的强烈气味”。[2] 美国驻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官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中苏之间出现摩擦和分裂的可能，从而加强了国务院关于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报告中说，在中国的“苏联使馆人员对中国，对中国人，甚至对中共，都远不是热心的”。他列举了三个可能的理由，来解释苏联为什么对中共的胜利采取冷淡的态度：第一，苏联和中共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满洲，政策上的分歧；第二，苏联担心，“在其后门口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强大和团结一致的中国”；第三，由于20年代苏联在中国的失误，斯大林因而对中国人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3]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在给国务院的几份报告中，也阐述了他关于中苏分裂不可避免的看法。[4]

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伊·柯勒（Foy Kohler）认为，中共和苏联在政策上能否保持永久的一致性，是一个大问号，因为，毛泽东享有很高的个人威望和受人爱戴，这是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所不具备的。中共并没有像其他共产党政权那样，变到完全崇拜斯大林的地步。因此，美国应该下工夫、花力气来扩大中苏分裂。[5]

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沃尔顿·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在和英国官员就中国问题进行磋商时表示，

---

① 有关院外援华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牵制和影响，参见 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此书的中译本为：罗斯·凯恩著，张晓贝译：《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 年); Stanley D. Back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翟强 :《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 年》，载《世界历史》，1986 年第 5 期，第 37–45 页；Ena Chao（赵绮娜）, *The China Bloc: Congres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1947-1952*,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990；高艳丽：《意识形态的悲剧：周以德与中国》，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第 4–5 章。布卢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在其讨论朝鲜战争起源的书中，对美国的亲蒋势力也有描述，见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2-160。

② Davies to Kennan, January 25, 1949, Policy Planning Staff Records, Box 13,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pp.88-89.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pp.355-357.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pp.249-251.

贸易和承认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在和中共交往时可以讨价还价、施加影响的机会。和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恢复贸易关系是保持和中共的联系的“最可行办法”，让中共进口西方石油产品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中共“可能建立起对西方的依赖关系”。[①]

1949 年 3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在其第 41 号文件中，采纳了国务院的下述建议：美国应当对中共执行一条自由的贸易政策，以便把中共从苏联那里拉过来。文件不赞成对中共采取严厉的贸易政策，因为这会“迫使中共扫除存在于党内的意见分歧，会把中共推到完全依赖苏联的地步”。与此相反，在适当的安全措施下，恢复西方和中共的贸易，“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共的政策之间制造严重的分歧，从而可能引导出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②]

1949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解放南京。司徒雷登大使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而是选择留在南京，以观察中共的动向，寻找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机会。5 月至 6 月，司徒雷登多次和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办公室主任黄华会谈。在谈话中，黄华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集团断绝关系。对此，司徒雷登不做正面答复，却侈谈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所谓三原则：新中国必须：(1) 实际控制领土和国家的行政机器；(2) 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3) 获得全国人民的承认。[③] 司徒雷登提到的三原则反映了美国在 20 世纪应对那些摆脱外部政治压迫和经济依附的“革命国家”的基本态度。[④]

司徒雷登的立场表明，美国并不准备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讨论同新中国的关系。它所谈的“承认”只是一个用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和特权的工具，新中国要想得到美国的“承认”是可以的，但是有条件，条件就是新中国必须遵守美国规定的“国际义务”。说穿了，美国就是要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继续接受过去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继续承认美国在中国的大量侵略特权和利益，继续对美国俯首称臣，听凭摆布。对于美国的这种蛮横无理的帝国主义要求，中共当然是不会接受的。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pp. 5-9，823-826.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9, pp. 829-834.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8, pp. 746，752-753；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80–83 页；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22–32 页；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83–285 页。

④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84–85 页。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寻求国际承认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即民族独立，平等相待。毛泽东在1949年初先后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1—2月间，毛泽东在和米高扬谈话时，说到“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①]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另起炉灶”的思想。他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治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②] 4月17日，周恩来在向前来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北平的一些大学教授作的报告中说，新中国并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交，“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③]

为了抵消军方和国会的挺蒋派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艾奇逊国务卿在1949年夏天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就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和提供政策咨询；二是发表酝酿已久的对华政策《白皮书》。成立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动机是针对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张美国加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艾奇逊在国务院成立的咨询委员会，由深得他信任的国务院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 at large）、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菲利普·杰塞普（Philip Jessup）牵头，所以又叫“杰塞普委员会”（the Jessup Commission）。为了表示咨询委员会所作的政策分析和建议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委员会的成员都不从国务院内部挑选，而是面向社会，聘请同中国打过交道的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让他们以咨询人（consultants）的身份，参加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同时，为了强调咨询委员会重视在中国问题上的两党一致，杰塞普还特意邀请了两位共和党人士，参加咨询委员会，并担任他的助手。这两位共和党人士分别是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校长艾佛瑞特·凯斯（Everett Case）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rsdick）。[④]

---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3页。

④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pp. 168-169；Robert L. 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6.

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想法最早来自凯南和戴维斯，旨在向美国公众解释20世纪中美关系（特别是1944—1949年阶段的关系）的来龙去脉，解释为什么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没有危及美国的核心利益，说明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不是由于美国政策的错误造成的，而是归因于中国内部的因素，特别是蒋介石的领导不力。《白皮书》将回击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责难。《白皮书》是一部长达1054页的冗长报告，在8月5日出版时，还附带一封艾奇逊国务卿的信。艾奇逊的信概括了《白皮书》的主要观点，指出蒋介石应该对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负责，他指挥不当，总是指望美国来帮他打赢内战，中国内战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①] 让艾奇逊、凯南等国务院官员没有想到的是，《白皮书》不但没有平息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的批评，反而引发更大一轮抨击。[②]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其一手扶植起来的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最后崩溃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领导人是既无可奈何，又不甘失败。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所谓鼓励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及促进中苏交恶上，希望以此来尽可能地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召开中国问题圆桌会议，邀请政府外的25名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商界人士和退休外交官，齐聚一堂，和国务院官员互动，共同商讨美国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的变局。圆桌会议由无任所大使杰塞普主持，国务卿艾奇逊没有出席会议。国务院参加讨论的官员有凯南、巴特沃斯、司徒雷登以及各个司的负责人。凯南再一次重申中国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次要作用，他的观点得到多个国务院官员的赞同。这些官员都强调，北京新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堆积如山，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来稳定中国的局势并重建经济，因此，它目前没有能力在国外给美国制造麻烦。在圆桌会议上发言的多数外来学者，都主张美国政府应正视中国现实，结束和蒋介石政权的瓜葛，和北京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开展贸易。不少学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中蒙问题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都对美国国内围绕共产主义威胁的争论忧心忡忡，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种为了政治目的而开展的大辩论，毒化了国内政治气氛，妨碍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理性地制定明智和有效的对华政策。裴斐指出，美国应该采取行

---

①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p. 231-232;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pp. 168-169；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pp. 185-189.

② Robert P. Newman, "The Self-Inflicted Wounds: The China White Paper of 1949," *Prologue*, Vol.14 (Fall 1982), pp. 153-155.

动，帮助亚洲发展经济，而不应该遏制、破坏和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美国一味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会使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得出一个结论，即俄国人说的是对的，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①

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瓦尔德（Angus Ward）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留。随后，沈阳市公安局又以间谍案对瓦尔德提起公诉。② 事情发生以后，杜鲁门总统很震怒，一度威胁要对中共进行报复，考虑对中国实行海军封锁，阻止运煤船驶往上海，以经济手段教训中共。但是国务院不赞同这一建议，认为阻止运煤船去上海没有多大意义，杜鲁门遂作罢。瓦尔德事件以后，凯南仍坚持认为，美国和中共建立正常关系是阻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的最好办法。11月17日，凯南在写给艾奇逊国务卿等人的政策建议中指出，中共拘禁瓦尔德的背后策划者是苏联，苏联想通过此举来报复美国前不久逮捕一个苏联贸易公司在纽约的五名雇员的事件，同时，毒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美国不应上苏联的当，被苏联任意摆布。凯南建议，美国应该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他强调：阻止中国完全斯大林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并在中国发挥影响。③

凯南的观点在杜鲁门政府中仍有影响。1949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第48/2号文件中，表达了和凯南观点相似的立场。该文件强调，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来利用中苏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文件特别指出，美国如果对中共采取一个比对苏联还要严厉或敌对的政策是不妥当的。④

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试图直接诉诸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把这股势力引导到反苏的方向去，竭尽挑拨离间

---

① 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pp. 192-193. 裴斐曾于1946年7月9日在南京和当时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过话。裴斐说，我们恐惧的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中共所作所为首先根据于苏联外交的要求，如果再有战争，中国会成为第二个西班牙。周恩来解释说，中国不会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而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如果国民党改组成为联合政府，就可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反过来影响国际间的合作。中国是有理想的，中国要富强起来。中共对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的不对之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80页。

② 有关中共处理瓦尔德事件的背景和经过，参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2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章；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5-176.

③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39-240; 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p. 253.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7, pp. 1215-1220.

中苏关系之能事。艾奇逊指出，亚洲眼下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它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相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他宣扬了一番美国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有的同情和友好，称美国一贯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他话锋一转，剑指苏联，声称：苏联帝国主义正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独立，甚至想把中国的北部省份分离出去。这种在外蒙古所采用过的办法，在满洲也几乎实行了。苏联正在接替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着中国人民。艾奇逊还谈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指出美国的战略“防御环带”（defensive perimeter）是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和琉球群岛，南到菲律宾。他故意没有把台湾包括在这条防线内，似乎表示美国不准备干涉台湾，要撤出中国内战。[1] 艾奇逊发表此番言论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谈判中苏同盟条约。艾奇逊的讲话显然是想破坏中苏谈判。

但是，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做法并没有能改变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没能改变毛泽东要“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决心。毛泽东在和斯大林会谈时明确表示了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他告诉斯大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2]

为打消斯大林对他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铁托的疑虑，毛泽东在艾奇逊 1 月 12 日演讲的次日，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表示同意“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经合署留沪物资”。[3] 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的物资是准备用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国务院对中共征收外国兵营的决定反应强烈，宣布撤出所有美国在华官员。[4] 在得知美国对中共征收外国兵营的激烈态度后，毛泽东又于 1 月 18 日

---

①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5-6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23–28 页；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63–164 页；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8 页。

② 《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载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附录，第 328 页。

③ 毛泽东：《关于向联合国派出我国代表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3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 册，第 235–236 页。

④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p. 168; Beisner, *Dean Acheson*, p. 202.

再次致电刘少奇，称“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①] 很显然，毛泽东想让斯大林知道：中共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帝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为了回击艾奇逊的挑拨离间，苏联方面向毛泽东建议：苏联、中国和蒙古分别发表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言论。毛泽东表示同意。1 月 19 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词拒绝驳斥艾奇逊的声明。[②] 为了在 21 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③] 1 月 21 日，苏联、中国和蒙古分别发表了声明。

中国的声明指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④] 毛泽东用词辛辣，笔锋犀利，风格独特，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的敌视。

苏联的声明以同样严厉的措词反驳艾奇逊。它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关于“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说法，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

---

① 毛泽东：《关于向民主人士解释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给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8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41 页。又见 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76。

② 毛泽东：《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9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45 页。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43–44 页。苏联建议，苏联、中国和蒙古三国政府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而毛泽东只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对于中苏在这件事上为何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研究中苏关系的学者意见不一。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99–301 页。

③ 师哲：《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54–455 页。

④ 《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21 日。

在 1945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①

1950 年 2 月，中苏签订同盟条约，这对杜鲁门政府中那些期盼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的官员，是当头一棒。他们明白，在近期中苏关系破裂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艾奇逊并没有完全灰心丧气，他还愿意耐心等待。他仍然相信，美国有机会破坏中苏关系。中央情报局已作了预测：中共将在 1950 年底以前拿下台湾。一旦蒋介石政权彻底结束了，中美关系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复杂。说不定在 11 月国会选举以后，杜鲁门总统可以在对华政策方面有所举动。②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再次直接干预中国内战。不久，中国为保卫国家安全，出兵朝鲜，抗美援朝。至此，杜鲁门政府一度希望以承认和贸易为诱饵，和新中国讨价还价，制造中苏反目，维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宣告破产。同时，斯大林对毛泽东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铁托的疑虑，也完全烟消云散了。

坚守离间中苏的信念

朝鲜战争使美苏冷战全球化，美国更加从美苏对抗这个全球战略格局的背景下来看待中国，美国对华政策变得更为僵硬和敌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时候，美国外交决策人在内部的政策讨论中，仍念念不忘中苏分裂的可能性。尽管当时中美和解已经成为泡影，但是，艾奇逊及其助手们仍在寻找任何可能导致中苏最终分道扬镳的机会。

1950 年 7 月 31 日，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方针的政策声明中说，联合国军解放北朝鲜将改变满洲在苏联控制下的“俘虏地位”，因为一个“自由和强大”的朝鲜将为满洲的资源提供一个通向外部市场的出口，并将为满洲以及华北的中国居民提供一个与“非共产主义自由国家”接触的机会。在联合国领导下的朝鲜统一事业将会加强中共内部以及中国人民中间那些不愿完全依赖苏联的人的地位。如果西方巧妙地加以引导，中共可能改变方向。③

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在朝鲜战场咄咄

① 师哲：《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54–455 页。
②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p. 169.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p. 506.

逼人，肆无忌惮，要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做法，使美国的欧洲盟国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们非常害怕麦克阿瑟的一意孤行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是一场有限的战争。1950 年 12 月，英国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匆忙赶往华盛顿，就远东的紧张局势和美国领导人面谈，希望杜鲁门总统立即采取行动，约束麦克阿瑟。在会谈中，英美领导人除了讨论如何控制朝鲜战争的规模以外，还就如何对待中苏同盟的问题交换意见。艾德礼指出，尽管中国出兵朝鲜，但是，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到一定时候将会导致两家反目为仇。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但是，他们很可能不是苏联那样的帝国主义者。俄国人并没有给中国多少帮助，中国人也并不欠俄国人多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存在着产生铁托主义的机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总是能吸收和容纳外来的新东西，中共很可能是打着红旗，但是，实际是另一回事。艾德礼对西方采取敌视中国，而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的政策提出质疑。[①]

对于艾德礼的这番话，艾奇逊回答说，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持相同看法；他自己本人就一直在尽力执行利用中国民族主义、破坏中苏同盟的政策，但是，问题是现在是否有可能采取这一政策。艾奇逊解释说，一个困难就是中苏分裂仍是一个长远的前景，而朝鲜战争却迫在眉睫。如果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而使美国近期的安全受到损坏，那是非常失算的。美国必须考虑其政策对日本、菲律宾以及其它国家的影响。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有利于美国在西欧的重建计划。最后，美国的国内舆论也必须顾及。艾奇逊说完后，杜鲁门总统接着强调美国国内舆论的重要。他说，台湾问题“美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在美国有很多支持者”。[②] 由于总统都是选举出来的，所以，杜鲁门特别在意他的对华政策的国内反应。

美英领导人的华盛顿会谈表明，他们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出现铁托主义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尽管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直接对抗，互为仇敌，但美国领导人仍不忘把促进中苏分裂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来看。由于东亚的军事形势、西欧急待重建以及美国国内舆论的作用等近期因素，华盛顿眼下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杜鲁门政府对中国奉行了一个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政策。1953 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pp. 1397-1403.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pp. 1397-1403.

从以拉拢促分裂到以高压促分裂

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攻击民主党对手，争取选票，以重新控制白宫。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同麦克阿瑟一唱一和，呼吁在亚洲“放蒋出笼”，反攻大陆，收复失地。他们叫嚣美国必须在朝鲜全力以赴，赢得胜利。在中部城市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议员约瑟普·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所做的激烈反共演讲，获得满场喝彩。[①]

为了赢得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支持，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艾森豪威尔采纳了一个十分保守的竞选纲领。这个纲领的外交政策部分由共和党内的国际事务专家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起草。纲领激烈抨击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指责杜鲁门采用的遏制战略是“被动的”、“无效的”和“不道德的”，因为它对在“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统治下的无数生命”坐视不顾，置若罔闻。[②]

艾森豪威尔就是以这样一个坚定反共的形象执掌白宫的。他上台伊始，就发表引起广泛注意的“放蒋出笼”演说，声称：美国第七舰队今后不再“保护大陆不受台湾的攻击”。[③] 他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对盟国及其它一些国家发号施令，签订了一系列旨在包围和孤立中国的条约或协定。

面对共和党政府在公开场合所表现出的如此顽固的反共立场，人们不禁要问：艾森豪威尔班子是否已经放弃了所谓鼓励中国民族主义倾向、促进中苏分裂的打算？他们是否真的相信他们口头上说的“共产主义世界是铁板一块”？最近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人并未放弃想利用中共的独立性制造中苏分裂的念头。他们和杜鲁门政府的不同只是表现在策略手法上。

1953年，美英法三国首脑在百慕大群岛举行会议，讨论世界局势。在会谈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介绍他对中共的看法。他说：“毛泽东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杰出的共产党领袖的，他的声望虽说不如斯大林，但却高于马林科夫。因此，毛泽东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是很自然的。”斯大林在世时，由于他享有巨大的声望，毛

---

① Stephen Ambrose, *Eisenhower: Soldier, General of the Army, President-Elect, 1890-195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540, 543.

② Ibid.

③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3, p. 17.

泽东有可能听从他的命令；但现在是马林科夫，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很有意义，它很有可能最终给我们一个促使中苏分裂的机会"。[①]

和杜勒斯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相信利用中苏矛盾的可能性。在 1954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阐明了这一看法。这次会议讨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的一份有关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政策草案。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对草案中一段有关中国的话持有异议。这段话说："尽管目前还没有根据来预测（中共）政权的早日崩溃……但这类政权先天具有僵化和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很可能出人意料地导致危机爆发或政权垮台。"中央情报局官员认为，这段话的前后两部分是矛盾的。艾森豪威尔问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当年中央情报局是否有人预见到铁托和斯大林的分裂？艾森豪威尔接着又说：苏联阵营中这种有利于西方的事态有时是会突然意外发生的。国务卿杜勒斯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艾伦·杜勒斯承认，西方有可能把中国从苏联那儿拉出来；但是，他认为目前没有根据来指望中共政权会突然崩溃。最后，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把那段话留在草案中，并重申他的立场："极权主义先天具有过分的僵化和不足，美国应该加以利用。"[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指出，中苏关系"明显有别于克里姆林宫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国只是苏联的"小伙伴"，而不是"卫星国"。中共领导人"既是中国人，又是共产党人"。苏联是通过严格控制每个党员来和卫星国打交道的；但在和中共交往时，苏联是把中共"作为一个密切的，但却是独立的盟友"看待。在中苏关系中，既存在着长期的危险因素，又存在着近期的破坏因素。美国应该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来破坏中苏关系"。[③]

既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决策人认识到利用中苏矛盾制造中苏分裂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呢？美国官员认为，目前对中国采取一个温和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尽管中苏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因素，但是眼下两家并没有翻脸的可能。

当前的中苏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相互的利益这一强有力的纽带上的"，中苏和西方的矛盾要比中苏之间的矛盾大得多。因此，对中苏同盟的潜在威胁将主要来自于中苏关系的内部发展，外来的压力和引导只起次要作用。这些官员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5, p. 1809.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2, p. 1003.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4, pp.278-306.

怀疑美国对中国采取缓和的政策是否能造成一个中苏冲突大于中美冲突的局面，即使是像放弃台湾这样重大的让步，恐怕都难以改变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更不用说像贸易和承认这样较小一点的让步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前所实行的缓和政策未能奏效，就说明目前要分裂中苏同盟，缓和的政策是不灵的。[①]

在否决了缓和政策的可行性后，美国官员认为，强硬路线在当前更有可能促使中苏反目。在百慕大美英法首脑会议上，杜勒斯国务卿说，扩大中苏矛盾的最好方法是置中国于最大的压力之下，因为高压将迫使中共完全依赖苏联，向苏联提出更多的援助要求，而苏联势必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这样，中共的不满就会产生，中苏矛盾就会扩大。如果西方不采取这种高压政策，而是和苏联比谁对中国更好，那只会使中共从中渔利。铁托就是一个例子，他和苏联吵翻了，并不是因为美国对他客气友好；恰恰相反，美国一直对他很强硬。[②]

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是这种高压政策的一个方面。美国国务院官员认为，中苏矛盾最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对苏联提出的工业和技术援助的要求上，因为中共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实现工业化，最需要工业技术和装备。西方的贸易禁运将使中共完全依靠苏联，从而暴露苏联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一旦苏联没法满足中共提出的援助要求，北京必然对莫斯科产生不满和怨恨，以致最终转向西方和日本，寻求出路。[③]

为了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加高压，美国不仅自己对华实施严格的贸易禁运，还逼迫其盟国，特别是日本，照着做。在朝鲜战争前，日本曾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三十年代中期，日本百分之二十的出口是到中国，百分之十的进口来自中国。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几乎完全停止了与中国的贸易。[④]

为了确保日本的对华贸易封锁，美国还把日本拉入“巴黎统筹委员会”。日本除了必须服从该委员会其它成员国必须服从的禁令外，还要受一个特别禁令的约束。这个特别禁令列举了四百多种禁止运往中国的产品。当然，美国这种对日本的蛮横态度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阻止中日贸易的做法，使日本政界领袖和工商企业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4, pp.297-298.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5, pp. 1808-1809. 又见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3.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4, p. 401.

④ 有关朝鲜战争前中日贸易问题，参见 Nancy Tucke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Post War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 1984), pp. 183-208; Kazuya Sakamoto, “Eisenhower, the New Look , and Japan Policy,” (M.A. thesis, Ohio University, 1985)。

界巨头非常失望和恼火，造成美日之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长达二十多年的龃龉。[①]

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和牵制，保持军事威胁和压力，是美国对华高压政策的另一个方面。美国先后同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军事协定。此外，美国还和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断扩大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支持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和攻击。[②]在1954—1955年以及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支持蒋介石对抗大陆。[③]尽管美国官员认为金门、马祖等岛屿在军事上对于保卫台湾并不重要，但他们很重视这些小岛对台湾的心理意义，因为这些小岛的丢失将会严重挫伤台湾的士气，从而导致台湾的最后崩溃。1954年9月18日，杜勒斯国务卿在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会谈中，强调了金门和马祖对台湾的心理价值。[④]

尽管美国意识到台湾海峡危机的严重性，但它并不想直接卷入其中，因为一场和中国的战争很可能引起苏联的军事干涉，从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美国和西欧盟国的关系将受到影响。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我们经不起和盟国的分离。”[⑤]美国官员认为，阻止大陆对台湾的进攻，而又不使美国直接卷入的最佳方法就是实施核武器威胁。1955年3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北京发出威胁：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使用战术核武器。[⑥]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阻止大陆统一台湾一直是美国的既定方针。[⑦]美国官员坚信，使台湾由一个反共亲美政权掌控，不仅有利于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沿海岛屿防御链，还对大陆起威慑作用。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会领袖说，如果中共领导人想在朝鲜或印度支那制造麻烦，他们将会发现台湾正在他们背后威胁着他们。美国应该保持这种局面。[⑧]杜勒斯国务卿在百慕大美英法首脑会议上说，台湾的威胁

---

①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ntainment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82, 285.

②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7章。

③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chapters 8-11.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5, p. 1228.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4, pp. 280-281. 又见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 (December 1985), pp. 637-660.

⑥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5, pp. 332-333.

⑦ 关于朝鲜战争以后美国试图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参见王缉思:《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第31–43页。

⑧ Robert Ferrell, ed.,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96.

将使中共不得不在中国沿海地区部署大批军队，台湾可以牵制四十万大陆军队。台湾的压力将会迫使中共向苏联索要更多的援助，从而加大对中苏关系的压力。[1]

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对中国施加最大压力之外，还在舆论方面对中国开展宣传战。1953 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通过“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VOA）向中国大陆广播，宣传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美国之音”还专门推出一个旨在破坏中苏关系的特别节目，叫“分歧行动”（Operation Discord），试图在中苏之间制造分歧。[2]

结　论

从杜鲁门政府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美国对华政策中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分化中苏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党派斗争的影响，这两届政府在考虑如何分裂中苏关系时，强调不同的策略手法。杜鲁门政府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刚刚取得全国胜利的革命政权，他们还抱有幻想，还想“等待尘埃落定”，指望通过承认和贸易的手段，拉拢中共，离间中苏。艾森豪威尔政府碰到的却是已经在国内巩固了全国胜利并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交手毫不示弱的中国共产党，再加上美国国内极端的反共气氛，艾森豪威尔班子感到，民主党前任政府曾经试图对中共采取的“软”的做法已经不现实和不可能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高压强硬政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指望，美国对中国采取鼓励、封锁和包围的“大棒”政策，会迫使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从而达到分裂中苏的目的。

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内部政策考虑，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因素以及政策发展的来龙去脉。但是，只强调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某一方面考虑，不把这个考虑同决定政策的其它因素综合起来评估，那么，结论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和片面的。美国学者在论述美国对中苏关系的“楔子战略”时，过分强调它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作用，似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只受这一因素制约，而和美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无关。

必须指出的是，分裂中苏只是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政策考虑，而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在内部政策讨论中，美国领导人确实经常谈论如何破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5, pp. 1808-1809.

②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3.

坏中苏关系，但我们不应该只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他们遏制中国革命的基本立场和在东亚扩张美国势力的做法。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对抗格局。不管是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他们都是以一种居高临下和不切实际的心态来处理中国问题的。艾奇逊和他的助手们把美国“承认”新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讨价还价筹码，认为新中国在眼巴巴地期盼着美国的“承认”，一旦获得美国的“承认”，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因此，美国的“承认”就是施舍给新中国的一种恩惠。美国决策者觉得，中国人应对美国感恩，美国的“承认”不是随便就给的。新中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美国官员的这种一厢情愿想法，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以中国人的“恩人”和“保护者”自居的心态，总是以为美国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以及日本不同，那些列强总是千方百计地欺负中国，而美国却是一直在保护中国。美国决策者完全低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要使中国重新“站起来”的决心。[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要在世界上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却是遵循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原则，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中美冲突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

[本文最初写作于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生研讨课上，授课老师是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教授。1987 年暑假，我在南京探亲期间，将那篇英文习作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上。收入本书时，我对文章作了进一步和扩充，并加了小标题。]

---

① 资中筠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的傲慢心态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年，第 384–388 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

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就宣布承认，成为西方世界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英建交谈判长期磕磕碰碰，延宕不前，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才建立起代办关系。是什么原因使中英建交谈判如此旷日持久，拖延不决？影响英国政府对华关系决策的因素有哪些？英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有哪些分歧？他们之间在此问题上是如何互动和互相影响的？本文根据英国外交档案，通过考察英国在承认新中国、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香港“两航”事件、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冲突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和反应，来回答上述问题，从而揭示1949—1954年间英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脉络。

“留一只脚在门内”：英国承认新中国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国际地位下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相提出“三环外交”原则，试图通过与美国、西欧以及英联邦成员国的关系，来维持业已衰落的大英帝国地位。1945年上台的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工党政府基本上承认了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思想。战后，英国外交决策人集中关注的是欧洲和中东问题，相比之下，远东问题是次要的。[1] 如果

[1] 有关战后英国对亚洲的政策，可参阅C. M. 伍德豪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外交政策》（C. M. Woodhous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61年版；菲利普·达比：《苏伊士以东的英国防务政策，1947–1968年》，（Phillip Darby, *British Defence Policy East of Suez,1947-1968*），伦敦1973年版；孟庆龙：《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世界历史》，1988年第1期。

说，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主要是从美苏冷战对抗的战略角度制定对华政策的话，那么，英国则更多地关心如何维护其在华的大量商业和贸易利益。

尽管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已经受到4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的打击，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在华资产仍在3亿英镑左右。英国在中国的银行、工业、贸易、船运等方面都有广泛的投资，英国资本特别集中在上海，英国人掌握着上海的电车、煤气、自来水公司、船厂和许多港口设施。此外，英国在中国拥有的大企业还有开滦煤矿、英美烟草公司等。英国商人对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仍念念不忘。①

1945年12月，英国签署《莫斯科宣言》，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946年6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英国政府除继续在外交上承认国民党政权外，对国共两党的冲突基本持中立态度。港英当局对中共机构在香港的存在和活动，基本采取合作政策。1948年11月，中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对英国路透社记者鲍尔（H. C. Bough）表示，中共对港英当局的合作态度以及英国在中国内战中的中立政策，感到满意。②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国内战结局的日益明朗，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对英国在华利益、香港的地位以及英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所造成的影响。1948年1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指示英国驻华使领馆，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他们所在城市后，继续开展工作，“观察共产党的活动”。③

12月9日，贝文在议会下院再次重申英国恪守《莫斯科宣言》，不干涉内政。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中国科起草了一份供内阁讨论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该文件开头指出，中共已经控制了华北，人民解放军占领全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接着，文件分析了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将会对英国在远东地位所造成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影响。

首先，文件指出，中共的胜利将增加日本作为远东反共堡垒的政治和战略价

---

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可参阅贝弗利·胡珀：《中国站起来了：结束西方的存在，1948–1950年》（Beverley Hooper, *China Stands up: Ending the Western Presence, 1948-1950*），悉尼1968年版，第9–13页；瑞奇·欧文戴尔：《英国、美国和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载《历史杂志》[R. Ovendale,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26, No. 1 (1983)]，第139–158页。

② 《鲍尔（H. C. Bough）备忘录》，英国外交文件，FO371/75779，F124/1016/10，藏伦敦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③ 《贝文致南京英国大使馆》，1948年11月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69608，F15805/361/10G。

值。美国已不再视日本为其安全的潜在威胁，正日益加紧扶持日本，以便在亚洲抵制苏联的扩张。但是，美国扶持日本的作法，已经引起英联邦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关注。这些国家担心，日本的复兴将对他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文件强调，英国“必须仔细地观察事态的发展”。第二，中共的胜利将对香港产生影响。文件估计，在英国不可能用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保卫香港的情况下，香港要保持其目前的地位，将有赖于中共是否认为香港的存在有利于中共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如果中共认为保持香港目前的状态有利于其经济和外贸的话，香港将能继续存在下去。文件预测，香港将面临巨大的难民问题。第三，文件担心，中共的胜利将大大鼓励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造成压力，并将削弱法国在印度支那以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

在分析了上述中共胜利将产生的各种政治影响后，文件又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中共胜利将对英国在华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影响。文件估计，在中共政权站稳脚跟以前，其“外贸和商业将处于低潮”。从长远看，外资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共对外国商业和船运利益的看法以及对香港的态度。有鉴于这些利益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文件认为，在一段时期内，中共可能不会加以没收。最后，文件指出，英国影响中国局势发展的能力有限，能够以经济、军事实力对抗中共的国家，只有美国。但是，即使美国加以干涉，也很难奏效。因此，英国的最佳政策是“留一只脚在门内”，即“只要不存在对生命的确实危险”，英国应留在中国，和中共建立“事实上的关系”，并寻找“在中国继续开展贸易的可能性”。[①]

这份文件获得了内阁的批准，它基本拟定了英国对新中国的比较现实主义的调子。尽管英国外交部官员担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给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带来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和维持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需要相比，是次要的。当然，在最后承认新中国之前，英国外交部还得考虑议会、国内舆论、利益集团、英联邦成员国、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

1. 议会的反应

在 1949 年以前，英国议会很少讨论中国问题。左翼工党议员除了间或攻击政府的对苏冷战政策外，极少批评英国对中国内战的中立政策。在艾德礼的领导下，战后工党的团结在英国工党史上是罕见的。英国工党史专家肯尼思·摩根（Kenneth

① 英国内阁文件，CAB129/31，C. P.（48）229，藏英国公共档案馆。

Morgan）指出，在1945—1951年间，工党的领袖们“对政府、工党以及工党党员保持了长久的、独特的控制”。①

在议会中，保守党议员也很少批评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只是到1949年4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Amethyst*）在长江上被人民解放军炮击、搁浅的事件发生后，议员们才感到他们过去对中国事务关心太少了。保守党议员批评政府为何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派“紫石英号”去南京，指责政府对“紫石英号”保护不够。②4月26日，艾德礼首相就“紫石英号”事件，在议会讲话。他告诉议员们，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一直在努力和中共政权建立联系，但未成功。国防部长亚历山大（A. V. Alexander）说，到目前为止，在中共占领地区，尚未发生侵犯英国公民的事件，中共似乎有能力维持其控制地区的秩序。③

“紫石英号”事件过后，议会对中国问题的辩论，又归于沉寂。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议会再次对中国事务进行讨论，重点是“承认”问题。除少数议员担心英国承认新中国将鼓励马来亚的共产党活动外，大多数议员支持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0日，一批左翼工党议员在议会提出一个要求承认新中国的议案。④11月17日，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赞成政府承认新中国。他强调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为了表示祝贺，而是为了获得便利”。⑤丘吉尔的

① 肯尼思·摩根：《执政中的工党，1945–1951》(Kenneth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牛津1985年版，第46页。

② 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前前后后，可参阅马尔科姆·莫菲特：《长江上的人质：英国，中国和1949年紫石英号危机》(Malcolm. H. Murfett, *Hostage on the Yangtz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安纳波利斯1991年版。关于中共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处理，参见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538–543页；康矛召：《外交官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章（康矛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特纵炮兵团政委，参加了“紫石英号”事件的谈判工作）；杨颖奇、经盛鸿、孙宅巍、蒋顺兴、叶扬兵编著：《南京通史：民国卷》，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612–615页。关于英国议会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反应，可见詹姆斯·唐：《英国和革命中国的交往，1949–1954年》(James Tuck Hong Tang,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54*)，纽约1992年版，第43–44页。关于英国共产党对“紫石英号”事件的态度，参见汤姆·布肯南：《东风：中国和英国左派，1925–1976年》（Tom Buchanan, *East Wind: China and the British Left, 1925–1976*），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112页。

③ 詹姆斯·唐：《英国和革命中国的交往，1949–1954年》，第44页。

④ 彼德·罗：《在东亚遏制冷战：英国对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8–1953》(Peter Lowe, *Containing the Cold Wa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Japan, China and Korea, 1948-53*)，曼彻斯特1997年版，第107页。

⑤ 布赖恩·波特：《英国和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英国态度的研究，1945–1954年》(Brian Porter,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A Study of British Attitudes, 1945-1954*)，伦敦1967年版，第28页；戴维·沃尔夫：《“获得便利”：英国承认中国，1950》，载《当代历史杂志》[David C. Wolf, "'To Secure a Convenience': Britain Recognizes China, 195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8 (1983)]，第299–326页。

话基本上代表了英国朝野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共识。

2. 舆论界的反应

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议会的情况相仿，英国舆论界大多关注国内经济问题和欧洲局势，很少评论中国问题。“紫石英号”事件使英国舆论界开始意识到中国事态的严重性，报纸的社论和文章开始愈来愈多地议论中国问题。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要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政府有必要和中共建立联系。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说，为了“防止英国生命和财产的不必要损失”，有必要和中共政权建立“某种正式关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认为，鉴于英国在华利益如此之大，“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和中共建立联系。《泰晤士报》（The Times）写道，中国的内战仍将继续，英国不可能影响这一进程，因此，政府有必要和中共政权建立“工作关系”。[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舆论界的一致意见是英国应该承认新中国。[②]

3. 工商界的反应

40年代末，在美国有一个反对承认新中国，主张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利益集团，即院外援华集团。[③] 在英国，也有一个在中国问题上进行院外活动的利益集团，它就是“中国协会”（The China Association）。不过，该组织是主张承认新中国的。

“中国协会”代表了所有在华有商业利益的英国公司和企业，其中很有影响的公司有“香港—上海银行集团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等。“中国协会”和英国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年，“中国协会”的董事长是英国前驻华大使英弗查普尔勋爵（Lord Iverchapel），一年以后，另一位英国前驻华大使霍雷斯·西摩爵士（Sir Horace Seynour）接替他就任“中国协会”的董事长。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协会”的主席是威廉·凯瑟克（William Keswick）。[④]

---

①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1949年5月16日；《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49年5月26日；《泰晤士报》(The Times)，1949年6月23日。

② 布赖恩·波特：《英国和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英国态度的研究，1945–1954年》，第30页。

③ 参阅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年》，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第37–45页。

④ 关于中国协会的历史，可参阅N. A. 佩尔科维茨：《老中国通和外交部》(N. A. Pelcovits,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纽约1948年版；戴维·克莱顿：《重新评价帝国主义：英中政治和经济关系，1950–1954》(David Clayton,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54*)，贝辛斯托克1997版，第7–8页。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国民党从海上封锁上海港口，影响到当地的英国商业利益。上海的英国公司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和中共谈判，保护他们的利益。7月底，英美烟草公司的代表交给英国外交部官员彼得·斯卡利特（Peter Scarlett）一份由公司董事会起草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指出，公司的一个突出困难是“很难见到能够作最后决定的中共官员”。备忘录建议英国政府派外交代表（并不一定要以官方身份）进驻北京，以便和中共建立联系。[①] 几天以后，“中国协会”的代表也会见英国外交部官员，再次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在华英国利益。[②] 10月14日，“中国协会”上海英国商会的一份电报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该电报要求政府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③]

4. 英联邦成员国的反应

亚洲的英联邦成员国都主张承认新中国。印度领导人同情中国革命，出于自身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传统和信仰，他们视中国革命为亚洲广泛兴起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政府在外交上奉行中立的政策，希望和新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希望印度和中国作为亚洲两个大国，携手合作，共同领导亚洲事务。另外，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印度也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④] 1949年11月13日，尼赫鲁在和英国英联邦关系大臣菲利普·诺艾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会谈时，建议英国尽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⑤]12月30日，印度承认新中国。

尼赫鲁不赞同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和孤立政策，认为美国对新中国的高压态势只会使中共更倒向苏联，对亚洲邻国更强硬。尼赫鲁在一系列涉及亚洲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唱反调：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印度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接纳新中国的代表；在朝鲜问题上，印度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提出的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鲜的议案，不支持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

---

① 《斯卡利特备忘录》，1949年7月2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75866，F11173/1153/10。

② 《麦克尼尔备忘录》，1949年7月2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75866，F1163/1153/10。

③ 《中国协会致外交部》，1949年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75617，F15516。

④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印度对华政策，参阅沙瓦保利·戈保:《尼赫鲁传，1947–1956》(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1947-1956*)，剑桥1979年版；米拉·辛哈:《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成败都在中国》(Mira Sinha, “China: Making and Unmaking of Nehru’s Foreign Policy,” *China* Report, Vol. 15, No. 2 (March-April 1979), pp. 51-64; 何卫东:《1946–1958年的印度对华政策》，载《东南亚》季刊，1989年第2期，第56–61，64页。

⑤ 《诺艾尔 - 贝克与尼赫鲁谈话记录》，1949年11月13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75823/17462。

争爆发后将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印度主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在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旧金山和会后，印度又拒绝签署美国主导的对日和约。尼赫鲁甚至一度考虑另外召开一个对日和会，这个会议只邀请亚洲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但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他后来不得不放弃他的这一想法。① 在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不久，另外两个英联邦成员国巴基斯坦和锡兰也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②

尼赫鲁把英联邦国家定期会议作为他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舞台，并很快成为这类会议上说话极有分量的领导人。英国领导人视尼赫鲁为亚洲事务专家，非常重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1950 年，艾德礼首相通过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向尼赫鲁表示，他非常希望尼赫鲁能出席即将召开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讨论英联邦的防务问题，因为尼赫鲁代表了英联邦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声音。③

英联邦的其他主要成员国，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原则上都不反对承认新中国。但由于各自的特殊情况，他们又不准备立刻承认新中国。加拿大主要是出于美加关系的考虑，不愿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得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面临国内选举，中国问题太敏感，两国政府不愿马上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总的说来，英联邦成员国是不反对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④

---

① 高龙江：《持久的较量：中印在二十世纪的竞争》(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西雅图 2001 年版，第 117–118 页；哈里·哈丁：《战略三角的演变：中国、印度和美国》(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载富兰辛·富兰科和哈里·哈丁主编：《印中关系：美国应该知道什么》(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纽约 1948 年版，第 324 页。

② 缅甸虽然过去也是英国殖民地，但是 1948 年独立后，拒绝加入英联邦。和印度一样，缅甸也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亚洲国家。

③ 朱迪丝·布朗：《尼赫鲁的政治生涯》(Judith Brown, *Nehru: A Political Life*)，纽海文 2003 年版，第 255 页。也有个别英国官员对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动不以为然。尼赫鲁在致周恩来的信中提到中印友谊。对此，英国外交部官员富兰克林 (A. A. E. Franklin) 不屑一顾。他以讽刺的口吻说，喜马拉雅山这个屏障的存在，加强了中印之间的所谓“友谊”。《富兰克林备忘录》，1950 年 1 月 3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 FO371/83279。

④ 詹姆斯·唐：《英国和革命中国的交往，1949–1954 年》(James Tuck Hong Tang,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54*)，纽约 1992 年版，第 58–60 页。关于加拿大对华政策，参阅保罗·艾文斯和麦克尔·富罗尼克主编：《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多伦多 1991 年版。

5. 美国的态度

二战结束后，美国曾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指望扶持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东亚的代理人，以维护美国利益。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一直大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是，从 1948 年末起，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迅速发展，蒋介石统治的江河日下，美国对国民党的信心越来越小。无可奈何之中，美国外交决策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在继续援助蒋介石的同时，开始考虑美国和即将获得全国胜利的中共的关系。

以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为代表的一批国务院官员认为，贸易和“承认”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在和中共交往时，可以讨价还价、施加影响的机会。西方和共产党中国恢复贸易关系是保持和中共联系的“最可行的办法”。让中共进口西方石油产品的作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样中共“可能建立起对西方的依赖关系”。[①] 美国官员指望，西方可以影响中共的政策，使中共起码不成为苏联在东亚的工具，从而抵消苏联的影响，维护美国的利益。

1949 年 5 月 13 日，艾奇逊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转达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原则”：新中国必须（1）实际控制领土和国家的行政机器；(2）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3）获得全国人民的承认。[②] 随后，司徒雷登在和南京军管会外事办公室主任黄华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承认“三原则”。很明显，美国并不准备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讨论和新中国的关系。美国是要以“承认”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即改变中共的立场，要中共“遵守国际义务”，维护美国在华侵略利益和特权。对于美国的这种要求，中共自然是采取拒绝的态度。美国不愿放弃其“有条件的承认”政策，中美关系只能是越来越僵化。再加上，美国国内院外援华集团的压力以及美国政府担心承认新中国会鼓励东南亚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实际上采取了越来越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从 1949 年初开始，英美围绕承认新中国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双方的看法差别很大。一方面，美国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让英国在承认政策上和美国保持一致，不要作出“不成熟的”、“匆忙的”承认决定。另一方面，英国则反复强调，

① 《政策设计室第 39/1 号文件》，1948 年 11 月 23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 年第 8 卷，第 208–211 页；《斯普鲁斯备忘录》，1949 年 1 月 6 日，2 月 10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9 卷，第 5–6 页，第 823–826 页。

② 《艾奇逊致司徒雷登》，1949 年 5 月 13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9 卷，第 21–23 页。

它在中国有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需要保持，不得不采取和美国不同的作法。至于促进中苏分裂的问题，英国认为，保持西方在华影响是阻止中国进一步倒向苏联阵营的最好办法。[①] 英国官员认为，和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相比，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很小，因此，美国在考虑对中国施加压力和经济制裁时很可能顾虑很少。他们害怕，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会促使中共立刻将水电、保险、银行、商业、船运等行业收归国有，而英国在这些行业中投资巨大，利益很多。[②]

随着中国革命日益接近全国胜利，英国越来越倾向于承认新中国，以维护其在华利益，英美在承认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最后，英国政府终于不顾美国的压力，作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1949 年 10 月 24 日贝文向内阁建议承认新中国，他列举了两个重要理由来说明他为何主张这样做：第一，英国可以通过和中共开展贸易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第二，在不久的将来，中共有可能和苏联发生摩擦，如果英国和中共政权保持正常关系的话，英国就有机会利用中苏矛盾。[③] 随后，贝文于 11 月 1 日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英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否认地控制了中国四分之三的领土。贝文告诉艾奇逊，保护英国贸易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中国的门内伸一个脚。[④] 知道美国人对他的做法不悦，贝文于 12 月 16 日再次致电艾奇逊，就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和美国保持一致，表示遗憾，希望求得美方的谅解。贝文指出，英国想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但英国也不希望失去对亚洲形势的控制，并且必须考虑英国在亚洲的朋友的意见。他再次强调，对抗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让中共与西方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得越早越好。[⑤]

综上所述，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决定，在国内受到普遍的支持，议会、利益集团、舆论界都主张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现实的态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英国的大多数盟国及英联邦成员国都不反对英国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只有美国（以及法国）不希望英国迅速承认新中国。

---

① 《道格拉斯致艾奇逊》，1949 年 8 月 17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9 卷，第 57–61 页；《艾奇逊—贝文谈话记录》，1949 年 9 月 13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9 卷，第 81–85 页。

② 瑞奇·欧文戴尔：《英国、美国和对共产党中国的承认》，第 142 页。

③ 亨利·佩林：《工党政府，1945–51》(Henry Pelling, *The Labour Governments, 1945-51*)，纽约 1984 年版，第 143 页。

④ 艾伦·巴勒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纽约 1983 年版，第 744 页。

⑤ 《贝文致艾奇逊》，1949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9 卷，第 224–226 页。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1950 年 1 月 6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外长，承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未任命大使之前，派胡阶森（John Hutchison）为临时代办。北京 1 月 9 日复电表示愿意同英国建交，接受胡阶森作为英国代表来华谈判建交问题。英国虽已提出“双方换文本身已构成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但还是同意了进行谈判。①

中英建交谈判于 3 月初开始，中方向英方阐明：在建交问题上，最重要而必须先行解决的是英国政府同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这首先包括英国代表在联合国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行动。在这一方面，中方是不满意英方的行动的。

1950 年 1 月 13 日，苏联代表马立克（Jacob Malik）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驱除国民党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但被美国操纵的多数票否决。英国投了弃权票，2 月 2 日，英国外交部指示胡阶森向中方解释说，英国投了弃权票，不是英国支持国民党集团，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因为安理会里没有支持苏联提案的多数票。英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英国投了弃权票。② 中国认为，联合国各机构如何表决是一回事，而英国代表团在表决此问题时如何投票则是另外一回事，英方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英建交谈判被搁置下来。

为了打破中英谈判的僵局，英国在 1950 年 3 月至 6 月间，曾作出一些努力，试图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在组成安理会的 13 个国家中，已经有 5 个国家，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英国和挪威，承认了中国。英国认为，只要再有两个国家支持中国，就可以在安理会形成赞成中国代表权的多数票。因此，3 月间英国外交部指示英国驻埃及、厄瓜多尔和古巴的外交官与所在国政府接触，说服他们在安理会支持中国。③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暗地活动，以便阻止安理会形成支持中国的多数票。1950 年 1 月 18 日，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递交一份备忘录给厄国政府外交部。该备忘录指出，厄瓜多尔终止和国民党的关系，将会对安理会讨论中国问题

---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1987 年版，第 13 页。

② 《外交部致胡阶森》，1950 年 2 月 2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3283，FC1022/175。

③ 《外交部指示》，1950 年 3 月，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8504，UP213/63。

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希望厄瓜多尔政府“起码在目前推迟考虑”和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1]

由于美国的阻挠，英国试图在安理会促成一个支持中国的多数票的努力没能成功。6月，英国外交部决定，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再出现时，英国将不再投弃权票，而改投赞成票。外交部指出，将于7月3日召开的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是英国执行这一新政策的第一个机会。届时，英国将投票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2]

但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英国再次改变态度，迫于美国的压力，英国决定推迟执行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使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复杂化，并扩大了英美在此问题上的分歧。美国认为，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联合国不应该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英国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和朝鲜战争是两码事，可以分开来考虑。[3]

在9月19日举行的第5次联合国大会上，英国投票支持印度代表提出的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但却对苏联提出的驱除国民党代表，接纳中国的提案，投弃权票。后来，这二个提案都未获得通过。英国的作法表明：尽管它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它却不支持剥夺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从而表现出英国持“两个中国”政策的端倪。周恩来外长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 M. Pannikar）表示了中国政府对英国政策的两面性的不满。[4]

1951年5月，美国在联合国提出“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5月25日，艾奇逊对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说，美国此举的目的是防止6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成为安理会主席后再次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知道，安理会再次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投票的话，按照英国目前的政策，英国将投赞成票。英国再次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支持美国的“搁置”议案。由于美国操纵的多数使“搁置”议案获得通过，从1951年起，联合国大会多年不审议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任何建议。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61年。

---

① 《格罗斯致艾奇逊》，1950年3月11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2卷，第239页。

② 《外交部备忘录》，1950年6月，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8419，UP123/79。

③ 《艾奇逊致贝文》，1950年7月10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2卷，第349–350页；《道格拉斯致艾奇逊》，1950年7月11日，同上，第361页。

④ 《德里致英联邦事务部》，1950年9月23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8425，UF123/211。

“两航”飞机问题

50年代初，阻碍中英建交谈判获得成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政府对在英国、香港和其他英国属地的国民党集团的各种机构以及中国的国家财产所持的态度。在这一方面，香港“两航”飞机事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乘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敬宜和陈卓林，祝贺“两航”全体员工起义。[①]“两航”全体员工起义后，尚有70余架飞机留在香港。北京立即宣布：这些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财产”，要求香港当局予以归还。

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美国的支持者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惠廷·威劳尔（Whiting Willauer）等人也在积极活动，力图阻止北京获得这批飞机。国民党集团和陈纳德商定，由陈纳德控制的“民用航空公司”出面，“购买”这批飞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陈纳德让美国前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出面，去向香港总督亚历山大·格兰瑟姆（Alexander Grantham）施加压力，要求格兰瑟姆去影响香港地方法院对这批飞机的裁决。[②]格兰瑟姆在回忆录中说，多诺万和他谈话时，“盛气凌人”，并威胁说：如果格兰瑟姆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将去伦敦告格兰瑟姆的状，让格兰瑟姆“难堪”。[③]

1950年2月23日，香港地方法院根据“主权豁免”原则，裁决“两航”飞机归中国所有。美国政府反应激烈。24日，艾奇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伦敦和香港提出“抗议”。美国参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说，如果中共获得“两航”飞机，那将是对亚洲“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最大打击之一”。[④]

4月2日，由于香港当局没有采取认真保护措施，致使7架“两航”飞机被炸。

---

①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

②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最近发表国民党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日记，其中透露了当年蒋介石和陈纳德合作，阻止北京收回“两航”飞机的经过。见《传记文学》1990年第4期，第14–17页；又见小威廉·利尔瑞：《危险的使命：民用航空公司和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秘密活动》（William Leary, Jr,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Asia*），塔斯克卢沙1984年版，第91–99页。

③ 亚历山大·格兰瑟姆：《通过港口：从香港到香港》(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香港1965年版，第162页。

④ 利尔瑞：《危险的使命：民用航空公司和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秘密活动》，第97页。

4 月 4 日，周恩来指责香港当局阻碍飞机归还中国，要求香港立即放行剩余的飞机并对“中国的损失负全部的责任”。[①]

美国加紧对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改变香港地方法院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官员威胁英国大使：如果香港将“两航”飞机交还北京，美国将终止继续给英国以“马歇尔计划援助”。在伦敦，美国大使馆一秘阿瑟·林沃尔特（Arthur Ringwalt）频繁地会见英国外交部官员，要求英国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决定。[②]

英国政府考虑到英国对美援的依赖，不得不又一次屈从于美国的压力。5 月 10 日，英国政府颁布一项赦令，否决香港地方法院先前对“两航”飞机的裁决，并决定在飞机的所有权被最后裁定以前，将飞机扣留在香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召见胡阶森，指出英国政府的赦令是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不友好态度的表现”。[③] 1952 年，英国枢密院决定“两航”飞机归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所有。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参加美国组织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英国和美国一样认为，苏联幕后策划了朝鲜战争的发生。因此，西方国家应坚决遏制苏联的扩张企图。英国军方认为，南朝鲜的失败将大大打击西方的“威信和信誉”，将不利于英国在马来西亚的统治。[④]

英国尽管支持美国出兵干涉朝鲜，但却坚决反对美国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作法。英国许多政府官员对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危险的。英国担心朝鲜战争的扩大将使美国的“泥足”深陷一场“错位的战争”，从而使欧洲防务松懈，给苏联可乘之机。1950 年 7 月 6 日，艾德礼首相致杜鲁门总统，明确提出英国对朝鲜战争所“深为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担心苏联企图使西方陷入朝鲜半岛。[⑤]

---

① 《纽约时报》，1950 年 4 月 4 日。

② 阿瑟·林沃尔特口述历史，(Arthur Ringwalt, Oral History)，第 38–41 页，藏杜鲁门图书馆。

③ 《纽约时报》，1950 年 5 月 20 日。

④ 《英国国防部文件》，Chief of staff, (50)minutes, first meeting, July 3,1950, DEFE4，英国公共档案馆；关于英国对朝鲜战争爆发的反映的详细论述，参阅麦克尔·多克瑞尔：《外交部，英美关系和朝鲜战争，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 6 月》(M. L. Dockrill, “The Foreign Office,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 June 1950-June 1951”)，载《国际事物》(International Affairs)，1986 年夏季期，第 459–476 页。

⑤ 《艾德礼致杜鲁门》，1950 年 7 月 6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314–315 页。

7月7日，贝文在给艾奇逊的电文中说，美国在朝鲜的“勇敢行动”可望获得“世界舆论的衷心支持”，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却很难指望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认可，因为他们反对朝鲜冲突的扩大。①

在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艾奇逊于7月10日给贝文一份措词强硬的复电。艾奇逊拒绝在中国问题上让步。他指出，“以中共为先锋的共产主义目前已开始执行进攻亚洲的政策，其近期目的是朝鲜、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度尼西亚、开罗、印度和日本”。艾奇逊声称，西方的“暂时让步”不可能改变共产主义的政策。第七舰队的任务是使台湾“中立化”，而不是占领台湾。②

艾奇逊的强硬态度使英国外交部官员大为不满。在贝文生病期间，代理他处理外交部事务的肯尼思·杨格（Kenneth Younger）说：“目前好战分子似乎在美国占了上风。”英国应该告诉美国人：“印度、缅甸，可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将必定会拒绝支持美国的台湾政策。”③

7月15日，贝文再次写信给艾奇逊，阐述英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重申分裂中苏的最好办法仍是保持中国和西方的联系。贝文强调说，西方不应该给中国留下这样印象，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可救药”了，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再和西方建立联系了。贝文警告，西方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只会将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④

英国尽管不断地向美国进行说服和劝阻，以抑制美国的政策，但出于英美关系的全面考虑，特别是英国对美援的依赖，英国又不愿过分地牵制美国政策，以免危及英美同盟关系。因此，在美军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时，英国政府并没有尽全力说服美国不要这么做。11月间，伦敦提出在中朝边境建立一个非军事缓冲区，以安慰中国人，但英国并没有努力说服华盛顿接受这一建议。⑤

直到11月底，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规模入朝参战，击退美军，杜鲁门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时，英国才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英国官员

---

① 《贝文致艾奇逊》，1950年7月7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29–331页。

② 《艾奇逊致贝文》，1950年7月10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47–352页。

③ 《杨格致贝文》，195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94091。

④ 《贝文致艾奇逊》，1950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395–399页。

⑤ 有关英国提出的非军事缓冲区的建议，可参阅彼得·法勒：《1950年11月英国关于在鸭绿江以南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这是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被人忽略的机会吗？》(Peter Farrar, “Britain’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 Was It a Neglected Opportunity for End the Fighting in Korea?”)，载《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83年4月号，第327–351页。

对麦克阿瑟的骄横狂妄深为不安，担心世界大战的发生。12 月初，艾德礼首相匆匆飞到华盛顿，和美国领导人举行会谈。[①]

在会谈中，艾德礼要求美国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和中国谈判解决朝鲜和台湾问题。美方认为，英国提出的与中国人谈判的建议是“绥靖主义”，在美国国会和公众中是行不通的。艾奇逊说，他对与中国人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不抱希望。他认为，目前是自 1917 年以来，西方和共产主义世界谈判的“最糟时间”。[②]

英美华盛顿会谈还再次表现出双方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艾德礼说，尽管中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到一定时候将会导致中苏反目。艾德礼指出，“中国人确实是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他们很可能不是苏联那样的帝国主义者”，中国仍有“出现铁托主义的机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总是能吸收外来的新东西，中共很可能是打着红旗，但实际是另一回事。艾德礼再次表示，西方对中国采取强硬敌对态度，而将中国进一步推进苏联阵营的做法是不明智的。[③]

对于艾德礼的这番分析，艾奇逊回答说，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持相同看法，他自己本人就一直在尽力执行利用中国民族主义、破坏中苏团结的政策；但问题是是否有可能采取这一政策。艾奇逊解释说，一个困难就是中苏分裂仍是一个长远的前景，而朝鲜战争则迫在眉睫。如果为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而使美国近期的安全受到损害，那是非常失算的。美国必须考虑其政策对日本、菲律宾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有利于美国执行在西欧的重建计划。最后，美国的国内舆论也得考虑。这时，杜鲁门总统插话说，台湾问题“在美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在美国有许多支持者”。[④]

1951 年 1 月，美国告诉英国，它准备在联合国提出一个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希望英国支持。英国反对美国草案中针对中国的一些严厉措施。由于英国

---

① 汤姆斯·肖恩鲍姆:《在和平与战争中的努力：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年代的迪安·腊斯克》(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纽约 1988 年版，第 219 页；梅尔文·莱夫勒:《力量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斯坦福 1992 年版，第 399 页；彼德·罗:《在东亚遏制冷战：英国对日本、中国和朝鲜的政策，1948–1953》(Peter Lowe, *Containing the Cold Wa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Japan, China and Korea, 1948–53*)，曼彻斯特 1997 年版，第 215–218 页。

②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记录》，1950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1361–1374，1397–1403 页。

③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记录》，1950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

④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记录》，1950 年 12 月 4 日至 5 日。

的压力，美国不得不对其草案作些修正，降低草案中有关“惩罚”中国的条款的调子。[①] 总之，从 1950 年 12 月艾德礼访美到 1951 年 1 月，是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政策发挥约束作用最大的时期。在这以后，一直到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英国还时常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表示反对或保留。

日内瓦会议

1954 年初，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柏林举行外长会议，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3 月，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武装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下，发起抗法斗争的决定性一战，即奠边府战役。

美国急于武装干涉印度支那，为法国解围。美国认为，一旦印度支那被共产党占领，东南亚的其余国家，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跟着倒下，落入共产党手中。[②] 4 月 4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给丘吉尔首相，要求英国支持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反共联盟的设想。[③] 在这同时，杜勒斯国务卿访问伦敦和巴黎，和法国官员磋商在印度支那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

英国拒绝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考虑干涉印度支那。丘吉尔和艾登并不相信美国印支政策中的所谓“多米诺”理论。他们担心，西方对印度支那的干涉，会破坏在日内瓦会议上谈判解决问题的希望。此外，英国知道，亚洲国家，特别是印度反对扩大印度支那战争。[④] 由于英国的反对，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企图干涉印度支那的计划未能如愿。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丘吉尔保守党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考虑到英国这一态度，再加上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中国同意和英国讨论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⑤]

---

① 罗斯玛丽·富特：《朝鲜危机中的英美关系：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 月英国努力阻止一场扩大的战争》，(Rosemary Foot, “Anglo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 The British Effort to Avert an Expanded War, December 1950 – January 1951”)，载《外交史》杂志 (*Diplomatic History*)，1986 年冬季号，第 43–57 页。

② 乔治·赫林：《美国的最长的战争：美国和越南：1950–1975 年》(George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纽约 1986 年版，第 34 页。

③ 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1953–1956》(Dwight Eisenhower,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纽约 1963 年版，第 346–347 页。

④ 有关英国反对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干涉印度支那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杰弗里·沃纳：《印度支那战争的解决》(Geoffrey Warner,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载约翰·杨编：《1951–1955 年丘吉尔和平时期政府的外交政策》(John Young,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urchill's Peacetime Administration, 1951-1955*)，莱斯特 1988 年版，第 233–259 页。

⑤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3 页。

根据中国代表团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帮助中国同英国的接触，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亲自在苏代表团驻地设鸡尾酒会，请周恩来和艾登出席。此次宴会打开了中英交往的门路。在这以后，周恩来和艾登在日内瓦进行了几次互访。[①]

周恩来和艾登的助手们也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中英关系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英国驻华代表杜维廉在回忆录中说，他和中国代表团的宦乡、乔冠华、龚澎等人，举行了"融洽"的会谈。[②]此外，在日内瓦，周恩来还会见了英国工党代表、前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

中英在日内瓦谈判的一个结果是两国建立代办级关系。代办的任务是谈判建交，并处理两国间的侨务和贸易问题。由于英国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仍持不明确态度，中国认为，中英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③]总之，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会后，两国贸易往来开始增多。不久，艾德礼率领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④]

结　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五年中，与美国遏制中国的敌对政策相比，英国对华政策表现得比较谨慎和实际。1950 年 1 月，英国承认了新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危机期间，英国都对美国的战争冒险政策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建立起代办关系。此外，英国还对 1954 年中美日内瓦会谈起了中介作用。综观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有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英国对华政策。

第一，经济因素和维持殖民大国地位的考量在英国决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在华仍有许多商业利益，英国希望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香港和新加坡、马来亚共同构成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帝国，而殖民帝国的存在对英国既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又有重要的政治利益。从商业角度看，英国的远东殖民地为英国提供重要的原材料和市场。作为英镑区成员，它们对支撑英镑的国际地位

---

① 师哲：《日内瓦散记》，载《人物》，1989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

② 杜维廉：《和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Humphrey Trevelyan, *Living with the Communists*)，波士顿 1971 年版，第 82–83 页。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3 页。

④ 关于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的情况，可参阅摩根·菲利普斯：《东方会见西方》(Morgan Phillips, *East Meets West*)，伦敦 1954 年版，第 42 页。

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政治角度看，英国的远东帝国是英国维持其大国地位的重要象征，具有很大的心理价值。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英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了“留一只脚在门内”的政策，希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来保留英国在华影响，维护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

第二，战后英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和中东，相比之下，远东的战略意义较小。英国希望美国专注于欧洲防务，担心美国一旦卷入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就会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从而无暇顾及欧洲，使欧洲防务出现漏洞，让苏联有机可乘，浑水摸鱼。这是英国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危机期间，尽力约束美国的军事行动，努力缩小战争规模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从维护英联邦团结的政治角度出发，英国很重视英联邦的亚洲成员国，特别是印度对中国的态度。1950 年，英联邦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同情中国革命，反对西方干涉亚洲事务，反对美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扩大战争的行为。印度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影响了英国的立场。

第四，从分裂中苏同盟的目标出发，英国领导人认为，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开展贸易，是保持西方在华地位，抵消苏联影响的最好办法；而美国对中国的强硬高压政策，只会将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

第五，英国人讲究经验主义、重实际的性格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与美国外交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做法不同，英国外交比较实际，较少受观念形态的支配。英国承认新中国只是接受一个客观现实，而不是指望通过承认来表达某种“道德评判”。与此相反，美国的承认政策中却包含许多“道德”因素，中国要获得美国的“承认”，必须先在行为上满足美国的“道德”要求。不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东西，美国就不能接受，就要加以改变。英国人重实际的特点使英国能较快地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此外，英国决策人也较少受国内反共极右集团的制约，在对华政策上比较主动。英国国内没有像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那样的亲蒋势力。

尽管英美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许多分歧和矛盾，但英国也不愿和美国完全背道而驰。在英国领导人的眼里，英美同盟的重要性要大于英国在华利益。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为削弱。战后，英国要保持其国际地位，遏制苏联，并恢复国内经济，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因此，在中国问题上，伦敦经常不得不屈服于华盛顿的压力，不得不配合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政策。这明显表现在英国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以及对“两航”飞机问题的处理上。

必须指出的是，英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所采取的既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又保留国民党席位的政策，表现出英国日后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苗头。英国的这一做法表明英国领导人低估了中共要统一中国的决心和愿望。它只能有碍于中英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本文最初发表在《世界历史》，1990 年第 6 期上，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英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1950—1953）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英国加入美国组织的“联合国军”干涉朝鲜。伦敦和华盛顿一样认为，苏联在幕后策划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因此，西方国家应坚决遏制苏联的扩张企图。但是，英国政府反对美国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做法。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官员不断向美国决策人施加压力，希望把战火限制在朝鲜半岛，并尽快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在围绕战争规模上所表现出的英美分歧构成了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国际关系矛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根据英美外交文件，探讨英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着重论述伦敦在约束华盛顿的扩大战争企图，以及在尽早实现朝鲜停战等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并分析决定英国政策的因素。

一

二战后，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天平上，欧洲的分量居首位，中东次之，远东较小。1949 年 2 月，英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类似美国国务院以凯南为首的政策计划室的机构，即常设副外交大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常设副外交大臣牵头，负责规划英国的长期外交战略。3 月，该委员会在一份政策文件中重申，鉴于对抗苏联的需要以及英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英美关系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关键。[①]4 月，该委员会又在一份有关中东政策的文件中指出，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从战略角度看，中

① 安东尼·亚当斯维特：《英国和世界，1945–1949 年：外交部的看法》，(Anthony Adamthwaite, “Britain and the World, 1945-1949: the View from the Foreign Office”)，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1985 年春季号，第 228–229 页。

东都处于交通中枢，是防卫非洲和印度洋的屏障；从经济上看，中东的石油和棉花对英国战后的经济复兴“至关重要”。[①]

战后，英国视远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伦敦主要关心香港的地位，保护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寻求恢复与日本的商业关系，并通过远东委员会来影响对战后日本的处理。朝鲜对英国来说，既无经济利益，又无战略价值，其意义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出于在东亚遏制苏联的考虑，英国支持美国对朝鲜的干涉。英国官员认为，苏联是北朝鲜背后的支持者。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要求北朝鲜把军队撤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北的议案。[②]但是，当美国于6月30日要求英国派军队入朝时，英国政府内部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英国军方对派兵去朝鲜感到为难，因为英国在亚洲承担的安全义务已经够多了，马来亚的反政府骚乱迫使英国增加在东南亚的驻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又使英国不得不加强对香港的防卫。[③]英国参谋部认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布置已经“摊得太开”，不够使用，因而不情愿出兵朝鲜。但外交部却主张出兵。副外交大臣皮尔逊·狄克松（Pierson Dixon）认为，不出兵不利于英国在远东问题上约束美国，出兵可保证英美在朝鲜问题上的经常磋商。他指出，如果朝鲜局势恶化的话，美国有可能考虑使用核武器。因此，在适当的时候，英国应该让美国人保证，不经过和英国的预先协商，美国不使用核武器。[④]7月15日，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说服内阁同意从香港调两个步兵营去朝鲜。截至11月，英国在朝鲜的部队达到三个旅。[⑤]

在战争初期，英美之间的分歧很快就暴露出来。英国尽管支持美国干涉朝鲜，但却坚持反对美国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倾向。许多英国官员对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深感不安。他们认为，这一举动是危险的，朝鲜冲突的扩大将使美国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从而导致欧洲防务松懈，给苏联以可乘之机。同

---

① 亚当斯维特：《英国和世界，1945–1949年：外交部的看法》，第231页。

② 艾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纽约1983年版，第791页。

③ 威廉·斯图克：《朝鲜战争：国际史》(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普林斯顿1995年版，第72页。

④ 《皮尔逊·狄克松备忘录》，1950年7月1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091，藏伦敦公共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ffice)。

⑤ 肯尼思·摩根：《执政中的工党，1945–1951年》(Kenneth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牛津1984年版，第423页；威廉·斯图克：《朝鲜战争：国际史》，第72页。

时，英国正在寻求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不希望朝鲜战争的升级使中英关系恶化。[①] 1950 年 7 月 6 日，艾德礼首相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明确提出英国“深为关切”苏联通过朝鲜战争而使西方阵营陷入朝鲜半岛的企图。[②]

7 月 7 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致电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指出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可望获得“世界舆论的衷心支持”，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却很难得到国际的认可，因为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担心，一旦北京夺取台湾，战争将会扩大。贝文认为，美国在公开声明中应着重朝鲜问题，而不应提及台湾问题，否则，支持美国的国际阵营将会出现分裂。[③]英国官员希望通过谈判寻找解决朝鲜冲突的办法，他们要求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意接纳它进入联合国，以此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④]

在和杜鲁门商量过以后，艾奇逊于 7 月 10 日给贝文一份措词强硬的复电，拒绝在中国问题上让步。他认为：“以中国为先锋的共产主义目前已经开始执行进攻亚洲的政策，其近期目标是朝鲜、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度尼西亚、开罗、印度和日本。”艾奇逊声称，西方的“暂时让步”不可能改变共产党的政策；第七舰队的任务是使台湾“中立化”，而不是占领台湾。他强调说：“鉴于目前亚洲的形势，我们不愿看到台湾被北京夺去”；美国反对台湾被美国的敌人用作针对美国的基地。[⑤]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官开始和苏联官员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办法。7 月 6 日，英国驻苏大使戴维·凯利（David Kelly）会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艾德礼和贝文建议美国也寻找机会和共产党国家谈判，以结束战争。[⑥] 7 月 11 日，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Lewis

---

① 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参见翟强：《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载《世界历史》，1990 年第 6 期，第 37–45 页；詹姆斯·唐：《英国和革命中国的交往，1949–1954 年》(James Tuck Hong Tang, *Britain's Encounter with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54*)，纽约 1992 年版。

② 《艾德礼致杜鲁门》，1950 年 7 月 6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 年第 7 卷，第 314–315 页。

③ 《贝文致艾奇逊》，1950 年 7 月 7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329–331 页。

④ 博顿·考夫曼：《朝鲜战争：危机、信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Burton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纽约 1986 年版，第 100–101 页。

⑤ 《艾奇逊致贝文》，1950 年 7 月 10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347–352 页。

⑥ 《英国外交部致英驻美大使弗兰克斯》，1950 年 7 月 7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082；迪安·艾奇逊：《身临其境：我在国务院的日子》(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rtment*)，纽约 1969 年版，第 416–417 页。

Douglas）会见贝文，告诉他艾奇逊拒绝和中共谈判。道格拉斯说，艾奇逊认为和中共谈判将给苏联这样一个印象，即“西方正在削弱自己抵抗侵略的决心”。道格拉斯还告诉贝文，美国认为英国的谈判建议会对英美关系带来“严重影响”。①

艾奇逊的强硬态度使英国外交部官员大为不满。在贝文生病期间，代理他负责外交部事务的肯尼思·杨格（Kenneth Younger）说：“目前好战分子似乎在美国占了上风。”他认为，英国应该告诉美国人，“印度、缅甸，可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将必定会拒绝美国的台湾政策”。② 作为工党左翼的杨格，要比贝文更不怕顶撞美国。

7 月 15 日，贝文再次致电艾奇逊，阐述英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重申分裂中苏的最好办法仍是保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贝文强硬地说，西方不应该给中国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在西方眼中已经“不可救药”了，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再和西方建立联系了。贝文警告，西方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只会将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③

二

9 月 15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率军在仁川登陆。10 月 2 日深夜，周恩来总理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要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十八度线，中国一定要管。④ 英美在“联合国军”是否应越过三十八度线问题上很快出现分歧。英国外交部非常重视北京的警告，但麦克阿瑟却视中国的警告为“虚张声势”。他吹嘘说随时准备给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以迎头痛击。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他将轰炸东北。⑤

麦克阿瑟的骄横和狂妄使许多英国官员忧心忡忡。副外交大臣罗杰·梅金斯（Roger Makins）指出，麦克阿瑟的行为有可能在东亚导致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一场战争将会像一个“流脓的疮伤耗尽西方国家的力量，并削弱他们应付出现在其它

---

① 《英国外交部致英驻美大使弗兰克斯》，1950 年 7 月 12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084。

② 《杨格备忘录》，1950 年 7 月 11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94091。

③ 《贝文致艾奇逊》，1950 年 7 月 15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395–399 页。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7 页。

⑤ 关于麦克阿瑟对中国的态度，参见 M. L. 多克瑞尔：《外交部，英美关系和朝鲜战争，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 6 月》(M. L. Dockrill, “The Foreign Offic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 June 1950-June 1951”)，载《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1986 年夏季号，第 463 页；特伦布尔·希金斯：《朝鲜和麦克阿瑟的垮台》(Trumbull Higgins, *Korea and The Fall of MacArthur*)，纽约 1960 年版，第 58–59 页；威廉·曼彻斯特：《美国凯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 年》(William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波士顿 1978 年版，第 586–612 页。

地区的危机的能力”。[①]10 月 4 日，英国参谋部向艾德礼建议，“联合国军”应在三十八度线以南停留一至二周，以使西方外交官得以争取和中国谈判解决朝鲜问题。艾德礼赞同这一建议，但他要在同贝文讨论过以后，再决定是否向美国人传达英国军方的这一建议。10 月 5 日，艾德礼和贝文会商。贝文的看法是：艾德礼不将英国参谋部的建议传达给美国人，但英国应该要求美国人保证：麦克阿瑟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并且不轰炸东北和西伯利亚。艾德礼采纳了贝文的主张。[②]

有两个因素导致贝文不愿意在“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十八度线的问题上向美国施加过多的压力。首先，西欧防务合作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在重新武装西德问题上，美国和法国有分歧，英国支持美国的立场。[③] 贝文不愿此时在朝鲜问题上过多地刺激美国，从而影响英美在西欧问题上的合作。其次，1950 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11 月，国会选举在即，共和党正抓住杜鲁门政府在远东问题上的挫折（特别是所谓的“丢失中国”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图从民主党手中夺过对国会的控制权。贝文 9 月份刚在纽约呆了两个星期，出席联合国大会，所以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很熟悉，知道杜鲁门政府的狼狈处境。贝文意识到，英国如果在这个时候过分批评美国政策的话，会使杜鲁门政府在国内政治上处境更不利，甚至可能再度引起美国的孤立主义的情绪，从而危及美国对西欧防务的承诺。[④]

随即，贝文指示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三个问题：（1）美国的政策是否仍是将战争限制在朝鲜？（2）华盛顿是否明确指示麦克阿瑟不要袭击中国东北和苏联西伯利亚的目标？（3）在联合国大会即将提出的“八国提案”和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之间是否应有一个时间差距？[⑤] 10 月 6 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对这三个问题给

---

① 《梅金斯备忘录》，1950 年 10 月 6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100。

② 威廉·斯图克：《有限的影响：英国政策和美国在朝鲜扩大战争》(William 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British Policy and American Expansion of the War in Korea”)，载《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86 年 2 月号，第 84–85 页。

③ 1950 年 9 月 12 日，在纽约举行的北大西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艾奇逊提出了一个重新武装西德军队的计划，法国立即表示反对。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劳伦斯·卡普兰：《美国和北约：形成的年代》(Lawrence Kapl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莱克星顿 1984 年版，第 160–161 页。

④ 斯图克：《有限的影响：英国政策和美国在朝鲜扩大战争》，第 71–72、84–85 页。

⑤ “八国提案”是指英国、澳大利亚、巴西、荷兰、古巴、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将于 10 月份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个有关解决朝鲜问题的议案，其中心内容是要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和联合国机构的监督下，举行所谓选举来“统一”朝鲜。

以肯定的答复。[①]

麦克阿瑟无视中国的警告，于10月7日挥师跨越三十八度线，向朝中边境进犯。为拯救朝鲜共产党并保卫中国的安全，中国于10月19日派兵进入朝鲜，并于10月25日发起反击美伪军的第一次战役。英国官员对这一事态的发展极为恐慌。英国外交部要求华盛顿同意由联合国邀请中国派代表到纽约，讨论停火以及朝鲜战争问题的解决办法。[②]

从11月6日起，麦克阿瑟不断要求华盛顿同意他使用空军轰炸中国东北的军事基地。由于美国先前已向英国保证，美国在朝鲜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前，先和伦敦通气。所以，艾奇逊于11月13日指示美国驻英使馆征询英国的意见：美国飞机是否可以在和中国飞机交战时进入东北？[③]与此同时，艾奇逊还指示美国驻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大使馆，要他们就同一问题征询这些国家政府的态度。11月16日，贝文明确答复美国，英国不同意美国飞机进入中国东北。[④]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反对美国飞机越过朝中边境。[⑤]由于盟国的反对，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结果杜鲁门政府没有允许美国飞机进入中国境内。

11月13日，英国参谋部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在朝中边境北朝鲜一侧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的建议。贝文立即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个建议是消除中国人的恐惧的好办法，同时还可以向亚洲的舆论说明联合国军对中国没有威胁。[⑥]贝文立即指示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就"缓冲区"的建议征询艾奇逊的反应。11月15日，弗兰克斯和艾奇逊、腊斯克会谈，艾奇逊表示对"缓冲区"的设想"有兴趣"。[⑦]尽管艾奇逊表面不反对英国提出的"缓冲区"建议，但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建议没有什

① 《腊斯克备忘录》，1950年10月6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893页。

② 《外交部致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1950年11月7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111。

③ 《艾奇逊致美国驻英国大使馆》，1950年11月13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1144–1145页。

④ 《贝文致弗兰克斯》，1950年11月16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1172页。

⑤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伍德沃德致艾奇逊》，1950年11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7卷，第1159–1160页；《有限的影响》，第91页。

⑥ 《内阁会议备忘录》，1950年11月13日，英国内阁文件，CAB128/18，C. M. 73（50），藏伦敦公共档案馆。关于英国提出的非军事缓冲区的详细论述，参见彼得·法勒：《1950年11月英国关于在鸭绿江以南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这是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被人忽视的机会吗？》(Peter Farrar, "Britain'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 Was It a Neglected Opportunity to End the Fighting in Korea?")，载《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83年4月号，第327–351页。

⑦ 《弗兰克斯致英国外交部》，1950年11月1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114。

么价值，因为他确信中共是好战的。[①]

印度和加拿大也对“缓冲区”的建议反应积极。他们主张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提出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的问题。艾奇逊则要求在麦克阿瑟的攻势有分晓以前，不在联合国提出这一建议。贝文同意艾奇逊的意见。[②]英国的“非军事缓冲区”建议最后之所以未能实现，一方面是因为麦克阿瑟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一心要把战争推进到鸭绿江边；另一方面是因为贝文不愿意过分压美国接受这一建议，以免危及英美同盟关系。

随着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前返乡”攻势的来临，英国内阁和议会都对朝鲜局势的发展惶惶不安。11 月 22 日，贝文对弗兰克斯说，下院中工党和保守党议员都非常担心麦克阿瑟将把联合国军带到一场和中国人的大战中去。他要弗兰克斯向艾奇逊强调英国舆论的反应，并要艾奇逊保证：华盛顿将约束麦克阿瑟的行动，不使他有越权行为。[③]英国参谋部建议，内阁以“最有力、最明确的语言”告诉美国人，英国希望麦克阿瑟放弃其攻势。艾德礼表示，在必要时他将亲自去华盛顿，向杜鲁门陈述英国内阁的看法。[④]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反击麦克阿瑟攻势的第二次战役，并很快击退美军。11 月 30 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杜鲁门话一出，英国朝野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惊呼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即。一名工党议员致信艾德礼首相，提出如果美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英国就从朝鲜撤军。两小时之内，有 150 名工党议员在这封信上签名。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也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政策。[⑤]英国内阁一致同意艾德礼应去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谈。12 月 2 日，法国总理雷勒·普莱文（Rene Plevin）和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在伦敦向艾德礼和贝文表示法国对朝鲜局势的严重关注。[⑥]显然，艾德礼的美国之行将不仅是去传达英国的意见，而且还是去表达广泛西欧国家的看法。[⑦]

---

① 罗伯特·贝斯勒：《迪安·艾奇逊：冷战中的一生》（Robert L. 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纽约 2006 年版，第 409 页。

② 斯图克：《有限的影响》，第 91 页。

③ 《贝文致弗兰克斯》，1950 年 11 月 22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84103。

④ 多克瑞尔：《外交部，英美关系和朝鲜战争》，第 464 页。

⑤ 考夫曼：《朝鲜战争：危机、信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第 112 页。

⑥ 艾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纽约 1983 年版，第 821 页；肯尼思·摩根：《执政中的工党，1945–1951 年》(Kenneth Morgan,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牛津 1984 年版。

⑦ 贝斯勒：《迪安·艾奇逊：冷战中的一生》，第 417 页；考夫曼：《朝鲜战争：危机、信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第 112 页。

三

从 12 月 4 日到 8 日，艾德礼和美国官员就朝鲜局势以及其他国际问题连续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艾德礼指出，如果西方在亚洲陷得太深，只会对苏联有利。他强调，西方国家应倾听亚洲的反应，特别是印度的声音。他说，中国人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有恐惧感，他们很希望加入联合国，并对台湾“感情很强烈”，他们不愿“一头扎进苏联的怀抱”。因此，艾德礼建议，美国应尽早在朝鲜停火，并和中国人谈判，讨论诸如承认中国、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台湾等问题。艾奇逊说，他对与中国人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不乐观。他认为，目前是自 1917 年以来西方和共产主义世界谈判的“最糟时间”。他指出，美国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在政治和军事上都不利：政治上会给人以美国“示弱”的印象，军事上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有害，亚洲盟国会对美国的信誉产生怀疑，日本可能因此而离开西方阵营。艾奇逊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归咎于北京，指责中共在制造麻烦，认为中美关系是否能改善取决于北京，中共应该先作出善意举动。杜鲁门则强调，眼下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等于在美国社会扔下一颗政治炸弹。[①] 在会谈中，英美双方还表现出在如何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分歧。[②]

12 月 11 日，艾德礼返回伦敦。他告诉内阁，他向美国人阐明了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性，美国人已接受了他的警告。他还说，杜鲁门私下向他明确保证美国不会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英国议会和舆论界赞扬艾德礼是和平的使者，称赞他把美国人从远东的一场更大的战争边缘上拉了回来。[③] 实际上，艾德礼在华盛顿除了向美国人指出朝鲜战争扩大的危险后果之外，他并没有改变美国领导人对中国、对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问题的基本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艾德礼的美国之行的影响是有限的。

1950 年 12 月，美国向英国建议，如果中国不接受一些亚非国家在联合国提出

① 《杜鲁门—艾德礼会谈纪录》，1950 年 12 月 4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1361–1374 页；考夫曼：《朝鲜战争：危机、信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第 112–113 页。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详见翟强：《论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1948–1954 年》，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第 55–62 页。

③ 摩根：《执政的工党》，第 429 页。

的一个“停火”提案，美国就在联合国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①]对于美国的这个建议，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在外交部内，贝文、梅金斯、狄克逊等官员出于维护英美关系的考虑，主张支持美国的建议，杨格则表示反对。在内阁中，除了财政大臣休·盖特斯凯尔（Hugh Gaitskell）等少数阁员主张支持美国外（盖斯凯尔主要担心英国得罪美国会影响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大多数内阁成员反对美国的建议。艾德礼本人主张英国对美国的这一提案投弃权票。内阁决定，只有在美国接受对其提案的修正案后，英国才会支持美国的提案。英国提出的修正案是：联合国应先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和中国的纠纷；如果外交途径不行时，再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最后，在华盛顿同意了伦敦提出的修正案后，英国投票支持美国的建议。1951 年 2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②]私底下，艾奇逊向英国官员保证说，美国没有准备以这个决议案为借口来向中国开战。[③]

1951 年 3 月下旬，联合国军的战线重新推进到三十八度线附近。英美对于是否再越过三十八度线，以及用何种方式结束朝鲜战争等问题又产生矛盾。英国认为，此时正是结束朝鲜战争冲突的机会，主张在三十八度线建立“事实的停火”，以谋求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但麦克阿瑟却不愿将战争停止在三十八度线，3 月 24 日，他发表了一个威胁中国的声明。他说，如果联合国军决定放弃把战争限制在朝鲜的作法，而将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内陆基地”的话，中国将面临“立即的军事崩溃”。[④]

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讲话再次引起英国等盟国的紧张和不安。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批评麦克阿瑟太“危险和不负责任”。《观察家》说，鉴于麦克阿瑟得到一些国会议员的有力支持，伦敦对白宫是否能够抵挡住扩大战争的压力感到怀疑。[⑤]

---

①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致艾奇逊》，1950 年 12 月 9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0 年第 7 卷，第 1496–1499 页。

② 关于英国政府对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议案的反应，见威廉·斯图克：《朝鲜战争：国际史》(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普林斯顿 1995 年版，第 151–157 页；克里斯琴·艾尔柯科：《英国和朝鲜战争，1950–1953 年》(Christian Alcock, *Britain and the Korean War*)，曼彻斯特大学博士论文，1986 年，第 180–234 页。印度和缅甸对该议案投反对票。见罗伯特·贝斯勒：《迪安·艾奇逊：冷战中的一生》(Robert L. Beisner,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纽约 2006 年版，第 424 页。

③ 贝斯勒：《迪安·艾奇逊：冷战中的一生》，第 424 页。

④ 《麦克阿瑟声明》，1951 年 3 月 24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 年第 7 卷，第 265–266 页。

⑤ 曼彻斯特：《美国凯撒》，第 635 页。

英国官员认为，麦克阿瑟应该立刻被解职。[①]

由于盟国的批评，再加上杜鲁门本人对麦克阿瑟藐视总统权力的不满，[②]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为美国远东军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英国下议院对这一决定报以掌声，西德、法国、意大利等盟国也欢迎杜鲁门的决定。[③]麦克阿瑟的撤职除去了一个不断引起英美分歧的原因。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英国对这一事态发展感到满意。

四

1951年10月，保守党上台。英国新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美国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严厉制裁"声明（"Greater Sanctions" Statement）。美国官员认为，板门店的谈判不大可能解决停战的监督问题，因此，美国有必要发表一个"严厉制裁"声明，以防止中国将来违反停战规定。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如下的制裁措施：（1）对中国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2）以联合国名义对中国实施海军封锁；（3）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4）不考虑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1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修斯（H. Freeman Matthews）向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通报了这一"严厉制裁"方案。[④]11月28日，艾奇逊对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说，对中国的"严厉制裁"警告可以通过英美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出，也可以由美国单独提出，但英国给予支持。美国不打算通过联合国发出这一警告。艾登回答说，他将就此问题同丘吉尔商量，同时他还得考虑英国舆论的反映。就惩罚中国的措施而言，艾登个人认为，英国政府较容易接受轰炸中国目标的方案，而难以接受海军封锁中国的设想。[⑤]

11月30日，丘吉尔召开国防部和参谋部会议讨论"严厉制裁"声明问题。与

---

① 《斯科特备忘录》，1951年4月9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92757。

② 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麦克阿瑟声明是对"总统权力的挑战，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岁月》(Harry Truman, *Memoirs of Harry S. Truman: Years of Trial and Hope*)，纽约1956年版，第442页。

③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51年4月15日。

④ 《约翰逊致马修斯》，1951年11月21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154–1156页。

⑤ 《巴恩斯备忘录》，1951年11月28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1189–1193页。

会者指出，中国和北朝鲜可能会遵守停战协议；如果需要发出一个警告声明的话，这个声明应是泛泛而指，而不应该包括具体的制裁措施。英国军方认为，除非同时封锁苏联在远东的港口，否则，对中国海岸的封锁很难奏效；而同时封锁苏联港口的话，又会有触发世界大战的危险。相比之下，轰炸中国东北的危险性要小些。[①]

12 月 3 日，艾登将英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艾奇逊。艾登说，英国赞同发一个“制裁”声明，但这一声明不应该提任何具体制裁措施；同时，声明应获得尽可能多的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的支持。[②] 很明显，尽管英国政府出于维护英美关系的考虑，支持“制裁”声明的作法，但它却不愿意对任何具体的制裁措施作出承诺。英国官员担心，美国提出的制裁措施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同时，他们也知道，英国舆论不会支持美国的制裁措施。

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战俘的安排。矛盾的焦点在于：朝中方面主张双方按照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而美国却提出“自愿遣返”原则，企图扣留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③]

英国对美国的战俘政策不满。伦敦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以使英国的被俘人员早日获释。英国外交部 1952 年 1 月 29 日的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使用国民党人员对中国战俘进行“灌输”以使这些战俘加入蒋介石的军队。谈判在这个问题上拖延的时间越长，英国战俘被中国方面扣留的时间也将越长。备忘录说，英国对扩大蒋介石的军队“毫无兴趣”，英国只希望英国战俘早日获释。[④]

尽管英国官员对美国的战俘政策啧有烦言，但他们此时却不愿公开地批评华盛顿，因为英国这时正被中东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苏伊士运河区发生民族主义骚乱；伊朗的摩萨台政府驱逐英伊石油公司，将伊朗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搞得焦头烂额。英国需要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支持。

1952 年 5 月 8 日，巨济岛战俘营发生残杀中方战俘的事件，艾登对此大为震惊。他不再对美国的政策保持沉默了。他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巨济岛事件使他非

---

① 彼得·罗：《朝鲜战争的解决》(Peter Lowe, “The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War”)，载约翰·杨主编：《丘吉尔和平时期政府的外交政策，1951—1955 年》(John Young,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urchill’s Peacetime Administration, 1951-1955*)，莱斯特 1988 年版，第 210 页。

② 《英驻美大使致美国国务院》，1951 年 12 月 3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1 年第 7 卷，第 1221–1223 页。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47–48 页。

④ 《外交部备忘录》，1952 年 1 月 29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99561。

常沮丧。他以红十字会的报告为依据，指出战俘营中对中国战俘进行“甄别”程序的不合理。他说，英国公众很难相信，在短短的十天内，美国能对十七万中国战俘进行逐个的“甄别”。他要求美方对中国战俘进行第二次甄别。[①]

为了向朝中施加压力，以迫使朝中谈判代表接受美国的停战建议，美国于1952年6月23日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中朝边境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丰、赴战、虚川等发电站，导致北朝鲜地区停电十多天。[②]

美国过去曾答应英国，在采取类似大规模轰炸鸭绿江目标的行动以前，预先通知英国。但美国在6月23日的轰炸行动之前，却没有预先通知伦敦，这使英国官员很不满意。轰炸发生时，艾奇逊正好在伦敦访问，英国官员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在下院的讲话中，艾登要求美国不要再搞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动。[③]美国对鸭绿江水电站的轰炸使英国官员对美国政府的信誉发生怀疑。他们担心，美国军方在决策过程中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监视美国的行动，英国政府决定派一个副参谋长去联合国军司令部工作。[④]

五

1952年10月，英美在停战问题上的矛盾又一次尖锐起来。美国在联合国提出一个重申“自愿遣返”原则的提案，并活动二十个国家支持这一提案。[⑤]后来，印度又提出一个议案，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在一段没有确定的时间内，解决未直接遣返的战俘问题。印度的方案一露面，就获得许多国家的支持，原先一些赞同美国提案的国家也纷纷改变态度。英国和加拿大都支持印度的提案，认为这是一个打破战俘问题僵局的好办法。但美国反对印度的提案，理由是它没有明确提到“自愿遣

---

① 凯勒姆·麦克唐纳：《朝鲜：越南以前的战争》(Callum MacDonald, *Korea: The War Before Vietnam*)，纽约1986年版，第145页。

② 罗斯玛丽·富特：《错误的战争：美国政策和朝鲜冲突的范围，1950–1953年》(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伊撒卡1985年版，第178页。

③ 乔恩·哈利迪，布鲁斯·卡明斯合编：《朝鲜：鲜为人知的战争》(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eds. *Korea: The Unknown War*)，纽约1988年版，第187–188页；博顿·考夫曼：《朝鲜战争：危机、信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Burton Kaufman, *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纽约1986年版，第277–278页。

④ 罗斯玛丽·富特：《错误的战争》，第179页。

⑤ 关于这一提案的全文，见《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52年11月3日，第680页。

返”原则，而且会使不愿意被直接遣返的战俘无限制地滞留下去。[①]美国向英国和加拿大施加压力，要他们反对印度提案。艾奇逊威胁艾登说，如果英国支持印度，“北约将不复存在，英美友谊也将不复存在”。[②]在美国的压力下，加拿大让步了，但英国不愿意放弃对印度的支持。英国官员认为，印度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亚非国家中影响很大，西方对印度态度强硬只会把印度推向苏联阵营。最后，由于印度方面作出让步，在其提案中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修正意见，才使英美矛盾得以缓解。[③]

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英国官员非常担心共和党右翼以及麦卡锡主义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影响。丘吉尔认为美国新任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太僵硬和轻率，新政府“使战争变得更可能了”。[④]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作出“放蒋出笼”决定。英国对此非常不安。艾登对美国官员说，英国对美国的这一决定感到“遗憾”，因为它会“在联合国产生不幸的政治影响”；此外，它也不会给美国带来军事上的好处，无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⑤]丘吉尔也向艾森豪威尔表示了他对“放蒋出笼”决定的担忧和不满。[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新领导集体开始在外交上为缓和国际局势而作出努力。[⑦]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丘吉尔非常兴奋，他一直想在他最后的公职生涯中，再作出一些能使他青史留名的事情。缓和东西方关系变成他的一个主要外交目标。丘吉尔对自己的个人外交能力和经验非常自信，希望再搞一次类似二战

---

① 《艾奇逊—劳埃德谈话备忘录》，1952年10月29日，《艾奇逊—潘迪特谈话备忘录》，1952年10月29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5卷，第566–568，568–569页。

② 艾登的私人秘书埃夫林·舒克堡在回忆录中，记叙了艾奇逊对艾登咄咄逼人的讲话。见埃夫林·舒克堡：《从苏伊士下降：日记，1951–1956年》(Evelyn Shuckburgh, *Descent from Suez: Diaries, 1951-1956*)，纽约1986年版，第53–54页。

③ 巴顿·伯恩斯坦：《朝鲜停战的斗争：遣返问题的俘虏？》(Barton Bernstein, “The Struggle over the Korean Armistice: Prisoners of Repatriation?”)，载布鲁斯·卡明斯编：《冲突之子：朝美关系，1943–1953年》(Bruce Cumings, ed., *Child of Conflict: 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 1943-1953*)，西雅图1983年版，第304页。

④ 麦克唐纳：《朝鲜：越南以前的战争》，第178–180页；考夫曼：《朝鲜战争：危机、信誉和领导能力的挑战》，第313–314页；约翰·考威尔：《权力的边缘：唐宁街10号日记，1939–1955年》(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10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纽约1985年版，第654，661–662页。

⑤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艾利森致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2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136页。

⑥ 《总统—丘吉尔书信卷宗》，惠特曼档案，第16盒，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⑦ 约瑟夫·诺吉，罗伯特·唐纳德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苏联外交》Joseph Nogee and Robert Donaldson，*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纽约1988年版，第105–106页。

中英美苏首脑会谈的高峰会议。从 1953 年起，丘吉尔不断在国内和国际上呼吁西方和苏联领导人谈判。[①]

尽早结束朝鲜战争是丘吉尔寻求缓和东西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1953 年 4 月至 6 月，艾登因手术住院，丘吉尔直接负责外交部事务。他决定撤销英国先前作出的支持美国的"严厉制裁"声明的承诺。他认为，鉴于苏联已表现出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迹象，美国再提出这样一个声明不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5 月 4 日，英国公使弗兰克·汤姆林逊（Frank Tomlinson）向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阿列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传达了丘吉尔的这个决定。约翰逊对此很不高兴。[②]

为了促进朝鲜停战谈判的恢复并打破双方在战俘问题上所陷入的僵局，朝中方面于 1953 年 4 月 26 日提出新建议：把战俘的遣返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所有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直接遣返，其余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则送交一个中立国，以便对他们的遣返问题取得公正的解决。但美国借口将战俘送到中立国必须使用强制手段，因而反对送交第三国；同时又以将战俘送交中立国会造成"不必要的路途跋涉"为借口，提出"就地非军事化"和"就地释放"的主张。[③]

为了协商解决问题，朝中方面于 5 月 7 日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即采取美方建议的部分内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留在原地拘留，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安排。但 5 月 13 日，美方代表又节外生枝，提出联合国军控制的朝鲜战俘不应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而应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在南朝鲜"就地释放"。对于美国这一主张，朝中方面表示反对。[④]

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使丘吉尔非常恼火。他在议会的讲演中批评美国在板门店谈判中拖后腿，要求美国和苏联谈判，尽快解决朝鲜问题。[⑤] 加拿大政府也批评美国的政策。渥太华认为，中国 5 月 7 日的方案已经在战俘问题上作了重

---

① 关于丘吉尔寻求东西方缓和，推动东西方首脑会议的努力，参见亨利·佩林：《温斯顿·丘吉尔》(Henry Pelling, *Winston Churchill*)，纽约 1974 年版，第 601 页；约翰·杨：《丘吉尔，俄国人和西方联盟：百慕大三国会议，1953 年 12 月》(John Young, "Churchill, the Russians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The Three-Power Conference at Bermuda, December 1953")，载《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986 年 10 月号，第 889–912 页。

② 《约翰逊备忘录》，1953 年 5 月 4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 年第 15 卷，第 968–969 页。

③ 王福年：《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概述》，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 5 集，第 619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④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 591 页，1989 年版。

⑤ 考夫曼：《朝鲜战争》，第 315–316 页。

大让步，美国不应再拖延谈判。[1]

由于朝中方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压力，美国最后不得不改变态度。经过几次商量后，美方同意将所有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规定处理。6月8日，双方终于达成并正式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至此，阻碍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

结 论

综上所述，1950年至1953年期间，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届政府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一方面，他们认为，为了抵制苏联的扩张，西方有必要在朝鲜采取坚定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把中国卷进来。他们担心，西方在远东陷得太深太久，会使西方将有限的资源耗尽在亚洲，从而损害欧洲的防务，不利于遏制苏联。

在战争初期，麦克阿瑟一意北犯，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做法，使英国官员坐立不安。在朝鲜停战谈判阶段，华盛顿依赖武力和核威胁来迫使中朝在谈判桌上就范的行为，常引起伦敦的反感。英国对美国在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比如1952年6月轰炸鸭绿江电站）以前不和英国商量的作法，深为不满。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不时对美国的扩大战争倾向以及拖延停战谈判的行为，提出批评。英国的意见和不合作常使美国人感到恼火。总地来说，英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美国的政策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第一，1950年11月，由于英国以及其他盟国的反对，杜鲁门政府没有同意麦克阿瑟的飞机进入中国境内。第二，1950年12月初，艾德礼亲赴华盛顿，向美国领导人晓以扩大战争的利害关系。杜鲁门私下向他保证，美国不会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第三，英国的意见是促使杜鲁门作出撤销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一个原因。第四，1953年5月，当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有关战俘问题的解决上节外生枝，制造障碍时，丘吉尔要求美国不要在板门店拖后腿。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压力迫使美国改变态度。

以下几个因素影响了英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决定了英美在远东的分歧：第一，战后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相比之下，远东的意义是次要的。英国不

① 丹尼斯·斯代尔斯：《约束外交：加拿大，朝鲜战争和美国》(Denis Stairs, *The Diplomacy of Constraint: Canada, the Korean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多伦多1974年版，第276–277页。

希望朝鲜战争无限的扩大和延长，从而耗去西方阵营过多的精力和力量，使苏联在欧洲有可乘之机。

第二，英美在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分析上有区别。艾奇逊认为，中国的外交是扩张性的，中国在亚洲的“侵略”有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北京比莫斯科还危险，更有“侵略性”。但英国领导人（不管是艾德礼、贝文，还是丘吉尔、艾登）都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有限的，充其量不过是要统一台湾。美国和中国敌对，只会在亚洲引起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他们认为，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保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分裂中苏的最好办法。

第三，英国希望保持其在华经济利益，维护其在香港的地位，不希望朝鲜战争的扩大破坏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英国要求美国与中国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第四，印度等亚洲中立国家的态度影响了英国。印度是英联邦中有影响的国家，在中立国家中享有声望。印度主张承认新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尼赫鲁认为，朝鲜冲突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症结以及亚洲的其他问题都源于美国不承认中国，敌视北京。① 英国非常重视印度的意见，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英联邦团结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官员认为，西方对印度强硬，只会将印度推进苏联阵营。

第五，和美国外交相比，英国外交较少受国内政治牵制。五十年代初，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猖獗之时。反共分子、“亚洲第一论者”、院外援华集团纷纷向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在远东采取强硬的反共措施。麦克阿瑟的扩大朝鲜战争的主张得到国会不少保守议员的支持与喝彩。

必须看到的是，尽管英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时常批评美国政策，约束华盛顿的扩大战争举动，但英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伦敦并不能改变美国在东亚的基本政策。战争期间，美国更加敌视中国，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破坏中国统一台湾的努力。

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国内经济问题的成灾，使英国对美国的经济、军事依赖增加。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使得英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要约束华盛顿时不得不注意分寸。五十年代初，中东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英国更需要美国的支持，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英国在远东批评美国政策的能力。对英国决策人来说，毕竟英美同

---

① 关于尼赫鲁对于中国的态度，可参见萨瓦波利·戈波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传记，1947–1956 年》(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1947-1956*)，剑桥 1979 年版。

盟的重要性要大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要超过英国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价值。

（本文最初发表于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年，收入本书时做了加工和修改。）

英国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1954—1955）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虽然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但东南亚地区的冷战对抗却有增无减。为了遏制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和威胁，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加紧在该地区组织集体安全体系，并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商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所作所为高度关注。为了表示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解放浙东沿海大陈岛的军事行动，人民解放军从 1954 年 9 月 3 日起，开始猛烈炮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台湾海峡的炮声不仅震动了美国官员，也使英国领导人惶惶不安。伦敦担心，随着台湾海峡危机的升级，华盛顿为了保卫台湾的利益，很可能直接介入国共纠纷，从而与北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并在这场冲突中使用核武器。从英国自身利益考虑，伦敦不希望东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因此，在整个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官员和美国决策人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以图影响美国政策，缓和东亚紧张局势。本文依据英美外交文件，论述英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反应，分析英美领导人在是否应该保卫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的分歧，并评估英国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英国是西方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为了维护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和经济利益，伦敦希望保持东亚的稳定，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大棒”政策。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危机期间，英国试图约束美国要扩大战争规模的行动。英国官员认为，西方对中国采取敌对和强硬的政策，只会将北京进一步推向苏联一边；而西方国家同中国保持“正常关系”，却是逐步影响中共

政策，维护西方在东亚利益的最佳途径。[①]

尽管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较为实际的做法，但是它在台湾问题上，却和美国的看法相近。和美国一样，英国认为台湾对西方有战略价值，台湾的易手会在东南亚造成对西方利益不利的影响。因此，伦敦一直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1950年8月4日，英国外交部官员梅布利·丹宁（Maberly Dening）说，在对日和约签订以前，台湾“从法律上说既不属于蒋介石，又不属于北京政府”。[②] 1951年9月，对日和约在旧金山签订，但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被排斥在旧金山会议之外，和约并没有明确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③]

在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看法上，英美分歧很大。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国务卿以及美国军方多数领导人都认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具有重要“心理和政治意义”；失去这些岛屿会对台湾、朝鲜、日本和菲律宾产生“灾难性后果”。[④] 而英国官员却不同意这一分析。他们认为，金门和马祖从未被日本人占领过，一直是中国大陆一部分，它们紧靠大陆，对西方来说，是“不可能防卫的”，而且对保卫台湾也“无关紧要”。“台湾的真正屏障是美国第七舰队”。蒋介石应把军队撤出这些沿海岛屿。[⑤] 英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在协防金门和马祖的问题上冒的风险太大，得不偿失。他们害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莽撞行为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从英国利益的角度考量，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美国要协防金门和马祖的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因为，美国这样做，只会使西方在亚洲浪费原

---

① 关于五十年代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详细论述，参见翟强：《新中国成立初期英国对华政策（1949–1954）》，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第129–140页

② 《英美法外交官会谈记录》，1950年8月4日，《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6卷，第421页。

③ 王缉思：《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载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④ 《第21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54年9月12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619–620页。

⑤ 《外交部备忘录》，1954年9月16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31，FC1024/8G，藏伦敦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麦克尔·多克瑞尔：《英国和第一次中国沿海岛屿危机，1954–1955》，（Michael Dockrill，“Britain and the First Chines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1954–1955”），载麦克尔·多克瑞尔、约翰·杨格编《英国外交政策，1945–1956》（Michael Dockrill and John Young，eds.，*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1956*），纽约1989年版，第175页。

本应该用在欧洲的有限资源。[1]

1954年9月，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英国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先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然后迫使国民党撤出金门、马祖等岛屿；同时中共应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台湾在国际协议的安排下，实现非军事化和中立化。[2]

美国赞成英国的停火建议，但反对迫使蒋介石撤出金门和马祖的主张。美国官员感到台湾危机非常棘手：一方面他们认为金门和马祖对台湾具有重要的“心理和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如果美国为了保卫这些沿海岛屿而同中国发生战争的话，他们不仅不会得到盟友的支持，而且还不会得到国内选民的赞同。[3]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杜勒斯建议将台海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由联合国通过决议来停止台湾海峡的战斗，维持现状。[4] 艾森豪威尔支持杜勒斯的建议。[5] 杜勒斯的建议被称为“奥雷克”（Oracle）计划。杜勒斯知道，要实现他的设想，美国需要得到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支持。为此，1954年9月17日，杜勒斯访问伦敦，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举行会谈。杜勒斯建议英国出面在联合国提出“奥雷克”议案。[6]

英国外交部内有一些官员对“奥雷克”计划持保留态度。英国驻联合国代表皮尔逊·狄克松（Pierson Dixon）认为，金门和马祖是中国“无可置疑”的领土，任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都很难有理由说北京没有权利控制这些岛屿。[7] 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Humphrey Trevelyan）说，如果英国参与“奥雷克”计划，中国对英国的态度会“变得更强硬”。[8] 但是，艾登认为“奥雷克”计划有可取之处，

---

① 罗斯玛丽·富特：《在不一致中寻求统一：艾森豪威尔年代的英美关系和中国政策》(Rosemary Foot, “The Search for a Modus Vivendi: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hina Policy in the Eisenhower Era”)，载孔华润和入江昭编：《东亚的大国，1953–1960》(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纽约1989年版，第150页；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75页。

② 《外交部远东司备忘录》，1954年9月17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31。

③ 《第21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54年9月12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619–620页。

④ 《杜勒斯备忘录》，1954年9月12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612页。

⑤ 《第21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54年9月12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619–620页。

⑥ 多克瑞尔：《英国和第一次中国沿海岛屿危机，1954–1955》，第177–178页。

⑦ 《皮尔逊致外交部》，1954年9月23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31，FC1042/12A。

⑧ 《杜威廉致外交部》，1954年9月12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41，FC1042/249G。

因为他希望以该计划为契机，促使美国重新检讨自己的对华政策，改变对北京的僵硬态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他认为，东亚问题的症结就是美国敌视北京；而一旦美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亚的紧张局势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是，艾登不愿意由英国出面在联合国提出“奥雷克”计划。最后，经过反复磋商，英美决定让作为安理会成员国的新西兰出面提出“奥雷克”议案。①

英美在“奥雷克”问题上很快出现分歧。艾登对美国准备的“奥雷克”草案不满，认为该草案只是提出讨论金门和马祖冲突，而没有表示要讨论涉及中国的更广泛的问题。他要求美国修改“奥雷克”草案。②但是，杜勒斯不愿让步。10月9日，他对英国和新西兰驻美大使说，他从未打算在解决了金门冲突以后，进一步讨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③

与此同时，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有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也紧锣密鼓地进入最后阶段。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特逊（Walter Robertson）和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沃尔特·麦康瑙吉（Walter McConaughy）联袂飞往台湾，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坚决反对“奥雷克”计划，认为它“只有害而无利”。他要求美国阻止新西兰在联合国提出“奥雷克”议案，希望“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也将金门和马祖包括进去。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蒋介石要求美国在新西兰提出“奥雷克”议案之前，公开宣布将和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④

英国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非常不安。英国官员担心，该条约将破坏“奥雷克”计划获得成功的机会。10月15日，英国外交部在给英驻美使馆的电报中说，内阁认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会改变“奥雷克”计划的性质，英国在没有搞清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内容和目的以前，不能在安理会采取支持“奥雷克”议案的行动。⑤很明显，英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包括金门和马祖的话，“奥雷克”议案的提出只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西方要帮助台湾继续控制金门和马祖。

10月18日，英国驻美大使罗杰·梅金斯（Roger Makins）在一份给外交部的

---

① 《艾登致皮尔逊》，1954年9月28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31，FC1042/12A。

② 《邦德备忘录》，1952–1954年，第14卷，第710–713页。

③ 《邦德备忘录》，1954年10月9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716–720页；又见《杜勒斯和叶公超会谈记录》，1954年11月2日，顾维钧文件（Wellington Koo Papers）第191盒，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

④ 《麦康瑙吉备忘录》，1954年10月13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2–1954年，第14卷，第728–753页。

⑤ 《外交部致梅金斯》，1954年10月15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34，FC1042/68G。

电报中分析了杜勒斯对付台湾海峡危机的策略：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来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奥雷克”议案使联合国作出停火决议，从而保护金门和马祖。[①] 在杜勒斯眼中，“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奥雷克”计划是互相联系的，两者是他用以维持台湾海峡现状、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双刃剑。

12 月 2 日，美国和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维持并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缔约国的领土”遭到“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条约将所谓“领土”规定为台湾和澎湖以及经美台双方“共同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条约没有明确提到金门和马祖。

英国充当美国的说客，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辩护。1955 年 1 月 5 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向周恩来陈述英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他说，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变，目的仍旧是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是要起制约作用，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对蒋介石的保护；劝中国从实际出发，和平解决问题。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指出：英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不对的，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美国侵占台湾，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帮助蒋介石占据沿海岛屿并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又劫夺来中国通商的船只，包括英国的商船在内。但是英国却说这一切是对的。中国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英国却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收复自己的领土，这行不行呢？[②]

为了反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1955 年 1 月 18 日解放了一江山岛。1 月 19 日，杜勒斯对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说，台湾应将军队撤出大陈岛，同时美国保证“在目前形式下”协助台湾保卫金门。杜勒斯认为，如果美国公开宣布保卫金门的话。那将会抵销国民党因撤出大陈岛而受到的士气上的损失。[③]

同一天，杜勒斯告诉英国大使梅金斯，美国打算协助台湾守卫金门，并要英国

---

① 《梅金斯致外交部》，1954 年 10 月 18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0235，FC1042/84G。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97 页。

③ 《杜勒斯—叶公超谈话备忘录》，1955 年 1 月 19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6–50 页；又见《杜勒斯和叶公超会谈记录》，1955 年 1 月 19 日，顾维钧文件，第 195 盒。

配合准备在联合国提出“奥雷克”议案。[①] 华盛顿要协助台湾保卫金门的决定使伦敦甚为不安。艾登指示梅金斯转告杜勒斯：除非美国放弃支持台湾守卫金门的决定，否则英国不会在联合国采取支持“奥雷克”议案的行动。[②] 英国方面还认为，美国想要有效地保卫金门和马祖，可能不得不动用核武器。如果美国公开声明要协助国民党保卫金门，那么“这一决定将会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在联合国采取的稳定局势的行动都将是徒劳无益的”。[③]

其实，在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应该保卫金门和马祖的问题，意见有分歧。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主张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和马祖，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和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反对这一做法。卡特勒认为，美国协助保卫金门将冒和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汉弗莱说，金门就在中共的鼻子下面，美国“很难”找到理由来名正言顺地保卫金门。威尔逊认为，为了守住那些小岛屿而和中共开战是“愚蠢的”，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和澎湖，放弃沿海的小岛屿。[④]

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反对，另一方面由于自己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得不在保卫金门的问题上作些让步。1 月 21 日，杜勒斯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国将不公开声明保卫金门，而是在私下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协助他守卫金门。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保卫台湾和澎湖，而其他的沿海岛屿对于这一目标来说是“次要的”。他建议美国只是暂时将金门和马祖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内。[⑤] 随后，杜勒斯告诉英国大使梅金斯，美国决定不公开声明保卫金门和马祖。同时，杜勒斯又强调美国不接受英国关于让沿海岛屿“最终回到大陆政府手中”的立场。[⑥]

---

① 《杜勒斯—梅金斯谈话备忘录》，1955 年 1 月 19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4–46 页。

② 《艾登致梅金斯》，1955 年 1 月 20 日，英国外交部文件，FO371/115023。

③ 《第 233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55 年 1 月 21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90–91 页。

④ 《第 232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55 年 1 月 20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69–82 页 ;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189.

⑤ 《第 233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55 年 1 月 21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89–96 页。

⑥ 《杜勒斯—梅金斯谈话备忘录》，1955 年 1 月 21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96–99 页。

1月31日，华盛顿让美国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卡尔·兰金（Karl Rankin）转告蒋介石："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总统打算协助防卫金门和马祖，以对抗武装进攻，如果总统认为这一进攻是攻打台湾的前奏的话。"[①] 蒋介石表示，他理解美国不愿意公开声明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原因，但他要求准许在台湾发出的声明中提到美国要保卫金门和马祖。但兰金没有同意他这么做。蒋介石还反对英国要台湾放弃金门和马祖的政策，他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对英国做做工作。[②]

美国在私下向蒋介石保证要协助防卫金门和马祖的同时，又于1月28日指示新西兰在联合国提出"奥雷克"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中国大陆和台湾在沿海岛屿发生冲突的问题。[③] 同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通知周恩来：新西兰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有关中国大陆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英国支持这一提案。周恩来回答说，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就是干涉中国内政。[④]2月3日，周恩来电告安理会："新西兰的建议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不能派遣代表参加对新西兰建议的讨论。"[⑤] 随后，周恩来借接见瑞典驻华大使和印度驻华大使的机会，反复强调新西兰提案的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2月5日，他对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说："国际上一切为和缓并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内的真正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是给予支持的。现在的问题是，新西兰的提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要达到一个相反的目的，那就是把中国和被中国人民唾弃和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放在对等的地位来谈判停火。这就是要联合国来干涉中国的内政。"[⑥]2月6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大使赖嘉文（Nedyam Raghavan）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新西兰的提议是不能同意的，它要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同蒋介石之间的内战，它要中国和蒋介石集团到安理会去谈判停火，而在安理会里蒋介石的代表是正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

① 《胡佛致兰金》，1955年1月31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年，第2卷，第182–184页。

② 《兰金致国务院》，1955年2月1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年，第2卷，第193–195页。

③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99页；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第182页。

⑤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6–108页。

的代表却是被邀请的。这种形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①]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新西兰的提案，而台湾海峡的紧张对峙又持续不退，这使英国官员忧心忡忡。2 月 9 日，梅金斯大使向杜勒斯国务卿转告英国政府的一个口信：尽管美国协助国民党撤出大陈岛的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台湾海峡的形势“仍然令人担忧”。如果在金门和马祖发生冲突，英国的多数舆论不会支持美国干涉这些沿海岛屿，因为英国视这些岛屿为中国的一部分。[②]

2 月 10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致信丘吉尔首相，表明“在目前形势下”，他已经就沿海岛屿问题给了台湾“一些保证”。[③] 丘吉尔在回信中先要求艾森豪威尔说明给了台湾什么“保证 ”，然后指出，尽管西方不应让中共“消灭”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但沿海岛屿却不是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一场帮助蒋介石保卫沿海岛屿的战争在英国是得不到支持的。[④] 艾森豪威尔搬出所谓“慕尼黑教训”来反驳丘吉尔的观点。他说，西方不断让步只会助长中共的“好战精神”，西方在和中共打交道时，应记住 30 年代的“慕尼黑教训”。[⑤]

2 月底，杜勒斯突访东亚。回到华盛顿后，他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中共消灭驻守在金门和马祖的国民党军队，那么，不光是对台湾，而且对亚洲的其它地区，后果都将是“危险和糟糕的”。俩人一致认为，美国应该协助防卫金门和马祖，必要时使用战术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建议杜勒斯在 3 月 8 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美国准备像使用常规武器一样使用核武器。[⑥] 3 月 6 日，艾森豪威尔本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要像使用一颗普通子弹一样使用核武器。[⑦]

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强硬态度使英美关系很紧张。3 月 25 日，艾登告诉杜勒斯，英国不愿意继续在联合国支持“奥雷克”议案，因为，在目前的形式下再提出此议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100 页。

② 《杜勒斯—梅金斯谈话备忘录》，1955 年 2 月 9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243–247 页。

③ 《艾森豪威尔致丘吉尔》，1955 年 2 月 10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259–261 页。

④ 《丘吉尔致艾森豪威尔》，（时间未注明），《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270–273 页。

⑤ 艾森豪威尔致丘吉尔的信被附在 1955 年 2 月 18 日杜勒斯给美国驻英使馆的信中，《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292–295 页。

⑥ 《杜勒斯备忘录》，1955 年 3 月 6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336–337 页。

⑦ 理查德·贝茨：《核讹诈和核平衡》（Richard Betts, *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华盛顿 1987 年版，第 59 页。

案的话，其作用只能是暴露西方国家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分歧。[①] 杜勒斯对艾登的态度很恼火。他在给艾登的回信中说，“我只是预料苏联会否决（新西兰的）提案，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料到你会这样做”。他说，“奥雷克”计划的目的是要利用安理会这一“庄严场合”来“聚集世界的力量”，从而在“道义上”对中共发挥“遏制作用”。杜勒斯还提到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他说，中共将会从这个会议上“获得使用武力的绿灯”。[②] 3 月 28 日，艾登再次致信杜勒斯，进一步解释他反对“奥雷克”计划的理由。他说，现在在安理会挑起一场关于台湾海峡形势的辩论，只会被亚洲人看作是一次西方对付万隆会议的行动，这会给尼赫鲁和吴努以“很坏的印象”。[③]

3 月 29 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丘吉尔，对英美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表示遗憾。他说，尽管英美在欧洲问题上总是看法一致；但在远东问题上，“我们各自的态度却总是经常不一致，以致于几乎是相互敌对”。他呼吁英美加强团结，保持行动一致。[④]

英国在“奥雷克”计划上的不合作态度使杜勒斯很难实现他用联合国“停火”决议来维持台湾海峡现状的打算。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继续有人反对保卫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4 月 4 日，俩人作了一次长谈，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蒋介石对金门和马祖重要性的看法，蒋介石应视这些岛屿为“前哨”，而不是“堡垒”。[⑤]

4 月 17 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一个新建议：美国说服蒋介石撤出金门和马祖；作为补偿，美国在台湾搞一个“海上拦截”计划，以阻止中共进攻台湾。他还建议美国在台湾部署核武器。艾森豪威尔赞成这个建议，但强调美国不应该强迫蒋介石撤出金门和马祖。他说，美国应让国民党自己决定是坚守这些岛屿还是放弃它们。他还问杜勒斯是否打算将此设想通知英国人。杜勒斯回答说，他可能向英

---

① 《艾登致杜勒斯》，1955 年 3 月 25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397–398 页。

② 《杜勒斯致艾登》，1955 年 3 月 26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04–405 页。

③ 《艾登致杜勒斯》，1957 年 3 月 28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16–417 页。

④ 《艾森豪威尔致丘吉尔》，1955 年 3 月 29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18–422 页。

⑤ 《杜勒斯备忘录》，1955 年 4 月 4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44–445 页。

国官员“暗示”一下，但他怀疑英国政府会积极支持他的建议，因为英国国内舆论会反对。[①]4 月 20 日，雷德福和罗伯特逊到台湾和蒋介石会谈，转告杜勒斯的新建议。但是，蒋介石拒绝接受放弃金门和马祖的要求。[②] 杜勒斯的计划未能成功。

针对一些亚非国家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担忧，周恩来于 4 月 23 日在万隆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③]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结束。

结　论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英国非常担心美国为了保卫金门、马祖等岛屿而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英国官员认为，在一场中美战争中，作为美国盟国的英国将陷于很困难的处境：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英美同盟有破裂的危险；如果英国支持美国，英国又将得罪亚洲的中立国家，比如印度，同时将破坏英国要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再者，英国国内舆论会激烈反对政府支持美国的政策。保守党政府希望尽快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避免英国不得不作出困难的选择。为此，伦敦不断呼吁华盛顿冷静行事，要求美国政府迫使蒋介石撤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在危机初期，艾登同意杜勒斯提出的“奥雷克”计划。艾登希望通过该计划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坐下来和中国讨论整个远东的局势，包括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但是，杜勒斯对“奥雷克”计划有他自己的打算。“奥雷克”计划是他对付台湾海峡危机策略的一部分。他希望通过“奥雷克”议案使联合国通过“停火”决议，以维持台湾海峡现状；同时通过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来阻止中国统一台湾。杜勒斯并不打算和北京谈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以后，美国准备公开声明保卫金门和马祖，但

①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谈话备忘录》，1955 年 4 月 17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491–493 页。

② 《罗伯特逊致杜勒斯》，1955 年 4 月 25 日，《美国外交文件集》，1955–1957 年，第 2 卷，第 510–517 页；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p. 223。关于蒋介石对沿海岛屿的态度，可参阅郑永平，吴丹红：《试析美国处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载《世界历史》，1990 年第 1 期，第 58 页；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第 185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105–106 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44–45 页。

是，英国坚决反对美国这样做。由于英国的异议，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本身的意见不统一，杜勒斯不得不放弃公开宣布保卫金门和马祖的做法，转而私下向蒋介石交底。这说明英国的态度对美国的政策起了一些掣肘作用，但这一作用很有限。毕竟，英国只是迫使美国不公开声明保卫金门和马祖，而没能使美国完全放弃帮助台湾保卫金门和马祖的立场。危机后期，杜勒斯希望在联合国再次提出“奥雷克”议案，来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对抗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但是，鉴于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继续持强硬立场，英国已不愿再支持“奥雷克”计划了。杜勒斯的设想未能实现。

在危机期间，英国一直压美国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为美国可以对蒋介石耳提面命，发号施令。实际上，英国低估了蒋介石本人不愿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决心。英国以为，只要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意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就可以消除，台湾海峡的局势就可以和缓。这表明英国错误地理解了造成台湾海峡危机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美国搞“两个中国”，阻止台湾和大陆的统一。

英国政府自己就一直在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甚至就在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外交副大臣里丁（Lord Reading）还称“并不存在”规定台湾地位的国际文件，并说英国“并不认为它（台湾）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①]“美台共同安全条约”缔结后，英国官员还表示欢迎，赞扬条约的“防御性”。[②]这说明英国是不希望看到大陆统一台湾的。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又和美国站在一起，搞“两个中国”。英国的这种两面政策是阻碍五十年代中英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主要原因。

（本文事先没有发表过。）

① 《世界知识》，1955 年，第 1 期，第 4 页。
② 同上，第 7 页。

从隔阂到建交：1949—1964 年的中法关系

196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中法建交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外交都有重要意义。就国际局势而言，它代表了中法两国联手挑战美苏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是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中国外交史角度看，它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在处理同法国建交的问题时，中国领导人破了一个例：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意在一个国家没有事先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那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什么法国在 1949 年就表示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法建交拖到 1964 年才实现？导致 1964 年中法建交的因素是什么？中苏关系破裂对中法关系改善产生什么影响？越南危机和中法建交谈判的时机之间有什么关联？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近解密的文件，梳理 1949—1964 年间中法关系演变的脉络，考察中国领导人对法国态度的变化，分析他们最终决定与法国建交的战略动机和考虑。

1949—1958 年的中法关系

早在 1949 年初，法国政府就在考虑：一旦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法国准备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就像英国承认新中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殖民地位一样，法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盘算也是为了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法国官员希望通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来阻止北京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斗争。为了抵消胡志明的政治影响和赢得更多的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法国于 1949 年 3 月在法属印度支那实行改革，在越南、老挝和柬埔

寨成立所谓“独立国家”，向他们移交大部分内政主权和部分外交权，允许他们在法兰西联邦内自主独立。在越南，法国挑选前安南皇帝保大为新政权的领导人。[①]

法国在越南推出保大作为新领导人后，立即向很多国家发函，要求他们承认保大政府。法国外交部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出要求承认保大政权的函电，因为法国官员已经对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不抱希望，准备面对现实，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国政府开始酝酿是否承认新中国。12 月 21 日，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讨论由法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委员会最后以 22 票对 14 票否决了法共的提案，而通过了一个“适时采取步骤，准备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②] 法国政府采取等着看的态度，看新中国是否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1950 年 2 月 7 日，法国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国民党政府代表地位问题投弃权票。法国对国民党政府冷淡和疏远的做法引起撤离到台湾的蒋介石的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在 1950 年 2 月 25 日致“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的电文中指出：“据各方可靠报导，法政府本拟于保大政府获得英美等重要国家承认后，即承认中共政权，嗣以中共与苏联相继承认胡志明政权，故不得不暂于搁置，而对我政府方面若干重要交涉，则多方予以拖延，种种迹象皆证明法政府尚未放弃与中共妥协之企图。……本部认为：法政府既不放弃与中共妥协企图，而对承认保大事，亦迄未正式通知我方，其对我政府之地位如此忽视，对于反共立场亦无明确表示，目前我方自应暂时持观望态度。”[③]

台湾对法国政府“不放弃与中共妥协企图”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大西南地区的占领，法国官员密切关注中共会不会派兵越过中越边界去支持越南共产党武装。1950 年 3 月 13 日，法国驻美大使亨利·波奈（Henri Bonnet）奉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之命向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转告法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立场。波奈说，舒曼正在考虑和中共政权谈判建交的可能，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因为一旦中共决定派兵进入越南，法国如果和北京有外交关系的话，就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和中共谈判。艾奇逊问波奈，中法建交是否意味着中共将

---

① William J. Duiker, *Sacred War: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p. 67-68.

② 《中法关系简况》，1955 年 10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148-35。

③ 叶公超致黄少谷，1950 年 2 月 7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典藏号：002-080106-076-009，台北国史馆。

承认保大政权，如果是那样的话，法国是不是将面对中共既承认保大政权又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波奈回答说，他认为中共如果承认保大政府，就意味着中共将断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①]

法国希望以“承认”为筹码，在越南问题上和中共讨价还价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中共在援助越南革命的问题上，态度坚定，毫不犹豫。中共领导人在建立全国政权前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亚洲，中共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周恩来在 1950 年 4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今天胜利了，要有不怕担当大任的精神，要担当起帮助解放全世界的重任，而且要有此气魄。今后我们要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兄弟的解放，如朝鲜、印尼、越南等国家，如果这些民族都起来了，得到了解放，那不是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就更大，帝国主义更加容易崩溃么？”[②] 对于东南亚，中国不但迅速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派出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协助胡志明的抗法斗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与越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友谊要比与资本主义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更重要。[③]

对于法国而言，由于北京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毫不犹豫地站在胡志明一边，中法建交的构想也就无疾而终，法国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法国追随美国谴责中国“侵略”朝鲜。[④]

1954 年 5 月，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国际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在会议上，中法代表团就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和发展中法关系问题做过接触。5 月 18 日，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纪业马上校（Colonel Jacques Guillermaz）宴请中国代表团的王炳南，表示法国希望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起大国的调停作用。在谈及中法建交问题时，纪业马指出，当中国新政府成立后，法国原计划承认中国，后因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未能实现。这次在日内瓦会议上，如果印度支那和平得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Bonnet, March 13, 1950, Acheson Papers, Box 65, Truman Library.

② 周恩来：《在全国二、五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0 年 4 月 1 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49 页。

③ 关于 1950 年代初中国援越抗法的详细论述，见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apter 1；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辑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

④ 《中法关系简况》，1955 年 10 月 21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148-35；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载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46 页。

以恢复，即证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法国将再无理由不考虑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及贸易关系。[①]

1954 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日内瓦会议之后，法国国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又起，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和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两届内阁都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声称“希望两国关系在将来能有所增进”，“不承认中国及把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不现实的”。法国驻瑞士、英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先后主动同中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人员接触，表示愿意改进两国关系和保持个人联系。在对中国的事务性的联系方面，上述两届内阁也较前稍有改进，比如先后批准中国技术参观团、里昂展览团以及艺术团访问法国，但是这两届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富尔内阁的外交部长安东·比内（Antoine Pinay）公开表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和“将考虑美国的态度”。[②]

中国政府注意到孟戴斯–弗朗斯和富尔两届内阁在改善中法关系方面的举动，但也同时看到法国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的分析家指出：“法国统治集团，在法国人民广泛要求与我建立正常关系和发展贸易的压力下，不得不和我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一些联系；但由于美国的压力，仍不敢同我正式建交，而是企图追随英国，逐步推行‘两个中国’的计谋。”[③]

1956 年 2 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居尔·摩勒（Guy Mollet）担任总理。摩勒内阁在促进中法关系方面比前几届内阁更积极。1956 年 3 月，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比诺（Christian Pineau）在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时对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说：法国社会党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法国现政府在目前情况下还不打算这么做。尽管如此，法国准备同中国互换贸易代表团，因为贸易和外交承认是两个范畴内的事。[④] 4 月 12 日，比诺又强调指出：法国渴望发展同中国的贸易。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法国政府正在研究改变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259–260 页。（纪业马是个中国通，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多年。外交部文件称他为吉勒马兹）。

② 《中法关系简况》，1955 年 10 月 21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148-35。

③ 《中法关系简况》，1955 年 10 月 21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148-35。

④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March 7,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27, Western Europe and Canad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39.

对中国禁运的可能性。比诺访问美国时，曾提出将对中国的禁运放宽到对苏联禁运的水平。[①] 此外，法方就两国互派非正式代表和建交问题，分别向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士使馆进行探询。1957 年 2 月，摩勒表示他赞成承认中国和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两个月以后，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首次访华，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明确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做法。他在回到法国后著书，主张法国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并与中国建交。[②]

尽管在 1950 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路障：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抵制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做法。

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

1958 年 5 月，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重新执政。他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主张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愿在外交政策方面对美国言听计从，亦步亦趋。他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法国官员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③]

毛泽东十分关注戴高乐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动向。1956 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耿飚、黄镇、王幼平等驻外大使谈话。在谈话中，他问几位大使有没有读过戴高乐的回忆录，大家摇摇头。毛泽东接着说，“这也难怪，你们都很忙，但我还是要劝你们抽空看看这本书。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这个话很有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我们看看当前的国际现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所以，美国可以

① 《1956 年以来的中法关系情况》，1957 年 5 月 15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406-04。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362 页；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202–203 页。

③ 柴成文、黄政基、张常仅：《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207 页。

指挥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指挥不动法国。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正确地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①]

在戴高乐上台之初，中国政府内部的分析和官方媒体的反应都比较消极。《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批评戴高乐执政使法国的“议会政治从此让位于军事独裁”，认为戴高乐将把法国“引向法西斯化”，戴高乐政权绝不可能解决法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危机，它的寿命不会太长久。[②]

中国领导人认为，戴高乐领导法国有弊有利。从消极的方面说，戴高乐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将更多地限制法国共产党；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会和美国顶着干。1958 年 7 月，外交部长陈毅对访华的法国记者代表团说：“我们没有与戴高乐将军直接接触过，因此，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特别的恶感，对法国政府也是这样。”“戴高乐将军有闹独立性的一面，他并不是那样甘心情愿屈从于英美。”对于戴高乐有意承认中国的说法，陈毅重申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戴高乐上台后，非正式地放出空气，要承认中国，但还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也不准备对此发表意见，但我要说一句：如果要承认中国，就要赶走蒋介石的大使馆，否则，即使他承认中国，我们也不干。”[③]

9 月 5 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纵论国际形势时，专门提及戴高乐执政的好处和坏处，强调戴高乐的反面教育作用。毛泽东说：“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样。”[④]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对戴高乐上台喜忧参半。从积极的方面看，戴高乐和英美的矛盾标志着西方阵营的四分五裂，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证明国际形势正处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局

---

① 孔祥琇：《耿飚传》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0 年，第 47 页。

② 《人民日报》，1958 年 12 月 3 日，第 1 版；又见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法国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87 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2–363 页；张锡昌、王义浩、王泰平、黄志良：《峰峦迭起：共和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21–22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45 页。

面。从消极的方面看，戴高乐掌权对法共和法国人民不利。

1950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考虑和什么样的法国政治团体与个人发展关系时，往往先征询法共的意见，以免中国的举动会损害法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在 1958 年的选举中，戴高乐处心积虑地打击法共，收效显著，法共获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只有 10 名法共成员被选进法国国民议会。这是法共在历次选举中表现最差的一次，而在 1956 年的选举中，有 150 名法共成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鉴于法共在国民议会中影响力的下降，法共领导人不得不调整议会斗争策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组织街头行动和工厂罢工上。[①]

1958 年中国外交部对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贡特（A. Conte）要求访华一事所做的反应充分地说明了中方要保护法共的意愿。贡特是法国国民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1958 年，在他的倡议下，国民议会重新成立“扩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关系研究组”，由他任主席。同年 6 月 16 日，贡特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会见冯铉大使，要求 8 月访华，称他希望同中国政府讨论中法关系问题，返法后将向戴高乐汇报讨论情况，以便戴高乐“作出重大政治决定”。他告诉冯铉，他在来瑞士之前曾见到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和总理办公厅主任，并且他将在下个月参加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上提出动议，建议所有欧洲国家承认中国。贡特还表示，他将在报纸上发表呼吁承认中国的文章。至于他为什么急于要在 8 月访华，贡特解释说，9 月法国要举行修改宪法公民投票，所有政治人物都将为此活动和奔忙，所以 8 月以后他就没有时间去中国了。[②]

冯铉向贡特阐明中国政府对承认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并问法国将如何承认中国。贡特答称，一切问题由戴高乐本人决定。贡特虽然表示“不能承认‘两个中国’”，但又说：法国没有正式理由同台湾断交，而希望在法国承认中国后，台湾能主动同法国断交。冯铉在给外交部的汇报中谈了他对贡特的印象：此人“极端反动，坚决反共，支持戴高乐”。估计他要求访华的目的是“在中国问题上取得政治资本和以此问题作为社会党和戴高乐关系中的桥梁，同时通过此次访问，了解我国态度，为戴准备在 9 月底法公民表决前打出一张外交政策的牌位”。冯铉建议：为了不让贡特获得政治资本，“可暂拖延一时，推迟其行期，待确知戴本人意见后再

① Alessandro Brogi, *Confronting America: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s in France and Ital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p. 232.

② 冯铉致外交部，1958 年 6 月 19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436-07。

考虑具体答复。妥否，请速示”。[①]

外交部在给驻瑞士大使馆的回电中，同意冯铉对贡特要求访华动机的分析，并就如何答复贡特作了指示。外交部的电文指出：“修改宪法公民表决是目前法政治中心，戴高乐派为了击败法共，争取表决胜利，正试图利用中法关系作为骗取选票的手段之一。估计戴目前不可能满足我方条件，而且为了免于被动，可能在公民表决前不作明确表示，但将要求和我国进行某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接触，进行承认中国的笼统宣传。”外交部指示驻瑞士大使馆：“我们对戴高乐政府以及法资产阶级人士此类试探的处理，必须遵循下列原则：（1）我反对美英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必须明确，不容模糊；（2）不能让戴高乐政府利用中国问题欺骗人民，打击法共；（3）在有利条件下利用法美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打击美国。”[②]

中国领导人明白，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独立问题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道义上说，法共应遵循反对殖民主义的原则；但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如果法共大张旗鼓地公开赞同法属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它在国内选举中就可能失去很多选票。阿尔及利亚问题就是一个例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在 1950 年代后期迅速发展。1958 年，阿尔及利亚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国土的三分之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掌握了十几万军队。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于同年 9 月 19 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法国外交部宣称任何国家承认该临时政府都将被法国政府视为“不友好的举动”，继一些阿拉伯国家之后，于 9 月 22 日成为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③] 在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建议他们谅解法国共产党不愿立即和直接表示支持他们的苦衷。1959 年 5 月 2 日，陈毅在接见由奥马尔·乌西迪克率领的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法国共产党“是支持亚非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支持你们摆脱从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从原则上看这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为了争取选票”，法共不便“立即和明确地支持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斗争，他们往往采取另一种态度”。[④]

实际上，在 1950 年代后期，对于戴高乐政府而言，打承认中国的牌，不仅是为了在国内政治中削弱法共的影响力，还是为了减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受到的压力。1959 年 7 月，法国政府向中国试探：如果法国放弃台湾，中国是否可

① 冯铉致外交部，1958 年 6 月 19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436-07。

② 外交部致驻瑞士大使馆，1958 年 7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436-07。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113 页。

④ 《陈毅副总理接见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 年 5 月 2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7-00191-05。

以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些让步，以打开中法关系。7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内属于戴高乐派的新共和联盟议员德洛纳（Dronne）找新华社驻巴黎记者陈定民谈话，强调戴高乐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倚赖和追随美国，因此承认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但把承认中国没有进展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和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援助。在涉及台湾问题时，德洛纳用东西德国和南北朝鲜相类比。中国外交部在获悉德洛纳的谈话后，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写了一个报告，分析了德洛纳谈话的背景。外交部的报告指出："德洛纳此次约我记者谈话一定程度上是法政府的授意。我们估计其主要目的有二：（1）企图在联合国大会前夕，利用'承认中国'的姿态来要挟美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2）妄图以'承认'我国诱使我放缓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离间我和阿人民的关系。"对于如何回应德洛纳，外交部提出四点建议："（1）德洛纳如再找我记者，仍可保持接触，以便继续了解法对我政策的动向，但我目前不去主动找他，以免造成我对法'承认'有兴趣的迹象。（2）在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仍应保持鲜明的正义立场，不给他以任何离间的余地。（3）说明台湾问题和东西德、南北朝鲜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坚决反对其'两个中国'的谬论。（4）指出和台湾保持关系便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法关系的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陈毅在看了外交部的报告后，对外交部的分析和建议表示同意，并在报告上画了圈。①

1959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时，法国投了弃权票，采取了和美英两国不同的立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法国的态度与美英也不相同，并未公开攻击中国。②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和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 Bernard Montgomery）谈话时，再次对戴高乐作出正反两方面的评价：既赞扬他抵制美国的做法，又批评他不放弃阿尔及利亚战争。毛泽东说："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

① 外交部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10-00544-0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114页，第363页。

② 王文博：《从中法建交谈判看周恩来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谈判艺术》，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Xiaohong Liu,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1.

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①]

1960 年 9—10 月间，正在努力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菲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和鼓励。9 月 30 日，阿巴斯在和毛泽东谈话时曾担心地问："我们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如果法国人也读你的军事书，利用你的战法怎么办？"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根据中国经验写的书，只适用于人民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强大的侵略军队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而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②] 话题转向中法关系，毛泽东提出中法建交的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要它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对你们的援助，如果把干涉我们对你们的援助当作建交条件，我们决不干。"[③]

10 月 3 日，周恩来在和阿巴斯会谈时，解释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关系。周恩来说：你们在决不放下武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不排除通过平等谈判来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应有主从，我们认为，应该以武装斗争为主，外交斗争是配合武装斗争的。戴高乐所以要同你们谈判，正是因为你们始终坚持着武装斗争。所以，武装斗争是基础，没有武装斗争，外交斗争将软弱无力。[④]

1961 年 2 月，法国社会党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访华时提出："中法建交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暗示只要中方停止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援助，中法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陈毅外长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并不是去搞掉法国，你占领阿尔及利亚。中国不能拒绝穷民族援助的要求、搞外交关系的要求。""我们过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432 页。

② 陈晋：《毛泽东·格瓦拉·游击战：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世界性话题》，《党的文献》，2007 年第 3 期，第 81 页。阿巴斯在访华结束后接受突尼斯《非洲行动》周刊的采访时说：毛泽东建议他要争取真正的和实质的独立，不要接受任何妥协。见 Edgar O Balance, *The Algerian Insurrection, 1954-62*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7), p. 160.

③ 转引自李潜虞：《试论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期间的中阿关系（1958–1962）》，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4 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 12 月，第 101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291 页。

去自己受压迫，中国自己不援助被压迫民族，脸上无光。”毛泽东在和密特朗交谈时，也强调中国不会为了中法建交而放弃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阿尔及利亚问题是阿法双方的事，应由阿法双方谈判解决；解决阿问题首先要给阿独立，并撤出全部占领军；中法总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但要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毛泽东和陈毅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可以把中法建交问题放一放，但是援助民族独立斗争义不容辞，事关原则大事，中国是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的。

尽管阿尔及利亚问题使中法关系难有重大突破，但中国方面在国际场合仍密切关注美法矛盾的发展，对美国和法国区别对待。1961 年 2 月，法国驻柬埔寨大使皮埃尔·高斯（Pierre Gorce）即将卸任回国。驻金边外国使团团长英国大使提议：以外国使团名义，为高斯大使举行欢送酒会，并向他赠送一个刻有各国大使名字的银盘。英国大使宴请中国大使馆参加。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请示是否可以参加。外交部西欧司和礼宾司都不反对。在给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回复中，外交部指示：“考虑法国大使一般对我尚友好”和法美在柬埔寨的矛盾等情况，“同意你馆参加使团为法大使举行的告别酒会和集体送纪念品。”[①]

1960 年代初，一连串的国际形势发展使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1961 年 5 月，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在会议上，中国采取分化英、法、加拿大同美国关系的方针，孤立美国，克服主要来自美国的阻力，使会议达成有关老挝中立的协议。陈毅外长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商谈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德姆维尔表示：目前建交还有困难，希望先加强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此后，法国开始逐渐疏远与台湾的关系，冷淡台湾派往巴黎的官员。戴高乐政府采取措施发展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为建交创造条件。[②]

1962 年 2 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主要路障被扫除。[③] 从 1962 年 6 月起，《人民日报》不再发表攻击戴高乐政策的文章。该报在当年 6 月 5 日报道法国选出新国民议会时，以中性的用语说：“戴高乐派及其支持者占绝大多数席位。”而在四年前，中国报刊在评论戴高乐上台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时，批评的语调十分明显，批评戴高

① 中国外交部致驻柬埔寨大使馆，1961 年 2 月 20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7-00393-02。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4 页。此书误将国民党政府驻法“公使衔参事”段茂澜写成“大使”段茂。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88 页；Xiaohong Liu,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1.

乐策划的所谓“议会选举”是“摧残民主”。四年之中，中国官方媒体对法国两次国民议会选举的不同评价，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

由于法共在中苏分歧中支持苏联，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对法政策时已不再顾及法共的利益，已不再担心发展中法关系会对法共造成不利影响。中共后来甚至考虑用改善同戴高乐政府的关系来打击法共。[②]1962 年 2 月 21 日，廖承志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分析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英共和法共不像共产党，简直是社会党。某些资产阶级左派做的事反而像共产党，他们有阶级分析。美共、西欧、北欧共产党，好的已没有几个。美、英、法、意、比利时等国的共产党都不行，领导人是工人贵族为基础的修正主义者。”在非洲，“挂共产党招牌的不像共产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打游击时看不见，和法国谈判就出来了。摩洛哥、突尼斯、苏丹、黎巴嫩共产党都是扯淡的。这些党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大部分是法共搞起来的，不少是拿美国的津贴”。[③]

1963 年 7 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④]

1960 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论战的加剧使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分裂；另一方面，戴高乐和美国的裂痕日益扩大，矛盾日趋激化。两大阵营的分化，再加上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对二战以后产生的两极格局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在外交方面却处于一种困难境地：美国继续敌视和围堵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中苏关系日益下滑；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由于边界纠纷而急剧恶化。中国面临四面受敌的窘境。

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重新提出他的中间地带理论并阐述“间接同盟军”的思想。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是在 1946 年 8 月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一次谈话

① 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第 87 页。

② 《法国独立社会党德普勒等人访华事（未成行）》，1959 年 5 月 12 日至 1960 年 12 月 22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0986-01。

③ 《廖承志同志谈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问题》，1962 年 2 月 21 日，江苏省外事办公室档案，全宗号 3124，卷号 147，江苏省档案馆。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4 页。

中，他在评论战后世界形势时，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①]

1963 年以后，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中间地带理论。1963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时，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论断。他指出，美国同西德的阿登纳和法国的戴高乐都是竞争对手，国际资本互相对立，这是客观规律。马列主义要善于利用这个分裂，这是一个间接同盟军。[②]

同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间地带理论。他指出：

>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③]

在毛泽东争取"间接同盟军"、和中间地带国家合作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领导人重视戴高乐政府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希望抓住机会，促进中法关系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193–1194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 年，第 485–489 页。迟爱萍：《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指导》，《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第 37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506–507 页。

展，并通过中法关系的突破，来推动中国同其它西欧国家的关系，从而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促成一个反对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国际统一战线。

戴高乐的战略考虑

戴高乐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风。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听任美国摆布，希望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他在回忆录中指出，他的外交政策有几个重要目标。第一，重新确定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他并不是要彻底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是不愿意让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受美国的支配。第二，和东方阵营的每一个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特别是通过理解和对话，与苏联改善关系，建立缓和。第三，条件成熟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最后，发展法国的独立核打击能力，从而使任何敌对势力在策划攻击法国时，都不得不考虑打击法国的后果。他强调，这些外交政策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旨在加强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①]

1958 年，戴高乐再次入主爱丽舍宫后，雷厉风行，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大胆举措，全力推进他的外交构想。为了建立法国独立的防务政策，他毅然决然地将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领导体系中分离出来。为了打破美苏在世界上谋求建立核垄断的企图，他不遗余力地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他毫不犹豫地否决英国要求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因为他觉得英国在外交方面对美国过于言听计从，亦步亦趋。[②] 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

---

① Charles de Gaulle,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and Endeavor*, translated by Terence Kilmarti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 p. 202.

② John Newhouse, *De Gaulle and the Anglo-Saxo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Stanley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1974), pp. 283-331; Edward A. Kolodziej, *French International Policy under De Gaulle and Pompidou: The Politics of Grandeu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35-291; A. W. DePorte,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Alli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29-242; Michael M. Harrison, *The Reluctant Ally: 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49-114; Jeffrey Glen Giauque, *Grand Designs and Visions of Unity: The Atlantic Pow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55-19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p. 185-189；周荣耀：《戴高乐主义》，《世界历史》，2003 年第 6 期，第 2–22 页。

为，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他的整个外交战略构想。[1]与中国合作使戴高乐在和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时，手中多了一些筹码。他对美国和苏联都在打“中国牌”：一方面，他要向美国人表明，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法国是独立的，法国不会在中国问题上跟着美国走。另一方面，他要让苏联人知道，在外交方面，法国是独立于美国的，法国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苏联应该重视法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2]

如果抵制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战略谋划决定了戴高乐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基本方向的话，急于在迅速恶化的越南乱局中促成政治解决的考虑，增加了戴高乐同中国建交的紧迫感，影响了他启动和中国谈判的时机选择。1963 年，南越局势急剧恶化，反对政权的抗议示威日益扩大，美国加大对越南危机的干涉。戴高乐对南越局势的恶化忧心忡忡。

自从 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惨遭失败以后，戴高乐就失去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信心，他开始考虑中立化措施。[3]法国虽然已于 1954 年结束了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法国在越南南部仍保留很多经济和文化利益。很多法国人在越南南部还拥有财产，越南南部的每一个省都有法国公民居住，法语仍是大多数越南人的第二语言。因此，法国领导人对越南的局势非常关切。他们对美国不断加强对越南事务的卷入深表担心，其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他们不愿看到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在越南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他们害怕美国扩大印度支那冲突会导致中国和苏联直接出兵，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法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势必不得不介入。

戴高乐坚信，法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在解决印度支那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因为法国和这个地区的交往历史很久，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和当地人打交道经验丰富；而美国人作为插手该地区事务的后来者，过于自信，盲人瞎马地乱闯，只会将矛盾激化，把局势弄得更乱，更危险。他担心，美国不断加深在越南争端中的介入，不仅会使美国深陷越南冲突的泥潭，无法顾及对西欧防务所承担的义务，而且会使越南矛盾演变成一场和直接中国较量的地区战争，而法国作为北约的

---

① Qiang Zhai, “Seeking a Multipolar World: China and de Gaulle’s France,” in *Christian Nuenlist, Anna Locher, and Garret Martin, eds., Globalizing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 1958–1969*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p. 181-202.

② Philip G. Cerny, *The Politics of Grandeur: Ideological Aspects of de Gaull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Pierre Journoud, *De Gaulle et le Vietnam (1945-1969)* (Paris: Éditions Tallandier, 2011).

成员，势必将被美国拖入这场战争。[①] 戴高乐对美国在越南取胜的前景极为悲观。他认为，尽管美国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和装备优势，但它在越南不会成功，因为发生在越南的冲突，从本质上说，是一场越南民族内部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北越并不是外来势力，美国却是外来势力。在非殖民化的时代，越南的民族主义最终将战胜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他对美国资深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即使美国在越南投入一百万军队，美国也打不赢战争。[②]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遭受的挫折加深了戴高乐对西方国家能够用武力阻止第三世界政治发展进程的怀疑。因此，他主张，越南问题应该由冲突中的各派通过谈判和协商达成政治解决，而中立化就是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强调，中立化并不意味将越南拱手交给共产党，中立化可以在给东南亚带来和平的同时，不损害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不改变全球的势力均衡。他认为，老挝中立化的模式可以适用于越南。[③]

1963 年 8 月 29 日，戴高乐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他的解决越南冲突的主张。他指出，法国十分关注越南局势的发展，法国和越南源远流长的关系使法国对越南的情况非常了解，对越南人民所受的磨难“真心诚意地感同身受”。法国寻求越南冲突的中立化解决方案，主张以 1954 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使越南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和平解决。会后，新闻部长兼政府发言人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fite）将戴高乐的讲话全文原封不动地透露给媒体，引起广泛注意。尽管戴高乐在讲话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美国，但明眼人都知道他所说的“外来干涉”指的是谁。[④] 戴高乐希望通过和中国改善关系来提升法国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东南亚问题上的发言权。

---

① Yuko Torikata, “The U.S. Escalation in Vietnam and de Gaulle’s Secret Search for Peace, 1964-1966,” in *Christian Nuenlist, Anna Locher, and Garret Martin, eds., Globalizing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 1958–1969*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p. 155-179.

②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p. 556; Robert Dallek, *Flawed Giant: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3-244.

③ Fredrik Logevall, “De Gaulle, Neutralization, and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 1963-1964,”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92), pp. 69-102; Eugenie M. Blang, *Allies at Odds: America, Europe, and Vietnam, 1961-1968*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1), chapter 6.

④ Charles G. Cogan, *Charles de Gaulle: A Brief Biography with Documents*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6), pp. 149-150; Fredrik Logevall,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3; Maurice Vaisse, “De Gaulle and the Vietnam War,” Lloyd Gardner and Ted Gittinger, eds., *Vietnam: The Search for Peace, 1964-1968*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2.

对越南问题的关注使戴高乐迫不及待地想和中国领导人对话，因为他深信，亚洲所有的事务，包括柬埔寨、老挝、越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朝鲜、苏联和日本，都和中国有关。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要想在东南亚国家中达成中立协议，是不可能的，中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多利益。[①]

戴高乐决定派一名特使秘密去中国谈判建交事宜。为了不让美国人察觉，戴高乐要绕开容易被人注意的外交部渠道。他想到他十分信赖的老朋友富尔。富尔出身律师，深谙国际法，外交经验丰富，能言善辩，见多识广，和戴高乐的关系非常密切，交往渊源很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法国沦陷于德国的侵略铁蹄，富尔参加由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担任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战后，富尔两度出任法国总理（1952，1955—1956），曾于1957年访华。1958年戴高乐上台前夕，富尔率先表示支持他上台，在法国政界声望很高。[②]

1963年富尔访华

1963年8月19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称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清泉当即答复同意。20日上午，富尔来到中国大使馆，说明造访的目的是要求再度访华，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目前世界形势和法中关系交换意见。他表示，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看法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交情，可以帮助双方建立联系，沟通看法。访华时间希望安排在10月。李清泉向国内报告和富尔谈话的内容。[③]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富尔传递的信息，在周恩来主持下，中方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如能抓住这个时机同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新局面，打破美苏对世界事务的垄断，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周恩来亲自批示同意致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复电，同意富尔于10月

① De Gaulle press conference, January 31, 1964, quoted in Garret Martin, "Playing the China Card? Revisiting France'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63-1964,"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Winter 2008), p, 54.

② 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第202–203页。

③ 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第203页；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记事》，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99页。

下旬访华，拟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出面邀请。[①]

8 月 31 日，李清泉到富尔在瑞士的住处，向他转达张奚若的邀请。富尔对邀请他访华表示感谢。富尔同李清泉见面后，立即返回巴黎。9 月 12 日，他又专程去瑞士见李清泉，说他从瑞士返回巴黎后，见到戴高乐，戴高乐要他再次来把问题说明白，他将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携带戴高乐给他的一封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亲笔信，到北京后面交中国领导人。因此，他的访华实际上具有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谈话中，富尔问到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李清泉回答，英国承认中国，但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与其保持"领事关系"，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所以和英国只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富尔当即明确表示，反对搞"两个中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就不应该支持蒋介石。但是，富尔又不无用意地补充道，英国在台湾设有领事馆，可能是实际需要，这个问题以后可以研究。富尔的话表明，戴高乐既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又不愿完全割断与蒋介石的关系。[②]

1963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4 日，富尔访问中国，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外长举行了多次会谈。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富尔转达戴高乐对中法关系的看法。他说，戴高乐觉得像中法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举行会谈是不正常的；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结果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法国将不管其他国家的态度，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周恩来对富尔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并赞扬戴高乐坚持走独立的外交路线。周恩来指出，在戴高乐执政的这几年中，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这样；另一方面，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这是件好事。周恩来还表示，法国没有在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上签字，中国也反对这个条约；双方事先并没有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却是一致的，因为中法两国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主张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周恩来强调了中法之间的共同之处，指

---

① 高长武：《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关节点》，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221 页。

② 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第 204–205 页。

出两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富尔同意周恩来的分析。[①]

在建交的具体步骤上，富尔表示，法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起，不愿突然切断关系”。对此，周恩来回答说，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那会导致“两个中国”；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蒋介石集团和法国互设有使领馆，为了结束这一关系，需要采取一些手续，这不是个大问题。富尔表示法国的问题属于后者。[②]

考虑到中法建交有助于利用美法矛盾来破坏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有助于抵制美苏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的倾向、有助于推动中国同欧洲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削弱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了有别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灵活措施。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接受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台湾与法国断交的方案。[③]

12 月 13 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开始访问亚、非、欧十四国。虽然身在国外，但他仍十分关系中法建交的进展情况。在他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12 月 21 至 27 日），他叫一个中国派到法国工作的人员到阿尔及利亚去，以便听取他汇报有关中法接触的情况，并要求早日实现中法建交。陪同周恩来出访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后来回忆道：“那时周总理对戴高乐的估计是正确的。首先，周总理认为戴高乐反法西斯是坚决的；其次，认为戴高乐在从阿尔及利亚撤兵的问题上是开明的。”[④]

在周恩来出国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任代总理，负责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对中法建交事宜的处理。1964 年 1 月 24 日，他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介绍中法建交的有关情况。他指出：中法建交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件大事，是在西方打断一个链条，其影响会越来越深远。同日，他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中法建交

---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88–189 页；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记事》，第 106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5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89 页。

③ 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记事》，第 105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89 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751 页。

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起草后，他随即将通知稿和《宣传要点》稿报批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核阅，并说明："这是我们集体修改的，此件必须早日发出。"[①] 第二天，邓小平又审核《人民日报》社论稿《祝贺中法建交》，并报送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核阅。[②]

1 月 26 日，外交部将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中法建交的宣传要点》登载在《外交通报》第 13 期上，转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和各驻外机构。《宣传要点》既分析了中法建交的积极意义，又指明了它的局限性，要求驻外人员在宣传此事件时，不要对法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要"过于渲染"，不要给人"造成我有求于法国和过分重视这一事件的印象"。在论述中法建交的正面意义时，《宣传要点》指出："这一事件不仅直接打击了美帝，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而且也打击了苏修的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阴谋。中法建交后，有些非洲法兰西共同体国家、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以及在对华政策上尚在观望的国家，可能继起效仿，从而导致我对外关系进一步开展的局面，对今后国际局势发展的进程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中法建交的局限性，《宣传要点》明确说明："戴高乐政府虽然反对美帝，但法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对我国的态度以及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也存有两面性。同时，法国影响的非洲、欧洲某些国家，也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作法。"《宣传要点》特别指示驻外人员在谈论中法建交时，强调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没有降低建交条件和门槛。[③]

富尔访华之后，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Jacques de Beaumarchais）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在伯尔尼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双方最后在 1964 年 1 月 27 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④] 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1 月 28 日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793 页。又见《杨尚昆日记》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34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794 页。

③ 外交部：《转发中央关于中法建交宣传要点的通知》，1964 年 1 月 26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1998-03。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1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90 页。

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①

中法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发表后，中国外交部加紧筹备先遣队去巴黎建立使馆。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被任命为临时代办，先遣队成员包括张锡昌。由于中法联合公报发表后台湾当局对法国只抗议不"断交"，法台关系的下一步走向就成为外交部非常关心的问题。赴法建馆先遣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同法国政府交涉，尽快"驱蒋"，逼走国民党驻法"大使馆"，为实现中法如期交换大使创造条件。②

以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好小组主席弗朗索瓦·贝纳尔为团长的法国议员代表团的来访，给中国领导人一个再次向法方强调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政策、希望法国尽快与国民党政府了断的机会。1 月 29 日，邓小平会见该代表团。他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改变不了的。"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的主要谈话内容及该团成员多次表示要求见毛泽东一事，提议："我意如可能，请主席见他们一次。"③

毛泽东接受邓小平的建议，于次日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

>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 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五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

---

① 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318 页；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记事》，第 107–108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90 页。

② 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第 41–42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1794 页。

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①]

2 月 4 日，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法国建馆先遣人员来中国和中国建馆人员赴法问题的请示报告后，作出批示："我找外交口同志谈了一次。(一）我同意外交部意见，即通知法方，我代办等六人可于二月十五日左右到达巴黎。我们考虑，目前我们派代办去，没有危险，反而迫使法方对台湾态度明朗化。代办去后，如法方再玩'两个中国'把戏，充其量搞成英国那样的局面，于我无损。看来，这对法方来说是不利的。(二）我代办去后的活动方案，由外交部迅速拟出送批。(三）此事是否需在主席处一谈，请主席决定。"[②]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希望迅速派代办去巴黎，以迫使法国政府赶快在台湾问题上明确立场。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作了退一步的准备：如果法国继续和台湾保持官方关系，中国就将像对待英国那样，把中法外交关系定格在代办级水平。

2 月 5 日，邓小平在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时，谈到中法建交问题。他说：美国在极力鼓动法国搞"两个中国"，企图以此来破坏中法建交。但是，戴高乐听不听他们的，还靠不住，因为法国同中国建交是戴高乐采取的主动。在开始谈判建交时，我们已谈清楚了，一点也不含糊，戴高乐既已下决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又要搞"两个中国"，这对他有什么好处。[③]

2 月 7 日，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赴法临时代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后，作出批示："拟同意。我明日约他们面谈一次。""我代办十五日以前可到巴黎。原则上，在蒋帮在法保留领事馆的情况下，我不宜派出大使，对这点不能含糊。至于蒋帮不在法国保留领事馆，而法国却在台湾保留领事馆，这种可能性较小。如未出现这种情况，我可暂时置之不理，等情况发展再说。"[④]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522–52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1795 页。

③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47–48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第 1796 页。

次日，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带宋之光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先谈了挑选合适的驻法大使的重要性，强调“要选派政治坚强并有外交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此职”。他接着指示宋之光早日赴法，首要任务是“驱蒋”，如果“驱蒋”拖延不决，中国将撤回代办。为此，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宋之光在思想上做了留与撤的两手准备。[①]

实际上，在法国方面，戴高乐也很着急，担心如果台湾不作出断交决定，导致中方变卦，将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于被动局面。因此，法国政府要求中国代办先去巴黎，以利于促使台湾方面主动撤除其“外交机构”。[②] 2月6日，戴高乐在给蓬皮杜总理（Georges Pompidou）和德姆维尔外长的指令中说：“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都这样认为。既然我们与北京政府协议建立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并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质准备。”[③]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精神，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同一天，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主动，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2月15日，中法两国临时代办分别抵达巴黎和北京。[④]

中国领导人对中法关系正常化的进展表示满意。2月17日，正在缅甸访问的周恩来接见法国驻缅甸大使，请他转告戴高乐：“我很高兴中法正式建交，应对此表示祝贺。现蒋帮已同法绝交，这很好，正合我们原来的设想。”周恩来还评价了法国的历史和文化，说：“法国人民是有很强的民族志气的，法国近二百年的历史，把法国人民锻炼出来了。法国的文化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发展了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以其大革命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传统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主义，我们一贯反对。”[⑤]

3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驻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克劳德·沙耶时指出：中法双方要痛痛快快地发展关系，要如期互派大使和发展其他各方面的关系，这样做是

---

① 宋之光：《五星红旗飘扬在巴黎上空：中法建交回顾》，载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72页。

② 宋之光：《五星红旗飘扬在巴黎上空：中法建交回顾》，第72页。

③ 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第45页。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20–621页。

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我们的相互了解才开始，要逐渐加深。随着了解的加深，双方文化、经济、贸易机构可以进行更多的接触。[1] 4 月 10 日，中国政府将任命黄镇为首任驻法大使的决定通知法国政府，并对法国政府任命吕西安·佩耶（Lucien Paye）为首任驻华大使表示欢迎。至此，中法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2]

中国领导人在中法建交谈判中，对台湾问题做了灵活处理，即在不要求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与法国建交。中国领导人之所以破例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法国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影响力的重要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法建交可以帮助中国改善同第二中间地带中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把中法建交的模式看成是一个日后可以普遍适用的样板，而是把中法建交的经验当成为一个特别案例来处理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在 1964 年 3 月 17 日发布的一个文件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文件分析了中法建交对其它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并指出警惕美国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 中法建交后，对于我们在第二个中间地带开展工作，进一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造成了很有利的条件。目前，一些西方国家，要求突破美国的控制，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愈来愈高。我们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对西方未建交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方针，分别不同对象，进行争取分化，扩大在第二中间地带的战果，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美国仍在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有些西方国家也认为“两个中国”的作法，既能适应美国的需要，又可对付要求同我建交的舆论压力。因此，在采取积极方针的同时，我们在具体作法上还应更加明确，以便彻底地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法建交后，有些国家会试探我对建交的态度。我们认为，在建交问题上，对西方国家原则上仍应一律不采取主动。如这些国家向我试探，对同蒋帮有外交关系的，应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必须对方先同蒋帮绝交，然后才能同我建立外交关系，一般不再轻易采取中法建交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对方同美矛盾较深，同我建交影响较大，对我态度较好者，也不排除参照中法建交的方式加以运用。总之，既要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发展我对外关系，又要在原则上毫不含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3]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 1804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71 页。

③ 《外交部对西方未建交国家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1964 年 3 月 17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0-01990-01。

中法建交是否会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的估计是谨慎的。1964 年 2 月 3 日，正在索马里访问的周恩来对舍马克总理说：虽然法国承认中国代表了一种承认中国的趋势，但是，在联合国中是否能有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代表，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美国如看到联合国中多数国家支持恢复中国席位，它会有新花样，会提出台湾必须除外。周恩来强调，中国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如果出现“两个中国”，中国宁可不进联合国。①

结　论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高举意识形态大旗，支持反帝革命。从 1949 年到 1963 年，中法关系的发展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更重视推动反帝反殖运动，更强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而对改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不太在乎。毛泽东对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援助是造成 1949 至 1963 年间中法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导致中法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当中国的国际地位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也能在外交方面及时作出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政策调整，审时度势，绝地反击。1963 年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一个例子。到 1962 年末，中国外交已陷入严重困境：中美对抗势头不减，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边境冲突又使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降到冰点。面对来自所谓“帝、修、反”的多重压力，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试图为中国的外交窘境找到改善的途径。中法建交是中国政府在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原则的指导下，在外交领域里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毛泽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务实思想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次有效实践，是对美苏操控国际局势的挑战。为了推动利用美法矛盾、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战略目标，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做了灵活处理，不让该问题成为中法建交的拦路虎。

反对美苏独揽世界事务的共同需要使中法两国走到一块。在中法建交以后的一年中，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向国际友人强调中法在反美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和诉求。1964 年 8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在反对美帝国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618 页。

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①]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对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15 周年国庆庆典的西哈努克亲王说，在对美政策问题上，"我们同法国总统有共同点"。"英国政府、西德政府就不如法国政府，还有日本政府都比不上戴高乐政府，也比不上亲王。但是，我看这些国家总有一天要走你的道路和戴高乐的道路。这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②] 很显然，中法领导人都愿意从全球战略的大角度出发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双边关系。

中法建交对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铺垫。1971 至 1972 年的中美关系破冰谈判是毛泽东在外交困境中以现实主义态度寻求战略突破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就美国而言，中法建交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辩论。1964 年 3 月 25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他作了题为"旧神话、新现实"的演讲，批评美国的东亚政策。他说，美国官员必须抛弃那些扭曲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旧神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东亚新现实，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下去的现实。他建议，美国应该在对华关系中加入灵活的成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竞争共存"的关系，为"将来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打开大门"。富布赖特的讲话在公众中引起积极反响，他收到约一千两百封信，其中三分之二支持他的观点。《纽约时报》指出，富布赖特的讲话代表了对华政策大讨论的开始。[③]

戴高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动影响了后来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尼克松对戴高乐怀有高度的崇敬。他在《领导人》一书中，给予戴高乐极高的评价，称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中，丘吉尔第一，戴高乐第二。1963 年 6 月，尼克松访问法国时，同戴高乐共进午餐。席间，两人纵论国际局势，戴高乐强调，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西方。[④] 1969 年，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第一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就是欧洲。在法国，他和戴高乐再度聚首，讨论世界形势。戴高乐向他建议，从越南撤军，和

---

① 转引自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法国近代史》，《党的文献》，2011 年第 1 期，第 120 页。

② 《毛主席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64 年 9 月 28 日，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204-01548-05。

③ Randall Bennett Woods, *Fulbright: A Biograph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 336-337;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100; Guangqiu Xu，*Congres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1949-1979* (Akron: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2007), pp. 181-183.

④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 1962-197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p. 22-24;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 369.

苏联缓和，同中国改善关系。尼克松对戴高乐所说的国际社会不应该孤立中国的观点，并无异议，只是觉得他眼下还不能马上就向中国示好。他表示，十年之内，当中国在核力量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以后，美国将别无选择，不得不和它交往。戴高乐不以为然地说，你何必要等到将来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再同中国交往，你最好现在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告诉戴高乐，有很多国务院官员不但主张美苏缓和，还提出美国、苏联和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建议。尼克松认为，这个建议在短期内是个好主意，但从长远考虑，承认中国和苏联是“大国”并和他们建立“同等的关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①] 很显然，戴高乐的劝告加强了尼克松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决心。

如果把中法建交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段看，它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从客观效果的评价考虑（毛泽东主观上始料未及的），中法建交可以说是中国最终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一环。从中法建交，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最终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从一个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成为一个该体系的支持者和既得利益者。

（本人在为撰写此文收集资料时，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北京大学高艳丽、南开大学张秀阁和中南大学刘青松的帮助。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杨奎松和前中国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就本文的初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本人也曾就此课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作讲座，得到参加讲做师生的有益回馈，感谢牛大勇、赵学功、徐友珍、李潜虞和蔡佳禾安排本人在上述五校作讲做。本文后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8 期上。）

①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p. 168-169; Jussi Hanhimaki,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3; Ambrose, *Nixon*, p. 254.

美台对中法建交的反应（1963—1964）

1964 年中法建交，此举震动世界，对台湾蒋介石政权构成一次重大的外交危机。美国约翰逊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如何应对中法建交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对危机的不同处理加深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不信任，扩大了美台同盟的裂痕。有关此问题的法国和美国政府档案已公布多年，[①] 中外学者利用法美解密文件对约翰逊政府处理中法建交的经过也做过分析和评论。[②] 但是，蒋介石是如何对中法建交这一突发事件做出反应的？他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采取了哪些步骤？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幕后外交对蒋介石产生什么影响和教训？对于这些问题，基于档案基础的

---

① 法国外交部档案以及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总统的档案，均以开放。正式出版的相关美国政府文件集有：*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22, Nor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Chin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Hereafter *FRUS*).

② 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法国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85–91 页；潘敬国、张颖：《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91–97 页；陈长伟：《1964 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百年潮》，2006 年第 12 期，第 47–52 页；姚百慧：《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世界历史》，2010 年第 3 期，第 63–77 页；苏宏达：《"一个中国原则"与"两岸国际共存"并行的可能性评估——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华民国"对法国外交政策为案例研究》，《美欧季刊》（台湾）2000 年春季卷，第 83–111 页；许文堂：《建交与断交——1964 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载黄翔瑜主编：《战后档案与历史研究：第九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8 年，第 159–200 页；Nancy Bernkopf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9-134.

深入学术论述和分析还尚付阙如。[①]

最近，收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对研究者开放。蒋介石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对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描述了他在应对法国政策变化和美国压力时所采取的措施，记录了他在处理外交危机和大国关系时所经历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使我们可以深入观察美台双方既争吵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进一步了解他们沟通看法、消除危机、维护同盟纽带的各种机制。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时，准确把握外交决策者的动机和目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当事人的日记往往为后人窥视当事人真实思想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深入探讨他对中法建交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史学家梦寐以求的机会。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中法建交的背景和经过，然后依据美国政府档案和蒋介石日记，详细和深入地评析和剖决美国和台湾对中法关系正常化的反应，特别是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和美国官员之间的互动、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危机处理给蒋介石带来的教训，以求拓展我们对中法建交的国际影响的研究，增加我们对蒋介石外交风格和特点的了解，加深我们对冷战时期美台关系性质的认识。

美国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中法之间的交往。1963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双方谈到中国问题。腊斯克强调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说中国对全球很多地区（包括老挝、印度尼西亚、古巴和非洲）的动乱负责，国际社会不应该放任和鼓励中国的政策。戴高乐认为，西方应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孤立和敌视政策，接触政策更有利于西方利益。他用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政策的经验来说明他的观点。腊斯克不同意戴高乐的看法，认为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做法并没有改变苏联人的行为方式，改变苏联人态度的原因，不是接触政策，而是西方的军事实力。腊斯克还补充说，过去

① 潘敬国和张颖在他们文章的引言中称："本文根据近年来陆续出版和最新解密的中国、美国和台湾的相关文献档案。"但是，仔细阅读他们文章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却看不到一件"最新解密"的台湾的文献档案，他们所引用的台湾材料只有《中央日报》和《自立晚报》。许文堂的文章只是使用了一些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文件，但没有利用蒋介石文件，特别是没有利用内容丰富的蒋介石日记。材料的缺陷限制了许文堂的视野，使他不能详细描述蒋介石是如何处理中法建交危机的，不能揭示蒋介石在处理危机时是如何与他的主要幕僚（包括"外交部长"沈昌焕）互动的。

印度对中国采取过“非常友好”的政策，最近日本也对中国表示友好，但这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政策。戴高乐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西方过去对苏联采取的接触政策并不是一点用处没有，印度和日本没能通过接触和交流来改变中国人，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资源和能力都有限，不能向中国提供很多东西，而将来如果西方和中国建立关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腊斯克把话题转向台湾问题说，除非西方放弃台湾，否则中国不会有兴趣和西方改善关系。戴高乐对腊斯克的话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西方应该放弃台湾。双方显然话不投机。在谈话结束前，腊斯克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有没有时间表？戴高乐说，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那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受多种因素制约，不是法国一家就可以说了算。为了不使美国人太难堪，戴高乐向腊斯克保证：法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前会通知美国。①

腊斯克极力劝阻戴高乐不要承认中国的做法表明：他无意改变美国从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就一直奉行的对中国“遏制加孤立”的强硬敌对政策。腊斯克代表了美国政府中对华政策的“鹰派”，但他的对华顽固态度并不被他手下的一些官员认同或接受，在美国政府中还有一批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鸽派”官员，他们主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莫（Robert Komer）、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詹姆斯·汤姆逊（James C. Thomson，Jr.）、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斯（Adlai Stevenson）、驻日本大使爱德温·瑞肖尔（Edwin Reischauer）、驻香港总领事爱德华·赖斯（Edward Rice）等人。②他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这一事实，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承认，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最终加入联合国。美国继续坚持将中国摒弃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做法，最多只能是推迟一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即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美国的做法只会加深美国和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有鉴于此，美国应该修正对华政策，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改变“遏制加孤立”的做法，采取“既遏制

①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6, 1963, in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409-410. See also James Peck, *Washington's China: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ism*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6), p. 255.

② 新加坡学者吴翠玲 (Evelyn Goh) 称这些“鸽派”官员为对华政策“修正派”，即他们修正了传统派官员对中国的强硬看法。吴翠玲主要是从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的角度，讨论“修正派”官员和传统派官员在对华态度上的分歧。见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3。

又接触”的措施，即美国要继续遏制中国的扩张行为，但同时与中国保持对话和接触，以此来引导中国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他们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在联合国推动“两个中国”方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保留“中华民国”的席位；减少对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松动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特别是取消在食物和药品方面对中国的禁运。他们认为，采取这些新措施的好处有三个：第一，美国可能减少中国对美国的敌意；第二，美国可以缓和与盟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第三，美国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已经做了努力；如果中美关系仍然紧张，那么，责任不在美国，而在中国，是中国不可理喻，不可救药。①

“鸽派”官员主张增加对华政策的灵活性，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长远考虑，即美国应着眼于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属于那种非理性、患共产主义狂热症的、对美国充满恐惧和仇恨的人，而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更理性、更清醒、更务实一点，美国对中国的“既遏制又接触”的政策，可以减少这些人对美国的恐惧，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国际社会的影响。希尔斯曼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斯说：苏联已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更负责任地行事”，就是因为美国对苏联采取了“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通过接触来鼓励苏联内部的变化，通过遏制，来防堵苏联的扩张。②

就在腊斯克于12月16日在巴黎就对华政策向戴高乐施加压力的前十天，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对华政策演讲，阐述“鸽派”官员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主张。他指出：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最大和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另一方面，中共的政权稳固，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美国应该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的现实，考虑采取“两个中国”政策。从长远看，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就需要在中国周围

---

① Thomson to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William Bundy, October 28, 1964,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238, Johnson Library; Rice to State Department, November 6, 1964,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238, Johnson Library; Komer to Johnson, March 2, 1966, Komer Papers, Box 1, Johnson Library;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71-272; Victor S.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 U.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p.182.

② Hilsman to Stevenson, December 19, 1963, *FRUS, 1961-1963*, Vol. 22, pp. 411-412.

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稳定远东。美国应该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禁运"政策，继续中美会谈，保持谈判接触。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方针是"采取保持实力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促使中国大陆发生变化"。总之，美国对华政策应该是既坚定，又灵活、又理智。"坚定"指的是美国应维持在东亚的实力，随时准备对付侵略行为，同时恪守对盟国的义务，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灵活"意味着美国将打开和中国谈判的大门；"理智"是提醒美国领导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少受情绪因素支配。①

希尔斯曼的演讲稿是"鸽派"官员的集体讨论成果，参加演讲稿磋商和撰写的官员有国务院远东事务特别助理汤姆逊、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国务院远东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巴尼特（Robert W. Barnett）、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官员林赛·格兰特（Lindsey Grant）、国务院情报研究室分析员艾伦·惠廷（Allen S. Whiting）。② 希尔斯曼选择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有其特殊含义，因为1957年，正是在旧金山，当时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作了一个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讲，称中共政权是一个"短暂而非永久的现象"，为美国对华"遏制加孤立"政策定了调。③

约翰逊政府并没有在希尔斯曼演讲之后立即对中国采取灵活松动的措施，主要原因是国务卿腊斯克在拖后腿。但据当时在国务院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格林的回忆，腊斯克对希尔斯曼的演讲很不高兴。④ 腊斯克坚持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认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先决条件是中共放弃支持革命、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在中国没有改变其对国际社会的敌视政策之前，法国与中国建交只会给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使中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极端政策已被国际社会认可。⑤ 腊斯克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害怕引起保守派的

---

①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Dell, 1964), pp. 350-357;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1;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 271; Peck, *Washington's China*, pp. 219-220.

② Memorandum of May 6, 1964, by Thomson, Thomson Papers, Box 9, Kennedy Library; Thomson,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19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0 (April/June 1972), pp. 230-231.

③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 355;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5-196.

④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p.196.

⑤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102; Robert Gar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9: A Troubled Affair*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9.

攻击，因为他在 1950 年代曾遭到右翼势力麦卡锡主义的围攻。在杜鲁门政府时期，腊斯克曾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参与撰写 1949 年《中国白皮书》。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政坛和社会引起一场恐共、反共热，共和党右翼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借机向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兴师问罪，指责杜鲁门政府"丢失中国"。腊斯克作为杜鲁门政府中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首当其冲地承受来自共和党保守派的巨大压力。这段经历给腊斯克后来的政治生涯投下浓重的阴影，使他在后来处理中国问题时，如履薄冰，心有余悸。1960 年代初，腊斯克成为国务卿以后，一直牢记 1950 年代的教训，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小心谨慎，不给共和党右翼留下发难的话柄。① 腊斯克不满意希尔斯曼擅自做主、喜欢向媒体透露政府内情的行事风格，在得到约翰逊总统同意后，他于 1964 年 2 月撤销了希尔斯曼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任命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接替希尔斯曼的位子。②

1964 年 1 月 7 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通知美国驻法国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法国已原则上决定承认中国。③ 第二天，波伦向德姆维尔转达美国政府意见：如果法国执意要承认中国，那么最好将这一行动推迟到 1965 年。那时，此举的影响要比 1964 年小，因为 1964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1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法国准备承认中国。几天后，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Herve Alphand）会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阐述法国承认中国的理由。他特别指出，中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不再像杜勒斯过去所说的那样，同苏联结成紧密的集团。④

1 月 15 日，阿尔芳大使通知美国副国务卿艾佛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① Dean Rusk, *As I Saw It: As Told to Richard Rus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p. 282; Alonzo L. Hamby, *Man of the People: A Life of Harry Tru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66; Kai Bird,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p. 354-355; H.W. Brands, *The Wages of Globalis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 Thomas W. Zeiler, *Dean Rusk: Defending the American Mission Abroad*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2000), pp. 23-29. 关于"谁丢失中国？"的争论对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的影响，参见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② 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p. 415-416.

③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January 1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3. 腊斯克在电报中回顾了 1 月 7 日德姆维尔和波伦的谈话。

④ 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载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34 页。

Harriman）：法国内阁已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几周内将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一决定；在建交公报公布的三个月以后，中法将互派大使。阿尔芳说，他之所以奉命将法国的决定事先通知美国，是因为戴高乐总统曾经保证他在采取任何承认中国的行动之前都会先和美国通气。阿尔芳告诉哈里曼：在中法建交问题上，法国没有接受北京任何条件；法国不会同台湾断绝关系；北京很可能要发表一个单方面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法国虽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没有被要求就此问题公开表态；法国同台湾的关系将保持不变，除非台湾决定断绝关系。在谈到法美双方都很关心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阿尔芳表示，法国没有做任何妥协，但法国保留在此问题上的决策独立性。哈里曼对法国承认中国的决定表示强烈不满，他口气强硬地指出：法国的决定"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会加大美国公众对法国的反感，美国没有预料到法国作为一个盟国会做这样的事。法国不会从承认中国这件事上得到任何好处，只会极大地危害美国。阿尔芳没有想到哈里曼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提醒哈里曼：别的国家也承认过中国。哈里曼火气未消地说，那是朝鲜战争以前发生的事。哈里曼接着以略带讽刺的口吻对阿尔芳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最聪明的外交家之一。"（言外之意：你怎么对你政府这样错误的决定都看不出来？）哈里曼然后喋喋不休地数落法国：法国的行动将在亚洲产生困惑，助长共产党中国的气焰，为美国人民和总统制造巨大困难；法国完全无视美国的利益，擅自做主，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在政策制定上独立于美国，而不惜将美国人对法国的好感弃之不顾。哈里曼最后教训法国不要忘记是美国在亚洲承担主要的责任，虽然美国欢迎法国在像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地方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亚洲的基本问题是遏制中国，在这方面，法国能作的贡献是很小的，"责任完全在美国的肩上，而法国却在加强我们的敌人。朝鲜战争还从未解决，在亚洲的其他地区，现在到处都存在着共产党支持的冲突"。[①]

约翰逊总统本人对法国打算承认中国的做法也深感不安，对戴高乐不按美国步调行事的行为甚为恼火和不满，但一时间，他不知道他是应该直接出面向戴高乐提出抗议，还是只让手下官员去向法国政府交涉？带着困惑和忧虑，约翰逊于 1 月 15 日打电话给他的民主党老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①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 January 1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1-3. 作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哈里曼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三把手。阿尔芳事后在《不寻常的经历》一书中写到：他在美国国务院受到冷遇，哈里曼以法国的老朋友自居，倚老卖老，出言不逊："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为了给美国一记耳光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第 35 页。

Russell)，倾诉胸中块垒。由于俩人的对话很能反映约翰逊此时的矛盾心态，即：他既对戴高乐特立独行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和无奈，又在内心深处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迟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特将谈话节录如下：

约翰逊："戴高乐即将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是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提出强烈抗议，还是我应该让政府去抗议？……我们倾向于让政府去抗议……他（戴高乐）将不予理睬。"

拉塞尔："总统先生，我不主张在这件事上反应太强烈。如果他（戴高乐）不予理睬，那么，他在承认中国时，他会很难堪……我们控制不了他们的外交政策。"

约翰逊："你说得对，我们一点也控制不了。"

拉塞尔："现在我们还不能谈这个问题（即承认中国），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红色中国的那一天终究要到来。"

约翰逊："我很同意你的话。"

拉塞尔："我不是很确定，如果我们在三四年前就承认了中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不是更好些。"

约翰逊："我们的处境会更好些。"

拉塞尔："目前从政治上说，承认中国当然是一剂毒药。"[①]

很显然，拉塞尔和约翰逊都意识到，承认中国这个问题在目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仍然太敏感了，一不小心，共和党保守派就可能在此问题上做文章，向民主党政府发难。

在和拉塞尔打电话之后，约翰逊又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通电话，讨论中法建交问题。邦迪认为，破坏戴高乐行动的一个办法是让蒋介石不和法国断交，拖延一个星期左右。在过去，每当有国家承认北京，蒋介石都会立刻与那个国家断交。如果这次蒋介石不马上宣布与法国断交，那么难题就摆在北京面前，因为北京一直坚持它不能与一个同时承认台湾的国家建交。法国就是希望蒋介石立马和法国断交，而蒋介石很可能会这样做。"我们应该建议蒋介石顶住一个星期"，不要和法国断交。约翰逊赞成邦迪这番话。[②]

第二天，国务卿腊斯克致电美国驻台"大使"杰诺尔德·赖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指示他将约翰逊总统的一封信转交给蒋介石。约翰逊在信中建议：

---

① Michael R. Beschloss, ed., *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196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p. 162-163.

② *FRUS, 1964-1968*，Vol. 30, pp. 3-4.

蒋介石不要在法国承认北京后立即同法国断交，因为北京会强烈反对法国继续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就希望台湾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如果台湾不宣布和法国断交，那毛泽东的赌注就下错了，他会非常难堪，他将在中法建交中捞不到多少好处；而如果台湾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那就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使他正好不用承担默认“两个中国”事实的骂名。[①]

美国在尽力劝阻法国不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还向其西方盟国施加压力，以防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步法国后尘。在美国官员的眼中，中法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开始，法国的行动会产生腐蚀效应，就好比在美国长期精心维护的封锁中国的水坝上冲开一个洞眼，如果不及时堵住这个洞眼，它就会被水冲刷得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大坝崩溃。美国特别担心像加拿大和日本这样盟国的对华态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要求和中国建立联系和交流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大。

在加拿大政府中，有很多官员同情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认为东亚的稳定和繁荣有赖于同中国建立对话和接触的关系。他们觉得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必须调整和修改。在盟国的会议上，加拿大代表经常为法国的对华政策辩护，认为法国的做法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和中国交流的机会，西方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结束北京的孤立处境。加拿大外交部官员认为，在 1964 年第 19 届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席位时，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可以维持其“重要问题”提案；在这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的对策。外交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考虑在联合国提出一个“两个中国”方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保留台湾的席位。[②]

1964 年 1 月 22 日，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同马丁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在谈话中，鲍尔指出，戴高乐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看来

①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6,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4-5.

② Don Page,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Canadian Perspectives and Initiatives, 1949-1971,”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89-90；Michael Lumbers, *Piercing the Bamboo Curtain: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during the Johnson Yea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65-66.

“重要问题”提案最初是美国于 1961 年在第 16 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意大利、日本提出的一项规定中国代表权问题需经三分之二多数票决定的提案，旨在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那以后，美国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重要问题”提案，继续阻挠联合国接纳中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发现它在联合国内为维持其“重要问题”提案而寻求支持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了。有关美国对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的态度的详细分析，参见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chapter 2。

是不会改变了，这一做法会产生两个恶劣影响：第一，它会大大损坏南越政府的利益，会使西贡的领导人觉得国际社会在推动南越中立化，会破坏美国帮助南越抵抗共产主义的努力。第二，它会使联合国有关中国代表权的讨论更复杂、更难处理，因为很多非洲国家可能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丁在发言时强调戴高乐的对华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永远地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告诉鲍尔，加拿大和中国已经建立了接触，最近加拿大通讯社和中国的新华社就要互派记者。知道美国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影响忧心忡忡，马丁说，尽管加拿大充分意识到法国的举动会对美国以至整个西方同盟阵营造成的冲击，但是，他目前没有办法表明加拿大将来对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也不知道加拿大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时最终会如何投票。马丁重申，加拿大希望和中国增加来往，因为继续无视中国的存在不是一个现实的或明智的政策。至于中法建交会对南越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马丁表示，他对目前南越政府的生存前景持悲观态度，因为南越政府没有得到南越人民的支持。鲍尔对马丁的描述非常不以为然，声称将南越中立化就相当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南越。他强调，两年前在老挝推动中立化是因为老挝的情况特殊，老挝中立化模式不适合南越。[①]

马丁的话表明，戴高乐的对华政策在加拿大很有市场，美国要继续维持其对中国“遏制加孤立”的政策，已越来越难以得到盟国的支持，加拿大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裂痕已经很大了。1964 年 9 月 14 日，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在渥太华举行的一次北约会议上指出：如果西方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的观点和看法，那么有一天中国的政策就会变得更现实一些；而“目前对中国的孤立做法只是鼓励危机不断地出现”。[②] 尽管加拿大领导人出于维护加美战略同盟的大局考虑，还不会像戴高乐那样与美国撕开脸皮，做出马上承认中国的戏剧性行动，但他们也不会刻意掩盖他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

就像加拿大官员一样，不少日本官员也对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表示不满。他们感到，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和台湾保持关系，与中国大陆隔绝，长此以往，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将下降。他们不明白美国为什么在亚洲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日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22, 1964, *FRUS, 1964-1968*, Vol. 12, Western Europ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pp. 671-675.

② John W. Holmes, “Canada and China: The Dilemma of a Middle Power,” in A. M. Halpern, ed.,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5), p. 120.

本的舆论普遍赞扬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要求日本政府也采取类似行动，顺应新潮流。1964 年 1 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说：日本人民不关心东南亚的民族解放斗争，他们倾向于认为苏联，而不是中国，是主要敌人；在法国承认北京的问题上，日本政治家和报纸认为，法国的行动开创了一个和中国接触的机会。[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布罗姆利·史密斯（Bromley Smith）在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腊斯克和大平正芳会谈情况时称："日本外相大平告诉国务卿腊斯克，在日本国内，公众强烈支持和中国大陆达成理解。"[②]

2 月 27 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Ikeda Hayato）会见美国驻日本大使瑞肖尔，讨论对华政策，并就此问题向美国提建议。池田说，"法国承认北平已经对日本公众造成很大影响，使公众对日本政府的压力增加"。他告诉瑞肖尔，中国政府的"日本通"廖承志和赵安博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向日本提议，两国扩大贸易，互派贸易代表，互相开通航线和互换记者，日本公众对这些建议反应积极。池田表示，尽管他不愿意在对华政策上和美国脱节太大，但他觉得"美国和北平增加接触是好事，并不一定有违美国意愿"。池田特别想先和中国互派记者，并希望美国也这样做。池田还对希尔斯曼"突然辞职"一事表示担忧和不解。[③] 但腊斯克对池田所提的增加美中交流的建议不为所动，他指示瑞肖尔在回复池田时，强调以下几点：美国曾向中国提出过互派记者的建议，但中国没有同意；日本在考虑是否承认中国时，应首先顾及"自由世界的利益"和防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日本应该关注自己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重要安全利益。至于希尔斯曼"辞职"的问题，腊斯克解释称，希尔斯曼的行为完全是"个人决定"，决不意味任何政策变化。[④] 此外，腊斯克还对中日贸易的迅速增长深感不安，他在多个场合对日本官员说，和中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okyo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8, 1964,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ountry File, Box 250, Lyndon Johnson Library.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mith) to President Johnson, January 28,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 6.

③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7,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7-8.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Japan, March 4,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Part 2, Japan, pp. 9-10.

国发展贸易关系不会给亚洲带来和平。①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

蒋介石十分重视与法国的关系。1963 年 4 月，他和宋美龄多次接见即将返国的法国驻台北"代办"戴国栋（Emile de Curton），表示友好之意。在一次交谈中，蒋介石先向戴国栋表达对戴高乐的敬佩，然后希望法国加强对亚洲反共盟友的支持。宋美龄则强调蒋介石和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下的盟友关系，希望以此来打动法国人。她说："今日的'中华民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为国家之自由而战。当时我们毫不保留的支持，如今也期盼能获得你们同样的支持。"②

中法准备建交的动向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台湾当局呼吁美国和其他友邦向法国做"说服"工作，强调法国的行为"不但有害于法国，而且有害于自由世界"。蒋介石于 1963 年 12 月 13 日致函戴高乐称："近数日外电频传，法国正考虑承认'共匪'，或与之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为举世所注目。我军民尤感惶惑不安，将使我士气民心受到严重打击。希能本持颠扶危、主持正义的精神，在吾人艰难困苦之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③

戴高乐决心已下，准备承认北京，没有理会蒋介石的请求。但是，与此同时，戴高乐并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和蒋介石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反法西斯盟友。考虑到这一层面的老朋友关系，戴高乐决定派两名特使去台湾，向蒋介石说明他决定承认北京的原因，以表明他没有忘记老朋友，争取蒋介石的谅解。戴高乐挑选的两个特使是曾在二战期间担任"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的贝志高将军（General

---

① Walter LaFeber, *The Clash: U.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338, 340. 关于 1960 年代初期美日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参见 Roger Buckley, *US-Japan Alliance: Diplomacy, 1945-199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5; Michael Schaller,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3-177; Hideki Kan, "Dealing with an Increasingly Strong, Confident and Nationalistic Japan," *Diplomatic History* (April 2008), p. 292。有关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发展，参阅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 年，第 6 章。

② 许文堂：《建交与断交——1964 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第 169–170 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9–370 页。

Zinovi Peshkov，又作 Pechkoff）和法国政府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纪业马上校。[①]

对于戴高乐不理会他的请求，执意准备承认北京，蒋介石十分恼怒。他在1964 年 1 月 15 日的日记中宣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

> 戴高乐承认“共匪”之政策似已决定，今日世界见利忘义，怕强弃弱，只有强权，绝无公理，更可概见。自戴出任法政以后，人以为法国反共政策将更坚定，不料时势变化皆对相反方向进行。如不有自我奋起决斗，反攻大陆，打破现状，则真将不成人类世界矣。……戴高乐派要员十九日来访，此为其“共匪”前，在形式上作其不忘旧情之行动乎。[②]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谈判中北京不坚持法国先与台湾断交为前提条件的做法，非常担心，认为这一做法将为日后别的国家承认北京制造一个很坏的先例，会助长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再联想到不久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希尔斯曼放话说要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蒋介石忧心如焚。他在 1 月 16 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法国政策的担心和对美国的不信任：

> 今日国际消息近年中最为恶劣之一次，即法国决于近期内将承认“共匪”，并以对我“中华民国”继续维持其外交关系为对“匪”条件，而“匪”且已承认其条件。……我必宣布与法绝交，或待“匪”在巴黎成立伪使馆，而我必撤退使馆。……今日美国早存有“两个中国”政策，且“匪”大使级谈判已有百余次，如其一旦“匪”与美有妥协之意与诈术例，美亦必将承认“共匪”，何况其国内左派及其政府中何斯曼等最近言行显有“两个中国”之政策，只待“共匪”放口乎。我今后外交不能不重作考虑，另谋出路矣。[③]

---

① Jean Lacouture, *De Gaulle: the Ruler, 1945-1970*,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Harvill, 1991), pp. 406-407，1943 年 6 月 3 日，戴高乐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8 月 27 日，即美国、英国等国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第二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随后，戴高乐任命贝志高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中国外交代表（大使衔）。关于贝志高在担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中国外交代表期间与蒋介石的来往，参见黄庆华：《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8 年第 3 期。

② 《蒋介石日记》，1964 年 1 月 15 日，第 70 盒 (Box)，第 13 夹 (Folder)，胡佛档案馆。

③ 《蒋介石日记》，1964 年 1 月 16 日，第 70 盒，第 13 夹，胡佛档案馆。（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的“何斯曼”即希尔斯曼。）

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中美大使级谈判持有戒心，害怕美国背着他与北京“妥协”，害怕被美国抛弃。[①]

蒋介石想和法国“断交”，但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叫他不要这样做的压力。他感到进退两难。他在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蒋经国讨论同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感到“国际形势虽甚恶劣，父子对前途皆抱乐观，且具信心也。美对我外交部照会，要求我暂不与法绝交，以观望‘共匪’行动为计”。为了说服戴高乐推迟承认北京，蒋介石盘算“以法在东亚之利害，及其个人对余之道义，使之展延时期与我布置时间”。[②]

面对即将抵台的戴高乐特使，蒋介石考虑如何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为有可能以道义和个人交情为理由，来说服法方延缓承认北京，其日记云：“法戴承认‘共匪’政策既已决定，殊无改变之望，但其既派私人代表特来面谈，此戴个性为英雄主义者，而且常认对余现在之奋斗与过去世界大战患难之交，念念不忘，惟有以此方面是否有打动其延展时间之可能发生，加以研究。”蒋介石希望他能说服法国延迟承认北京六个月，在这六个月中，东亚形势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有可能使中法建交不能实现。[③]

1月19日，戴高乐的两位特使贝志高将军和纪业马上校到达台北。他们给蒋介石带来戴高乐的亲笔信，内称：“承询外传法政府拟改变其与中国关系，兹谨以开诚与信赖精神奉告，在相当接近的将来，法国政府将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果属真确。”[④]戴高乐的信清楚地表明，法国承认北京的决定已经不会更改，而且中法建交很快就要实现。很显然，蒋介石要说服法国推迟承认北京六个月的希望已经落空。

蒋介石在接获戴高乐的信后，立刻召集“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和“外交部长”沈昌焕“商谈对法交涉之策略”。[⑤]戴高乐的信使蒋介石怒

---

① 有关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详细论述，参见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6–7章；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史蒂文·M·戈德斯坦：《聋子的对话：1955–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69–194、195–256页；Yafeng Xia,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7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③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8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0页。

⑤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19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不可遏，他的失望和愤恨的心情在他的日记中表露无遗："西方政治家或军事家皆为自大狂的一邱之鹿，所谓口上精神道义者，皆是欺诈之谈。余在上月二十四日特致其信件中，特加持颠扶危与坚持道义之精神，以为或可以私情感之，但事后此信未出时，已觉此二语对其谦卑过甚，反以为其轻视。今竟不出所料，悔之晚矣。"[①]

如何回复戴高乐是让蒋介石十分头痛的事。他又一度考虑和法国一刀两断，召回驻法"外交使节"，但美国人的压力又使他犹豫不决。1 月 20 日，蒋介石"五时起床，朝课后，……手拟复戴高乐之函件，甚费思索，如何严正斥责，使之反省？"他上午再次召集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三人，共同商讨给戴高乐的回信，决定"以严辞复之，不再加以希望，但如其果为政治家，为其国家与历史计，自当对余函件必将有考虑反省乎"。中午，他又会见贝志高，"嘱其转达戴也"。[②] 中法建交一事让蒋介石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入睡。其 1 月 21 日日记云：昨"夜间不能安眠，乃服药"。今早"六时前起床，审核中文及法文稿致戴复函，……对戴复函稿义正词严，心妥理得"。[③]

1 月 21 日，贝志高携带蒋介石致戴高乐的复信返回法国。同一天，沈昌焕奉蒋介石之命，将戴高乐来信的内容以及蒋介石致戴高乐复信的内容，转告美国"大使"赖特。蒋介石在致戴高乐的复信中，再次从道义的角度向戴高乐呼吁，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他要求戴高乐本着"对后代和历史"的"责任"，"慎重明断"地"思考"他的行动。[④] 沈昌焕对赖特说，戴高乐的来函使蒋介石坚信：既然法国很快就要承认北京，台湾就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哪怕是保留很短一段时间。赖特立刻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汇报沈昌焕的话。[⑤] 尽管沈昌焕说台湾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但蒋介石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并没有表示要与法国"断交"，很明显，蒋介石充分考虑了违背美国人的意志要付出的代价。他不得不再次忍气吞声，对法国只做道义上的劝说，只字不提"断交"。他在日记中写道："答复给戴高乐来函，严斥其承认'共匪'，其个人事业与历史，皆将因此毁灭之意，亦于当时发出，惟其结果如何，尚未可知。"同时，他也抱怨美国在中法建交问题上的压力和霸道：

① 《蒋介石日记》，1964 年 1 月 19 日，第 70 盒，第 13 夹，胡佛档案馆。

② 《蒋介石日记》，1964 年 1 月 20 日，第 70 盒，第 13 夹，胡佛档案馆。（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贝志高为"贝起科夫"。）

③ 《蒋介石日记》，1964 年 1 月 21 日，第 70 盒，第 13 夹，胡佛档案馆。

④ 《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4 年 1 月 21 日，姚百慧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9 期，第 334–335 页。

⑤ *FRUS, 1964-1968*，Vol. 30，p. 10.

“美国自私怯懦、损人利己之卑鄙言行，最为痛心也。”[1]

1月23日，台湾当局首次就中法建交表明立场。“行政院长”严家淦表示坚决反对法国政府的决定，“希望戴高乐总统慎重考虑”。当记者问台湾是否打算与法国保持类似和英国的关系，即在法国外交使节撤离台北改驻北京后，台湾仍然同法国保持“领事级外交关系”时，严家淦回答：“此为一假想的问题，本人不拟答复。”[2] 1月24日，国民党“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法国承认北京“将严重损害‘中华民国’及所有自由国家的利益。对于法国本身为害尤巨。今法国政府竟不顾一切出此下策，其对整个世界必将遗患无穷，此事所导致之一切严重后果，法国政府应负全责”。台湾当局还强调“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立场不变”。[3]

接到赖特1月21日的电报后，国务卿腊斯克对沈昌焕所说的台湾不可能在巴黎保留“大使”的话大为紧张，担心蒋介石在一气之下真的与法国“断交”。他觉得有必要再对台湾施压。这一次，他要双管齐下，在华盛顿和台北同时向蒋介石表明美国的立场。在华盛顿，他亲自出马，和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黼会面。在谈话中，腊斯克对台湾处理法国承认北京的方式表示“极度的失望和不安”，并再次指出如果台湾不和法国“断交”，那么，北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就会严重受挫。腊斯克一边说美国无意干涉台湾的政策制定，美国只是提建议；一边又明显用带着威胁的口吻对蒋廷黼说，如何处理中法建交一事，既牵涉到美国和台湾未来的关系，又牵涉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还牵涉到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因此，美国需要台湾的合作。即使挫败法国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三，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应放过。他要求台湾在“继续抗议法国的行动”的同时，还“应尽力让巴黎和北平难以实现它们的计划”。在谈话结束时，腊斯克强调，阻止法国承认北京只是“一场长期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如果法国承认了北京，“我们很可能很快将面对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确实，已有四十二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了北平，但法国是一个特例。如果水坝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洞，那么洪水就将顺着洞冲过来”。因此，“阻止巴黎和北平的行动的重要性”非常大。[4]

与此同时，腊斯克派中央情报局前驻台北站站长雷·克莱恩（Ray S. Cline）访

---

①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2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② 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09页。

③ 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09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0页。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anuary 24,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9-12.

问台湾。克莱恩与长期负责台湾情报系统的蒋经国关系密切，[①] 希望通过蒋经国这个特殊渠道，劝说蒋介石不要为了面子，匆忙同法国“断交”，好让戴高乐承担断交的道义责任。副国务卿哈里曼在给克莱恩的指令中说，如果蒋介石不宣布与法国“断交”，那么戴高乐就会非常尴尬和下不了台，那些准备效仿法国承认北京的国家，看到法国如此狼狈，就会三思而后行。[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莫（Robert W. Komer）在向约翰逊总统报告克莱恩的台湾之行时说，就像“腊斯克在和‘中华民国’大使谈话时措辞严厉一样，克莱恩接到的指令同样强硬，给他的指令包括向‘中华民国’发出的隐含的威胁，即如果‘中华民国’不听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以后就不能再和它密切合作”。[③]

克莱恩于 1 月 26 日秘密抵台，蒋经国在机场迎接。俩人随后开始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克莱恩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透露，他和蒋经国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俩人很快达成一致。蒋经国在了解了美国方面的想法后表示，尽管他知道美国的建议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看到的，但他会去说服他父亲。蒋经国随即去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汇报，然后，返回克莱恩的住处，告诉克莱恩，他父亲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同意在几个星期内不和法国“断交”。[④] 约翰逊政府绕开通常外交联络路径，使用私人外交的特殊渠道，起到在危机关键时刻及时为蒋介石降温的作用，阻止了他在中法宣布建交时立刻与法国“断交”。

1 月 27 日，克莱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他和蒋经国谈话的经过称：蒋介石已经知道了美国的立场，即当法国承认北京时，台北只向法国提出抗议并声明反对“两个中国”政策；但在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之前，台北不应同法国“断交”；如果戴高乐宣布与台湾“断交”，那么事情已无法挽回，再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如果法国的声明含糊其词，那么台北将根据美国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克莱恩还说：蒋经国向他强调反攻大陆的重要性，希望美国从台湾的角度看问题；蒋经国抱怨美国在

①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73.

② Ray S. Cline,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pp. 107-114. 此书的中译本为克莱恩著：《我所认识的蒋经国》，联合报国际新闻中心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年。

③ Memorandum from Robert W. Kome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President Johnson, January 2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2-13.

④ Cline,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pp. 107-114. 蒋介石在 1964 年 1 月 26 日的日记中记录：“经儿报告其今日接克来因来台。”《蒋介石日记》，1964 年 1 月 26 日，第 70 盒，第 13 夹，胡佛档案馆。

反攻大陆的问题上对台湾限制太多，称台湾不会“出卖大陆人民的灵魂”，如果台湾不对大陆抗争，台湾就会落入中共之手。①

1月27日也是中法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的联合公报的日子，蒋介石在得知中法联合公报后，迅速约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三人商讨“对法抗议之方式”。沈昌焕原先拟定了一份“对法严加谴责与准备绝交”的声明初稿，但蒋介石牢记美国要他对法国只抗议不绝交的劝告，“彻底改正”了沈昌焕的初稿。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他的复杂心情：他一方面责怪沈昌焕“勇有余而谋不足”，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人的压力耿耿于怀，“思之愤闷不已”。②

次日下午，蒋介石去三军联大主持中央政策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对法政策。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与会的多数成员不赞成同法国断交。精疲力竭的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小结下午会议的情况：参加会议的代表“多不主张与法绝交，且其理由充足，颇感欣慰，最后加以指示结论，心力交瘁矣”。③

台湾当局再次向法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除重复过去抗议中所使用的言辞外，对人们普遍关心的台湾将采取何种实际措施却只字未提。④ 暗地里，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在外交上变被动为主动。美国过去一直对他的反攻大陆计划泼冷水、拖后腿，现在似乎有了再次向美国人进言的机会。蒋介石思考如何用法国承认北京使中共在亚洲的影响扩大的理由，再结合南越日益恶化的局势，来说服美国在东亚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步骤。他想到几个准备向美国人提出的新方案：在亚洲建立新的反共联盟，或以台湾—美国—南越—韩国四国同盟的形式，或以台湾—南越双边联盟、台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7,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 13-15. 关于肯尼迪政府约束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的论述，参见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 (December 1985), pp. 637-660; James Fetzer, “Clinging to Containment: China Policy,” Thomas G. Pat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8-197; Timothy P. Maga,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John F. Kenned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1-1963,” Priscilla Roberts,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1), pp. 468-481;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4)；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5-267; Noam Kochavi, *A Conflict Perpetuated: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2);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29–335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7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③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8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④ 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09–310页。

湾一韩国双边联盟的形式。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透露了他的这些想法。他写道：他在回味前一天晚上蒋经国汇报的与克莱恩谈话的情形时，“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今时与其利害最关切者是越南问题，当彼进退维谷之际，提出中美越韩四国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韩各别联盟，彼或有考虑之可能乎？”中法建交后，“不仅东南亚”，而且“我自由中国与日韩皆有很快赤化之可能”，须向美国“提出警告”。①

1月30日午后，蒋介石与克莱恩以及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做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检讨中法建交对亚洲局势造成的影响，并将他建立亚洲反共同盟的想法和盘托出。蒋介石在日记中对那场谈话做了如下记录：先警告美国不要忽视由于中法建交而在亚洲出现的“反共各国之危机即将崩溃之情势”，然后提出“最低方式挽救局势，以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之三策：甲、由美领导组成中韩越四国联盟；乙、由美从中支持，组织中韩越三国联盟；丙、中韩与中越分别组成同盟，而由美国作后盾，以便海空军担任运输任务”。蒋介石特别强调：除了他建议的这些策略外，“再无维持东亚反共阵形之法，只有等待‘共匪’渗透及其自动各个崩溃，而美国决不能再在越南援越反共，必须准备撤退”。②

蒋介石的日记只记录了他和克莱恩、赖特谈话的主要精神。赖特在会谈后发给国务院的汇报中，对整个谈话经过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根据赖特的汇报，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中法建交的后果和影响表示了几个担心：一是担心对台湾军民士气的打击，二是担心共产主义影响在日本的扩大，三是担心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气焰。蒋介石强调：美国没有意识到最近东亚恶化的局势对台湾民众和军队士气的影响，中共将利用台湾低落的士气来渗透和颠覆台湾，不动一刀一枪，实现“和平解放”，使得美国第七舰队无用武之地。在谈及日本在亚洲反共联盟中的作用时，蒋介石指出：他没有将日本包括在内，是因为日本的宪法不允许；共产主义在日本的渗透已经很深了，日本已经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池田政府控制，另一部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不应该低估日本在东方的作用。话题转到东南亚，蒋介石声称：中法建交扩大了法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共产党将利用法国的影响来破坏美国的行动，最后迫使美国撤出南越，而美国从南越撤退将对美国的声望造成如此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不管美国如何保证，韩国和台湾都会对美国失去信任，士气将大跌。蒋介石还用二战后美国调停国共冲突的所谓历史教训来敦促美国在亚洲采取更积极的反共政

①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29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② 《蒋介石日记》，1964年1月30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策。他说他曾告诉美国调停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如果美国不对共产主义采取强硬的政策，大陆就会沦入共产主义之手；同样的道理今天也适用于东南亚和台湾。蒋介石还再次重申他反对“两个中国”的建议：只要不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反攻大陆就有希望，台湾军民的士气就会高昂；“如果我们三年前采取行动收复大陆，那么今天法国承认（大陆）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①]

很明显，对蒋介石来说，中法建交所造成的危机既包括危险又包含机会。一方面，法国承认北京对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带来危险，对东南亚的反共力量构成危险；另一方面，戴高乐的行动又给了蒋介石一个在美国人面前再次强调反攻大陆重要性、再次强调在东南亚（特别是南越）遏制共产主义重要性的机会。蒋介石提出的建立台湾和南越反共联盟的构想，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和南越变成一个战场，迫使美国同意在南越的剿共行动中使用他的军队，从而为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创造机会。

蒋介石有关美国在南越必须坚决遏制共产主义的言论为美国官员的越南战争升级理论提供了证据，因为他们在向美国民众解释美国为什么必须干预越南时，用的是和蒋介石一样的逻辑和说法，他们也强调共产党夺取南越会产生的连锁反应，即“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也指出美国是否在南越顶住共产主义牵涉到美国在盟国眼中的“声望”和“信誉”。也就是说，美国官员在谈到越南问题时经常挂在嘴上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不是属于空穴来风，不是一个仅仅用来掩盖美国在东南亚扩张的幌子。起码像蒋介石这样的盟友就赞同“多米诺骨牌”理论。[②]

1 月 31 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详尽解释法国这么做的原因以及中法建交的意义。他赞扬中国是一个“伟大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9,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p.19-21.（赖特致国务院电报的时间可能标错，因为他和蒋介石谈话的时间是 1 月 30 日，而不是 1 月 29 日。）

② 很多美国学者在分析美国在越南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往往批评美国决策者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该理论夸大了美国的盟国对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的恐惧和担心，结果，美国在东南亚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或“赢不了的战争”。有关这些分析的代表作有：George C.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Michael H. Hunt,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Fredrik Logevall,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David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2002)；John Prados, *Vietnam: The History of an Unwinnable War, 1945-197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法国应该“如实地承认世界”，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戴高乐还在讲话中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敬意。[①]戴高乐的讲话使蒋介石感到意外，他没有想到戴高乐在宣布承认北京时还会美言他几句，这使他那颗由于中法建交而伤痛的心得到一些安慰。其日记云：“此次法‘匪’建交声明后，不料戴高乐三十一日对记者会之谈话以完全颂扬我功业与民族精神之伟大，……次乃其与‘匪’建交对我外交上作答，……对我大有助益，不仅为光荣的失败耳。”蒋介石还记录了他对苏联在法国承认北京问题上态度的观察：“法‘匪’建交后，俄态表现虽冷静，且认此为与俄和平共处之主张相符，但其内心对‘共匪’更具戒心与敌视，无疑此于我反攻计划将更增加效用乎。”[②]很显然，蒋介石一直在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希望能够在中苏分裂中找到可以为他所用的东西。

蒋介石在《上月反省录》中，回顾了过去一个月中台湾所经历的一连串外交危机（包括由于“周鸿庆事件”而引发的台日矛盾、中法建交、美国的压力等），不禁感慨万分。他写道：

> 自去年杪日本受其日共之压迫押解周鸿庆回大陆后，我国外交至本月最为艰危，但精神振奋，努力斗争，亦已此为最极点，并未因此略抱悲观，而其间最不幸者，乃为美国之无理干涉，强制压迫，无所不至，最足痛愤，但亦因此而激起我独立自主、不屈不挠之精神，使美方有所认识也。本月可谓外交奋斗月，用心最苦，但反攻军事行动之决心亦因此而得确立，不能再有其徘徊犹豫矣。[③]

2月1日，蒋介石指示“外交部长”沈昌焕将他对戴高乐记者招待会讲话的反应转告给法国驻台北的“代办”皮埃尔·萨莱德（Pierre Salade）。蒋介石的反应包括，感谢戴高乐“对我之道义与情感一如往昔”，希望戴高乐在与北京的关系上“至此为止，不可再有进一步实现建交之行动，意在不互派使节”。[④]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法国继续忍耐，即使巴黎和北京互派使节，如法国不主动同台湾绝交，台湾也不撤退“驻法使馆”，这样，世

① 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第40页。

② 《蒋介石日记》，《上月反省录》，1964年1月31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③ 《蒋介石日记》，《上月反省录》，1964年1月31日，第70盒，第13夹，胡佛档案馆。

④ 《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1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界舆论将同情台湾。对美国的不断施压，蒋介石非常恼火，其2月7日日记云：美国视“我政府为其玩物，不仅视为幼稚无知，而已可痛。现在不必再对美作答，先问其对我与克来因所谈者是否作复，如其对我意见不予采理，而只要求我国无限期的永蒙耻辱，则我必不能对人民与国家永无交代，而国民亦对我政府决不能支持与谅解也”。[①] 第二天，他又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外交不择手段，专以利己损人，不惜牺牲盟友……之卑劣心理，令人更为痛愤，但亦可因此更增我自重永存之决心，也在国际上艰难与耻辱日增一日。在此时期中，似乎一片黑暗笼罩在我心头，但亦光明即在目前的信心更强。”[②]

2月10日，法国驻台北“代办”萨莱德口头通知台湾“外交部”：法国即将与中国政府互派代办，一旦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在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就失去存在的理由。[③]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日召开临时院会，详加讨论后，决定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由“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断交”决定，同时下令“驻法代表”高仕铭，“准备即日下旗闭馆返国”。[④]

美国“大使”赖特在得知萨莱德给台湾的通知后，紧急会见严家淦和沈昌焕，要求台湾在同美国磋商前暂不做与法国“断交”的决定，称萨莱德的通知只是口头的，台湾应该向法国索取正式书面通知。但严家淦和沈昌焕回答：萨莱德的通知“清清楚楚，明白无误”，没有必要再去向法国要书面通知。[⑤] 蒋介石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既然法国已走到这一步，他感到他已不能再按美国人的要求忍耐下去。他在日记中描述了他最后下决心与法国“断交”的理由：如果他在与法国“断交”的问题上再犹豫不决，“不仅为法国不齿”，而且将使“美国认为有‘两个中国’可能”。念及美国大使在此问题上总是“纠缠不休”，蒋介石愤愤地写道：“美国卑劣外交尤甚，”“美国此种丑态与帝国主义之欺压手段，殊为可痛可耻，更可证明，此次中法绝交，法国乃全对美国为仇所致。……我如不决心当时即与绝交，则戴对我之自尊心亦即丧失，或其反恼羞成怒，而亦蔑视我人格矣。自觉与法主动绝

① 《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7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② 《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1964年2月8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371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0,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 22.

④ 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第310页。

⑤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0,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 22.

交，不仅能系持国格，而且因之打破美国‘两个中国’之阴谋，故虽失犹荣也。”[①]

至此，腊斯克也不得不面对中法建交的现实，停止再对蒋介石的政策说三道四。他在2月12日给赖特的电报中非常无奈地说，他和赖特一样，对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与法国“断交”一事“感到遗憾”；由于蒋介石最终没能让法国承担“断交”的责任，也就“失去了获得策略手段上的最大利益”的机会。有鉴于此，再和蒋介石讨论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但腊斯克要赖特在适当场合提醒台湾方面，美国对台湾在决定与法国“断交”前没有同美国全面磋商的行为是不满的，台湾的行为将不利于美国今后在“维持‘中华民国’国际地位时做出最大的努力”。[②]

结　论

中法建交在美国构建的围堵中国的防波堤上冲开了一个缺口。美国官员非常担心法国承认北京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害怕西方盟国以及非洲的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堵住大坝上的缺口，约翰逊政府一方面敦促盟国不要步法国的后尘，另一方面，压蒋介石保持忍耐，不提出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对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负面效应还表现在它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法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但它和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却越来越意见相左，再加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另一个成员巴基斯坦也越来越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因此，到1964—1965年左右，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约翰逊政府的亚洲政策（特别是越南战争升级）制定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③]

围绕中法建交的争端充分暴露了美国与盟国（特别是加拿大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已经渐行渐远，美国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精心布置的封锁和孤立中国的国际阵线。实际上，就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继续执行原有的对华“遏制加孤立”的政策，还是采取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新步骤，意见也不一，分歧也很大，

---

① 《蒋介石日记》，1964年2月10日；《蒋介石日记》，“上月反省录”，1964年2月29日，第70盒，第14夹，胡佛档案馆。

② Telegram fromthe Department of State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12, 1964, *FRUS, 1964-1968*, Vol. 30, p. 23.

③ 有关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最初十年的评估，参见 Damien Fenton, *To Cage the Red Dragon: SEATO and the Defence of Southeast Asia, 1955-196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2).

约翰逊总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在约翰逊政府内部后来讨论对华政策时，常有官员用法国承认北京的先例来说明美国应该调整对华态度了。可以说，法国承认北京为日后尼克松政府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铺垫。

约翰逊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还清楚揭示，制造“两个中国”是美国应对政权日益稳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台湾海峡分裂现状的一个既定考虑。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核心是“两个中国”问题。白宫处理中法建交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派遣私人特使，利用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用“走后门”的方法，来接近和说服蒋介石。

蒋介石自始至终负责对中法建交危机的处理。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蒋介石日记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中法建交。他这一时期的日记表明，中法建交是萦绕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烦心事，他为此经常是朝思夜想，煞费苦心。他独断专行、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表露无遗。他不管大事和小事，一概过问，不分琐细，大到总体方针的制定和调整，小到给戴高乐复信的一字一句，都直接插手，亲自过问，亲自修改。①

蒋介石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所依靠的主要外交事务顾问是三个人：张群、严家淦和沈昌焕，他多次召集他们共同分析动态，商讨对策。他也和蒋经国一块讨论过对法政策，非常重视通过蒋经国传递的美方信息。当蒋介石不满意沈昌焕起草的文件初稿时，他会亲自动手推翻重写，他是最后决策人。蒋介石密切观察国际社会对中法建交的反应和动向，特别留意苏联的表现。

蒋介石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表明，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当他得知戴高乐准备承认北京时，他的最初反应是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反对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在美国的压力和掣肘下，他很不情愿地推迟做出与法“断交”的决定。私底下，他对美国官员的压力表示非常不满，时刻警惕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阴谋。蒋介石对中美大使级谈判也充满戒心，担心山姆大叔会抛弃他。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警告美国官员，中法建交对东南亚反共国家造成了威胁，美国必须加强在东南亚的反共部署和力度。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为后来美国决定在越南战争升级提供了依据。

① 蒋介石的这一事无巨细、大事小事一起抓的行事风格特点，也清楚地反映在 1961 年他对“外蒙入会案”（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的处理上。详见陈红民、傅敏：《1961 年蒋介石应对“外蒙入会案”决策之研究》，作者提交给《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 年 5 月 9–10 日，澳门大学）的论文。

蒋介石对美国既怨恨又离不开的矛盾心理，充分显示了他由于力量与目标差距悬殊而造成的窘境和无奈，他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手下兵不强马不壮，独处孤岛，势单力薄，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寄希望于美国这个靠山。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不喜欢美国人对他的政策指手画脚，横加干预，抱怨美国人“无理”、“自私”、“霸道”、“卑劣”、“损人利己”这类字眼时常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他厌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总是在日记中称他为“鲁丑”。多年的交往使蒋介石对美国充满了不信任和警惕性，但形势比人强，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现实还得面对。在他和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他做的妥协和让步远比美国官员做的妥协和让步要多得多，“尾巴摇动狗”（即小盟友操纵大盟友）的情况，很少发生。毕竟蒋介石手上掌握的资源以及可做的选择，比起美国人来，要少得多。陈红民和傅敏对美台同盟关系的性质作了一个形象而精辟的描述：“美台关系这出戏，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台湾的表现可以使剧情起伏曲折，却无碍结局。”[①]

蒋介石还是一个异常执著、不轻言放弃、坚持到底的领导人，只要他认准的事，他就要尽力而为，努力做下去。尽管中法建交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但蒋介石仍要和大陆抗衡，仍不放弃反攻大陆的目标。当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限制和约束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和行动时，蒋介石并不气馁，没有罢休，总是处处寻找新的机会和可能获得的其他支持。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特点充分表现在此文所叙述的两个事例中：（1）他在处理中法建交危机时提出的建立地区反共联盟的构想；（2）他希望从中苏分裂中获得可以为他所用的新的支持。

围绕中法建交而发生的美台互动充分揭示了冷战时期美台同盟关系的一个特点，即双方的关系是一种施压和抗压、限制和反限制的复杂关系。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台在是否应该坚守和包围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问题上就矛盾重重，[②] 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台关系又因华盛顿压台北从缅甸、老挝、泰国金三角撤兵而几起波折。[③] 美国官员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个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全局利益和“自由世界”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只服务于台湾国民党政权一家的地

① 陈红民和傅敏前引文，第 13 页。

② 详见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s 8-9;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 6–8 章。

③ 详见牛大勇：《60 年代初期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387–408 页；范宏伟：《缅北蒋军撤台与蒋介石“反攻大陆”：台湾与美国的分歧和妥协》，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78–85 页。

区利益。蒋介石却总是处心积虑地想操纵和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其服务于他的反攻大陆计划。

（本人为撰写此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查阅蒋介石日记时，得到林孝庭的帮助，在此致谢。本文发表在《史林》2013 年第 2 期上。）

（本人曾就此课题，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做讲座，得到参加讲座师生的有益回馈，感谢徐友珍教授安排本人在武汉大学做讲座。）

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的升级（1964—1965）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也是最具争议的战争。约翰逊总统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在美国国内民意大跌，灰头土脸。虽然美国对越南的干涉由来已久，但是是在约翰逊当政时，美国采取了将战争美国化的激烈举动。约翰逊一改其前三任总统间接卷入越南冲突的做法，转而执行大规模轰炸北越、直接出兵南越的政策，使印度支那成为20世纪60年代冷战冲突的一个焦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给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都造成巨大的创痛，在美国人中间引发一场围绕“美国应在世界上起什么作用？”问题的深刻反思。

关于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的升级问题的文献评述

西方关于越南战争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数学者认为，傲慢、偏见和无知使美国在越南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卷入越南冲突是受了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支配，美国领导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能够左右世界局势发展的能力，迷信美国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优越，过低地判断越南共产党人的决心和坚韧不拔。[1] 有少数持保守观点的学者，倾向于接受美国官方的解释，强调美国在印

---

①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Michael H. Hunt,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Loren Baritz, *Backfire: A History of How American Culture Led Us into the Vietnam War and Made Us Fight the Way We Did* (New York: 1985); David Kaiser, *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2002).

度支那并没有错误估计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美国在越南打了一场必要的、正确的战争。[①]

美国的越南战争升级与约翰逊的国内政策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约翰逊担任总统后，其主要政治抱负是实现他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改革方案，以使自己在美国政治上像因推行“新政”改革方案成功而广受好评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样名垂青史。他担心，如果越南问题处理不好，他在美国国内的领导威望和政治地位将被削弱，他的各项改革方案将受到共和党的阻挠，在国会搁浅，胎死腹中。约翰逊还清楚地记得，1949—1950 年杜鲁门总统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所受到的巨大国内压力和批评。当时，共和党出于国内党派斗争的考虑，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咎于杜鲁门对蒋介石政权支持不力，借机掀起一场“谁丢失中国？”的政策大辩论，对民主党政府大加讨伐，兴师问罪。约翰逊希望避免重蹈杜鲁门的覆辙，希望避免越南问题在美国国内再引发一场外交政策大辩论。他在越南实行战争升级，就是希望能够迅速威慑北越，稳定南越局势，熄灭共产主义叛乱，从而显示自己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强硬立场和果断决策，不使越南冲突成为一个造成国内分裂、破坏他的改革计划实施的消极因素。[②]

在讨论约翰逊的越南战争升级决策时，不少学者强调约翰逊的外交政策顾问的作用，特别是约翰逊内阁中三个鹰派官员，即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对约翰逊看法的影响。他们特别指出麦克纳马拉在越南战争升级决策中的推动作用，甚至称越南战争是“麦克纳马拉的战争”。[③] 但另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过分强调约翰逊的外交政策顾问的作用。他们认为，决定在越南

---

① Michael Lind, *Vietnam: The Necessary War: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s Most Disastrous Military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Mark Moyar，*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45-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Larry Berman, *Planning a Traged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 (New York, 1982); Robert Dallek,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David M. Barrett，*Uncertain Warriors: Lyndon Johnson and His Vietnam Adviser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3); H. R. McMaster, *Dereliction of Duty: Lyndon Johnson, Robert McNamara,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7); Thomas W. Zeiler, *Dean Rusk: Defending the American Mission Abroad*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2000); Kai Bird,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Andrew Preston, *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 the NSC, and Vietn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战争升级最后拍板的还是约翰逊总统本人，是他最终选择通过战争升级，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他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反共信誉（credibility）和领导威望，又是为了维护民主党在国内的政治信誉和民意支持，还是为了维护他本人的个人信誉和历史地位。约翰逊是一个在外交问题上有明确主见的强势总统，对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的建议，并不总是言听计从。①

在讨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为什么失败的问题时，有一批被称为是“修正派”的学者，批评约翰逊总统对战争的指挥不当。他们指出，在越南战争升级的过程中，约翰逊总统缩手缩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怕这怕那，过多地让杞人忧天的政治考虑干扰军事行动，过多地担心中国的反应，过分地限制军方在越南的行动，使军方在越南不能全力以赴，不能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不能争取主动权，来打败对手，赢得胜利。“修正派”学者认为，约翰逊总统只听取内阁中文职顾问的建议，忽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军方顾问的观点，是一个致命错误；如果约翰逊总统采纳军方顾问的建议（包括放开手脚、无束缚地轰炸北越；在北越港口布雷；封闭划分北越和南越的分界线；出兵老挝和柬埔寨，以捣毁和切断北越向南越渗透兵力和装备的隐蔽所和补给线；允许美国地面部队进攻北越等措施），美国就能迫使北越就范，同美国谈判，达成解决协议。这些学者认为，约翰逊总统不愿采纳军方的建议，是因为他过度地担心如果他按军方的意见行事，他会触发中国的介入，引起中美直接军事对抗。他们强调，北京在美国越南战争升级时向华盛顿发出的警告，都是虚张声势，咋唬一下而已，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和苏联吵得一团糟，根本无暇顾及越南，中美直接兵戎相见不会发生。②

本章叙述约翰逊政府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的决策过程，讨论影响约翰逊的越南决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分析越南战争中的中美互动，并回答越南战争“修正派”

① Larry Berman, *Lyndon Johnson's War: The Road to Stalemate in Vietnam*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Brian VanDeMark, *Into the Quagmir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eorge C.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Lloyd C. Gardner, *Pay Any Pric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Wars for Vietnam*(Chicago: Ivan R. Dee, 1997); Fredrik Logevall,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② Harry G. Summers, *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Dell, 1982); Bruce Palmer, *The 25-Year War: America's Military Role in Vietna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4); Timothy Lomperis, *The War Everyone Lost-And W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F. Krepinevich, *The Army and Vietn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有关对越南战争“修正派”的史学批评，见 Gary R. Hess, “The Unending Debate: Historians and the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 2 (Spring 1994), pp. 239-264.

对约翰逊的批评。

面对越南危局

1963 年 11 月是一个越南局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先是南越军官发动流血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袭身亡。消息传来，越南共产党上上下下，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起初，河内的越共领导人向西贡的新军人政权作出试探，寻求谈判，但西贡方面置之不理。河内随即放弃幻想，继续武装斗争路线，加强南越革命力量对西贡政权的军事骚扰。12 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九中全会，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加大北越对南越的人员和武器渗透，包括直接派出北越正规部队去南越；二是指示领导越南南方斗争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强化对西贡政权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①]

肯尼迪遇刺后，副总统约翰逊接任，成为美国总统。约翰逊入主白宫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其中，越南局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让约翰逊始料未及的是越南问题竟是日后决定他的总统任期成败的关键事件。一心扑在外交事务上并非约翰逊的初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想在国内改革方面有所建树的政治家。自 30 年代约翰逊在德克萨斯州从政开始，他的榜样就一直是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新政”改革的成功使罗斯福赢得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赞誉，约翰逊立志日后要像罗斯福那样，积极推进国内改革，在农村电气化、社会安全与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减贫等领域为美国人民造福，也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总统。约翰逊在成为总统时，对外交事务并不是毫无准备，毫无经验。他过去在国会任职时，曾在众院和参院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在担任肯尼迪的副总统时，他也经常出席内阁有关外交事物（包括越南问题）的讨论。但总的来说，约翰逊对国际问题的处理总不如对国内政策的把握那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对约翰逊而言，外交事务太复杂、太不尽人意。[②]

像他的几个前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一样，约翰逊是一个具有坚定反共信念的冷战斗士。他们都是属于“牢记慕尼黑教训”的一代美国政治

---

① William J. Duiker, *Sacred War: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p. 160-162;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3), p. 327;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 122.

② Doris Kearns,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Marilyn B.Young, *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New York: HarperPerrenial, 1991), pp. 105-106.

家，对 1930 年代西方绥靖政策怂恿希特勒侵略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立场深恶痛绝。他们深信，共产主义在南越的胜利会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共产主义在该地区其他国家接二连三地得手，因此，美国有义务、有责任援助南越的反共政权，在南越建立起阻挡共产主义扩张的防火墙和防波堤。约翰逊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强调，他不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鸵鸟政策或执行绥靖路线。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舵手，约翰逊在和共产主义对手打交道时，重视加强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威慑能力，轻视外交和谈判的作用。他担任总统后，基本上沿用了肯尼迪总统留下的外交政策班子和顾问。①

面对日益恶化的南越局势，约翰逊不得不迅速作出反应。他表示，尽管南越出现政权更迭，但美国对越南的既定方针不变，即美国寻求阻止共产主义在南越胜利。1963 年 11 月 24 日，约翰逊召开他担任总统以后的第一次有关越南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官员有：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麦克乔治·邦迪、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克科恩（John McCone）和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Jr.）。在会上，洛奇和麦克科恩先后汇报越南局势。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约翰逊批评美国在南越的表现，要求洛奇负起美国在南越的所有责任，消除在南越的美国人中间的互相指责、勾心斗角、不团结的状态，撤除任何对现行政策持异议的官员的职务。约翰逊重申：在越共的挑战面前，他不会退缩，他不会让东南亚像当年中国那样丢失给共产主义。他指示洛奇在返回西贡后告诉南越领导人：美国政府将毫不含糊地遵循对南越承担的义务。②

两天以后，11 月 26 日，约翰逊签署《第 273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 273）。该备忘录强调，美国在越南的首要任务是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帮助南越政府对

① Waldo Heinrichs, “Lyndon B. Johns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30.

②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of a Meeting, November 24, 1963, “South Vietnam Situation,” Meeting Notes File, Box 1, Johnson Librar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61-1963, Vol. 4, pp. 635-637. See also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 122; 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p.422-423；Robert Buzzanco, *Masters of War: Military Dissent and Politics in the Vietna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5. 约翰逊在自传中也描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见 Lyndon Baines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p. 43-44。

抗共产主义阴谋，阻止共产主义在南越取得胜利。[①] 根据这一备忘录精神，约翰逊于当年 12 月批准“34-A 计划”（OPLAN 34-A）。该计划属秘密行动，旨在加大对北越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对北越实施“惩罚性或损耗性”打击。计划具体内容包括：在海上和空中监视北越军事部署和调动；派遣南越军队突击组袭击北越桥梁、铁路、海岸军事设施和阵地；向北越民众投撒传单。与此同时，为了破坏河内通过老挝领土向越南南方运送人员和物资，约翰逊授权美国空军轰炸老挝巴特寮控制的地区。[②]

面对越共日益频繁的袭击，约翰逊意识到他的前任肯尼迪留下的做法（即美国在南越只维持有限的介入，仅向南越军队提供顾问和后勤支援，不派美军去南越直接参战）已经不能有效地帮助西贡政权对抗越共武装的压力。12 月 2 日，约翰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说：“南越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军事地区。”约翰逊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最优秀的士兵和军官派到南越去。[③] 他教诲手下官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每时每刻地提醒自己我们在越南是不是全力以赴地赢得胜利。[④] 约翰逊任命威廉·威斯特莫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为驻南越美国军事援助团司令（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MACV）。威斯特莫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约翰逊看中他的丰富作战经历和指挥才能。[⑤]

1964 年 3 月 16 日，麦克纳马拉为约翰逊准备了一份重新评估美国对南越政策的文件。在文件中，麦克纳马拉指出，美国在南越的中心目标是保卫南越政权的独立，不让南越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美国不要求南越成为西方的军事基地，但南越领导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有权接受外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铲除在南越嚣张的共产主义叛乱势力。如果美国不帮助南越政权扫除共产主义的威胁，那么，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能被共产主义控制，同时，共产主义对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威胁也会增大。麦克纳马拉建议美国增加对南越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⑥]

---

① *FRUS*, 1961-1963, Vol. 4, pp. 637-640.

② Buzzanco, *Masters of War*, pp. 155-156；Young, *The Vietnam Wars*, p.114；Gardner, *Pay Any Price*, pp. 112-113; Karnow, *Vietnam*, p. 364.

③ Johnson to Taylor, December 3, 1963, *FRUS*, 1961-1963, Vol. 4, p. 651.

④ Bundy to Johnson, December 5, 1963, *FRUS*, 1961-1963, Vol. 8, p. 542.

⑤ Mark Atwood Lawrence, *The Vietnam War: A Concise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5.

⑥ McNamara Memorandum to Johnson, March 16, 1964, *FRUS*, 1964-1968, Vol. 1, pp. 154-167.

6 月初，约翰逊的顾问和助手们为他准备好了轰炸北越的方案和一份要求国会批准总统对北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但出于国内政治考虑，约翰逊没有马上实施轰炸北越的计划，因为 1964 年是总统选举年，约翰逊希望以一个温和的“和平”候选人的形象参加大选，以吸引自由派和中间派选民的选票。约翰逊担心，如果在总统选举没有结束之前，他就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他可能在选民中制造分裂，可能失去很多反对扩大战争的自由派和中间派选民的选票。约翰逊的竞选对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此人以极端保守著称，在美国政坛属强硬的反共鹰派。在竞选演讲中，戈德华特声称：“为了捍卫自由，不惜采取极端措施。”另一方面，约翰逊也不愿意被人们看成是对共产主义软弱的领导人，对他而言，当年民主党总统杜鲁门因所谓“丢失中国”的争议而备受攻击和诋毁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因此，约翰逊虽然不希望以一个好战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但他同时要让选民知道：他既不会放弃美国对南越盟友的支持，也不会放松对北越的压力。①

7 月间，按照“34-A 计划”，南越突击队在美军顾问的协助下，增加了对北越海岸军事目标的袭击。7 月 30 日，南越突击队攻击北部湾的两个北越岛屿。南越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北越目标的打击，直接导致了 8 月初发生的“北部湾事件”。②

北部湾事件

南越突击队 7 月 30 日攻击北部湾北越岛屿以后的第二天，美国海军“麦道克斯号”（Maddox）驱逐舰驶进北部湾。“麦道克斯号”开进北部湾是执行美国海军于 1962 年制定的“德索托计划”（DE SOTO Operation），该计划的目的是用海军追踪和监听北越军事部署和调动，向河内炫耀美国实力。“麦道克斯号”进入北部湾后，遇到在前一天刚刚对北越岛屿实施攻击的南越突击队返航，双方互致问候。8 月 2 日，“麦道克斯号”驶近 7 月 30 日受到南越突击队袭击的北越岛屿，立刻遭遇三艘北越巡逻艇追击，北越方面以为“麦道克斯号”也参加了对其岛屿的攻击。

① Lawrence, *The Vietnam War*, p. 85. 关于戈德华特对越南的态度，详见 Barry M. Goldwater with Jack Casserly, *Goldwa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pp. 222-224; Lee Edwards, *Goldwater: Man Who Made a Revolution*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5), pp. 365-367。

② Young, *The Vietnam Wars*, pp. 114-115; Wallace J. Thies, *When Governments Collide: Coerc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Vietnam Conflict, 1964-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43-44.

在交火中，北越巡逻艇发射的鱼雷没有击中“麦道克斯号”；相反，“麦道克斯号”的优势火炮击伤北越巡逻艇。同时，配合“麦道克斯号”执行任务、在北部湾口游弋的美国海军“提孔德罗加号”（Ticongeroga）航空母舰派出飞机支援“麦道克斯号”的战斗。[①]

美国和北越的海上交火发生后，约翰逊反应强硬。他首先启动美苏热线，通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美国无意扩大冲突，但要求北越不要再在国际水域攻击美国船只。同时，约翰逊指示“麦道克斯号”驱逐舰重返北部湾，并派“特纳·乔伊号”（C. Turner Joy）驱逐舰增援“麦道克斯号”。约翰逊要求这两艘驱逐舰坚决还击任何对他们的攻击。接着，美国政府向河内发出警告：如果北越再向部署在公海上的美国舰船进行挑衅，北越要承担严重后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布置反击北越的措施：向南越和泰国增派轰炸机；命令美军进入戒备状态；派遣“星座号”（Constellation）航空母舰去南中国海，增援“提孔德罗加号”航空母舰。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沙普（Admiral Ulysses Grant Sharp，Jr.）指示“麦道克斯”和其他美国军舰驶向离北越岛屿更近的水域。同时，南越突击队也再次进入北部湾，袭击北越岛屿。[②]

8 月 4 日晚，北部湾上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麦道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两艘驱逐舰上的雷达系统接受到混乱信息，两舰的指挥官误以为又遭到北越巡逻艇袭击，下令还击。于是两艘驱逐舰上的火炮开始向伸手不见五指的四周胡乱射击。“提孔德罗加号”航空母舰派出 8 架战机，赶去支援，但飞机驾驶员看不到任何北越巡逻艇的影子。[③]

约翰逊在接到所谓北越再次攻击美国军舰的报告后，立刻下令报复北越。美国轰炸机从“提孔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北越四个巡逻艇基地和一个油库，一共击伤或击沉 25 艘北越巡逻艇，美军损失两架飞机。与此同时，约翰逊向国会两党领袖通报：美国军舰在国际水域遭到北越无端攻击。他要求国会批准他采取对北越的反击措施。8 月 5 日，国会就约翰逊提交的那份要求国会批准总统对北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到国会就“北部湾事件”作证，他说：美国军舰是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巡逻时，突

① Edwin E. Moise, *Tonkin Gulf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② Karnow, *Vietnam*, pp. 368-370; Young, *The Vietnam Wars*, p.117.

③ Karnow, *Vietnam*, pp. 370-371; Young, *The Vietnam Wars*, p.118.

然遭到北越巡逻艇的无端攻击。两天以后，众议院一致通过，参议院以绝对优势票通过（只有两名参议员反对）《北部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授权总统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击退对美国武装力量的进攻。[①]

约翰逊很得意他对“北部湾事件”的处理，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②]但是，约翰逊能让国会立刻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是因为他和他手下的官员有选择地向国会提供有关越南冲突的情报，以影响议员的看法，使他们作出有利于白宫的决定。不管是约翰逊在向国会领袖通报“北部湾事件”时，还是麦克纳马拉在国会就“北部湾事件”作证时，他们都并没有说明事件的完全真相：他们没有解释“麦道克斯号”驱逐舰最初去北部湾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没有解释“德索托计划”的来龙去脉，他们没有说明南越突击队按照“34-A 计划”对北越岛屿的袭击。结果，国会和民众得到的印象是，8 月 2 日北越巡逻艇对美国军舰的攻击完全是无端的挑衅，美国的反应完全是正当防卫。国会是在听信约翰逊和他的助手的一面之词、不了解全部事实真相的情况下通过《北部湾决议案》的。约翰逊之所以急于得到国会授权动武决议案，是因为他想避免出现当年杜鲁门打朝鲜战争时没有事先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

1964 年 11 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束，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大获全胜。踌躇满志之余，约翰逊庆幸越南危机没有成为竞选中分化选民的争议焦点。他没让戈德华特利用越南问题在竞选中得分，他在“北部湾事件”中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使得戈德华特没法批评他对共产主义示弱。大选结束，稳坐白宫宝座，约翰逊现在一心想全力以赴地实现他的“伟大社会”国内改革计划，但那个被他轻蔑地称为是“蚂蚁小国”的越南却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剪不断，理还乱”。

战争升级

1965 年 2 月 6 日，越共武装袭击南越波莱古的一个美军兵营和直升飞机机场，击毙 9 名美国士兵，击毁 5 架飞机，另有一百多名美军受伤。事件发生后，约翰逊立即下令对河内采取报复行动，轰炸北越目标。2 月 6 日，约翰逊在白宫举行的一

① “The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ugust 24, 1964), p. 268. See also Karnow, *Vietnam*, pp. 372-376; Young, *The Vietnam Wars*, pp. 118-119.

② Lawrence, *The Vietnam War*, p. 87.

次讨论轰炸北越的会议上说：胆怯只会使我们以后不得不打更多的仗。[①] 约翰逊原来准备马上实施被称作是“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的大规模和连续轰炸北越的计划，但考虑到此刻苏联总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正在河内访问，为了不使柯西金难堪，约翰逊暂缓执行“滚雷行动”。[②]

2 月下旬，驻南越美军指挥官威斯特莫兰将军要求华盛顿向南越派出海军陆战队，以保卫岘港（Danang）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他担心在美国轰炸北越目标后，越共武装会对南越的美军设施展开报复性攻击。约翰逊批准威斯特莫兰将军的请求，同意向南越派出海军陆战队。3 月初，约翰逊批准执行“滚雷行动”。3 月 8 日，两营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配合他们作战的坦克和重型火炮，在岘港登陆。美国在直接接手越南战争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美军在南越扮演的角色出现根本性变化：美军从后台正式走到前台。3 月中旬，威斯特莫兰将军再次向华盛顿要求往南越增派美军，他这次的理由是，南越军队的重建和整训进展缓慢，越共武装很可能在南越中部高原地区发起新的攻势。他要求华盛顿派给他两个师的兵力，一个师部署在中部高原地区，另一个师部署在西贡地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仅迅速批准威斯特莫兰将军的请求，还为他多拨一个师，一共向南越派遣 3 个师，供他向越共武装发动进攻性袭击。[③]

“滚雷行动”并没能阻止北越对南越的渗透，[④] 反而引起国内和国际舆论对约翰逊政府的批评和谴责。在美国国内，很多报纸，比如拥有大量读者的《纽约时报》，批评约翰逊政府在越南的行动是“劳民伤财的错误之举”。一些民主党参议员，比如弗兰克·契奇（Frank Church）、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呼吁约翰逊总统与北越对话，寻求谈判解决争端。不少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约翰逊政府轰炸北越。4 月，一万两千

---

① Memorandum of White House Meeting, February 6, 1965, *FRUS*, 1964-1968, vol. 2, pp. 158-160.

② Michael Beschloss, *Reaching for Glory: Lyndon Johnson's Secret White House Tapes, 1964-1965*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1), p. 175. 关于 1965 年 2 月柯西金对河内的访问，参见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Ree, 1996), pp. 27-31。该作者指出，莫斯科没有指使河内发动对波莱古美军基地的攻击。

③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p. 128-131; Richard Immerman, "A Time in the Tide of Men's Affairs" : Lyndon Johnson and Vietnam,"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1-62.

④ “滚雷行动”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中，美国投掷在北越的炸弹的数目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扔在欧洲的炸弹的总数。有关“滚雷行动”为何没能威吓北越停止战争的详细分析，参见 Robert A. Pape,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6。

多名学生在首都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越南战争。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求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保持克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反复斡旋，试图促成和谈。4 月初，17 个不结盟国家联合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华盛顿与河内举行无条件谈判。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敦促美国和北越尽快阐明各自的谈判立场和条件。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在访问美国时，劝说约翰逊政府停止轰炸北越，与河内谈判解决冲突。[①]

在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约翰逊不得不作出反应。4 月 7 日，他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表示美国愿意同北越举行无条件谈判。他表示，只要北越停止支持南越的反政府骚乱，不寻求推翻西贡政权，美国愿意向河内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北越发展经济，将湄公河流域建设得像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那样繁荣。[②] 约翰逊设想用美国的模式和经验改造越南，他认为自己过去在德克萨斯州从政时积累的那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经验，完全可以适用于越南。

5 月初，约翰逊政府宣布：美国停止轰炸北越五天，以观河内对美国提议的反应。实际上，约翰逊政府的“和平”举动只是为了缓解一下国内和国际的舆论压力，政府内部并没有认真准备一套详尽和周全的谈判方案。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心里很清楚，北越不会按美国的条件（即北越放弃推翻南越政权的努力）同美国谈判。对于约翰逊政府的所谓“和平橄榄枝”，河内毫无所动，反而谴责美国的“暂停轰炸”做法是一个“骗局”。[③]

约翰逊的“和平攻势”暂时缓解了舆论的批评。他借机于 5 月 4 日，向国会提出再拨款 7 亿美元的要求，用于支持政府在越南和多米尼加的军事行动。国会立即通过了拨款议案。约翰逊政府很快恢复对北越的轰炸。与此同时，威斯特莫兰将军不断要求华盛顿继续向南越派兵。6 月初，他建议政府再向南越派遣 34 个营，共计 18 万兵力，并要求美国出钱，让韩国向南越派 10 个营的士兵。7 月，约翰逊作出决定：向南越增派出 5 万美军，并同意在年底之前再向南越派遣 5 万美军。他同时授权威斯特莫兰将军：为了保卫南越政权，他可以任意使用美国士兵，采取任何

①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 134；Karnow, *Vietnam*, p. 421;Young, *The Vietnam Wars*, pp. 155-156.

② 约翰逊在霍普金斯大学讲话的全文，见 Lyndon Johnson, “Pattern for Pea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52, No. 1348 (April 26, 1965), pp. 606-610; See also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p.134;Dallek, *Flawed Giant*, p. 261。

③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pp.135-139;Dallek, *Flawed Giant*, p. 261；Karnow, *Vietnam*, pp. 421-426; Young, *The Vietnam Wars*, pp. 155-156.

独立的或是和南越军队共同的军事行动。[1] 至此，约翰逊完成了使美国完全介入越南战争的决策过程，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也是美国历史上打的最长的战争。1968年是美国卷入越战的最高峰时期，有多达53万的美军在南越作战。

约翰逊在将美国推入越南战争的过程中，重用和依赖麦克纳马拉对五角大楼庞大官僚机构的操控。麦克纳马拉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他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以擅长经营管理著称，曾亲手将福特公司从财务和销售烂摊子中起死回生，再获生机，在企业界好评如潮。他是以年轻"技术专家"的身份，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约翰逊成为总统后，继续任用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掌管五角大楼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精简机构，任用了一批和他的背景类似的所谓"技术精英"、"计算机天才"、"数据神童"的官员。他们笃信技术，一切让数据说话，希望用经营公司的那套方法和效率，来操控国防部这一庞大的政府机构。他们坚信，通过对美国优越技术的运用，他们可以找到制服越共、赢得战争胜利的办法和良策。[2]

1964—1965年间，约翰逊和他的主要外交顾问们否定了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和建议，执意采取战争升级的强硬措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冷战中作为反共阵营领袖的信誉和威望。他们所以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怀有深深的敌视和不信任，既是出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又是出于他们对历史教训（特别是老挝危机教训）的记忆。1962年达成的《日内瓦协定》宣布结束老挝内战，恢复老挝的中立国地位，但在《日内瓦协定》签署后的日子里，老挝的冲突仍持续不断。美国指责北越违反《日内瓦协定》，继续通过老挝领土，向越南南方输送人员和武器装备。国务卿腊斯克当时亲自参加日内瓦会议就老挝问题的谈判，认为北越背信弃义，无视国际法。1964—1965年间，约翰逊政府在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在越南战争升级时，腊斯克明确反对法国用南越中立化的方法来和平解决越南冲突的建议。他指出，如果中立化方案在老挝行不通，那有什么

---

①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p.134-139；Karnow, *Vietnam*, pp. 421-426; Young, *The Vietnam Wars*, pp. 155-156; H. R. McMaster, *Dereliction of Duty: Lyndon Johnson, Robert McNamara,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pp. 282-285.

② George C.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r*（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p. 28-29; Berman, *Lyndon Johnson's War*, p.11. 关于麦克纳马拉的背景和生平，参见 Deborah Shapley, *Promise and Pow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bert McNamara*（New York: Little and Brown, 1993）.（中译本见[美]德博拉·沙普利：《承诺与权利——麦克纳马拉的生活和时代》，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理由相信同样的方案在南越能够行之有效？[1]

约翰逊的战争升级决定还得到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所谓外交政策“智者”（Wise Men）的支持，外交政策“智者”是指一批曾经在前几届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退休官员。1965 年 2 月，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在白宫讨论了越南问题。约翰逊问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局势的看法，艾森豪威尔说，美国在东南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应该帮助南越政权加强自身力量，对抗北越的压力和渗透。他建议约翰逊对北越采取强硬措施：对北越不只是仅仅报复，还应加大压力，给予更有力的打击。至于美国是否应该和北越谈判，艾森豪威尔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美国应先轰炸北越，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再从强势的地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北越谈判。约翰逊问艾森豪威尔：国会通过的《北部湾决议案》是否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战争授权？艾森豪威尔做了肯定回答，说该决议案很像 1955 年台湾海峡危机时国会通过的《“福摩萨”决议案》，那个决议案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台湾。约翰逊说，他的助手们在准备《北部湾决议案》的最初草案时就是以《“福摩萨”决议案》为蓝本的。[2]

7 月 8—9 日，约翰逊邀请了 11 名外交政策“智者”就越南问题为他献计献策。这些外交政策“智者”包括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前国务院德国事务最高专员（High Commissioner for Germany）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前副国务卿罗伯特·罗维特（Robert Lovett）等人。他们都来自所谓东部“外交政策权势集团”（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在外交观念上属“大西洋派”（Atlanticists）和“欧洲第一论者”（European Firsters），他们在冷战初期都为美国遏制政策的制定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现在虽然已退休，但仍很关心外交事务，经常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发表的意见很有分量。在和约翰逊会面时，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如果让共产主义在南越得手，美国的国际信誉将大打折扣，欧洲盟国将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帮助他们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罗维特强调，美国既然已经对南越政权承担

---

① 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 424.

② VanDeMark, *Into the Quagmire*, p. 77.

了义务，就应该恪守承诺。[①] 同艾森豪威尔和外交政策“智者”们的谈话和交流更坚定了约翰逊要保卫南越政权的决心，增加他的勇气。

约翰逊政府在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在越南战争升级时，有少数官员，比如副国务卿鲍尔，持反对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鲍尔曾参加对战时盟军轰炸德国效果的评估，得知盟军的轰炸并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接下来，他又在法国驻美大使馆担任顾问，接触到法越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亲自见证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民族主义力量的顽强，亲眼目睹法国殖民主义在越南遭到的惨败。鲍尔怀疑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做法能否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他担心，就像二战时盟军对德国的大规模轰炸没能奏效一样，现在美国对北越的轰炸不但不能阻止河内继续支持越南南方的反政府斗争，不能鼓舞西贡政权的士气，反而可能促使北越向越南南方派出更多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迫使美国以牙还牙，进一步战争升级，最后引起中国甚至苏联的大规模干涉。鲍尔认为，相比欧洲，东南亚对美国安全利益是次要的，美国在东南亚的卷入会使美国无暇顾及欧洲事务。1964 年 10 月，他在一份长达 67 页的备忘录中，表达了对越战前景的担忧，指出：“我们一旦骑上老虎的背，我们就不能选择从虎背上下来的地点了。”[②]1965 年 7 月 1 日，鲍尔又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再次对越战的前景表示悲观。他表示，南越政权正输给越共武装，没有人能保证我们能打败越共或强迫他们按照我们开出的条件参加谈判，我们向南越派遣再多的外国军队，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还没有人证明白人军队能打赢一场游击战争，越南战争是一场亚洲人之间在丛林中进行的内战，越南的老百姓不会同白人军队和南越军队合作，不会向他们提供有关越共游击队的情报。[③]

鲍尔的谨慎意见并没有被约翰逊采纳。约翰逊和他的大多数顾问主张用战争升级的方法解决越南问题。他们认为，东南亚对美国安全利益已经不是次要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胜利会进一步助长共产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最终威胁欧洲的安全。至于鲍尔提到的先前法国在越南失败的前车之鉴，约翰逊和他的那些赞同战争升级的顾问们不以为然。他们强调，美国和法国不一样，法国在越南一败涂

---

① Dallek, *Flawed Giant*, pp. 272-273; Kai Bird,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p. 337-338; 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chapter 22.

② Karnow, *Vietnam*, pp.404-405.

③ Ball Memorandum, July 1, 1965, *FRUS*, 1964-1968, vol. 3, pp. 106-109. See also George W. Ball,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Memoi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82), pp. 380-385.

地，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越南也注定要失败；法国在越南做不到的事，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越南也做不到。[①] 约翰逊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内阁多次开会讨论鲍尔的意见，大家也理解鲍尔表述的担心，但内阁大多数官员更担心如果美国从南越撤军会在美国国内和在国际上产生的后果。我认为鲍尔的意见并不完全令人心服口服。我倒是更同意腊斯克的观点，他说，如果共产主义阵营知道美国在越南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那么，他们会住手吗？我觉得不会，他们会在世界各地（不光是在亚洲其他地区，还在中东、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制造麻烦。[②]

为了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涉更具备国际合法性和正义性，约翰逊政府四处游说，多方走动，竭力争取美国的盟国向南越派兵，以增加在越南战争中的“国旗数目”。但是，在同美国签有同盟条约的 40 个国家中，大多数国家不愿向南越调兵遣将，最后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少数几个国家向南越派了兵，其中韩国、泰国、菲律宾出兵南越，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换取更多的美国援助。美国的主要西欧盟国都一致反对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战争升级政策。[③] 西德总理路德维希·厄尔哈德（Ludwig Erhard）批评美国向国外输出和传播通货膨胀。法国则是公开和明确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所做所为。1966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访问柬埔寨时，在首都金边足球场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亚洲人民不会屈服于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外国的力量，不管那个外国的动机如何，也不管那个外国的武器有多先进。回到巴黎后，戴高乐又指责约翰逊政府在越南的干涉是一场大国凌辱小国的不正义的和可恶的战争。[④]

就这样，约翰逊不顾政府内像鲍尔这样的官员的异议，无视国际上像法国那样的盟国的反对，执意将美国大规模的卷进越南冲突。他是以一种居高临下和美国万

---

①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p. 125; Dallek, *Flawed Giants*, pp. 243-244.David L.Dileo, *George Ball, Vietnam, and the Rethinking of Containme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②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 147.

③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 254; Lloyd C. Gardner and Ted Gittinger,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Vietnam*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7；Robert M. Blackburn, *Mercenaries and Lyndon Johnson's "More Flags": The Hiring of Korean, Filipino, and Thai Soldiers in the Vietnam War*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4).

④ Robert D. Schulzinger, *U.S. Diplomacy since 1900*, six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42-243. 关于戴高乐对约翰逊越战政策反应的详细论述，参见 W. 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Marianna P. Sullivan, *France's Vietnam Policy: A Study in French-American Relation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8)。

能的心态面对越南局势的：对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人的坚韧不拔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决心，缺乏了解；对美国的南越盟友，盲目信任；[①] 对战争可能会出现旷日持久、僵持不下的前景，缺乏估计和心理准备。他坚信，美国可以决定越南的未来走向，可以按照美国的样板重新塑造东南亚。他在多个场合提到：他要将湄公河流域建得像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那样，为人民提供水利、发电、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②] 作为一个西方工业大国的领导人，约翰逊对越南这样一个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小国，完全缺乏研究和认识。在制定有关越南的决策时，他或是从抽象概念出发，或是按美国的经验做判断，想当然，盲目自信，一厢情愿。

越战升级中的中美互动

尽管约翰逊认为美国必须直接出兵接手越南战争，但他在实施战争升级时，并不是毫无顾忌，随心所欲，放手大打。他没有向北越正式宣战，他没有要求国会为战争增加税收，他没有征召后备役兵力。他之所以没有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他担心，如果他正式向北越宣战，将国家置于战争状态，会在国内引起越南政策大辩论，使得国会不能及时通过他的各项国内改革议案；第二，他知道，美国的欧洲盟国只希望美国在越南进行一场防御性的有限战争；[③] 第三，他害怕美国在越南的过度战争升级会触怒中国，引起中国参战，重蹈朝鲜战争覆辙。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因为无视中国对美国发出的“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一意孤行地要推翻北朝鲜金日成政权，导致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美血拼朝鲜战场。约翰逊对这一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念念不忘。[④]

1964 年 5 月 27 日，约翰逊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电话谈话。两人都害怕美国进攻北越会引起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中美对抗。罗素说，如果我们大举进军北越，中国人会介入，我们将会陷入一场比朝鲜战争规模还大、结果还糟的战争。约翰逊同意罗素的分析，指出如果美

---

① 约翰逊曾经对在南越缺乏民众支持的领导人吴庭艳赞扬有加，称他是“亚洲的温斯顿·丘吉尔”。见 Sandra C. Taylor, “Lyndon Johnson and the Vietnamese,” in David L. Anderson, ed., *Shadow i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and the Vietnam War, 1945-1975*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3), p. 116。

② Merle Miller, *Lyndon: An Oral Biograph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0), p. 465.

③ 有关美国盟国对约翰逊越南战争升级政策的详细描述，参见 Logevall, *Choosing War*.

④ 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5.

国进攻北越，把他们逼急了，中国人将干涉。约翰逊告诉罗素，内阁中有些人（比如麦克纳马拉、腊斯克、邦迪）不同意他的观点，不相信中国人会干涉。[①]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特别是害怕中美交战，约翰逊在主导越战升级的过程中，严格控制美军介入的规模和程度，亲自挑选和审定美国轰炸北越的目标，经常否定军方领导人的过激建议，不让战争扩大到越南的邻国，特别是中国。有时，出于政治因素考虑，约翰逊还会临时取消原定的轰炸目标。他在越南进行的是一场为了达到有限目标的有限战争。他的有限目标是：保卫南越政权，惩罚北越，阻止河内向越南南方输送战斗人员和军事装备。他无意摧毁越南民主共和国，更害怕和中国交战。[②]

从 1964 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对约翰逊政府扩大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毛泽东越来越关注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准备打仗。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地区，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5 月 2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指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另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③]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立即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越方“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同时，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④] 毛泽东原计划在这段时间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北部湾事件”的发生使他改变了出行计划。他在审批中国政府对美国警告的声明稿时，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

---

① Michael R. Beschloss, ed., *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196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 367.

② 关于“有限战争”思想在约翰逊越南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参见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chapter 1。

③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361 页。

④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74 页。

⑤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 1349 页。

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 月 12 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他还询问国务院的专案小组是否已经成立并开始工作？ 8 月 19 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给党中央、毛泽东写出报告。报告指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外，其余一律缩小规模，不再扩建；第一线的现有企业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搬迁；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和科研、设计机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该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报告还建议在国务院成立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同意。[①]

1965 年初，鉴于美国在越南南方不断增兵，中国加强战备工作。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将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送交毛泽东审阅。该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随时准备与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战备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注意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该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的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指示稿还对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和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要求。4 月 13 日，毛泽东在指示稿上批示："已阅，同意。"第二天，中共中央将指示发至县团级党委。[②]

---

① 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638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第 1349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59–360 页。

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战备，另一方面增加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①]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通过多种渠道和场合，向美国发出警告，表达中国对美国干涉越南的严重关切。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总统转达四点警告：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三、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②]

后来，约翰逊政府由于不满意阿尤布·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推迟了他访问美国的计划。结果，周恩来委托阿尤布·汗向美国传递的四点警告未能转达。因此，1965年6月8日，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点警告。[③]与此同时，外交部长陈毅于5月31日在北京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Donald Charles Hopson），请他向美国转达周恩来的四点警告。[④]

美方很重视中国发出的讯息。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在接到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转达的中方警告后，很快于6月5日向国务卿腊斯克作了汇报。邦迪说，中国外交部长已经向美国亮出底牌。如果美国对北越的攻击只是限于空中轰炸，而不直接打击中国，北京不会参战；如果北京一旦参战，它就会全力以赴打到底。邦迪还告诉腊斯克，他已经请英国方面转告中国：美国收到中国的信息了。[⑤]

6月26日，麦克纳马拉在一份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分析了中国和苏联可能会对美国在越南增加军事介入的反应，担心中苏在北越为扩大影响而展开的竞争会

---

①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的详细论述，参见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apter 6;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23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16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④ *FRUS*, 1964-1968, vol. 2, pp. 700-701.

⑤ *FRUS*, 1964-1968, vol. 2, p. 729；罗伯特·舒尔辛格：《约翰逊政府、中国和越南战争》，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刺激北京增加对河内的援助。麦克纳马拉指出，只要美国或南越军队不对北越发动地面进攻，只要美国或南越的飞机不轰炸和袭击中国领土，中国很可能不会派正规地面部队或飞机参战。但是，苏联扩大对北越的支持可能会促使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向北越派出地面部队，以和苏联争影响。[1]

7月22日,，约翰逊总统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讨论是否再向南越增兵10万人时，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国反应的担心。[2] 他问：如果美国再向南越派10万士兵，中国和苏联会不会介入？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Harold Johnson）将军回答：不会。约翰逊总统反驳：当年朝鲜战争时麦克阿瑟将军也认为中国不会介入朝鲜。约翰逊将军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情形和朝鲜战争时的情形不同。约翰逊总统重申，美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向越南派兵参战的可能。[3] 很明显，约翰逊总统很在意中国的态度，他用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忽视中国警告的教训，来批评陆军参谋长轻视中国的倾向。

约翰逊总统在实施“滚雷行动”时，小心挑选轰炸目标，一开始，只限于北越的南部，远离中国边境，以后逐级将轰炸目标向北部扩大。1965年4月6日，约翰逊签署命令，禁止美军攻击河内附近的米格19飞机机场，以免打死在那里工作的中国顾问和技师。[4]4月8日，几架执行轰炸北越桥梁任务的美国军机进入海南岛榆林上空，与中国海军航空兵飞机遭遇，美国飞机向中国飞机发射空对空导弹。[5] 事件中，一架美国飞机失踪。中美战机的冲突让约翰逊总统非常紧张，他一天一夜没合眼，十分关切事态的发展。他在4月8日半夜十二点零五分和次日凌晨三点五十五分，两次打电话给国防部指挥中心，询问失踪飞机的下落和飞行员的情况。[6]

---

① McNamara Memorandum to Johnson, June 26, 1965, *FRUS*, 1964-1968, vol. 3, pp. 97-104. 关于苏联对越南战争的卷入，详见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② David M. Barrett，*Uncertain Warriors: Lyndon Johnson and His Vietnam Adviser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3), p. 55; H. R. McMaster, *Dereliction of Duty: Lyndon Johnson, Robert McNamara,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p. 314.

③ Record of Meeting, July 22, 1965, *FRUS*, 1964-1968, vol. 3, p. 215；舒尔辛格：《约翰逊政府、中国和越南战争》，第151页。

④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chapter 2.

⑤ 江英：《冲突与克制：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74页。美国飞机4月8日入侵海南岛上空后的第二天，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在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将海南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兵改由空军统一指挥。周恩来审阅修改这一报告后，杨成武即呈交毛泽东。毛泽东立刻对报告作出答复：“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卷，第403页。

⑥ Beschloss, *Reaching for Glory*, pp. 274-275.

约翰逊非常害怕由于对越战升级操作不当而引起中美冲突。整个 1965 年上半年，越南这个“烫手的热山芋”让约翰逊经常寝食不安。[①]

8 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个越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加强和扩大对北越的空中和海上打击、进军老挝和柬埔寨以阻止北越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装备、用布雷的方式封锁北越主要港口海防港、在泰国增兵以阻吓中国等措施。约翰逊拒绝采纳这些建议，因为他担心这些行动会激怒中国，引起中美对抗。他还拒绝军方提出的动员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在国会通过对越宣战、置国家于战争状态、征战争税等要求，他担心这些行动会刺激中国。[②]

约翰逊总统在制定越战政策时，小心谨慎、瞻前顾后，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和言论，重视中国领导人就越南局势发出的警告。中美领导人在处理越南战争升级的危机时，表现出很多相似性。一方面，双方都坚决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双方都无意再打一次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仗。因此，双方都非常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信息和举动，都将对方的可能反应作为自己决策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结果，尽管越南战争从 1965 年初开始就不断升级，中美双方也分别向各自的越南盟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援助，但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中美直接军事交锋并没有在印度支那重演。中美两国之间在越战初期通过特殊信息传递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案例生动地表明：即使在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互相敌视的国家之间，仍然有可能通过有效沟通和对话，使得敌对双方在抵制对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在“不同对方交战”这一问题底线上达成与对方妥协的共识。而这种妥协的实现，又必定会使双方在彼此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承诺”意愿和能力的信心，从而为未来双边关系从敌对转向和解打下基础。[③]

担心扩大越南战争会导致中美直接冲突的顾虑，束缚了约翰逊总统在越南战争中的手脚。中国的警告就好像在约翰逊周围画了一个圈，将他行动限制在圈内，使他感到非常尴尬。一方面，他感到他不能坐视北越消灭南越政权，因为出现那种情况的话，美国在盟国心目中的信誉度将受到极大损害，美国的盟国将因此不再相信美国会信守对他们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约翰逊又害怕，如果他让军方放手打击北越的话，美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战争，引发中美大战。

---

① Dallek, *Flawed Giant*, p. 262.

②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chapter 2.

③ 关于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及其意义，参阅陈兼、赫斯伯格：《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595–651 页。

事后，美国军方领导人对约翰逊总统在越战中的表现非常不满。他们抱怨，美国在越南打的是一场窝囊仗，因为美国是一只手被绑在身后，只用另一只手和敌人交手，一只手打敌人的两只手，难怪打不赢。他们责怪约翰逊没有动员后备役兵力，使美军人手不够，在应对美国面临的各种全球挑战时，捉襟见肘。他们批评白宫在决定越南政策时，缩手缩脚，怕这怕那，过多地让杞人忧天的政治考虑干扰军事行动，过多地担心中国的可能反应，过分地限制军方在越南的行动，使军方在越南不能全力以赴作战，不能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不能争取主动权，来打败对手，赢得胜利。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警告纯属咋呼，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和苏联又吵得一团糟，根本无暇顾及越南；美国根本不必担心中国介入越南。[①]

虽然约翰逊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在国内大失民意，最后不得不忍痛放弃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他在指导美国干涉越南时小心谨慎不触怒中国的作法，却避免了美中之间有可能因为越南冲突而发生的一场直接军事对抗。如果约翰逊在指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时，无视历史教训，毫不顾及中国的反应，完全采纳军方的激烈建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尽管约翰逊在指导越南战争升级时，做了很多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他在处理中国的可能反应时，却表现出意外的冷静和谨慎。

历史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对他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约翰逊干涉越南的最终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展，中国是一个主要遏制对象。但约翰逊又希望避免朝鲜战争悲剧重演，害怕再和中国兵戎相见，结果，他在增加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同时，又向中国释发善意，作出妥协举动。比如，从1965年8月开始，在约翰逊的直接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初步举动：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对华言论的语气等。由于约翰逊在实施越南战争升级的措施时，非常担心与中国直接交战，所以，他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警告和信息传递的同时，又对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作些调整，以达到向中国交出底牌的目的，即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有限的，行为是有克制的；美国只是要惩罚北越，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美国不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因为误解对方意图和

① Harry G. Summers, *On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Dell, 1984); Bruce Palmer, *The 25-Year War: America's Military Role in Vietna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2).

错判形势而陷入一场直接军事冲突。[①]

结 论

总而言之，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是一场在错误观念指导下的错误战争。约翰逊和他的政府内外的顾问们大都是从西方文化和经验的角度审视越南问题，将复杂的越南问题简单化。他们或是从美国历史经验中找对付越南的办法，或是从欧洲事务角度看待越南。比如，约翰逊凭着他过去在国会与议员们打交道的经历（有时，为了使一个议案获得通过，议员之间互相拉票），错误地认为他也可以如此对付胡志明：他可以通过向胡志明提供经济援助的办法，来换取胡志明在南越问题上的让步。约翰逊政府中主张战争升级的顾问们和政府外的外交政策"智者"们，大多是欧洲事务专家和西方中心论者，对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在讨论越南问题时，主要关心的是越南会对欧洲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在制定越南战争政策和考虑政策的可能结果时，往往表现出傲慢自大和一厢情愿。他们相信，越南人应该会按照美国人的思维逻辑行事。约翰逊和他的助手在谈到越南人（不管是北越对手，还是南越盟友）时，言语中经常表现出轻藐和高人一等。他们简单化地认为：以胡志明为代表的力量只是国际共产主义势力的走卒而已，完全受苏联或中国支配。他们彻底低估了对手的强烈民族主义诉求和决心。由于美国优越论和美国例外论的作祟，华盛顿的越战政策制定者们对先前法国殖民者在越南打得头破血流的教训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对美国技术优势的迷信使他们过高估计美国的力量，过低估计越南民族主义的力量。他们坚信，美国无所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必定能使北越乖乖就范。

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战争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使美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美国国际地位和力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同西欧盟国的关系，法国公开反对约翰逊的越南政策，西欧的其他国家对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判断力产生怀疑和不信任。[②]第二，越南

---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翟强：《越南战争和约翰逊对华政策》，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7 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 12 月，第 97–116 页。又见 Michael Lumbers, *Piercing the Bamboo Curtain: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during the Johnson Yea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4。

② Frank Costigliola,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Power in Europe," in Gardner and Gittinger,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Vietnam*, pp. 143-153.

战争使苏联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借机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扩大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当约翰逊在越南战场上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时，苏联乘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军备，特别是核武器和海军。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在核力量方面落后于美国的苏联蒙受屈辱，在国际上很丢面子。自那次危机以后，苏联就一直在充实和加强自己的核武器库方面加大投入，奋力追赶美国。到 1969 年约翰逊下台时，苏联已经在陆地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上取得几乎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到 1970 年代中期，苏联在陆地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其他几种战略武器的数量上超过美国。同时，苏联乘美国泥足深陷越南之机，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四处出击，扩大影响。约翰逊刚担任总统时，曾提出一个用加强同东欧国家贸易联系的方法来分化东欧和苏联关系的计划，但是，约翰逊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后，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加强了对北越的援助和支持，引起美国国会的反弹，国会拒绝取消对东欧国家的贸易限制，使约翰逊用贸易手段离间东欧和苏联的计划胎死腹中。[①] 第三，越南战争损害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为了支付越南战争的庞大军事费用，约翰逊政府不得不采取赤字财政、大借外债等措施，引起美元大幅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结果，作为支撑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流通的美元，忽然间失去了自己的诱人光环，身价大跌。欧洲银行纷纷抛售美元，兑换黄金，造成严重的“美元危机”。[②]

1969 年 1 月 20 日，约翰逊黯然下台，挥泪告别白宫。他总统任期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导作用的终结。越南战争不仅毁了一个总统的声望，也毁了一个国家的世界领袖地位。

（本文是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中的一章，该书将由经济出版社出版。）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65-267;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406-407;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p. 254.

②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pp. 312-326, 334-337;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p. 267.

越南战争和约翰逊对华政策（1965—1966）

1965年8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作出决定，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允许美国医生、科学家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人员访问中国，从而修正了美国政府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一直执行的对华旅行禁令。约翰逊为什么做出这一政策调整？不少学者认为，约翰逊采取此举是为了缓和来自盟国以及来自国内（包括政府幕僚、国会、舆论和学术界）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①] 但"缓和压力"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约翰逊作出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决定的时间问题，因为从1963年11月约翰逊接替肯尼迪担任总统以后，他就一直面对来自国内外要求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为什么他最终在1965年下半年点头同意放宽对华旅行限制？他作出此举的时间为什么不是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

本文认为：导致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下半年放宽对华旅行限制的主要原因，

---

① Nancy Bernkopf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07; Rosem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100-103; Michael Schal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1; Guangqiu Xu, *Congres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1949-1979*, (Akron: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2007), pp. 183-184；唐小松：《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3–63页；陈长伟、王民：《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研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34–43页。

和他当时在越南奉行战争升级的政策密切相关。[①]1964 年下半年，约翰逊开始轰炸北越，以惩罚和阻止北越向南越渗透人员和武装。1965 年上半年，约翰逊又直接向南越派出军队，帮助南越政权和越共武装作战，从而将越南战争美国化。但与此同时，约翰逊又牢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因为忽视中国警告而导致中国出兵朝鲜和美军血战的教训，不希望美国这次干涉越南又一次引起一场中美直接军事对抗。所以，在这一时期，约翰逊在作越战决策时，总是在考虑他应如何打消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如何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只是为了保卫南越盟友，只是为了阻止北越推翻西贡政权，而不是要消灭作为中国盟友的北越。为了避免中国错判美国在越南的意图，约翰逊选择在 1965 年 8 月对中国作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举动。

约翰逊政府内部的对华政策辩论

1963 年 11 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成为美国总统。约翰逊基本继承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班子。在对华政策上，这些人有不同看法，可以分为“鸽派”和“鹰派”。“鸽派”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委员和国务院的一些中层官员，主张在同中国打交道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对北京采取“既遏制又接触”的措施。“鹰派”人物包括：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副国务卿（国务院第二把手）乔治·鲍尔（George Ball）等。这些人身处政府高位，对约翰逊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他们在肯尼迪政府中任职时，就曾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忧心忡忡。他们认为，中国向来无视核战争的后果，中国领导人比苏联领导人更头脑发热、更不可理喻、更冲动、更有侵略性、更有危险性、更有扩张性。他们强调，中国一直敌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一直在抨击苏联和西方搞缓和，一直在鼓动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他们拒绝对中国妥协，认为法国承认中国的作法或吸收中国进联合国的建议，都是错误的，只会助长中国的嚣张气焰，使中国领导人觉得他们很

① 麦克尔·伦伯斯 (Michael Lumbers) 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注意到约翰逊的越战政策和他的中国政策调整之间的微妙关系的人，见 Michael Lumbers, “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1965-196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6, No. 3, (Summer 2004)。但伦伯斯在论述约翰逊总统在越南战争升级时为什么如此害怕和中国交战这一问题时，主要是强调约翰逊的国内政治考虑，即约翰逊担心，如果他把越南的冲突扩大到中美战争的话，国内民众对他的越战政策的支持会大大下降。伦伯斯没有重点讨论朝鲜战争教训在约翰逊越战决策中的作用。

成功。他们主张维持对华“遏制加孤立”的政策。[①]

1963 年 12 月 16 日，对华政策“鸽派”代表、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旧金山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强调美国对中国采取“既遏制又接触”政策的必要性。他的讲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国际上，各国对希尔斯曼的演讲普遍看好；在美国国内，公众舆论对他的演讲也大多反应积极。连一些保守派和共和党的报纸杂志都加入自由派媒体的行列，正面评价希尔斯曼的观点。在美国国会，没有议员批评他的讲话。攻击他的立场的只是少数极端亲蒋组织和势力，比如“百万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和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百万人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希尔斯曼的演讲表现出“对共产主义软弱”。[②]

希尔斯曼的演讲引起中国外交部的注意，外交部 1963 年 12 月 26 日编印的《新情况》登载了“美国对华政策新诠释：对希尔斯曼 12 月 13 日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文章指出，希尔斯曼的演讲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国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这篇演说虽然调子比较和缓，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改变。希尔斯曼所说的“门户开放”是指我国改变政策而言，是以我国改变政策为前提的，是要中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希尔斯曼的演讲有一些新提法，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目前重点，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以在外围遏制中国为主。肯定中国有和平演变的可能，鼓吹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长期政策。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也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这篇演说明显地为美国对华政策作了辩解和说明。据西方透露，这篇演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集中研究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当前对华政策的蓝图。看来这篇演说中所说明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两党取得一致、各主要集团所同意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似将保持有效，不会有多大变动，另一方面也

---

① Record of Cabinet Meeting, June 18, 1965, Cabinet Papers, box 3, Johnson Library.

②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 355-357;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p. 102;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p. 99. 关于“百万人委员会”的形成和活动，详见 Stanley D. Bachrack,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毛泽东在看了外交部文章后，于 12 月 28 日作出批示："这篇分析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人民日报》于 1964 年 2 月 19 日发表题为"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国对华政策"观察家文章。①

腊斯克对希尔斯曼的演讲很生气。他坚持认为：只要中共不放弃支持革命、挑战国际社会的做法，美国就不会改变对华政策。1964 年 1 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腊斯克一度大为恼火，批评戴高乐政府的举动。② 腊斯克不满意希尔斯曼在对华政策上和自己唱反调。在得到约翰逊总统首肯后，他于 1964 年 2 月撤销了希尔斯曼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③

约翰逊在担任总统的初期，基本采纳对华政策"鹰派"的建议，对中国态度强硬，毫无松动。对待中美大使级会谈，约翰逊继续美国过去的政策，对中方举行高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没有诚意，继续在对台湾"互不使用武力"以及禁止核武器实验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使中美会谈时断时续，难有进展。④

1964 年 3 月 25 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国会率先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华政策。他作了题为"旧神话、新现实"的演讲，批评美国的东亚政策。他说，美国官员必须抛弃那些扭曲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旧神话，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东亚新现实，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长期存在下去的现实。他建议，美国应该在对华关系中加入灵活的成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竞争共存"的关系，为"将来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打开大门"。他指出，如果中国领导人保证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应该考虑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富布赖特的讲话在公众中引起积极反响，他收到约一千两百封信，

---

① 毛泽东：《对希尔斯曼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的批语》，1963 年 12 月 2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467–469 页。

②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102; Robert Gar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9: A Troubled Affair*,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9.

③ Thomas J. Schoenbaum,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p. 415-416.

④ 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详细论述，参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夏亚峰：《重评 1961–1968 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4 期，第 174–201 页；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141–166 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449 页。

其中三分之二支持他的观点。《纽约时报》指出，富布赖特的讲话代表了对华政策大讨论的开始。而国会一些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比如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约翰·托尔（John Tower），指责富布赖特搞绥靖政策。台湾的蒋介石抨击富布赖特的言论只会鼓励北京更加“仇视和侮辱”美国。[①]

约翰逊总统对富布赖特的演讲，不为所动。1964 年 4 月 20 日，约翰逊在纽约一个新闻界午餐会上说：只要中国搞侵略，只要中国鼓吹暴力，美国就不会和中国改善关系，不是美国应该改变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而是中国应该改变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②]1964 年 9 月，国务院给所有驻非共产党国家的大使，指示他们向他们所驻在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孤立中国，要求那些正在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国家，不要改变政策，不要去承认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亚洲、非洲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煽动暴乱和侵略。[③]

1964 年 11 月，属于对华政策“鸽派”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斯建议约翰逊总统在联合国采取“两个中国”政策，史蒂文斯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美国在联合国可能遇到的外交失败，同时可以通过国际社会来约束中国。但是，国务卿腊斯克不同意史蒂文斯的建议，认为：此建议的风险太大，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太多，比如，会对台湾打击太大，会削弱台湾在外交上抗衡中国的地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比如韩国、南越、泰国，产生不良影响，可能迫使他们改变对华政策，对中国让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同意腊斯克的观点。最后，约翰逊总统采纳腊斯克的建议，否定史蒂文斯的建议。[④]

1965 年上半年，约翰逊和腊斯克继续采取对华强硬态度，拒绝一些国会议员要求松动对华政策的呼吁。3 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远东事务小组负责人克莱蒙特·扎布洛基（Clement J. Zablocki）举行听证会，讨论中苏冲突，腊斯克以及学术界的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在听证会上发言。听证会结束后，扎布洛基代表的远东事务小组建议美国通过和中国开展学者、记者交流的方式，来和中国建立有限的、

---

① Randall Bennett Woods, *Fulbright: A B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36-337;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p. 100; Xu, *Congres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pp. 181-183.

②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Lyndon B. Johnson, 1963-64*,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 Vol. 1, p. 499.

③ State Department to Certain Embassies, September 5, 196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 85.

④ Record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November 18, 196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p. 126-127.

但是直接的接触。[①]

6月16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建议美国放宽去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学者和研究生访问中国。[②]约翰逊和腊斯克都反对放宽旅行限制。在6月18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腊斯克表示，美国不管是对中国让步，还是承认中国，都不会使中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③]约翰逊在6月29日的一次午餐会上说：现在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明智的。[④]

1965年下半年，约翰逊总统的对华强硬态度有所松动。8月10日，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医生保罗·怀特（Paul Dudley White）致信约翰逊，表示他和一些中国医生有私人联系，愿意访问中国，通过他和中国医生的私人联系，来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约翰逊立刻批准了他访问中国的请求。[⑤]约翰逊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这时也放弃了坚决反对美国公民访问中国的强硬立场，他对约翰逊说：在我们的越南政策已经基本明确和成型以后，采取诸如放宽对华旅行限制这类措施，有助于缓解国内舆论对政府对华关系僵硬的批评。[⑥]腊斯克一开始还不愿意放宽对华旅行限制，但因为总统已经做了决定，最后也不得不同意，12月29日，允许美国医生访华的措施正式生效。

美国对华旅行新措施出台后，美国官员密切关注北京的反应。但中国政府态度依然强硬。《人民日报》于1966年元旦发表评论，指出约翰逊政府为公共卫生和医务人员颁发赴华旅行护照是"反革命的两手政策"，是想通过此举散布"和平"烟幕，以掩盖其扩大战争的目的。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在研究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后指出，该报代表了中国政府的如下立场：如果美国仍然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如果美国拒绝从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撤军，中美之间就不可能举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或其他任何关于两国交换专业人员的谈判。[⑦]

---

①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p. 100; Xu, *Congres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pp. 183-184.

② William Bundy to Rusk, June 16, 19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 175.

③ Record of Cabinet Meeting, June 18, 1965, Cabinet Papers, box 3, Johnson Library.

④ McGeorge Bundy to Johnson, August 24, 19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4, Johnson Library. 邦迪在文中提到约翰逊在6月29日午餐会上等讲话。

⑤ White to Johnson, August 10, 1965，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4, Johnson Library; Foot, *The Practice of Power*, p. 99.

⑥ McGeorge Bundy to Johnson, August 24, 19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4, Johnson Library.

⑦ 陈长伟、王民：《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研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讨论》，第39页。

越战升级和对华政策调整

约翰逊选择在1965年下半年放宽对华旅行限制，此举主要受他当时越南政策的影响。1965年上半年，约翰逊在出兵南越、迈出越战升级的重要一步后，十分担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会触怒中国，引起中国参战，重蹈朝鲜战争覆辙。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因为无视中国对美国发出的“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一意孤行地要推翻北朝鲜金日成政权，导致中国入朝参战，中美在朝鲜战场兵戎相见。约翰逊对这一历史教训，牢记不忘，念念在兹。[①] 所以，他在指导越战升级时，严格掌控制美军介入的规模和范围，经常推翻军方领导人的过激建议，不让战争扩大到中国。他不愿在越南打一场无限战争，他在印度支那谋求达到的有限目标是：破坏河内向越南南方输送战斗人员和军事装备的行动，阻止北越推翻南越政权。他无意消灭越南民主共和国，更无意和中国交战。[②]

1965年上半年，面对约翰逊政府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不断升级，中国领导人表示极大的关切和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战备，比如落实“三线”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③] 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多种渠道、在多种场合，向美国领导人发出警告，表达中国的关切和决心。

为了避免刺激中国，避免中美关系中再添加新的紧张因素，并表示美国有意改善中美关系，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下半年和1966年，作了好几个姿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

第一，拒绝台湾方面提出的反攻大陆的要求。台湾当局希望利用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的机会，进攻大陆东南沿海地区。1965年9月，台湾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访美，要求美国支持台湾的反攻大陆计划。蒋经国告诉美国官员：目前中国大陆内部

---

①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5.

② 关于“有限战争”思想在约翰逊政府越南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参见 George C. Herring, *LBJ and Vietn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chapter 1。

③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的详细论述，参见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chapter 6;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江英:《越南战争与中国对美政策》，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99–137页；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

虚弱，民心涣散，是进攻东南沿海地区的最佳时机，台湾并不需要美国大规模介入，只需要美国提供空中和海上掩护。但美方对蒋经国的建议不看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蒋经国的建议使他想起几年前古巴猪湾事件的惨痛教训；眼下还没有证据表明，台湾攻打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会引发大陆人民起而反抗政府。[①]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也对蒋经国的建议很冷淡，认为此建议从军事角度上看，也是行不通的。[②] 蒋经国在华盛顿碰了一鼻子灰，扫兴而归。1966 年 1 月 25 日，美国驻台湾“大使馆”报告：国民党领导人对美国的消极态度，非常失望和沮丧。[③] 3 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作出联合决定，取消对台湾的“军援项目拨款”(Military Aid Program funding)，原因是美国对台湾的义务完全是防御性的，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不能被用于进攻大陆的目的，而台湾目前的军队数量和规模，就对付大陆的威胁而言，已经是过于庞大了，美国不准备继续为台湾军队的现代化买单。[④]

第二，1965 年 10 月，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个扩大对中国的广播战计划：在目前由美国新闻署开展的对华广播的基础上，由中央情报局再开设一个对华广播，以扩大对华心理战的规模。但美国国务院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这个计划，赖斯和汤姆逊都认为：该计划只会激怒中国领导人，不利于美国希望在越南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目标。由于国务院的强烈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没有被采纳，约翰逊政府维持由新闻署开展的对华广播的现存状况。[⑤]

第三，在 1966 年上半年，约翰逊政府的高官，包括约翰逊总统以及他身边几个在对华政策上持“鹰派”观点的顾问，在谈及中国时调子都有所变化。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往往对华言辞激烈，总是强调中国对东南亚的威胁，总是声称美国将不遗余力地遏制中国的扩张，但现在他们却开始强调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无意推翻北越政权，无意进攻中国。1966 年 2 月 23 日，约翰逊总统在纽约“自由之家”的餐会上说，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行动。他强

① Record of Meeting，September 22, 19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p. 211-213.

②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McNamara, November 16, 19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p. 224-225.

③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January 25, 196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p. 242-245.

④ Joint Message of State and Defense Departments on Revision of the Military Aid Program Guideline, March 9, 196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p. 266-269.

⑤ Rice to Rostow, April 15, 1966,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240, Johnson Library; Thomson to Rostow, May 3, 1966,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18, Johnson Library.

调：美国没有威胁任何国家，无意推翻任何政府，美国的目标完全是防御性的，完全是防御侵略。①

对华态度一贯死硬的国务卿腊斯克也开始转变语气。1966 年 3 月 16 日，他对国会众议院远东和太平洋小组委员会说：我们不能总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也不能总是认为中美之间的敌视是永远不会结束、永远不可避免的。他建议对中国采取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在遏制中国的扩张倾向的同时，通过非官方接触，来逐渐改变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在解释对华接触的问题时，腊斯克指出：美国可以做以下几件事，（1）向中国表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2）扩大与中国的非官方交流；（3）继续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4）和中国官员就裁军和不扩散问题开展对话。他认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会放弃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对世界采取一个比较务实的政策，美国愿意和这样一个务实的、负责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建立友好关系。② 5 月 14 日，他向约翰逊总统建议，美国应考虑采取“两个中国”政策，美国应注重如何保住“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不是强调如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外。③

1966 年 5 月 18 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当代世界安全”的演讲。他一反自己过去作为反共鹰派的形象，在演讲中淡化武力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强调通过经济援助的方法来帮助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他还特别对共产主义国家伸出橄榄枝，呼吁美国同苏联、中国“搭桥”，以最终发展共同利益。对于中国，他建议美国采取具体行动，比如贸易、外交接触、甚至军事观察员交换等方法，来增加中美之间的沟通，消除彼此的误解。④

第四，美国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外使馆和外交官：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采取主动接触的态度。在 1965 年 12 月 15 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中，美方首席代表约翰·格罗诺斯基（John Gronouski）主动提出：美国愿意单方面欢迎中国记者访问美国，而不同时要求北京允许美国记者访问中国。格罗诺斯基的表态改变了美国

---

①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rch 14, 1966, p. 393.

②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y 2, 1966, pp. 686-695; Rusk, *As I Saw it*, p. 289.

③ Rusk to Johnson, May 14, 196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 30, pp. 301-302.

④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ne 6, 1966, pp. 880-881; Deborah Shapley, *Promise and Pow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bert McNamara*, (New York: Little and Brown, 1993), pp. 381–384. (中译本见 [美] 德博拉·沙普利:《承诺与权利——麦克纳马拉的生活和时代》，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过去在记者访问的问题上一直坚持的对等原则。[①] 次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②] 在当月举行的第 129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是前边 128 次谈判当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格罗诺斯基的做法是美国走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暗示。[③]

1966 年 9 月，美国国务院首次允许美国驻外使节在合适的社交场合，同中国外交官建立非正式接触，只要这种接触不会给外界留下美国已改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就行。国务院希望，通过增加和中国的接触，美国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并改变中国官员对美国的刻板印象。[④]

令人遗憾的是，约翰逊政府的这些向中国释发善意的举动和试探，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中美关系僵局依旧继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正进入了一场国内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当年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国权后来回忆：在他把美方在大使级会谈中首次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情况报告给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他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进一步调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许不会拖到 5 年之后的 1972 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可能会出现。”[⑤]

结　论

本文揭示了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升级决策和他的对华政策调整之间的令人意外的联系，说明了 1965 年 8 月约翰逊批准放宽对华旅行限制的越南战争背景，指出了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和重视在约翰逊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约翰逊是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最后拍板人。

从肯尼迪当政开始，美国政界中就一直有人呼吁白宫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改变对中国的“遏制加孤立”的做法，采取“既遏制又接触”的新立场，这些人中有行

① Kenneth T.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1968), pp. 278-279.

② State Department to Warsaw, March 10, 1966, National Security File, box, 202, Johnson Library.

③ 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第 154–155 页。

④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cheaper 7, pp. 49-50, box3, Johnson Library.

⑤ 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第 154–155 页。

政部门官员，有国会议员。与此同时，主张维持对华“遏制加孤立”高压政策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从1963年11月接替肯尼迪担任总统开始，到1965年8月，约翰逊总统一直拒绝采纳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建议，不愿改变现行的“遏制加孤立”的政策。1965年8月，约翰逊最终改变态度，同意有限度地解除对华旅行限制。导致约翰逊转变立场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越南战争政策：由于约翰逊在实施越南战争升级的措施时，非常担心与中国直接交战，所以，他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警告和信息传递的同时，又对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作些调整，以达到向中国交出底牌的目的，即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有限的，行为是有克制的；美国只是要惩罚北越，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美国不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因为误解对方意图和错判形势而陷入一场直接军事冲突。

有不少学者认为，约翰逊总统对越南的大规模干涉使他不可能考虑改变对华政策，因为遏制中国是约翰逊越南战争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指出，在北京向河内提供军事援助并压北越不和美国谈判解决冲突的情况下，约翰逊如果作出任何向中国妥协的举动，比如解除贸易禁运，都会使他的外交政策变得自相矛盾。[①] 但历史的结局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约翰逊在越南的干涉对他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约翰逊出兵越南的目的是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但朝鲜战争的梦魇在约翰逊的脑中又挥之不去，他害怕再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结果，他在增兵越南的同时，又向中国作出善意的举动。同时，约翰逊对越南的干涉使他在考虑松动对华政策时，减少了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即他不用再怕保守派批评他对共产主义软弱，因为他已经在越南显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强硬态度。

从1965年8月开始，在约翰逊总统的直接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初步举动，比如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对华言论的语气等。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带来中美关系的解冻，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回应。正如中国学者陈长伟和王民所说：中美关系没有出现突破，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际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使中美双方能够求同存异、进行冷静谈判的程度。中国坚决拒绝美国绕过台湾问

---

① Tucker,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p. 99; Kaufman, *Confronting Communism*.p.183.

题伸出的橄榄枝”。[1] 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极端狂热之中，中苏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边境冲突的地步，中国仍然视美国为一个主要敌人，促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中国外交战略的客观形势尚未形成。

虽然约翰逊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在国内大失民意，不得不忍痛放弃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他在指导美国干涉越南时小心谨慎不触怒中国的作法，却避免了美中之间有可能因为越南冲突而发生的一场直接军事对抗。如果约翰逊在指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时，无视历史教训，毫不顾及中国的反应，完全采纳军方的激烈建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尽管中美关系在约翰逊执政时期没有得到改善，但他为解冻中美关系而作的那些初步的破冰尝试，却为后来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取得突破作了准备和铺垫。

（本文最先提交给2008年4月14—15日在澳门大学举行的“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对华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后发表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7辑。感谢澳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郝雨凡教授和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魏楚雄教授邀请我参加会议。本文在收入此论文集时有删减。）

① 陈长伟、王民：《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研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讨论》，第41页。

周恩来和万隆会议

1955 年举行的万隆会议是发生在 20 世纪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①]，有 29 个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出席。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备受瞩目。在会议期间，周恩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努力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惧，使很多亚非国家人士对新中国外交刮目相看，印象深刻。

1950 年代中期（1953—1955 年）是中国外交较为成功的时期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风格的时期之一。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在中印两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开始之时，向印度代表团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次完整表述。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周恩来恪守这些原则，积极推动中国的和平外交攻势，寻求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他代表中国参加了两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即日内瓦会议（1954 年）和万隆会议（1955 年），使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多边外交中崭露头角，独树一帜。他在制定和执行中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利

① 有关万隆会议的背景和历史意义的论述，参见 Christopher J. Lee, ed., *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 The Bandung Moment and Its Political Alternativ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Jason Parker, “Cold War II: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Reperiodization of the Postwar Era,” *Diplomatic History*, (November 2006), pp. 867-892; Jamie Mackie, *Bandung 1955: Non-Alignment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5)。

用新近公布的中国外交档案，探讨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外交活动和实践，揭示他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独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由来已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初见端倪。作为中共党内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为中共的初期外交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通过他的外交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1944 年夏，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周恩来将对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接待工作看作是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这份为中共外交政策奠定基本立场的早期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周恩来日后进一步完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思想。周恩来在文件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的到来“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涉及中共外交的基本原则时，周恩来强调，共产党人从事外交活动“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要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树立“中国的新人典型”；必须警惕近百年中国外交史“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②]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共识。毛泽东在建国前夕也多次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某些提法。比如，1949 年 4 月 30 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

---

①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兴趣在明显增加，参见 Sophie Richardson,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越来越关注如何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寻找可以指导今天中国外交政策的观念和原则。比如，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作者提交给《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 年 5 月 9–10 日，澳门大学）的论文；阎学通：《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7 年第 1 期；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ited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有关对阎学通观点的评论，见 Allen Carlson, “Moving Beyond Sovereignty? 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Recent Changes in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ianxia* Concep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anuary 2011), pp. 89-102。

②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 年 8 月 1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314–31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580–581 页。

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不久，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一次重申“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①]

1953年12月，在中国和印度就中国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恩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政府的主张向印度提出，很快得到印度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两国于1954年4月，正式将这些原则写进双方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②] 同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和缅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被写入中印和中缅两个联合公报中。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进一步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他指出，中印两国所确定的五项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能适用”。“如果这些原则在亚洲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了，那么，战争的危险便会减少，亚洲国家合作的可能便会扩大”。[③]

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充分认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8月24日他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④]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在和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会谈时又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⑤] 毛泽东的话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人中间的共识。

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在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赞扬的同时，却引起一些美国官员的担心，他们害怕美国在和中国争夺亚洲民心的竞争中败下阵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4年，第1461、1473页。赵春生：《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39页。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08–109页；倪立羽：《略论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92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⑤ 同上，第165页。

来。1954年6月2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政策设计顾问查尔顿·奥哥本（Charlton Ogburn）在评论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时，批评该委员会在评估国家安全政策时忽略对中国和平外交攻势的关注。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在争取亚洲民意和舆论同情的竞赛中已经跑在美国前面，中国对美国在亚洲地位和威望的挑战，不是来自直接的军事进攻和渗透，而是来自文化上的吸引力。中国正在通过其改变贫穷、实现国家统一和提高国际声望的努力，在亚洲国家赢得崇敬和支持。奥哥本认为，二战以后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包括在援助方面重欧轻亚、在印度尼西亚独立问题上态度含糊不清、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没有平等对待亚洲人，使美国作为平等、自由和反帝的领头国家的形象大打折扣。[①]

英国官员也对美国政府在处理亚洲事务时过分强调武力威慑和军事干涉的做法表示不满和担忧。1954年8月8日，英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高级专员（the British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South East Asia）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在一份讨论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备忘录中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亚洲实行的大棒政策使美国在亚洲的朋友越来越少，招来的批评却越来越多，美国在亚洲的威信正急剧下滑，除了得到几个在亚洲影响力有限的盟友（泰国和台湾）的支持外，美国在亚洲实际上是很孤立的。[②]

中国对亚非会议的重视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缅甸和巴基斯坦的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讨论召开一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中国立即表示支持。同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中国赞同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③]12月1日，毛泽东向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U Nu）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

① Memorandum drafted by Charlton Ogburn, June 23, 1954, "NSC (January-June, 1954)" Folder, Box 11, Records of the Far Eastern Bureau,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② Memorandum o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Colombo Powers, August 8, 1954, D1015/5, FO371/111852,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 London.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37–238页。

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①]

12 月 28 日，科伦坡五国在印尼素有“雨城”之称的茂物开会，商讨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问题。在会议期间，围绕是否邀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问题，五国领导人意见不一。缅甸总理吴努首先提出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印度总理和印度尼西亚总理支持这一倡议，[②]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和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Sir John Kotelawala）却对中国偏见很深，疑虑重重，反对邀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有鉴于此，吴努明确表明，如果不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他就将退出科伦坡五国会议；如果不邀请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他本人就不去万隆。[③]最后，他的建议获得通过。[④]

科伦坡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上宣布，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将于 1955 年 4 月 18 日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促进亚非各国的亲善与合作，商讨与会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问题，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评估亚非国家和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⑤]同月，1955 年 1 月 15 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致电周恩来，代表五个发起国政府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83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38 页。

② Qing Simei,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1.

③ Kweku Ampiah, “Japan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 Cat Goes to the Mice’s Convention,” *Japan Forum* Vol. 7, No. 1 (Spring 1995), p. 19; Qing Simei,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71；U Nu, *U Nu: Saturday’s Son*, translated by U Law Yone, edited by U Kyaw W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46；Maung Aung Myoe, *In the Name of Pauk-Phaw, 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p. 27. 吴努在这一时期 (1954–1955) 的外交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化解中美冲突，以推动亚洲地区的和平发展。他在公开演讲中以及在和中美领导人的会谈中，都呼吁中美两国能够捐弃前嫌，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携手合作，共同努力。William C. Johnstone, *Burma’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93-94.

④ 关于尼赫鲁对中国的态度，见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1947-19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Mira Sinha, “China: Making and Unmaking of Nehru’s Foreign Policy,” *China Report*, Vol. 15, No. 2 (March-April 1979), pp. 51-64; Mridula Mukherjee, “Situating India in Asia: The Nehru Years,” in Uyama Tomohiko, ed., *Empire and After: Essays in Comparative Imperial and Decolonization Studies* (Hokkaido: The University of Hokkaid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12), pp. 117-128。关于印度为什么在冷战中奉行不结盟政策，有的学者强调印度的理想主义影响，特别是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作用。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印度领导人的现实主义考虑更说明问题，对印度而言，不结盟立场是经济和军事落后的国家在冷战的两极世界中求生存的有效方法。

⑤ 关于印度尼西亚中立政策的起源和演变，参见 Samuel E. Crowl, “Indonesia’s Diplomatic Revolution: Lining Up for Non-Alignment, 1945-1955,”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38-257。

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亚非会议。次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准备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报请周恩来批准。该草案指出，亚非会议的召开“具有历史性意义。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好，有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势必对会议产生重大作用。茂物会议协商定出席这次会议者，共计三十个国家。有兄弟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和平中立’国家，也有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其中情况是很复杂的。因此我国必须采取主动而慎重的态度，以便使会议发挥积极作用。在会议过程中，我国应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势力，大力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并设法分化追随美国对我敌视的国家。亚非会议，就和缓亚洲局势来看，是日内瓦会议的继续发展。但亚非会议的内容与日内瓦会议内容毕竟不同。估计亚非会议会场上的发言和辩论不会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纠缠，但会场外协商和会外活动一定更加频繁。因此，我代表团必须配备足够的活动力量”。周恩来批准了这份草案。[①]

1955 年 1 月 22 日，周恩来向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表示，中国感谢五个科伦坡会议国家为筹备亚非会议而作的努力。[②] 2 月 10 日，周恩来复电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表示：中国政府赞同亚非会议的目的，对于能够有机会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这些目的而努力，感到荣幸。中国政府决定应邀派代表团出席会议。[③]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亚非会议，把会议看作是争取中立国家的一个好机会。1955 年 3 月 22 日，刘少奇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国际形势报告时，特别强调争取中立国家的意义和重要性。他指出：“对于中立国的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对于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妨碍美国的战争活动，动摇美国的某些同盟国和仆从国，特别是扩大和平区域和抵制美国组织侵略性军事集团的阴谋，中立国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重视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各国独立的国际会议。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这个会议对于促进亚非各国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亚非地区扩大和平势力，争取更多的亚非国家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对这次会议感到十分恐慌并

---

① 外交部亚洲司：《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1955 年 1 月 15 日，转引自张伟：《从解密档案看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准备》，《百年潮》，2005 年第 5 期。

② 《周恩来与莫诺努图谈话记要（节选）》，1955 年 1 月 22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1955 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14–16 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38 页。

力图从会外会内进行破坏的缘故。”[①]

毛泽东非常重视万隆会议，4 月 5 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的方案。[②] 这一方案指出，亚非会议是首次没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在回顾了近期的国际形势以后，方案指出，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各地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并企图通过它在亚非会议中的仆从国来破坏会议，而大多数亚非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独立、发展经济的愿望。有鉴于此，方案建议，中国参加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方案特别强调：“友好合作应该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为基础。争取使五项原则为亚非地区的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扩大和平地区，建立集体和平，并力求亚非会议能发表一个和平公约或维护世界和平的宣言。”[③] 中国政府组成由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

周恩来在万隆的表现

4 月 17 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他在机场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抱着对于和平与友好的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针对美国对会议的敌视，周恩来说：“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④]

在 4 月 18—19 日大会一般性发言中，一些亲西方国家（伊拉克、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抨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说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对邻国构成“威胁”。他们的讲话使大会的气

① 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 年 3 月 22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29 页。

②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109 页。

③ 《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节选）》，1955 年 4 月 5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1955 年亚非会议》，第 41–44 页。

④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41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104 页。

氛骤然紧张，很多代表担心会议将因此爆发激烈的争吵。中国如何反应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

为了使会议能够顺利进行，周恩来对他的发言作了调整，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同时针对会议出现的情况临时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在4月19日下午的大会上即席发言。在书面散发给各国代表团的发言稿中，周恩来在阐明亚非国家大都具有共同经历、遭遇和历史任务后指出："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关系。"" 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①]

周恩来在即席补充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忌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　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然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回答和解释了亚非各国中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后，周恩来指出："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②]

周恩来的即席讲话受到很多与会代表的欢迎和好评。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就连一些曾经对中国抱有很深偏见的领导人也赞扬周恩来的发言。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周恩来作了一个"很和解的演说"。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表示：周恩来的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5–46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05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42页；冀朝铸：《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苏为群采访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冀朝铸作为英文打字员参加中国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66–4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05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43–245页。

言“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①] 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卡代·敦·萨索里特（Katay Don Sasorith）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表现的道德精神完全符合佛教的教义。[②] 很显然，周恩来的补充发言打消了不少一开始对中国怀有戒心的代表们的恐惧和疑虑，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使会议能够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

从 4 月 20 日开始，会议分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进行小组讨论。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在讨论中虽然也有不同观点和争论，但经过协商和沟通比较顺利地取得一致，达成协议。在政治委员会的讨论中，争论激烈，气氛非常不和谐。在讨论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决议及宣言的过程中，缅甸总理吴努建议与会各国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来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但黎巴嫩代表反对“和平共处”一词，称它是共产党的术语。埃及总理加麦尔·纳赛尔（Gamel Nasser）提出七点建议，强调和平取决于大国共处，主张全面裁军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而伊拉克、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代表强调集团自卫，说他们是小国，必须依靠大国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为参加军事集团找借口。与会代表一度分裂成两派。一派力挺印度奉行的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拥护和平共处。另一派要求与西方结盟，主张集体防卫，呼吁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他们还提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称苏联的政策是“新殖民主义”。不同的看法针锋相对，使会议公报起草委员会无法取得一致，不能达成共识，会议陷入僵局。[③]

面对会议几乎瘫痪的情况，周恩来顾全大局，审时度势，本着求同存异和增进合作的精神，表达中国促团结求和平的基本态度。他在 23 日的讲话中说：“我们彼此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过去、现在由于参加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正在讨论的问题。”针对黎巴嫩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前言中有‘和平相处’

---

①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年，第 18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45 页；李连庆：《论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编：《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613 页；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97–198 页。

② Mackie, *Bandung 1955: Non-Alignment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p. 23.

③ 蔡佳禾：《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1954–1957 年）》，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4 页。针对锡兰总理批评苏联在东欧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言论，尼赫鲁反驳说，东欧国家都是得到联合国承认的独立国家。Judith Brown, *Nehru: A Political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61.

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为了不使一些国家感到中国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加在它们头上，周恩来表示，他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彼此受此约束……当然，在座的所有国家的代表不能都同意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我们认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周恩来以团结为上、避免争吵、化解矛盾、求同存异的作法，赢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赞许，成功地打破了会议的僵局，使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大决议和宣言。[①] 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发展。

不少国家对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周恩来为了避免由于美国的压力而使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争论，没有要求会议讨论台湾问题，仅在会议上声明了中国的立场，而在会下进行解释。他先后向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说明台湾冲突的来龙去脉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指出台湾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正是美国的这种干涉导致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4 月 23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②]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大小国家一视同仁，以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同很多已建交或未建交国家的代表团接触和交谈，平等待人，开诚布公，增进相互了解。4 月 20 日，他在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表示，中国对柬埔寨抱有好感，希望在两国交往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西哈努克说，柬埔寨保证遵守日内瓦协议，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③] 宴会结束客人走后，周恩来同中

---

①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55 年 4 月 23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1955 年亚非会议》，第 70–74 页。又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45–249 页；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 112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第 134 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48 页。

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谈论在会议上接触到的各国代表团的印象时，觉得西哈努克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开明、爱国的亲王。[1] 周恩来的谦逊和友善态度给西哈努克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柬埔寨“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2]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一些邻国非常担心的问题。4 月 22 日，周恩来以外长身份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 (Sunario) 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为解决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间华侨双重国籍提供了榜样，打消了这些国家对华侨问题的顾虑。[3] 4 月 27 日，周恩来在雅加达和印尼的华侨代表会见，向他们解释放弃双重国籍、选择一个国籍的意义。周恩来说："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百万外国侨民，他们也是双重国籍，我们政府好不好办事呢？凡事都要推己及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形，也不愿意，那么，我们在国外怎么能要求人家接受双重国籍呢？今天中国政府执行和平的、平等的外交政策，所以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也会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信誉。"[4] 周恩来在双重国籍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灵活、务实、合作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他对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政策。[5] 针对泰国对中国在云南省设立傣族自治区的担心，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近邻，建立正常

---

①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59 页。

② 转引自杨明伟、陈扬勇：《周恩来外交风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117 页。西哈努克甚至回忆说，他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见是“一见钟情”的见面。参见 Norodom Sihanouk with Wilfred Burchett, *My War with the C.I.A.: Cambodia's Fight for Survival* (Middlesex, U.K.: Penguin, 1973), p. 202. 1998 年 3 月 5 日，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说，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同我们热情交往，双方自此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参见张金凤：《记西哈努克国王同唐家璇副部长的一次谈话：情真意切忆恩来》，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5 辑，第 61–62 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50 页；Hong Liu,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1), pp. 177–179.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135–136 页。

⑤ Xiaohong Liu,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57.

关系。”周恩来然后把话锋转向美国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周恩来还在会外对参加会议的泰国代表团团长旺·威他也干亲王（Prince Wan Waithayakorn）说，中国在云南设立傣族自治区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中国政府无意对泰国搞颠覆，无意侵略泰国。周恩来建议，中泰可以像中印（尼）那样签订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他还邀请旺亲王访问中国，到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去亲眼看一看。会面结束以后，周恩来向旺亲王夫人赠送丝绸制品，旺亲王向周恩来回赠一个香烟盒。①

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周恩来特意安排精通日本问题的廖承志参加中国代表团。代表日本出席万隆会议的是鸠山内阁的经济审议厅（后改为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在廖承志的安排下，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举行了会谈。俩人会谈内容广泛，从日本当时的局势和处境、开展中日贸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直谈到解决邦交正常化和双方面临的困难和障碍等。周恩来以诚相待，推心置腹，使高碕达之助受到很大的触动。②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组织的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国对此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友好，中国没有公开指责巴基斯坦。第二，巴基斯坦接着又参加了受美英支配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基斯坦参加这两个组织使自己在亚洲处于难堪的地位。巴基斯坦是亚洲大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这样左右牵制，对巴基斯坦人民是很不利的。第三，巴基斯坦还同美国签订了军事协定。这不仅对巴基斯坦不利，也使中国感到不安。美国不仅要利用巴基斯坦领土来挑拨巴基斯坦同印度的关系，也会以巴基斯坦为基地来包围甚至进攻中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阿里向周恩来表示，巴基斯坦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巴基斯坦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阿里郑重声明，巴基斯坦参加两个条约组织和它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完全是为了防御邻国的侵略，并不是针对中国。如果发生美国的侵略战争，巴基斯坦决不参加，例如对朝鲜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74 页，第 251 页；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 213.

② 1960 年代初，高碕达之助接连两次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为打开岸信介内阁造成的中日关系僵局作出了贡献，并成为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开拓者之一。钱嘉东、王效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党的文献》，2007 年第 6 期，第 60 页；王俊彦：《中日领导人万隆会议期间进行战后首次接触》，张彦主编：《万隆精神普照大地：纪念亚非会议 50 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148–151 页；吴学文、王俊彦：《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187–190 页。

的战争，巴基斯坦就没有参加。[①]

5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Ahmed）时，回忆他和阿里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交往。周恩来说："在万隆，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谈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够和解和友好的。""我们两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也容易找到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并为此目标而共同奋斗。这是一个有利的基础，我们应该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②]

总之，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会上会下，处处表现得通情达理，温文尔雅，不挑起对抗，不强加于人，不摆大国架子。他呼吁彼此宽容，善意相待，和平相处。周恩来的和平外交打破了美国把中国说成是蛮不讲理的侵略性大国的反华宣传和孤立做法，增进了亚非各国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了解，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③]

周恩来的国际影响

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的评价最能反映大多数与会代表对周恩来外交的钦佩和折服。1955年4月25日，周恩来在万隆寓所与马利克谈话，马利克说：

> 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旁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或者这里那里的一场战斗，但他们没有赢得每一场重要战斗。关于你，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各小组委员会中同你进行过接连几小时的辩论，我们对你的想法有了

① 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12–113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31页，第250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13页。

③ 万隆会议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详见刘磊：《万隆会议与中国同亚非国家经贸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第70–77页。

一些了解。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作了许多愉快的和甚至恐怕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这样，整个会议对你说来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①]

很多媒体观察家和学者都注意到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得尼赫鲁大为逊色。[②] 报道会议进展的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契特（Wilfred Burchett）后来回忆说，就魅力和精力而言，周恩来远远超过尼赫鲁。[③] 美国学者高龙江（John W. Garver）认为，尼赫鲁在和亚非小国打交道时，总是带着“说教”的派头，喜欢表现自己是代表一个古老文明，他的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周恩来的谦逊精神形成强烈反差。[④] 一位印度国际问题专家如此评骘：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表现出的“礼貌与温和”使得“言辞激烈、情绪亢奋、居高临下”的尼赫鲁相形见绌。[⑤]

代表菲律宾出席万隆会议的罗慕洛一向以反共强硬著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曾积极推动成立一个反共的“太平洋同盟”。[⑥] 周恩来万隆会议上表现出的温和与友善，大出罗慕洛之所料，使他难以忘怀。很多年以后，他还时常回忆他和周恩来在万隆的难忘交往以及他对周恩来的良好印象。罗慕洛 1975 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108 页。

② Rahul Mukherji, “Appraising the Legacy of Bandung: A View from Ind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8), p. 169.

③ George Burchett and Nick Shimmin, eds., *Memoirs of a Rebel Journalist: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fred Burchett*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5), pp. 454-455.

④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p. 119-120.

⑤ Rena Fonseca, “Nehru and the Diplomacy of Nonalignment,” in Gordon A. Craig and Francis L. Loewenheim, eds., *The Diplomats, 1939–197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87. 对于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的影响为什么会超过尼赫鲁这个问题，也有印度学者持不同的解释。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Giri Deshingkar 认为，尼赫鲁故意低调出席万隆会议，好让周恩来在会议上尽量发挥作用和影响。见 Giri Deshingkar, “India-China Relations: The Nehru Years,” *China Report*, Vol. 27, No. 2 (April-June 1991), pp. 85-100。

⑥ 关于罗慕洛的“太平洋同盟”计划以及国际上的反应，参见 Nicholas Tarling,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05-410。

回忆说：在签署万隆会议公报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所有亚洲和非洲已经获得自由的国家自己确定未来的发展道路。周恩来非常诚挚地重申了中国希望和平的愿望以及要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友好相处的决心。[①] 1985 年，在万隆会议召开 30 周年前夕，罗慕洛接受了《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②]

美国官员非常害怕中国会在万隆会议上批评美国，担心会议会给中国提供一个扩大国际影响的机会和场所。他们试图用宣传战的手法来抵消中国的影响：他们先是暗中鼓励亲美反共国家的代表团在会议上发表诋毁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在会场上报道会议进程的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代表迅速将这些反共言论发回华盛顿，由“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VOA）向全世界广播。美国操纵亚洲舆论的做法引起印度的不满。1955 年 5 月，印度外交部官员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古博（John Sherman Cooper），抱怨说：尼赫鲁总理感到印度政府受到干扰，因为他听说美国“赞助了印度报纸和人员”。这位印度外交部官员指出，他有证据表明美国在操纵当地媒体。他提出的证据是：在同一天，一篇攻击中国的文章被同时发表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报纸上。古博否认美国赞助了当地的报纸。[③]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和解态度与和平攻势使美国官员大为意外，一时不知所措。他们原来估计，周恩来会利用万隆的讲台，来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指责美国是制造东亚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来为中国解放台湾开绿灯，但没想到周恩来却和颜悦色地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④]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在一份评估万隆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周恩来在万

---

① 潘敬国、张颖：《周恩来与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开启》，《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48 页。

② 熊华源：《周恩来和万隆会议》，《党史文汇》，1987 年第 6 期，第 8 页。

③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26.

④ Jason Parker, “Cold War II: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Reperiodization of the Postwar Era,” *Diplomatic History* (November 2006), pp. 867-892；任东来：《美国对中国参加 1955 年万隆会议的反应》，载沈宗美主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9–44 页。

隆会议上"取得很大的成功";"他在公开亮相时总是表现得温文尔雅，沉着镇定，和蔼可亲";"他讲话的语气和内容都很温和";"他深深地感染了媒体、与会代表和会议观察员";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打动了所有的会议代表，使美国处于守势"。[①]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重新塑造中国和平形象的努力有力地回击了美国官员有关中国人好战的说法。就连以强烈敌视中国著称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会议上表现出了外交魅力。杜勒斯在1955年4月29日给内阁的一份分析万隆会议结果的报告中提到:"万隆会议对尼赫鲁先生来说是一个严重挫折，相比之下，周恩来取得了一定的个人成功。"[②]

万隆会议以后，很多美国人感到，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对抗中，正在一步一步地输给中国。[③]不少美国官员担心，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代表了共产党人哄骗自由世界放松警惕的一种策略。[④]尤其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安的是，反美主义不仅在很多新兴独立国家中迅速蔓延，而且在不少西欧国家中抬头。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出现：一方面，出于对欧洲殖民主义的仇视，很多亚非发展中国家虽然口喊中立，实际却偏向共产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对待第三世界的中立主义的态度上，西欧国家要比美国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抵制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主义步骤，同时，他们不满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核大棒政策，害怕被美国拖进一场在第三世界的核冲突。法国官员不厌其烦地告诫美国人，法国出现的反美情绪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万隆会议上所提倡的不结盟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不仅会使法国转向中立主义，还会使法国反对在第三世界推行冷战政策。[⑤]1955年10月4日，法国外交部长安东·比内（Antoine Pinay）提醒美国驻法大使迪龙（Douglas Dillon）：美国没有充分认识到万隆集团和苏联集团结合所造成

① James Peck, *Washington's China: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ism*,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6), p. 181.

② Minutes of Meeting, April 29, 1955, Cabinet Series, Whitman File, Box 5,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③ Matthew Jones, *After Hiroshima: The United States, 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 194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 7.

④ 南希·塔克 (Nancy Tucker):《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载袁明、哈里·哈丁 (Harry Harding):《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5页。

⑤ Alessandro Brogi, *Confronting America: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s in France and Ital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p. 204.

的危险，这一危险是对世界稳定的最严重威胁。[①]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文化渊源

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他在外交领域中运用其“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哲学思想的结果，反映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和为贵”的戒条，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将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相结合这一特点的体现，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指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而既没道德又不学无术的人常常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而不能和谐相处。如果将“和而不同”的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它对于化解和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②]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万物并育”和“道并行”讲的是“不同”；“不相害”和“不相悖”指的是“和”。《国语·郑语》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矛盾对立双方的和谐相处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 这种思想为不同的文化共存共荣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保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同”的成语比比皆是：“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同心同德”、“求同存异”。

必须指出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积极因素，又摒弃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中国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因此产生天朝观念和朝贡制度。中国的帝王视自己为“天之元子”，奉天承运，因天的授权而君临天下，

---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Fr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4, 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18: Afric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p. 222-224.

② 本文着重论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体现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有的学者强调“和平共处”主张的列宁主义渊源。蔡佳禾：《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1954–1957 年）》，第 54–55 页；杨闯：《论周恩来和平共处思想》，《外交学院学报》，1991 年第 1 期，第 42–45 页。周恩来本人就提到过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1959 年 11 月 3 日，他在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工作会议上说：“和平共处有三种，一是列宁的和平共处，第二是麦克米伦的和平共处，就是维持现状，第三是杜勒斯的保存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65 页。还有的学者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佛教的道德规范。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 112.

③ 方小教：《从“求同存异”看周恩来的辩证思维方法》，《党的文献》，2008 年第 1 期，第 43 页。

统治天下，负有维护“天下太平”的责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崇尚一种所谓“华夷秩序”或“夷夏观”，把中国与世界简单地划分为“内夏”与“外夷”。这种以中国为天下中心、以“华夷之辩”为思想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服从于农业文明对和平与稳定的需求，为中华帝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互动的框架。但“华夷秩序”有其非常消极的一面。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中华帝国并不是将自己放在和周边国家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关系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习惯以“中央大国”的心态，看待周边的弱小国家和民族，要求遵循一种各国向中国朝贡、中国为各国提供保护的交往规则。“华夷秩序”不是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观念之上，美其名曰“万方来朝”、“四夷宾服”来满足民族虚荣心和自大感，它反映了一种大国的傲慢心态。[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思想是对这种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的批判。有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宋明时期，中国的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常常不是按儒家的“和为贵”和防御为主的路子出牌，而是经常大动干戈，耀兵异域，以强凌弱，开疆扩土。[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对中国历史上这种

① 有关“华夷秩序”理念、原则和历史沿革的详细论述，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0–45页。黄枝连认为，在中华帝国和东亚各国（朝鲜、安南、琉球和日本）的漫长交往中，存在着一个“天朝礼治体系”，这个体系为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相安无事、和谐发展的框架和模式。在这个体系中，朝鲜、安南、琉球和日本的王朝承认自己是“小邦”，“事大以诚”，主动地向中国王朝学习和借鉴，定期地向中国朝廷送礼、纳贡，引进中国的文物和典籍。而中央王国以“字小以仁”的胸怀和肚量，善待远方来的使节和他们所代表的政治体系。久而久之，礼尚往来，礼义加礼仪，就形成了固定的“朝贡模式”。在黄枝连的笔下，“天朝礼治体系”是和平的、互惠的和建设性的，有别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天朝礼治体系”建立在物质条件缺乏、活动空间狭小、难以持续发展的小农社会；其农业文明所要求的情境，强调的是“和”与“忍”，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以守势、静态、俭约、中庸来行事，避免冲突，减少摩擦。比较而言，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崇尚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动辄使用武力，强行向外扩散和移植基督教文明，让全世界接受它，用它来取代当地的社会情境构架，规范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它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黄枝连：《探索第三个千年的“天朝礼治体系”—— 关于国际关系形态对“社会情境—五理系统”的促进作用》，载陈奉林、魏楚雄主编：《东方外交史之发展》，澳门：澳门大学，2009年，第39–66页。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1956年11月，周恩来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专程前往纪念统一过越南并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因抗击中国汉朝马援率领的侵略军而战死的两位女王——征侧、征贰二征王庙，并在她俩的像前献了花。随后，周恩来又在中国大使罗贵波举行的招待会上保证，中国永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40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92–93页。

尚武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的否定。

从国际关系演变的角度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以大国霸权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的重大冲击，它反对“雅尔塔体系”所代表的大国主宰和强权政治。从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角度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遵循的“一边倒”政策的调整，它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自主性。正如中国学者章百家所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①]

（作者在为撰写此文而收集资料时，得到北京大学高艳丽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张静教授和南开大学张秀阁教授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此文曾发表于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实践篇》，澳门：澳门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12 页。

周恩来和中越关系（1949—1972）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是两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它们既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亚洲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独特表现方式。中越两党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既互相支持，互相借鉴，"同志加兄弟"，又时有矛盾，时有分歧，最后甚至反目为仇。周恩来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长期处理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见证了两党交往的起起伏伏、恩恩怨怨。他是和越南领导人来往最多、交往最深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当中越关系出现矛盾和龃龉时，比如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和在1971—1972年中美和解的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国的主要外交代表，首当其冲，要直接面对来自越南劳动党方面的不满和阻力，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沟通和说服越南领导人，以图化解中越分歧和矛盾，求得共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讨论周恩来与越南交往的所有事件和经历，只能通过择其大端，来考察他对中越关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①

① 在现有的论述周恩来与越南关系的著述中，学者们集中关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为解决印度支那冲突所作的外交努力，比如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53–268页；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王善中：《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载《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熊华源：《征战日内瓦会议前夕的周恩来》，载《党史文汇》，1999年第10期；赵学功：《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载徐行主编：《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34–748页。但系统论述周恩来与中越关系的著作或文章，尚未见到。

援越抗法

周恩来与越共领袖胡志明有着长期的交往，两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们先在巴黎，后在广州，有过多次接触与合作，过从甚密，相知颇深。[①] 周恩来后来（1973年7月20日）对越南《人民报》总编辑黄松说："胡志明主席艰苦奋斗几十年，我们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胡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22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为了保密，我们在地下铁道见的面……从1925年到1926年，胡主席在广州主办青训班。我和邓颖超也在那里。当时，胡主席没有担任黄埔军校的具体职务，主要负责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有时到黄埔军校讲演越南的革命运动。"[②]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胡志明的交往继续加深。胡志明先在桂林与叶剑英一起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办事处俱乐部主任，后又随叶剑英前往湖南衡阳，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后到达重庆，和周恩来会面。在重庆，胡志明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忙，周恩来给予大力支持，向国民党友人介绍胡志明："这是我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越南朋友胡志明……"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德保县被国民党逮捕，关进柳州监狱。周恩来闻讯后，多方奔走，想方设法与国民党交涉，营救胡志明出狱。周恩来亲自到国民党将领冯玉祥的官邸，商量解救胡志明的方案。冯玉祥找到李宗仁，然后，同李宗人一块去面见蒋介石。后来，在国际舆论和各抗日组织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3年9月释放胡志明。[③]

1945年8月，日本战败，胡志明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法国不甘心失去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帝国，在英国的支持下，很快重返越南，迫使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撤出河内，退入越北地区。在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前期，中共由于忙于完成自己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无暇顾及越南，不能向胡志明的抗法斗争提供大规模和有效的军事、经济支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越两党合作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

① William J. Duiker, *Ho Chi Minh: A Life*, (New York: Hyperion, 2000), p. 143.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680页。

③ 胡志明著，洪左君译：《在中国的经历及其他》，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第189–201页；何延虹：《情谊深似海——记周恩来与胡志明的交往》，载《人物》，1991年第4期，第5–12页；Duiker, *Ho Chi Minh: A Life*, pp. 237, 242, 263-264, 284.

中共领导人同情并支持越南革命。对于他们来说，越南革命的胜利，既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又符合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越南革命的成功有助于在东南亚扩大共产主义影响。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可以为亚洲的革命运动提供借鉴的模式和样板。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越南革命的胜利有助于消除中共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从南部威胁新中国的后顾之忧。因此，当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向中共提出要求援助的请求时，中共领导人立刻毫无顾忌地予以全力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安排援越事宜。

1949 年 12 月，中共任命罗贵波为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在他赴越前，周恩来约他谈话一次。周恩来说："胡志明同志早年叫阮爱国，在法国参加法共，同我、李富春、蔡畅等都很熟。大革命时期胡志明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同在广州，不仅同我，同邓颖超、陈赓、叶剑英也相熟。抗日战争时期到过延安，后来在桂林等地活动，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掩护，胡志明同志对中国情况比较了解 …… 现在中央正在考虑和越南建交。1945 年越南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如果中国承认了，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业可能陆续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对于他们打破孤立和提高国际地位很有好处。现在法国很注意中越两国的关系，你去了要注意保密。"①

1950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已先期到达的毛泽东，与苏联政府谈判。2 月 1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要他代为问候刚刚到达北京的胡志明。毛、周在电报中说：胡志明"在为越南民族独立与建立越南人 [民] 民主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起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 [认] 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越南请求各国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申明文件，我驻苏大使馆已为转达各新民主国家的主苏使馆）。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并祝越南全境统一早日实现。胡志明同志及其战友们身体健康。"②

---

① 罗贵波：《历史的回顾——中国援越抗法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纪实》，载符浩、李同成主编：《中国外交官丛书：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年，第 150–176 页。

② 《毛泽东、周恩来为问候胡志明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 年 2 月 1 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254 页。

刘少奇随后又安排胡志明访问苏联，胡志明在莫斯科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1]并一同与斯大林商谈援越事宜。2 月 17 日，胡志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他先到中国东北参观，然后于 3 月 3 日抵达北京。毛泽东随后在中南海为胡志明举行欢迎宴会，周恩来也出席。[2]

日内瓦会议

1954 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他处理对越关系的经历中，最耗费精力和心血、最需要表现耐心和智慧的一段时间。会议上，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谈判一波三折，先是围绕从印支三国撤出外国军队问题，后是涉及在越南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决定。在第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代表团表示，如果法国从印支三国撤军，越盟也必须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作战人员，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一开始不愿承认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有越盟的军队。越方的僵硬态度一度使谈判陷入僵局。从 6 月 11 日到 15 日，中苏越代表团举行数次商谈，周恩来提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办法，主张“对于高、寮两国关于禁止自境外运入军人、军火问题可以适度的满足对方要求”。[3]他指出：目前谈判的焦点是我方是否承认越盟有部队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如果我方坚决不承认，那么，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就谈不下去，越南问题受到牵连也就谈不下去。所以，为使谈判有所进展，应当承认过去有越盟志愿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但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遵循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原则办理。“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补偿”。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赞同周恩来的主张。

① 《毛泽东关于斯大林派飞机接胡志明访苏事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 年 2 月 3 日，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84 页。（毛泽东致刘少奇的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国内多部论述中越关系的著作，在描述这一时期周恩来和胡志明赴苏时间时，都出现史实性错误，都说周恩来与胡志明是一块“化名”前往苏联的，以讹传讹。比如黄铮编著的《胡志明与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迎接了胡志明主席后，二人又以‘大胡’和‘小胡’的化名，一同赴莫斯科，与毛泽东主席、斯大林元帅共商有关越南革命的重大问题。”（第 125 页）；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说：1950 年“2 月 4 日，胡志明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化名大胡和小胡同赴莫斯科，和毛泽东主席、斯大林元帅共商有关越南的党建、民族阵线、军事、外交、干部等重大问题”。（第 26 页）。

② 罗贵波：《历史的回顾——中国援越抗法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纪实》，第 16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5 页。

③ 《周恩来关于中、苏、越三方磋商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 年 6 月 14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166–167 页。

鉴于中苏的立场已经一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不得不改变态度，表示同意。按照计划，周恩来于6月16日和17日分别会见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和法国代表团团长皮杜尔，表示目前仍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越盟志愿军队可以撤出。随后，范文同又在6月18日举行的限制性会议上，按中苏越代表团事先商定好的口径，在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上表了态："过去曾有越南人民志愿军在高棉和寮国作战，但是这些军队已经撤出两国。如果现在还有，自然也应撤出。"中苏越三方的新举动使谈判出现积极的转机，6月19日会议达成双方军事代表就老挝和柬埔寨军事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①]

从印支三国撤出外国军队的难题解决后，如何在越南划分军事分界线就成为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法国主张军事分界线划在北纬十八度线，因为法国希望保持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不远的九号公路以及十六度线附近的出海口岘港（又称土伦港），九号公路是连接越南中部和老挝的战略通道，岘港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越方，特别是范文同，希望军事分界线划得越往南部越好。6月17日，中国、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代表团就曾开会，讨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划区方案。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我方方案应以越南为争取重点而在高、寮可以酌情让步。在高棉不划区只求政治解决，把寮国南北划为边区。根据高棉抗战政府的实力情况，要求在高棉划区不可能，只有按就地停战、双方协商、中立国监察、政治解决的方针进行谈判。6月1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介绍三国代表开会情况，并指出：根据实际情况，如果我们在老、柬问题上作出让步，"则在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补偿"。"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较强，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够逐渐巩固和扩大影响"，"目前形势是：如我在军事会谈中提出合理的具体方案，即可争取与法国迅速解决问题，达成停战。这样即可推动法国新政府抵抗美国干涉，又可拖延欧洲军问题。这对东西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些关键性问题必须谈清楚"。但是，现在只凭电报的往返交换意见，是不易取得一致的，因此，在日内瓦会议各国外长休假期间，我"有必要于访印后返国途中去广西南宁一行，请越劳中央的负责同志多去几位。由我向他们报告情况，说明重点划区的方针"。在谈到对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看法时，周恩来说，孟戴斯–弗朗斯虽然有摇摆性，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1–388页；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第275–305页；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第256–257页。

但与皮杜尔不同。[①]

6月25日至28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强调也应成为指导中印两国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原则。7月2日，周恩来到达柳州。7月3—5日，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举行了八次会谈，围绕关于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会上，周恩来作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会议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它超过朝鲜战争的国际化范围的程度。当年在朝鲜，苏联、美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所以，朝鲜战争停下来了，形成双方相持的局面。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本身是三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日内瓦会议今后的谈判应首先谈越南，先把越南局势肯定下来。关于划区问题，最后的底盘是：（1）在越南，准备在十六度线划线，如不可能，拟以九号公路为界。（2）在老挝，要求是上、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有一块地方。如果不行再议。（3）在柬埔寨，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武元甲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力争在划区问题上达成协议，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②]

柳州会议结束时，胡志明作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以“七·五文件”的形式发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要其照办。文件明确规定：谈判的指导思想是：应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应消极等待，并应主动地提出我方方案。具体谈判方案是：在越南仍争取以十六度线停战，但考虑到十六度线以北的九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可能不会让步，因此可在十六度线的基础上再作若干小调整；在老挝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抗战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只能争取政治解决。[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柳州会议上的工作。7月6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5–386页。

② 《周恩来关于与胡志明会晤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30–23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4–395页。

③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第335页；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第257页。

日，周恩来回到北京。次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参加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诸问题的汇报。他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根据既定方针，中国、苏联和越南代表团在会议上就是要实现印度支那停战。两个月来的会议取得了若干成就。它使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了一步，使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受到阻碍。照现在的趋势，实现印度支那停战的可能性是大的，是要达成协议的。听完周恩来的发言后，毛泽东说：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今后继续这个方向，估计可以达成协议。①

在柳州会议上，胡志明和武元甲虽然同意周恩来的观点，但身在日内瓦的范文同却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他对“七·五文件”有抵触情绪，认为该文件提出的谈判方案对越南革命不利。他主张以十四度线或十五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由于范文同思想没有转过弯，所以他迟迟不按“七·五文件”的指示向法方提出新建议。而孟戴斯–弗朗斯 6 月 17 日组阁时许诺的“4 周内若实现不了和平便辞职”的最后期限已经越来越近。美国在寻找机会破坏日内瓦会议，法国的主战派在施加压力，谈判随时可能破裂。②

7 月 9 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次日，与苏联领导人交换对日内瓦会议的意见。鉴于美国正千方百计地拉拢法国的主战派，对孟戴斯–弗朗斯施加压力，企图破坏日内瓦会议，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应该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新政府所能接受的、简单明确的条件，排除美国的干扰和破坏，争取迅速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③ 当晚，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转胡志明，介绍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并指出：“现在从各方面看来，以十六度为界，再加上土伦港供法方暂时使用和九号公路容许老挝进出的条件，是大体可以达成协议的。”④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95 页。

②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第 337–352 页。当年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后来回忆说：“印支问题的一个中心点是越、法临时军事线的划分问题。越南有些人当时希望能一下统一越南，但实际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是不可能的。”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12–1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96–397 页。

④ 《周恩来关于与苏共中央会谈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 年 7 月 10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第 231–23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97 页。

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回到日内瓦。他立刻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听取留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副团长李克农的汇报。李克农介绍了范文同对印度支那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后，张闻天说：范文同在思想中对越盟的力量估计过高，特别是对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估计过高，认为越盟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法军很难再打下去，所以不肯作让步，总想要法国多作让步。张闻天还批评范文同有“印支联邦”的思想，说他不善于区别人民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张闻天指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用越盟的外来力量在老挝和柬埔寨进行人民革命是不行的，只有靠本国人民的自觉自愿起来革命，赶走法国帝国主义和推翻王国政府，革命才能成功。张闻天建议周恩来好好做范文同的工作，弄通他的思想，推动谈判前进。周恩来表示：他同意张闻天关于“革命不能输出”的观点，并支持张闻天对范文同“印度支那联邦”思想的批评。①

老挝和柬埔寨的抵抗运动代表是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持越南护照，去日内瓦参加会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中的老挝抵抗运动代表是诺哈（Nouhak），柬埔寨抵抗运动的代表是梅福（Mey Pho）和高莫尼（Keo Moni）。会议刚开始时，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主张由这些抵抗运动人物代表老挝和柬埔寨出席会议，但越方的建议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他们力挺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派去的代表。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放弃其原先主张，愿意同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代表谈判。② 当时，亚洲的很多中立国家，包括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也反对越南用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抵抗运动的方法来控制那两个国家，反对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做法。③

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领导人“输出革命”和“印度支那联邦”思想的批评，表明中越双方对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该地区战略格局看法的分歧。就像法国殖民当局一贯将印度支那三国视为一块完整和有机的战略区一样，越共领导人长期视印度支那三国为一个完整和统一的革命区。1930年，胡志明成立共产党组织时，称他的党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而不是“越南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

①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第337–352页。

② 美国人称老挝和柬埔寨抵抗运动代表是“鬼影政府”(ghost government) 代表，拒绝承认他们的“交战方”（belligerents）身份。David P.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2-74;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87.

③ 关于印度的态度，可参阅 Gilles Boquerat, “India's Commitment to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 *Cold War History*, No. 2 (2005), pp. 211-234。

党”负责领导和组织印度支那三国的革命运动，党内下设老挝和柬埔寨支部。1945年11月，出于巩固新生政权、赢得其他党派支持、争取国际承认等多种原因的考虑，胡志明暂时“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而另行组织“印度支那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原党组织转为底下活动。1951年，胡志明恢复他的党的公开活动，改称越南劳动党，原印度支那共产党中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分别独立出去。虽然胡志明的党不再叫“印度支那共产党”，但它仍在实际操作中控制和指导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①] 中共领导人认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应该植根于本国自己的土壤，应该依赖本国民众自发的革命愿望，而不是依赖外来的革命输入。他们不赞成越南包办代替老挝和柬埔寨的革命。他们实际上认为：越南在处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抵制越南操纵和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作法，是导致日后中越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

7月12日，周恩来结束了中国代表团会议后，又马不停蹄于当日下午会见莫洛托夫，向莫洛托夫通报他打算找范文同详谈，敦促范文同提出新谈判方案，给孟戴斯–弗朗斯一点资本，以对抗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莫洛托夫完全同意和支持周恩来的想法。在取得了与苏联代表团的共识后，周恩来当晚与范文同彻夜长谈，向他说明中、苏、越三国党中央所商定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一致意见：主动、积极、迅速、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周恩来还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结合中国抗日战争中“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我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阐述了退与进的辩证关系。他劝范文同不要在十六度线、十七度线上计较，给孟戴斯–弗朗斯一点面子，换取法国军队的撤出是很合算的，“法国撤出，全越南都是你的”。周恩来的一番旁征博引、权衡利弊、循循善诱的肺腑之言最终说服了范文同，他同意第二天按“七·五文件”的精神向法国提出

①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为了适应印度支那的新形势，越南劳动党于1955年8月10日成立“老挝和柬埔寨特别委员会”，由黎笋牵头。该委员会的任务是：(1) 研究和观察老挝和柬埔寨的局势，为中央委员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2) 为老挝和柬埔寨训练干部；(3) 与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参见 Christopher E. Goscha, “Vietnam,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and the Meltdown of Asian Internationalism,” in Odd Arne Westad and Sophie Quinn-Judge, eds.,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1972-1979,*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61. 又见 William J. Duiker, *Sacred War: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p. 56, 76。（1955年，原印度支那共产党中的老挝支部成立老挝人民党，1976年，又改名为老挝人民革命党。1960年，高棉共产党成立。1971年，波尔布特将高棉共产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逐渐摆脱越南劳动党的控制。）

以十六度线作为分界线的新建议。[①]

范文同态度的改变使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据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钱嘉东的回忆，为了说服越南代表团，周恩来做了“极其复杂艰巨”的工作，“跟越南代表团在别墅的花园里一圈一圈地绕着走，边走边谈。这个花园有多大？我没法讲出一个范围，大概走一圈得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一边走，一边说话，谈一次要数小时，要走多少路？”[②]

7月13日上午，周恩来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一致认为：为了使孟戴斯–弗朗斯在回巴黎同杜勒斯会谈前有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稳妥把握，便于他坚持立场，抵制美国的压力，拒绝美国的过分要求，在越南十六度线划分集结区的方案在他口气有松动时就应提出。[③]随后，周恩来又在范文同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前，会见孟戴斯–弗朗斯，就其仍坚持十八度划界，认为法国撤出的是经济、政治、人口都很重要的地区一事说，目前，法越双方都应再作努力，互相让步，求得达成协议。并说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越南中部和越南南部与当地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要从这些面积很大的地区撤退，需要很大力量，进行解释也需要时间，法方应该了解这些情况和越方的困难。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立场上前进一步，越南是愿以更大的一步来迎接法国的让步的。[④] 7月20日，范文同与孟戴斯–弗朗斯终于就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达成协议，双方部队集结区以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约20公里的贤良河为界。[⑤]7月21日，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一系列协定在日内瓦签订，日内瓦会议结束。

根据师哲的回忆，在日内瓦协定最后签字时，还发生一个小插曲，反映出越南人的民族自尊心。师哲说：“越南问题达成协议，签字时间定于1954年7月20日晚上。到了签字的时刻，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却又有不同意见，一直拖到7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7页；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第352–358页；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第257–258页；师哲：《日内瓦会议散忆》，载《人物》，1989年第1期，第37–44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57页。师哲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翻译。

② 程华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7页。

④ 《周恩来关于与苏、越等方会外接触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14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233–23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7–398页。

⑤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24页；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第359–364页；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第257–258页。

21日才签字。中国代表团不参加签字，只有苏、英两位会议主席参加。我们一直在莫洛托夫住处等他回来，想了解签字情况，午夜过后，莫洛托夫回来了。周恩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问题？莫洛托夫说：哎，越南同志非把签字拖至7月21日，小国，民族自尊心强，总想表示我不是跟着你们大国跑。”[①]

周恩来的灵活和务实外交，成功地打破了越法双方在从印支三国撤出外国军队、越南军事分界线划分等重大问题上的僵局，扫除了谈判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为“日内瓦协定”的最终签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政策。他的聪明睿智、他的外交才华、他对问题的敏捷反应、他的缜密思考和周全安排，他的忘我工作，都赢得了很多与会代表的由衷赞叹和钦佩。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打破了美国企图直接干涉印度支那的计划，避免了中美再次兵戎相见的可能。

在日内瓦会议上，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迫于中国和苏联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北纬十七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停止战争。他们清楚地知道：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面对美国的阻挠，统一越南的斗争将会更加漫长、更加艰巨。越南方面尚未公布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外交档案，我们无从得知当时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在内部是如何表述他们对中苏政策的看法的。但从日后越南政府发表的材料看，越方对中苏的做法是有怨言的。1976年，越南外交部编写了两卷本的《作为人民民族民主革命一部分的外交斗争（1945—1954）》一书，其中回顾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论述中苏对日内瓦会议的态度时，该书指出：中国和苏联都希望与美国缓和，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比苏联更迫不及待，中国甚至愿意接受整个越南和印度支那的中立化，因为当时中国的总体战略是要在中国四周建立和扩大缓冲区，包括南亚和东南亚的中立区，以此来推动国际缓和，推动中美谈判（指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谈判）。[②]

---

① 师哲：《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一些情节》，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9–32页。

② 《Dau Tranh Ngoai Giao Trong Cach Mang Dan Toc Dan Chu Nhan Dan (1945-1954)》（作为人民民族民主革命一部分的外交斗争（1945–1954），河内，1976年。1979年，中越关系全面恶化后，越南外交部发表题为《过去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白皮书，公开地并直截了当地指责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阻挠越南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

帮助越南战后重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战后经济，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家园。周恩来经常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经济献计献策，并安排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技术援助。1954 年 10 月 8 日，周恩来致电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贵波、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总顾问方毅、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顾问乔晓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议在处理越、法双方的经济关系时，"总的原则是，遵守停战协定及其附件，保持独立主权，照顾统一战线，照顾将来统一，并要结合恢复经济，稳定市场物价，医治战争创伤通盘考虑"。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疑应该适用于解决一切经济关系，但"在收回主权时，应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分别轻重、逐步实现的方针"。首先，"货币发行必须统一，进出口管理、外汇管理以及有关我们整个的经济命脉的方面必须坚持越方的管制权，而且目前在执行上又必须适当照顾对方企业和商人的积极性"。[①]

1955 年 1 月 18 日，周恩来在审改一份中共中央致罗贵波、韦国清、方毅的电文时指出："下列各点请告胡主席和劳动党中央：（1）对越南的物资及技术援助不能也不应由中国全包，当然，中国会尽自己的能力来援助越南的。（2）向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提请援助，毫无疑问地应由越南政府和劳动党自己出面向苏新国家提出。（3）各国对越南援助，应由越南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估计对方的可能，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和数额，才好进行磋商。（4）为商量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中共中央邀请劳动党中央和胡主席指派一领导同志率领必要干部飞北京和中共中央面谈。在来北京之前，请劳动党中央根据农业、交通、工业、贸易、军事、文教等方面的需要，按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大约五年的期限，准备好一个要求援助的计划，内中包括援助项目、技术和金额。"[②]

1956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周恩来作为总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了一次正式访问。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因为它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当年 2 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生前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揭露和谴责。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共产主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417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442 页。

阵营内，引起不少国家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比如波兰出现罢工和游行示威，匈牙利发生骚乱和冲突，北朝鲜爆发党内危机。中共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和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在“去斯大林化”及其影响等重大问题上，互相沟通，增加信任，达成一致。在访问河内期间，周恩来同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就目前国际局势、批判斯大林问题、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越两党和两国的关系问题，广泛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向越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近几年完成的几件大事以及从这些工作中获取的经验教训，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实际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纠正错误的长期性。在会谈之余，周恩来还专程前往纪念统一过越南并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因抗击中国汉朝马援率领的侵略军而战死的两位女王——征侧、征贰二征王庙，并在她俩的像前献了花。随后，周恩来又在中国大使罗贵波举行的招待会上保证，中国永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交往方面，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①

周恩来专门在二征王像前献花，并公开保证中国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对稳定中越关系、打消越南对中国的疑虑，起了积极作用。二征王在越南被视为民族英雄，是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周恩来亲自访问二征王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历史因素可能会对中越关系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显示他愿意平等对待越南的诚意。周恩来从最近东欧事件中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作法会破坏兄弟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团结，会制造彼此之间的怀疑，甚至敌视。比如，1956 年 11 月 10 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发言中说：从国际事件中取得了两点教训，第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我国是否也有可能产生？“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第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②

11 月 22 日，周恩来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然后离开河内飞赴金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39–641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92–9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36 页。

开始对柬埔寨的访问。11月27日，周恩来结束访问柬埔寨，又飞回河内，作短暂停留，准备第二天访问印度。在河内停留期间，周恩来应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的请求，对越南国内情况提出一些参考意见。他说：越南现分为南北两方，内外都还有敌人，必须分清敌我，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去战胜我们的敌人。南北统一是一个长期的斗争。通过自由普选统一南北的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政治斗争，但不是具体行动步骤。北方是人民民主的基地，必须大力巩固北方，才能争取南方，统一越南。还须继续彻底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消灭封建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鉴于越南国内的实际情况，过渡的时间可能较中国长些，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针对越南财政赤字大、市场不稳、物价上涨的情况，周恩来建议：财经问题的关键是增产，发展壮大国营企业，加强市场管理。根据越方的要求，周恩来同意中国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专家留下继续帮助工作，但中国专家的意见只能供越南同志参考，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应该由越南同志自己决定。[①]

中苏分歧和中越关系

中共领导人反对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奉行的国内国际政策，中苏分歧逐渐加大。中苏矛盾的加深给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出了难题。处于自身反美斗争的考虑，胡志明希望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中苏两国，保持团结，共同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美斗争。他担心：中苏反目会削弱共产主义阵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和援助，会给美国以可乘之机，使美国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越南事务。为此，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胡志明在多个场合试图调解中苏隔阂，以维护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1960年8月，胡志明为了调解中苏矛盾，出访中国和苏联。8月7日，他先到达北戴河，并于次日，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在会谈中，胡志明希望中苏两党停止争论，先召开中苏两党双边会议，再举行有各兄弟党参加的多边会议，共同努力，消除分歧，恢复团结。会谈结束后，胡志明又于8月11日离开北戴河去苏联，与苏共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举行会谈。8月19日，胡志明从苏联回到北京，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介绍他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②]

中共领导人对胡志明在中苏分歧中充当“和事佬”的作法不满。他们批评胡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8–339、342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07页。

志明在中苏之间两边劝和，缺乏是非观念。1960 年，在毛泽东同金日成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明确指出："越南在反帝方面是坚决明确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不很明确。"周恩来所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就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的态度。[①]8 月 14 日，陈毅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向与会代表介绍胡志明在北戴河斡旋中苏分歧的来龙去脉。陈毅说：毛泽东不同意胡志明对中苏"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陈毅对胡志明作了如下评价：胡志明是"好人"，但就是对苏联"顶不住"，"耳朵太软"。[②]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胡志明继续在中苏之间斡旋。10 月 12 日，周恩来和彭真同准备前往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途经北京的越共代表团成员胡志明、黎笋会谈。在谈到自己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苏联参加会议时，周恩来说：这次我们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是去祝贺，我们的贺词除祝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这样强调对敌斗争有好处。[③] 在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与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换了意见，强调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守三条原则：（1）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2）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3）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④]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创了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攻击兄弟党的先例，赫鲁晓夫明是指责阿尔巴尼亚，暗是批评中国。周恩来在发言中，反驳赫鲁晓夫："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提前离会回国，以示抗议。[⑤]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加剧的时期，同时也是越南劳动党为了统一越南，决定重新在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期。从越南劳动党的角度来说，中苏矛盾的出现和激化对越南的统一事业是不利的，因为越南劳动党需要

① 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战争》，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第 35 页。

② 《陈毅同志在国务院外办第四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 年 8 月 14 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 3124，卷号 10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440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441 页。

⑤ 柴成文、黄政基、张常仪：《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295 页。

中苏的共同支援，来对抗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但中共领导人正处于意识形态争论的极端情绪中，只希望越南劳动党在中苏分歧中站在中国一边，而没有从越南劳动党的角度考虑问题，犯了强加于人的错误。

援越抗美

1961 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开始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由美国出钱、出武器、出顾问，由南越西贡政权出军队，开展反游击战。美国在越南进行的“特种战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北京作出相应反应，加强与河内的军事合作，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1962 年夏，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共同讨论南越的严重形势，分析美国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可能，双方商定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 230 步兵营的武器装备。次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越南领导人研究了如果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攻，中国援助北越和双方配合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两家无条件地共同对敌。”“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①]

从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周恩来数次与东南亚的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由于美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特种战争”而引发的新局势。1963 年 9 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会见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就东南亚的现状及可能出现的形势，进行全面的评估。周恩来指出：美国很想在越南和老挝直接参战，但它在世界各地出兵太多，犹如十个手指头捉十个跳蚤，动都动不得。因此，只要美国发动战争，等待它的只能是失败。东南亚各国只要树立必胜的信心，一定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他说，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之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插足很深，反动派既薄弱又残暴，但这里的人民已经觉醒，而且富有斗争经验，共产党都有一定阵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东南亚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本主义，而要实现这一任务，首先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其次要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再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对各方面的领导。东南亚各国共产

---

① 柴成文、黄政基、张常仪：《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第 230 页；江英：《冲突与克制：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美] 罗伯特 · 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264–265 页。

党要加强彼此联系，互相支持。中国作为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会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周恩来还就如何对抗美国的"特种战争"，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指出要做好长期战争的打算。至于援助问题，中国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大后方，会同仇敌忾，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东南亚。[1]

1964 年 7 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出席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会议。在会上，越南、老挝领导人介绍了北越、南越、老挝的形势，特别谈到美国如何把南越作为进攻社会主义的基地、防止社会主义发展的基地、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等情况。周恩来在听取了东南亚局势的介绍后，指出：东南亚是世界矛盾最集中、斗争最尖锐、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区，美国企图把南越、老挝、泰国作为一条战线，以"特种战争"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用经济利诱和政治颠覆的手段，企图破坏缅甸、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但美国的这些阴谋不断受到挫折，而且面临彻底失败的危险。然而，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不会罢手，当前美国可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但不管美国采取哪一种措施，中国必将出面支持东南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在发言中，既深刻地分析了局势，又详尽和具体地提出斗争的任务。他建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做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政治上应坚持两次日内瓦协议，不断揭露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并利用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军事上，要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巩固根据地，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砍敌人的手指头，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争取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在不断胜利中解决问题。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应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2]

1964 年 8 月 2 日和 4 日，接替肯尼迪出任总统的约翰逊制造了所谓"东京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次年 3 月，约翰逊又派遣 3500 名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这是美国第一次出动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南越参战，是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升级的重要一步。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是对中国国家安

---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19–22 页。童小鹏当时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随周恩来参加了从化会议。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第 220–221 页。童小鹏随周恩来出席了三党会议。

全的进一步威胁，中国领导人决定全力以赴，援越抗美。中国在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还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政府表明中国援越的决心。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四点警告：（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为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①

由于阿尤布·汗后来推迟访问美国的计划，周恩来委托他向美国传递的四点警告未能转达，因此，1965年6月8日，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点警告。②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告，使约翰逊总统在印度支那推行战争升级政策时，有所顾忌，不敢肆意妄为，比如他在战争初期，否决军方要把轰炸目标扩大到中越边界，在海防港布雷，派兵进入老挝截断“胡志明小道”等主张。约翰逊总统要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但不愿因此而与中国交战，他对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政府由于无视中国要求美国在朝鲜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而导致中美兵戎相见的教训，记忆犹新。约翰逊总统非常重视周恩来的警告，极力避免与中国交战，所以他在制定打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计划时，表现的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一事实说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发出的警告极大地支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美救国斗争。

1967年3月29日，范文同总理和武元甲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他指出：中国有句俗话，行路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九十里路，最后剩下十里更困难。爬山也是这样，比如喜马拉雅山，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爬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③

1969年，胡志明由于长期辛劳，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他要求中国派医生到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3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0–16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40–41页。

越南，协助越南医生为他治病。越南劳动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周恩来非常关心胡志明的病情，他和中国卫生部的专家们一块精心挑选经验丰富的医生，组成医疗班子，拟定治疗方案，并派遣专机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9月2日，胡志明因病不治，撒手人寰。周恩来于9月4日赶赴河内吊唁。[①]

中美缓和与中越隔阂

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解冻给中越关系带来凉意，尼克松政府希望通过打“中国牌”，来加强美国同苏联争霸时的战略地位和筹码，来为美国从越战脱身寻找出路。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抵御苏联威胁的当务之急，还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和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正与美国势不两立、浴血奋战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对于中国突然与美国握手言和的举动，深感不安和困惑。实际上，在中美会谈中，周恩来拒绝美方提出的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帮美国说话、向河内施压的要求，拒绝将台湾问题同越南问题挂钩，即中国在越南问题上作河内的工作以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让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和周恩来先后举行了六次会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在7月9日的会谈中，双方谈到印度支那问题。基辛格提及美越巴黎和谈，说有两个障碍阻止了和谈迅速取得成果：（1）北越要求以推翻南越西贡政权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2）北越拒绝同意在美国撤军时在全印度支那停火。基辛格重申美国的立场：只要北越同意停火、释放美国战俘、承认南越西贡政权，美国就可以立即撤军，结束战争。基辛格补充说：对南越西贡政权的国际地位的保证，可以由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作出。但周恩来并没有接受基辛格的建议而承担对南越西贡政权的国际地位的保证。他批评美国支持南越吴庭艳政权破坏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协议，指出美国应该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扩大负责。基辛格希望在印度支那得到一个维护美国的体面和尊严的解决办法。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把军队从印度支那全部撤走，就是体面，就是光荣。周恩来重申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1）美国，以及其他跟随美国向印度支那派遣军队的国家，必须从印度支那撤军；（2）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42页；何延虹：《情谊深似海——记周恩来与胡志明的交往》，第10–12页。

未来。[①]

1971 年 7 月基辛格访华和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周恩来都立即飞赴河内，向越南领导人通报中美会谈情况，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希望得到越方对中美改善关系的理解和支持。1971 年 7 月 11 日，基辛格结束秘密访问，离开中国。基辛格前脚走，周恩来后脚（7 月 13 日）就到了河内，马上向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通报基辛格访华的情况以及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中美之间交换的看法。周恩来向越方表示："我向基辛格声明，关于越南和平问题的谈判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北京。我们只想作些推动工作。"[②]1972 年 2 月 28 日，周恩来在上海送走尼克松后，又于 3 月 4 日再次专程奔赴河内，向黎笋、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介绍中美高级会谈的内容。周恩来说："从 1955 年开始，中美谈判已经历了 16 年，当约翰逊总统扩大侵越战争时，我们停止了与美国的会谈，美国停炸越南北方后才得以恢复。1970 年美国在柬埔寨策动'三·一八'政变后，我们又停止了会谈。这都是从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考虑的。这次我们同尼克松会谈提出了四项原则，其中两条是：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任何一方都不能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不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我们向美方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南方提出的'七点和平倡议'，支持印支高级会谈发表的声明。如美国不停止侵略战争，中国决不停止对越南和印支人民的支援。如美国不接受越方的意见，战争就不会终止，远东局势也不会缓和。"[③]

尽管周恩来推心置腹，苦口婆心，但越南领导人不为所动。他们当面虽然没有表示反对，但背后却对中美和解深为不满，对中国产生怀疑和怨恨。河内报刊发表了大量社论和文章，虽不公开指名道姓，却都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联美反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就此事，周恩来于 1971 年 7 月 20 日，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

①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记录》，1971 年 7 月 9 日，载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pp. 359-397。又参阅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33–45 页。美国已经将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记录的全文公布，而中国目前只公布了会谈记录的片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第 5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469 页。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第 5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15 页。

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①] 同年，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南方外长阮氏萍、越南民主共和国文化部长黄明鉴时，指出：“基辛格访华刚走，我就立即去河内，把情况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把我心都掏出来了。新中国成立 22 年来，美国仍不承认中国，中美谈判 16 年也没成果，现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谈判，就等于他们承认了错误。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周恩来并未去华盛顿，你们可去巴黎同美国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我们并未出卖朋友。”但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不相信周恩来的解释，坚决反对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②]

1973 年，美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越南实现统一。中国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谋求霸权主义，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同志加兄弟”变成“对手加敌人”。

结　论

周恩来所面对的中越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越关系中，既有团结合作的一面，又有摩擦分歧的一面。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同情并支持胡志明领导的革命，为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提供了大量支援。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反对越南在处理与老挝和柬埔寨的关系时，居高临下，包办代替，输出革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抵制越南对待老挝和柬埔寨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认为：老挝和柬埔寨与越南的情况不同，两国的王国政府还有一定的民心，两国的多数民众要求的是民族独立，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印度支那三国各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各有自己明确的国家界限，越南不应该无视这种界限而推动成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周恩来主张：印度支那三国应该彼此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

每当中国调整和大国的关系时，都会对中越关系带来冲击和负面影响，比如 1960 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和 1970 年代初的中美和解。每当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表示困惑、不解和抱怨时，都是周恩来出面耐心作解释，尽力维护中越团结。但结果都不理想，不管周恩来如何努力去说服越方，越共领导人都坚持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469–470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1970–1978》，第 60 页。

为中国在调整与大国的关系时，只顾中国自己的利益，牺牲了越南的利益。

导致中越摩擦的原因，既有现实中因为两国国家利益相左而产生的新纠纷，又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阴影。越南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国家，他们由于国家势单力薄，在遭遇外部强权（先法国后美国）干涉时，不得不寻求外援，请求中国支持，但他们又不想给外界留下一个跟着中国跑的印象。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越南人的民族特点。总地来说，他在处理越南问题时，能够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越南人，和胡志明建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周恩来知道中越关系中历史包袱的沉重，勇于正视历史上中国曾经侵略过越南的事实。他在1956年访越时，专程去二征王庙献花。但在少数场合，特别是当中国外交政策受到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支配时（比如60年代初期），他对越南人也会表现出强加于人的倾向。在中苏争论激化的时候，周恩来对胡志明在中苏之间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表示不满。他没有能够设身处地从胡志明的角度看待问题，没有能够理解胡志明在中苏分裂中所处的尴尬困境。

（本文最初于2008年4月提交给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发表在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感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徐行教授邀请我参加会议。）

中柬“特殊关系”的形成（1954—1965）

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的十一年是中国和柬埔寨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彼此缺乏了解到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的过程。1964年中国向柬埔寨作出安全承诺，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史上是极其少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对一个东南亚小国予以如此高度的关注？为什么柬埔寨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把中柬关系的发展置于中国对美斗争的大战略背景下来考察。在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视美国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他们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为了反对和削弱美国这个主要敌人，中国领导人在外交领域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分化对手并争取中立势力。就柬埔寨而言，中国外交的主要考虑就是如何赢得西哈努克对中国的好感，争取他的合作，防止柬埔寨加入美国组织的反华包围圈。此外，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柬埔寨来扩大中国在亚非中立国家中的影响。

本文利用新近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考察1954年至1965年中柬关系的发展过程，揭示影响中国对柬政策的主要因素，并用中柬关系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冷战外交的一些特点。

日内瓦和万隆：中柬接近的开始

中国与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王国的首次正式接触是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

会议上。在这之前，中国领导人除了对越南的情况比较熟悉以外，对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知之甚少。[①] 在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以外交大臣狄普芬（Tep Phan）为代表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见和谈话。在 6 月 20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首先表达了中国对东南亚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对他们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支持，然后指出，中国希望柬埔寨成为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那样的东南亚新型国家。周恩来明确地告诉狄普芬：中国反对美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我们所关心的是美国基地，如果有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能不加过问的”。狄普芬回答：“现在我们和美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周恩来接着强调说：“美国正在组织东南亚公约，想拉柬埔寨参加，我们认为，这对柬埔寨不利，”“我们不愿看到，在三国的任何一国内建立军事基地。”会谈快结束时，周恩来重申，无论大国小国，“我们都是国家，要互相尊重”。狄普芬说：“我们与中国很接近，许多人都是中国血统。”[②] 周恩来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他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柬埔寨和美国建立军事同盟，使美国对华封锁链上又增加一个环节，而他一开始并不清楚柬埔寨外交的走向，害怕柬埔寨会倒向美国一边，允许美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狄普芬对柬埔寨和美国关系性质的解释，无疑使周恩来感到释然。

为推动印度支那三国的合作，周恩来于 6 月 21 日设晚宴，请柬埔寨王国代表团、老挝王国代表团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一块进餐，介绍他们以后多开展直接联系。[③] 6 月 24 日，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会谈。在谈话中，西哈努克的特别代表森沙里（Sam Sary）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说，如果和平不能在印度支那实现，那么柬埔寨可能与美国合作，比如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之类。[④] 范文同告诉柬埔寨的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

---

① 1972 年 2 月 24 日，周恩来在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时说，1954 年日内瓦会议之前，我们对印度支那三国的了解很少，只对越南有所了解。参见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ruary 24, 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1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p. 777。

② 《周恩来与狄普芬会谈记录（节录）》，1954 年 6 月 20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316–319 页。（档案文件中对 Tep Phan 的最初译名是泰普潘，后改译为狄普芬。）

③ 《周恩来关于第十六次限制性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 年 6 月 21 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第 176–177 页。美国曾试图阻止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参加周恩来的晚宴，但没有成功。见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From Curiosity to Confront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 35-36。

④ 李克农致毛泽东、刘少奇等的电报：《二十四日范文同与柬埔寨代表见面谈话内容》，1954 年 6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206-00016-31。

将在柬埔寨的“越南志愿军”撤出。[①] 范文同的保证使害怕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柬埔寨王国代表团松了一口气。

周恩来在日内瓦和柬埔寨王国代表团交往时，谦虚友好，平等待人，不以大国领导人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待柬埔寨。他的与人为善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触动了柬埔寨人。尽管西哈努克本人没有参加日内瓦会议，但在柬埔寨王国代表团从日内瓦回国后，他仔细地听取他们汇报参加会议的情况和感受，特别是他们和周恩来谈话的经过和印象。[②]

西哈努克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起初十分担心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会对柬埔寨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一度曾考虑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借美国组织的东南亚条约同盟来抗衡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友善举动使他非常意外，中国的友好，再加上后来（1954 年 11 月）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对柬埔寨的访问，坚定了西哈努克奉行中立政策的决心。[③]

在 1955 年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首次见面，相谈甚欢，气氛融洽。[④] 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浦寿昌后来回忆道：“印尼组织亚非会议时有一个规矩，会场不先开门，让各国代表团在外面站着队等候，然后鱼贯而入。一次，总理问我，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是谁？”“我一打听，是西哈努克。打听清楚后，总理主动过去跟他交谈”。[⑤] 4 月 20 日，周恩来宴请西哈努克。席间，周恩来表示，中国对柬埔寨抱有好感，希望在两国交往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西哈努克知道中国领导人很在意柬埔寨和美国的关系，所以，他在交谈中首先说明了他对美援和美国军事基地的态度。他告诉周恩来：柬埔寨拒绝接受附加任何条件的外来援助，因此获得的美援很少；柬埔寨保证遵守 1954 年《日内瓦协议》，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

---

①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 36.

② 多年以后，西哈努克在回忆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时说：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曾主动宴请柬埔寨王国代表团，表示中国愿意同柬埔寨结好。柬埔寨王国代表团的宋双回国后向我作了汇报，说周恩来同他们谈得很亲切，赞扬我为柬埔寨赢得了独立，并把柬埔寨引上了和平、中立、进步的道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见张金凤：《记西哈努克国王同唐家璇副部长的一次谈话：情真意切忆恩来》，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5 辑，第 61 页。

③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1971), p. 58; Roger M. Smith, *Cambodia's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68-69.

④ Nayan Chanda, “China and Cambodia: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 i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9, No. 2 (November 2002), p. 1.

⑤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223 页。

军事集团，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然后，西哈努克谈了他对柬中关系的看法：柬埔寨政府已经拒绝美国的要求，决定不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在法国统治时期台湾派驻金边的领事；亚非会议以后，他准备访问中国。①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在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谈论在会议上接触到的各国代表团的印象时说，他觉得西哈努克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开明、爱国的亲王。②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待人接物时总是放下身段，彬彬有礼，不摆架子。他所表现出的谦逊和友善态度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柬埔寨“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③周恩来同西哈努克在万隆的直接交往增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了解。

在对外关系方面，西哈努克执行中立政策，左右平衡，尽量不得罪冷战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方。他在万隆和周恩来相谈甚欢的同时，他的官员也在和美国人谈判“军事防御协定”（Military Defense Agreement，MDA）。1955 年 5 月 16 日，柬美正式签订“军事防御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向柬埔寨派遣“军事援助顾问组”（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MAAG），负责向柬埔寨军队提供武器装备。西哈努克一方面接受美国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又继续使用法国教官训练他的军队，美国人对此啧有怨言。对柬美“军事防御协定”的缔结，法国、中国、越南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48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105 页；Rahul Mukherji, “Appraising the Legacy of Bandung: A View from Ind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8), p. 168.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对柬外交中的作用，参见 Sophie Richardson,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59 页。

③ 转引自杨明伟、陈扬勇：《周恩来外交风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117 页。西哈努克甚至说，他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时就“一见钟情”。参见 Norodom Sihanouk with Wilfred Burchett, *My War with the C.I.A.: Cambodia's Fight for Survival* (Middlesex, U.K.: Penguin, 1973), p. 202。1998 年 3 月 5 日，正值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西哈努克在北京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说，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同我们热情交往，双方自此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参见张金凤：《记西哈努克国王同唐家璇副部长的一次谈话：情真意切忆恩来》，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5 辑，第 61–62 页。

民主共和国、印度以及日内瓦协议国际监察委员会都表示反对。[①]6月22日，周恩来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指出：柬美“军事防御协定”的很多条款违背了《日内瓦协议》。[②]作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国之一的英国，担心美国阻挠《日内瓦协议》实施的做法会使印度支那的局势再度紧张，曾设想由印度向柬埔寨派训练军队的教官。[③]

从万隆到建交

1955年是柬埔寨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3月，西哈努克将王位让给其父苏拉玛里特（Suramarit），同时成立“人民社会同盟”（Sangkum Reastr Niyum, People's Socialist Community），自任主席。9月，柬埔寨举行全国选举，“人民社会同盟”赢得国民议会中91个议席的全部席位，随后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政府。[④]西哈努克重申，柬埔寨不同外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同外国建立军事联盟，不许外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不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⑤]

万隆会议以后的两年中，中柬关系有一定的发展，但西哈努克执行所谓不偏不倚的严格“中立政策”，不同分裂的国家中的一方建交。根据这个原则，柬埔寨政府在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关系上，采取“一律看待”的立场，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6年西哈努克访问中国之前，柬埔寨王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由于柬埔寨的中立地位，不能在使人民中国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相

①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96. 有关柬美“军事防御协定”的谈判经过、最后签订以及国际反应，详见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p. 38-47。关于西哈努克为什么不肯使用美国军事教官的问题，柬方的解释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和柬埔寨、法国代表团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不允许柬埔寨引进美国军事教官。见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Cambo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0,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21: East Asia Security; Cambodia; Lao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p. 499-500。

② 《周恩来致尼赫鲁信》，1955年6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5-00059-01。

③ Anthony Short, “British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the Eisenhower Er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4-265.

④ 杜敦信、赵和曼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87页；David P.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revise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 191; Marie Alexandrine Martin, *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62-63.

⑤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48页。

分裂的冲突中站在任何一方。这一冲突是构成世界紧张局势的严重原因之一。因此，至少在中国问题解决之前，柬埔寨应避免考虑任何目的在于外交上承认中国的行动。”[①]

1956年2月13日至21日，西哈努克率国家代表团正式访华。在同周恩来会谈时，西哈努克重申柬埔寨的中立政策，表示柬中关系目前先通过间接方式保持接触。周恩来表示同意。毛泽东在会见西哈努克时，得知中柬目前建立外交关系还有困难，就以理解的口吻说：“让我们看，建交好嘛；柬埔寨处境困难，我们可以等待。”[②]毛泽东对柬埔寨政府奉行和平中立政策表示赞扬，说这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③]

1956年11月，周恩来回访柬埔寨。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保持和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从1956年开始，中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无偿给柬埔寨物资和商品，援建成套设备项目。中国派出经济代表团常驻金边，又派技术专家赴柬埔寨考察，同柬方商定了援建纺织厂、胶合板厂、造纸厂和水泥厂等四个项目，柬埔寨成为中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无偿援助的第一个国家。柬埔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④]周恩来要柬埔寨华侨遵守当地法律的表态使西哈努克感到放心和满意。[⑤]

同周恩来理解和支持柬埔寨中立政策的态度相反，美国官员对西哈努克走中立路线并寻求发展对华关系非常不满。1956年2月10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特逊（Walter Robertson）对柬埔寨驻美大使农·金尼（Nong Kimny）抱怨道，他“对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做法深表遗憾”，因为中立政策“即使没有支持共产主义的话，至少也给人以支持共产主义的印象”。他问金尼，为什么柬埔寨不像菲律宾和泰国那样亲西方，而是采取中立立场，是不是受了印度的影响？[⑥]5

---

①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②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第59–60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48页。

④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49–152页；《方毅传》编写组编：《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有关中国对柬埔寨经济援助的详细论述，参见：张勉励：《中国对柬埔寨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探析（1956–1970）》（作者提交给2013年3月23–24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的论文。）

⑤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p. 104.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mny and Robertson, February 10,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21: East Asia Security; Cambodia; Lao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p. 498-499.

月 31 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罗伯特·麦科林托克（Robert McClintock）在一份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忧心忡忡地说，中国正对柬埔寨展示和平共处的“灿烂笑脸”，意在“破坏亚洲自由国家的团结”，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内部制造分裂。他建议美国政府增加对亚洲盟国和中立国家援助，以回应中国的和平攻势。①

1957 年，柬埔寨政府向中国外交部发出正式照会，表示“在金边的台湾领事是法国在政权移交时转给柬埔寨的。这个所谓领事是法国高级专员派遣的，柬埔寨独立后的正式典礼从未邀请过他”。柬埔寨的这个外交照会表明，西哈努克在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松动。②

1957 年以后，柬埔寨同邻居泰国和南越的关系急剧恶化，一时周边险象环生。③ 先是泰国政府派兵占领位于泰柬边境的有争议的历史古迹柏威夏寺（Preah Vihear），并断绝与柬埔寨的外交关系。④ 接着 1958 年 6 月，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上丁省（Stung Treng），并将界碑向柬埔寨境内移动两公里。西哈努克要求美国出面阻止南越吴庭艳政权的侵略行为，但遭美国拒绝。⑤ 西哈努克怀疑美国政府在背后怂恿南越反对柬埔寨。⑥

尽管中国和柬埔寨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政府却率先表态，力挺柬埔寨。6 月 30 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出席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Yong Aun）为柬埔寨宗教等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如果按照国际惯例，东道国在处理这类外交活动时，一般派一位副部长参加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陈毅亲自出席，还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政府同情和支持柬埔寨反对南越武装挑衅的立场，“我们坚信，正义在柬埔寨人民这一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使西哈努克感到中国是柬埔寨抵制美国、南越压力的一个可依靠的朋友，从而也促使他决定与中

---

① McClintock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May 31,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21, p. 526.

②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第 60 页。

③ Mona K. Bitar, “Bombs, Plots and Allies: Cambod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8-5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Winter 1999), pp. 149-180.

④ 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74;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p. 107.

⑤ 英国官员批评美国袒护南越，认为西贡政权应为南越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关系负主要责任。他们告诫美国人，如果不阻止南越对柬埔寨的挑衅和干涉，柬埔寨不可避免地将去寻求中国的支持。参见 Mona K. Bitar, “Bombs, Plots and Allies: Cambod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8-59,” p. 168。

⑥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 64; Mona K. Bitar, “Bombs, Plots and Allies: Cambod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8-59,” p. 151.

国建交。[①]

柬埔寨同泰国和南越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是最让西哈努克感到棘手和头痛的难题，也是决定他的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西哈努克对美国的不信任促使他不得不调整外交布局，更寄希望于亚洲友好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

7 月 17 日，柬埔寨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8 日，西哈努克致函周恩来，提出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议。次日，周恩来复函西哈努克，同意和柬埔寨建交并表示中国将尽力支持柬埔寨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②] 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柬埔寨大使。在他去柬埔寨赴任之前。毛泽东对他说，不要在柬埔寨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③] 周恩来特别叮嘱王幼平“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④]

美国官员对西哈努克同中国建交的决定极度恼火。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卡尔·斯特罗姆（Carl W. Strom）于 7 月 25 日约见西哈努克，谈柬埔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斯特罗姆抱怨，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和柬埔寨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政策分歧”，西哈努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是一个“重大政策转变”，它不仅将柬埔寨置于苏联和中国“新殖民主义”的威胁之下，还使柬埔寨的邻居也处于共产主义颠覆的危险之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都批评柬埔寨，柬埔寨没什么朋友，是孤家寡人。斯特罗姆要西哈努克和南越搞好关系，西哈努克先为他的中国政策辩护，强调中国是柬埔寨旁边的一个大国，是一个现实存在。在对待分裂国家的问题上，他过去两年中一直采取不偏不倚，“一律看待”的立场，但这个政策并不成功。实际上，从万隆会议以后，他就一直在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谈到柬埔寨和南越关系的问题时，西哈努克说，尽管法国殖民时期划定的柬越边界对越南有利，但是越南人还不满意，他们老是要蚕食柬埔寨领土。他告诉斯特罗

---

①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50 页；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43 页。

②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第 61 页。

③ 王幼平：《去金边执行特殊使命》，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72 页。王幼平在回忆文章中还写道，有一次，中国在金边举行经济建设成就展览，原先的解说词中有一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把那句话改为“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曾就此事质问过他，他把毛泽东的话拿出来作挡箭牌，才得以过关。（第 72 页）

④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第 43 页；丹童：《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载《党史文汇》，总第 142 期，2000 年第 1 期，第 35 页。

姆，在柬埔寨人眼里，越南人比中国人更危险。[1] 斯特罗姆对西哈努克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在和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西哈努克越来越感到美国人的骄横和美援条件的苛刻。在柬埔寨的美国外交官经常颐指气使，美国大使甚至穿着短裤去和柬埔寨人会谈。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只能用于私营企业，不能用于国营企业，而在柬埔寨经济中，既有私营企业，又有国营企业。美国人规定，柬埔寨既然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就不应该再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援助。[2]

而中国领导人对柬埔寨却一直很耐心和友善。1958 年 7 月 24 日，周恩来在和柬埔寨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讨论中柬关系问题时说，中国非常了解和同情西哈努克亲王处境的困难，所以尽量给予支持，希望帮助柬埔寨克服这些困难。亲王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是适当的。在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周恩来说，中国在发展中，以后不仅在道义上，在物质上也可以多给帮助。现在我们正在发展工业，也希望别的国家发展工业，使亚非国家都强盛起来。我们愿意把中国的建设经验介绍给友好国家，愿帮助它们用最新的技术、最低的成本、最少的劳动力、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建设。[3]

8 月 15—25 日，西哈努克率柬埔寨王国国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正式访问，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西哈努克还去东北和天津访问，并参观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访问结束时，双方签署《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首相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对中柬建交、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国侨民和柬埔寨人民友好相处等表示满意。声明还强调，柬埔寨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应该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民族独立运动是当前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一切国际争端应该根据和平共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求得解决。[4] 西哈努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很关心柬埔寨的国内情况，很关心柬埔寨同邻国的关系，很想知道他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看法。西哈努克觉得，毛泽东是以平等的

---

① Str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July 25,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Cambodia; Laos(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 240-243;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 65.

② Marie Alexandrine Martin, *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p. 88.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4 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240–24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61–164 页。（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对西哈努克的这次访华活动没有涉及。）

态度对待他的，不像有些西方国家领导人（除了戴高乐将军）那样傲慢。[①]

西哈努克回到金边后，和美国大使斯特罗姆谈了他的中国之行。他告诉斯特罗姆，他在北京访问时，中国方面表示愿意向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和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但他只接受了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援助，而没有要中国的军事援助，因为他对目前从美国和法国那里获得的军事援助感到满意，他不能同时接受两边的军事援助。他还对斯特罗姆说，柬埔寨的外交政策没有改变。但斯特罗姆不相信他的话，反唇相讥地说："柬埔寨宣布支持联合国接纳红色中国就代表了一个政策变化。"[②]

西哈努克对斯特罗姆说的话很能反映此时他对美国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他知道美国人对他和中国建交并再次访问中国的举动不满，所以他对斯特罗姆说，柬埔寨的外交政策没有改变，以打消美国的猜忌和疑虑。尽管他不满美国在柬埔寨和南越、泰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不支持他，但他也不愿意和美国翻脸，仍想维持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想告诉美国人，柬埔寨并不完全依赖美国，如果美国不给柬埔寨军事援助，他可以从中国那里获得，所以美国应该多和柬埔寨合作，特别是在柬埔寨和南越、泰国的领土纠纷问题上，否则，他可能更倒向中国。

美国军方一直很担心西哈努克会向中国要求军事援助。8 月 2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给国防部长尼尔·麦克艾尔罗易 (Neil McElroy) 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可能以中柬建交为契机，试图向柬埔寨派遣军事援助人员，美国应该"采取新措施以阻止柬埔寨滑向一个更容易被共产主义颠覆和控制的处境"。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国应该加强和柬埔寨军队的联系，依靠柬埔寨亲西方的军队领导人，来抗衡那些主张和共产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柬埔寨政治势力。[③] 1959 年，美国邀请柬埔寨军方派人去菲律宾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海军演习，柬埔寨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比如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朗诺 (Lon Nol) 和国防大臣涅·刁龙 (Nhiek Tioulong)，主张派观察员去参加，但遭到西哈努克和外交部长宋双（Son Sann）的反对，未果。[④] 尽管朗诺和刁龙这样的高级将领有亲美倾向，但西哈努克此时在

① Norodom Sihanouk with Wilfred Burchett, *My War with the C.I.A.: Cambodia's Fight for Survival*, pp. 203-204.

② Eric Kocher to Walter Robertson, September 3,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pp. 249-250.

③ 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cElroy), August 22, 195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pp. 248-249.

④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编：《柬埔寨访华军事代表团人物情况》，1964 年 2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1206-02。

柬埔寨享有很高威望，还是能够驾驭他们的。[①] 发生在1959年的达春事件（Dap Chhuon Plot）加深了西哈努克对美国的不信任。达春是柬埔寨暹粒（Siem Reap）省省长和西北军区司令员，长期拥兵自重，野心勃勃，在暹粒省搞独立王国，还想将暹粒省从柬埔寨分离出去。他批评西哈努克的中立外交政策，反对柬埔寨同中国建交。他和流亡国外的西哈努克政敌山玉成（Son Ngoc Thanh）暗通款曲，并通过山玉成与南越和泰国建立了联系。南越和泰国则视达春为推翻西哈努克的工具，不但给他武器，还向他提供广播设备，供他作反对西哈努克宣传用。2月21日，西哈努克先下手为强，派兵攻占暹粒，达春畏罪逃跑。3月3日，他在试图穿越边界向泰国逃窜时，被朗诺将军带领的军队击毙。[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卷入达春事件仍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美国官员是事先知道达春想谋反的，而且没有将他要政变的情报告诉西哈努克。实际上，从柬埔寨和中国建交以后，不少美国官员就已经不看好西哈努克了，转而暗中支持柬埔寨反对西哈努克的组织和个人。

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59年以后，柬埔寨的安全形势更趋严峻。在南越，反对吴庭艳政权的武装运动日益发展。由于为南越的共产党武装运送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秘密运输线（即“胡志明小道”）是从柬埔寨领土经过，所以，吴庭艳的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大了对柬埔寨的袭击，侵犯柬埔寨的领空和领土，试图切断南越游击队的补给线。此外，南越还向柬埔寨提出几个沿海岛屿的领土要求。[③]

---

① 关于1950年代后期柬埔寨军队中亲美势力的有限作用，参见R. B.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61*(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163。

② David P.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01-107;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pp. 109-122；Mona K. Bitar, “Bombs, Plots and Allies: Cambod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8-59,” pp. 161-166; Edward Miller, “The Diplomacy of Personalism: Civilization,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Ngo Dinh Diem,”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86-388.

③ 美国和南越指责西哈努克允许北越使用柬埔寨领土向南越输送人员和武器弹药，但西哈努克矢口否认。由于柬埔寨和越南的相关档案尚未公布，目前还不清楚西哈努克和北越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如何沟通的，在多大程度上西哈努克是出于无奈，不得不让北越使用柬埔寨领土，以换取北越承诺不支持柬埔寨共产党反对他的政府。

为了表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周恩来和陈毅于1960年5月5日至9日正式访问柬埔寨。[①]由于周恩来访柬时正值柬埔寨为已故国王苏拉玛里特举行国丧，所以周恩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是穿着素白礼服到达金边波成东机场的。到达金边后不久，周恩来就去向苏拉玛里特的遗体致哀。[②]6日，在高棉皇家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你们和全体柬埔寨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可以指望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始终不懈的支持。”在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特别提到，双方谴责任何用武力侵犯邻国的企图。[③]

次日，周恩来在西哈努克的陪同下，在金边主持柬埔寨皇家电台开幕式，这个电台是周恩来在上次访问柬埔寨时赠送给西哈努克的礼物。周恩来还参观中国援建的胶合板厂并接见200名华侨代表。[④]周恩来向华侨代表询问了在柬埔寨生活和工作的华侨的情况，指出柬埔寨对华侨的友好政策，可以作为东南亚国家对华侨政策的一个范例。他嘱咐华侨要尊重柬埔寨法律，学好柬埔寨语言，在投资方面多发展对柬埔寨国计民生有利的工业，搞好同柬埔寨人民的关系。[⑤]

8日，周恩来、陈毅同西哈努克一块，乘柬埔寨海军的一艘巡逻艇游览南部风景名城白马（Kep）湾，在巡逻艇驶过的海域中，有一些星罗棋布的岛屿。在巡逻艇甲板上，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和陈毅，不久前南越海军曾在五个岛上登陆，经柬埔寨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如果南越海军强行占据这些岛屿，就意味着同柬埔寨开战，柬埔寨将宣战，后来南越海军才不得不从五个岛屿撤走。[⑥]周恩来和陈毅在柬埔寨海军船只上远眺曾被南越海军强占的岛屿，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柬埔寨维护领土主权斗争的坚定支持。

西哈努克此时尽管对美国政策不满，但他也不愿意得罪美国。在周恩来和陈毅

---

①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时提到周恩来即将访问柬埔寨，说：“人家请了几次，我们欠了人家的债。”《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6页；《陈毅传》编写组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553页；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第61–63页。（陈叔亮作为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随周恩来访问柬埔寨。）

③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277–27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1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278页。

⑤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第64页。

⑥ 同上，第64–65页。

访问柬埔寨以后不久，西哈努克于6月对英国官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说，他将在不久的将来去北京签订一个友好条约，但他和中国改善关系并不意味着他敌视西方或支持共产主义。柬埔寨人之所以对中国有好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有中国血统，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柬埔寨总是抱持友好合作的态度。他要麦克唐纳转告美国人，虽然南越和泰国觊觎柬埔寨领土，但他还不打算从苏联或中国那里获得军事援助。西哈努克暗示，如果南越和泰国继续向柬埔寨施加压力，他可能会和中国签订一个保证柬埔寨边界安全的条约。[①]

三个月以后，西哈努克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见了面。在谈话中，西哈努克告诉艾森豪威尔，最近越过边界进入柬埔寨的南越人日益增多，这些南越人中有不少是同南越政府对着干的叛乱分子。柬埔寨需要一些飞机和运输车来加强边界防卫。[②]

12月中旬，西哈努克再度访问北京，寻求与中国的进一步合作。他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签署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③]中方准备的条约原稿中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八个字，但在柬埔寨提出的对案中，这八个字被删去，原因是柬埔寨听西方通讯社说，中苏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苏联赞成和平共处，而中国不赞成。在谈判中，中方表示希望条约仍包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字样，柬埔寨最后表示同意。[④]条约第四条明确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同盟。[⑤]这样，柬埔寨就在法律上保证不会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在华期间，西哈努克除了缔结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外，还和周恩来就进一步发展柬中经济技术合作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他们主要讨论了原来援助柬埔寨的四个项目要增加设备、建设钢铁厂和机械厂需签订具体协议、修建铁路的技术帮助、帮助勘察铁路线路等问题。周恩来向西哈努克了解柬埔寨的农业情况，说以便考虑派什么样的技术人员去柬埔寨提供帮助。[⑥]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p.375; Ang Cheng Guan, *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6-1962*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1997), pp. 172-173.

② 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Waldorf Astoria Hotel, New York, September 27, 196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pp. 382-385.

③ R. B.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61*(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238.

④ 外交部国宾接待办公室编：《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访华情况简报》，第8号，1960年12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274-02（1）。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50–5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0页。

美国官员非常关注西哈努克是不是开始从中国获得军事援助。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威廉·琼布（William Trimble）在向国务院报告西哈努克访华情况时说，尽管中柬联合公报和中柬领导人的公开讲话都没有提及中国向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但不排除双方私下签订了有关军援的秘密协定。琼布认为，西哈努克在处理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并没有一碗水端平，因为他同意成立柬中友好协会，而迟迟不成立柬美友好协会。①

在这一时期，西哈努克除了加强和中国的合作以外，也努力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在访问中国之前，还访问了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同意帮助柬埔寨建立一所技术学校，修建水电站和探矿。②西哈努克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③并开始派学生去苏联、东德等东欧国家学习。④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中柬友好关系，为两国在 1960 年代前半期的多方面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1960 年代上半期，中柬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互相协调，互相支持。这些问题包括：老挝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核武器和核试验等。两国关系在国际事务的合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老挝危机。1960 年，印度支那地区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除了南越吴庭艳政权面临日益加剧的反政府骚乱以外，老挝也陷入一场全面的内战冲突。西哈努克担心老挝冲突的扩大会不可避免地殃及柬埔寨。他在 1960 年 12 月访问中国时和周恩来讨论了老挝局势。在 12 月 18 日的谈话中，周恩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已经建议举行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讨论老挝问题，越南的这个建议同西哈努克在 17 日向毛主席提出的建议很相近。西哈努克表示，这次会议应增加一些参加国，比如印度、波兰、加拿大、泰国和美国。他还说，越南的建议对他并没有什么不便。周恩来接

①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Cambo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3, 196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pp. 408-410.

② Memorandu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Anderson)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s), December 9, 196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 16, pp. 405-407.

③ Ang Cheng Guan, *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6-1962*, p. 271.

④ Marie Alexandrine Martin, *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p. 102.

着说："那么你可以提。"西哈努克说，他愿意去给有关国家（包括美国）写信，正式倡议召开一次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双方还讨论了目前暂时撤退到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老挝中立政府首相富马的去向问题。在周恩来提到苏发努冯邀请富马去老挝爱国战线党控制的桑怒省一事时，西哈努克说，富马在金边有一架飞机，他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他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①]

12 月 20 日，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乘火车去南京访问。在路上，周恩来向西哈努克解释中国为什么反对由联合国出面解决老挝问题。周恩来用刚果的前车之鉴来说明邀请联合国干预地区冲突的坏处。周恩来指出：虽然联合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有消极方面，那就是美国控制了多数表决机器。尽管美国的多数越来越少，但是它仍然是多数。刚果问题上就是那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国家从联合国军撤出来。卢蒙巴没有经验，他把联合国请进去，结果请不出来了。刚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训就是：提联合国不如不提联合国。所以我们主张老挝问题应该采取日内瓦会议的形式来解决，倒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联合国，而是因为美国还能操纵联合国"。[②]

1961 年 1 月 1 日，西哈努克给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加拿大、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三国各方发出信函，建议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维护《日内瓦协议》和恢复老挝的和平。他说，老挝问题影响到柬埔寨的安全，也牵涉到许多国家，应该由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七个签字国、老挝问题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国、比邻的泰国和印度支那三国各方共同开会加以解决。4 月 24 日，关于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的两主席苏联和英国外交部长就老挝问题致函有关国家，决定接受西哈努克的建议，于 5 月 12 日在日内瓦召开由扩大成员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老挝危机。[③]

在会议召开之前，出现了一个波折。5 月 1 日，西哈努克在万象举行记者招待会，突然宣布他本人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将不参加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并且撤回他关于召开十四国会议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原因是老挝国王曾批评西哈努克的建议干涉了老挝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向中央建议由我方出面做各方

① 外交部国宾接待办公室：《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访华情况简报》，第 8 号，1960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0274-02（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380–381 页。

③ 《章汉夫传》编写组著：《章汉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243–244 页；《陈毅传》编写组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第 558 页；R. B.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61*, p. 239.

的工作。5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有人指责西哈努克的建议干涉了老挝内政，这是毫无道理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由有关国家召开国际会议，制止美国的干涉，共同保证老挝的和平、独立和中立，老挝有关各方怎么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老挝问题呢？”翌日，周恩来又亲自致函西哈努克，表示希望他重新考虑关于他本人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将不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决定。随后，在苏联、英国等国家的斡旋和推动下，老挝国王于 5 月 11 日又发表了一个讲话，表示“强烈希望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将会高兴地把他所想出的解决老挝问题的伟大主意贯彻到底”。次日，西哈努克发表声明，宣布他将于 14 日去日内瓦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会议。同时，他还致电感谢周恩来吁请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努力。[1]

5 月 16 日，扩大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终于召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会议于翌年 7 月 21 日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两个文件。在这两个文件中，老挝王国政府声明：它决心走和平中立的道路，以建立一个和平、中立、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不承认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包括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与会各国则表示，欢迎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的声明，依照老挝王国政府和人民的意愿，承认和尊重并从各方面遵守老挝王国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承担不干涉老挝内政等一系列义务。[2]

日内瓦会议达成恢复老挝和平的停战协议以后，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毅提议：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签字仪式。陈毅的建议得到绝大多数参加会议代表团的赞同。西哈努克从法国起程前往日内瓦时，陈毅专门叮嘱外交部的韩叙：“西哈努克何时启程，何时到达日内瓦，你们一定要搞准确，及时报告。我们要到他的别墅去探望。”在西哈努克抵达日内瓦那天，陈毅提前 15 分钟赶到西哈努克下榻的别墅等候。当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公主一行乘车到达别墅时，陈毅第一个迎上前去，和西哈努克握手致意，并向他通报会议的情况。西哈努克深受感动。当他进入会场

---

① 《章汉夫传》编写组著：《章汉夫传》，第 248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45–48 页。有关中国在扩大的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上的作用，见 Qiang Zhai, “Buying Time for the Pathet Lao: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Laos, 1961-1962,”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Karine Laplante, eds., *The Failure of Peace: Indochina between the Two Geneva Conferences, 1954-1962*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10), pp. 85-108。

时，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并肩出现在各国代表的面前。[①]

中印边界冲突。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以后，亚非很多国家同情印度。中国希望通过柬埔寨来影响亚非国家对中印边界纠纷的看法，特别是争取中立国家对中国立场的支持。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后，锡兰出面组织一些国家进行调解。1962 年 12 月 16 日，在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倡议下，六个亚非国家（锡兰、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阿联和加纳）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就中印边境争端提出了一个“科伦坡会议建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对中国是不公平的。中国虽然不同意“科伦坡会议建议”，但也不反对科伦坡六国会议对中印边境争端进行调解。[②]

对于科伦坡六国会议的调解努力，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希望他们只作一般性号召和推动，呼吁冲突双方举行谈判，而不要提具体建议，不要充当仲裁者。由于柬埔寨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国家，所以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柬埔寨的作用，希望西哈努克在科伦坡会议上传达中国的立场，抵制“中国威胁论”。西哈努克一开始感到有些为难，因为他需要中国的支持，但又不想得罪印度，毕竟他和尼赫鲁是朋友，印度既是不结盟运动中的一个领袖，又是日内瓦会议国际监督委员会成员。所以，西哈努克起初有时帮中国说话，比如，在科伦坡会议上，他主张对中印冲突只起调解作用，不当仲裁者，反对将中印边界纠纷提交国际法院，因为，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这样做不公平。他有时又为印度说话。[③]

1963 年 2 月 10—18 日，西哈努克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就中印边界问题和他进行了多次谈话。10 日，周恩来到昆明迎接从印度过来的西哈努克，和他在昆明举行了三次会谈，详细说明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背景、发生经过以及印度政府制造紧张局势的目的和目前的形势。周恩来指出：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仅仅是建议，不是仲裁或指令，双方都可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我们原则上接受建议作为官员会晤

---

①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第 235 页。（李越然作为俄语翻译随陈毅出席日内瓦会议。）陈毅同西哈努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72 年 1 月 6 日陈毅去世后，西哈努克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对西哈努克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 9 月 13 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顾保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03 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93 页。

③ 《柬大使询问苏班德里约要求澄清事》，1963 年 2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0754-02；《第二亚洲司马隆德副科长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馆三秘林山谈话记录》，1963 年 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0754-02；康岱沙：《在柬埔寨的日子》，载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76 页。（康岱沙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的夫人。1962–1967 年，她随陈叔亮在柬埔寨度过了五年。）

的基础，但保留两点解释，不作先决条件。如果科伦坡会议再次开会，我们有一个必不可免的要求，即中印双方必须派出最负责的代表列席会议，说明双方的立场和意见。[①]

12 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分别和他谈话。刘少奇在和西哈努克谈话时，首先感谢西哈努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持的公正立场，然后重申中国政府的政策，指责印度在中印边界谈判问题在上预先设置先决条件，致使谈判无法开始。刘少奇指出，印度希望保持中印关系紧张，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好处不在中印边界上，那里是喜马拉雅山，都是石头。好处在另外方面，它可以得到其他国家援助，或国内有某些需要”。西哈努克在谈话中介绍了柬埔寨在科伦坡会议上的作法：“我们一直认为会议只应该作出一般呼吁，呼吁中印双方通过和平友好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作出技术性建议。但是我们处于少数，只有缅甸支持。因为会议要求一致，我们跟随了大多数，尽管我们不欣赏他们的建议。”西哈努克同意中国关于科伦坡会议就中印边界问题提具体建议的做法有弊无利的观点，指出：“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并不能起到便利双方会谈、解决问题的作用，相反的只会使问题更复杂化。我们的想法是，除了当事人外，其它国家只能促进谈判，只有当事者双方才有资格讨论技术性问题，我们没有资格。”刘少奇对西哈努克的表态很满意，说：“亲王殿下的主张是完全对的。不要把科伦坡会议放在仲裁者的困难地位。中印都是大国，你来仲裁，要么一方不满意，要么两方都不满意。”刘少奇最后强调，印度表面上还喊不结盟，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已经和西方结盟了。[②]

尽管西哈努克在科伦坡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时主张只作一般呼吁，不提具体建议，但他的观点和看法属于少数派，会议的多数国家坚持就中印边界问题提具体建议。为此，西哈努克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经常意见不一。1963 年 5 月 17 日，西哈努克致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对她就中印边界问题采取的行动提出异议。西哈努克说：“如果我们超越了存在于必要的调解和不可能的仲裁之间的界线，我们的努力便不可能取得效果。”“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在科伦坡会议范围内采取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2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350 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 720–721 页；康岱沙：《在柬埔寨的日子》，第 476 页。

②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接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谈话记录》，1963 年 2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204-01509-04。

行动并没有符合我们的愿望。”[①]

7月17日，中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周秋野司长交给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瓦特·西里克·马塔克（Sisowath Sirik Matak，又译“施里玛达”）一份给科伦坡会议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文件通报了印度近期在中印边境上的挑衅行动。马塔克感谢周秋野给他这份备忘录，表示他对印度的挑衅行为“感到很遗憾”。周秋野感谢西哈努克在科伦坡会议上对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贡献。马塔克说：“现在我们不再相信印度是不结盟国家了。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作法一贯是正确的。”周秋野回答：“是的，印度早已不是不结盟国家了。”[②]马塔克的话表明，中国在中印关系问题上影响柬埔寨的看法的努力已见成效。

1964年，锡兰以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名义就中印边界争端提出一个建议：要求中国作进一步让步，撤出设在中印边境西段的七个民政点，以换取印度同意谈判。2月，周恩来访问锡兰时，班达拉奈克夫人提出上述建议，周恩来当即拒绝，并详尽阐述中国不能接受这个建议的理由。[③]

后来，锡兰财政部长佩雷拉访华时，又向陈毅外长提出这个建议。10月初，科伦坡六国在阿联首都开罗出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时，讨论中印边界问题。10月5日，阿联总统纳赛尔对中国大使陈家康说，科伦坡六国要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第二天，陈家康同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柬埔寨副首相宋双交谈，转达中国政府对科伦坡六国建议的态度。陈家康告诉宋双，陈毅对佩雷拉说，中国已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作了很多让步，不能再让了，七个民政点一个也不能撤。宋双表示，如果科伦坡六国开会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他将维护中国的立场。宋双答应，如果纳赛尔要商讨这个问题，他一定事先通知陈家康。宋双还告诉陈家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已经通过柬埔寨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

①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西哈努克复班夫人信原文》，1963年5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754-02。

② 《第二亚洲司周秋野司长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瓦特·西塔克·马塔克谈话记录》，1963年7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754-02。

③ 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阿联、加纳等十国大使馆的电报：《关于锡兰最近对中印边界问题公开表态和我对策》，1964年8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7-01891-0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397页。

案。陈家康回答说，周恩来已经指示他对柬埔寨的友好行动表示感谢。[①]

总地来说，西哈努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倾向中国的态度。西哈努克明白，从柬埔寨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中国对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印度对他的重要性。西哈努克的法文秘书兼国家元首新闻处主任夏尔·梅耶（Charles Meyer）曾对中国外交官说，当柬埔寨遭到南越和泰国攻击时，印度、印尼和其它不结盟国家都未吭声，唯有中国支持柬埔寨。[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在这个问题上，柬埔寨连续多年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块，坚持不懈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西哈努克总是及时将联合国大会围绕是否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争论通报给中方。比如，1965 年 11 月，西哈努克让元首秘书处主任周成（Chau Seng）将柬埔寨驻联合国代表胡森巴（Huot Sambath）大使给康托（Kantol）首相的机密报告详告中方，使中国领导人对当时联合国内外的斗争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周恩来和陈毅对西哈努克如此关心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表示感谢和高度评价。周恩来曾指示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陈叔亮以周恩来的名义向西哈努克表示谢意。[③]

核武器和核试验。1963 年 7 月，美国、苏联、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个条约的目的是建立美苏英三家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剥夺其它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发展自己核力量的权利。[④] 因此，中国政府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9 月 5 日，周恩来在一次和外宾的谈话中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三国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周恩来指出，"三国条约"不是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而是很危险的一步。它只是把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们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核讹诈。[⑤] 在对待《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上，西哈努克和中国的立场一致，他也拒绝在条约

---

① 陈家康致外交部：《同柬埔寨代表团成员宋双的交谈》，1964 年 10 月 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7-00575-06。中国外交部官员认为，要求中国撤民政点的建议是印度在幕后鼓动的。10 月 8 日，外交部在一份给中国驻缅甸、柬埔寨大使馆以及驻英国代办处的电报中指出："要我在七个民政点问题上作出新的让步"的建议是"印度策动下，印、阿、锡三方合搞的一个新阴谋"。参见外交部致中国驻缅甸、柬埔寨大使馆以及驻英国代办处的电报：《关于科伦坡六国磋商》，1964 年 10 月 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0824-04。

②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柬梅耶透露不结盟会议问题》，1961 年 8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0986-04。

③ 康岱沙：《在柬埔寨的日子》，第 481–482 页。

④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 364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77 页。

上签字。[①]

中国政府为了回应《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963 年 8 月 21 日，西哈努克致信中国领导人，表示支持中国的建议。8 月 29 日，周恩来致电西哈努克，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②] 9 月 30 日，周恩来在接见西哈努克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时，再次对西哈努克支持中国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召开世界政府首脑会议的主张，表示感谢。[③]

翌年 10 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在阿联首都开罗召开。在会上，柬埔寨代表团重申，柬埔寨不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但是，会议在结束时仍通过了含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内容的决议，对此，柬埔寨代表团表示保留。[④] 同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柬埔寨舆论纷纷对中国的成就表示庆贺和支持。[⑤] 西哈努克和外交部长胡森巴分别向中国领导人发了贺电，对中国的核试验表示支持。在 1965 年 6 月举行的一次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印度提出了一个谴责中国核试验的提案，柬埔寨代表投了反对票。[⑥]

西哈努克除了在老挝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核武器和核试验这几个问题上和中方积极配合以外，还在其它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和中国领导人互通信息，交换情况和意见。由于西哈努克平时关心国际事务，对世界上很多热点问题都反应迅速，在不少重要的国际活动和场合中，都有他的身影，所以，他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了解全球政治动态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比如，西哈努克经常向中方透露不结盟国家会议的情况。由于中国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所以柬埔寨就成为中国领导人了解不结盟运动内幕的一个难得的渠道。[⑦]

①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p. 6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7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82 页。

④ 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柬埔寨对不结盟会议的反应》，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13-00404-04。

⑤ 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柬对我核试的反应》，1964 年 10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13-00396-08。

⑥ Michael Leifer, "Cambodia and China: Neutralism, 'Neutra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 M. Halpern, ed.,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 pp. 344-345.

⑦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柬梅耶透露不结盟会议问题》，1961 年 8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0986-04。

西哈努克还积极推动中法建交，帮助中国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联系。[①] 实际上，从1960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和苏联、大部分东欧国家关系的疏远和破裂，柬埔寨逐渐成为中国和国际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桥梁。

中国给柬埔寨的安全承诺

1963年，柬越关系恶化。西哈努克对美国越来越不满，因为美国不仅继续支持泰国和南越对柬埔寨施压，还向被南越庇护的山玉成组织“自由高棉”（Khmer Serei）运动提供武器和训练，支持他们袭扰柬埔寨。停止了两年的反西哈努克广播又开始活动。[②]

2月1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吐苦水，倾诉柬埔寨遭受泰国和南越欺负之苦。他说，泰国把他看成是头号敌人，曼古的报纸用通栏大字描述他是第一号敌人；南越常派飞机越境轰炸柬埔寨的村庄，造成很多柬埔寨无辜百姓生灵涂炭，然后借口说是把边界位置搞错了。毛泽东要西哈努克不要惧怕泰国和南越的压力，并用最近伊拉克的政变为例，提醒西哈努克要注意防政变，要把军队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毛泽东鼓励西哈努克说：“我们很感谢你们，你们在东南亚站住了脚，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国家有发展，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发展。希望你们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你们不要垮台，垮台不得了。”[③]

5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率政府代表团到达金边，开始访问柬埔寨。在刘少奇出访柬埔寨之前，中国政府曾获得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金边搞爆炸以破坏刘少奇访柬活动的情报，中国驻柬使馆根据西哈努克的意见，建议不定期推迟刘少奇访柬。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以后认为：这是新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不定期的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他建议刘少奇按原计划访问柬埔寨，但可以把日期提前，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为了保证刘少奇在柬埔寨逗留期间的安全，周恩来派专机到河南安阳把前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接回北京。在请示了毛泽东以后，周恩来作出两项安排：其一，派公安部局长凌云随王幼平去昆明，向在那里

---

①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有关西哈努克对中法建交的看法》，1964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824-01；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柬报评论中法建交问题》，1964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824-01。

②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100.

③ 《毛泽东主席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记录》，1963年2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204-01509-03。又见康岱沙：《在柬埔寨的日子》，第476–477页。

休息的刘少奇汇报情况；其二，派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的随行人员，先期抵达金边，以指导中国大使馆同柬埔寨政府商讨安全保卫工作。[①]

在柬埔寨访问期间，刘少奇参观了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成就展，视察了中国援建的"柬中友谊纺织厂"。刘少奇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柬埔寨王国政府1962年提出的由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与会国保证和尊重柬埔寨的中立和领土完整的建议，不仅符合柬埔寨人民的愿望，而且有助于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建议。[②] 在告别宴会的致辞中，刘少奇说："我们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来干涉、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将一如既往，密切合作，相互支持。我们两国人民不仅在今天和睦相处，而且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③] 在刘少奇如期顺利地访问了柬埔寨之后，西哈努克感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来。"[④]

8月，柬埔寨和南越断绝外交关系。[⑤] 11月初，南越军队哗变，推翻吴庭艳政权。西贡发生的流血政变给西哈努克敲了警钟，他意识道，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以毫不留情地指使南越亲美军官除掉吴庭艳的话，它也可能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西哈努克于1963年11月宣布停止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⑥] 西哈努克将外来军事援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法国等友好国家身上，中国和法国都没有让他失望。

中国领导人对西哈努克敢于顶撞美国的独立精神大加赞赏。1964年2月7日，邓小平以代理总理的身份对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华大使西里克·马塔克说：中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十分密切，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重要的是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王国政府有独立的政策，有民族自尊。过去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在你们独立以后想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坚决抵抗了。在国际事务中，你们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起的作用难道比其他大国起

---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722–723页；王幼平：《去金边执行特殊使命》，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6–82页。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75–576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723页。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51页。

⑥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101;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pp.160-161.

的作用小吗？当马塔克提到柬埔寨希望召开国际会议保证柬埔寨中立时，邓小平马上表示：我们衷心支持你们召开这个会议。[①]

3月31日，毛泽东在接见朗诺率领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时也对西哈努克敢于同美国叫板的作法表示赞许，他说：“你们很坚强，你们的国家包括你们人民和政府一起，敢于与欺侮你们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你们不接受美国的控制。”朗诺回答：“这是我们一贯的路线。”毛泽东继续鼓励道：“我们很赞成，很赞成你们的政策。全世界都在注意你们，注意你们停止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把美国的军事援助团赶掉。”朗诺告诉毛泽东，美援一直成为美国“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的借口，要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毛泽东表示：“不仅仅如此。你们的国家比印度要小，但是敢于跟强国作斗争，得到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的拥护。在现在的世界上，不对帝国主义作斗争，要存在是有困难的。”[②]西哈努克知道朗诺亲美，派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影响他，改变他的态度。[③]

法国领导人同中国领导人一样，也很同情柬埔寨的处境和困难。1964年1月，法国国防部长皮埃尔·麦斯末（Pierre Messmer）访问金边，同意向柬埔寨提供军事装备，从而恢复了过去法国同柬埔寨的军事合作关系。[④]柬埔寨积极支持中法建交，金边的媒体甚至开始讨论建立“北京—金边—巴黎轴心”，来扩大三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与影响。[⑤]

1964年8月初，“东京湾（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约翰逊政府以此事件为借口，在越南进行战争升级，印度支那局势更趋紧张。9月底，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利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东南亚形势，希望获得中国更明确的安全保证。有西方学者说，西哈努克甚至准备放弃中立立

---

①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95–1796页。

② 《毛泽东主席接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1475-03。

③ 朗诺虽然亲美，但他在柬埔寨同泰国、南越关系的问题上，民族主义情绪却非常强烈，可谓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曾说：不仅白马对岸的那些岛屿是柬埔寨的，“而且整个南越也是我们的”。参见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编：《柬埔寨访华军事代表团人物情况》，1964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1206-02。

④ R. B. Smith,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I. The Struggle for South-East Asia, 1961-6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p. 211.

⑤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有关西哈努克对中法建交的看法》，1964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824-01；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柬报评论中法建交问题》，1964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06-00824-01。

场，提出与中国缔结共同防卫条约。[①]

西哈努克在北京逗留期间，同周恩来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不仅帮他安排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的三国四方会谈，还向他详细解释了中国对柬埔寨的安全承诺的含义，并安排中国对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的事宜。9 月 28 日，西哈努克和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会客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西哈努克先通报他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阮文孝和陈文成谈话的情况，他说，柬埔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贯相互同情"，而美国政府和西贡当局"目前正在污蔑我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同谋犯。但是，将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定能够解放和领导南越，成立政府"。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他向阮文孝和陈文成作了如下表示：柬埔寨愿意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金边派常驻代表团，作为它的正式外交机构，这是给它的一个外交承认，"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它的合法性，承认它作为南越人民的真正代表"。[②]

西哈努克希望他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合作是互利的。他对周恩来说："在我提出帮助之前，希望能由他们方面作出一些表示，尊重柬埔寨领土完整、主权，承认柬埔寨的现有边界包括一些西贡现在所要索取的沿海岛屿。这些，他们过去也曾口头表示过，但如果现在能有更正式的，譬如文字方面的协议，就将为柬埔寨和越南今后的谅解奠定了基础。对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同意我的看法：第一，认为在政治上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第二，将来的两国关系要有一个基础，这就是承认现在的边界。他们提出了如何具体实现的问题，我表示可以直接谈判，地点是金边或在双方共同友好的国家，如北京、瑞士、捷克或印尼，他们已表示将发电请示其领导。这就是我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会谈的情况。我想阁下也不会不同意我的意见。"

周恩来说：他"完全同意"西哈努克的建议，认为他的建议"非常正义，非常有说服力，同时对印度支那和平和东南亚和平将起促进作用"。西哈努克担心他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合作会"引起美国和西贡的报复"。周恩来叫西哈努克不要怕，说"这是英明的措施"。西哈努克表示同意，说"我想它们也不敢作出很多报复，因为已有三个不结盟国家承认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即：古巴、印度、

---

① Allen Whiting, "The Sino-Soviet Split,"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34.

② 这一段和下面五段的叙述，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记录》，1964 年 9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204-01548-01。

阿尔及利亚”。

周恩来接着对美国的政策作了评估，并向西哈努克作安全保证。周恩来指出：“美国就是要称霸世界。它什么都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最后它在各地都要被赶走。它连一个南越都管不好，将来它的一千多个军事基地都要像南越一样，它怎么办？”“美国好像是强大的，但从全面看，美国是虚弱的。十多年前，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它向中国全面开火。当我们说‘美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柬埔寨，中国就要全力支援’的时候，我们是懂得和准备着美国要全面宣战的。我们有了准备以后，如果它敢来，它就将陷在广大的中国泥坑和人海里。”如果美国“真的打算动手，向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攻，向中国进攻，它就失败得更快。”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要在西哈努克这次访华的联合公报中明确阐述上述立场。他表示：“现在可以说，我们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我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反对它的侵略、战争政策……这个问题要在这次公报中有所表现。”“使殿下在离开北京时能有一个响亮的公报。”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柬埔寨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渠道问题，他提出：“我们愿意提供北京为联系地点之一，张岗（Truong Cang）大使阁下可以和驻我国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代表团联系，看看你们刚才所谈判的两点用什么形式表达出来。”西哈努克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周恩来接着谈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针对柬埔寨提交给中国驻柬使馆的军援货单，周恩来作了四点答复：第一，“就像刘少奇主席昨晚说的：我们基本上可以满足王国政府的需要。第二，还有一部分我们不能提供，比如飞机等。几年以后，我们大批生产了飞机，可以供应。第三，是货单上没有的，而我们还应供应的，例如供应枪炮时，我们就相应地提供枪弹、炮弹等。第四，就是陈毅元帅所说的，我们要相应地帮助柬埔寨建立一个修理枪械的工厂。有关军事援助的具体问题，将由我国的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上将与殿下指定的人谈一谈。”

最后，周恩来同西哈努克讨论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关于经济援助问题，中国将帮助扩大磅湛纺织厂（扩大五千锭）加织布机、扩建水泥厂（由年产五万吨扩大到十万吨）、改建造纸厂黄板纸车间和扩建机场。会谈结束时，西哈努克说：“十分感谢你们的友谊和谅解，使一切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周总理回答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10月1日上午，西哈努克观看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国国庆游行，下午同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西哈努克希望在支持柬埔寨的问题上中方能说“美国侵略

柬埔寨就是侵略中国"这样的话。周恩来对他解释说，虽然他在第一次会谈中表述的"美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侵略中国"和"美国侵略柬埔寨，中国就要全力支援"两句话字面上不同，但实质的安全承诺是一样的。不同处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柬埔寨是中立国家，如果中国说"美国侵略柬埔寨就是侵略中国"，就会给人一个柬埔寨是中国的盟友的印象，这样不利于柬埔寨的中立形象，但是，一旦柬埔寨遭到侵略，中国会全力支持，包括派出军事人员，用什么形式，可以再商量。西哈努克告诉周恩来，柬埔寨同老挝之间也有领土纠纷，因为富马声称柬埔寨的一个省是老挝的。西哈努克还说，富马已经投靠美国了。[①]

西哈努克原计划参加了中国国庆庆典后就去开罗出席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但为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线党的代表讨论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问题，他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在北京再停留几天，不去开罗，改派副首相宋双去。西哈努克同越南、老挝共产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直接记录尚未公布，但根据他事后对周恩来的描述，会谈结果并不理想。10月4日，西哈努克在同周恩来举行第三次会谈时，介绍了他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线党的代表没能就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问题达成一个书面协议的经过。周恩来安慰他说："现在亲王不搞一个文件比搞一个文件好一些。就目前来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不是一个政府。柬埔寨和它签订文件，美国会说西哈努克不是和平中立，他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民主共和国结成同盟了。对老挝爱国战线党也是同样，签订文件也有危险，因为，它也不是政府。"[②]

西哈努克解释他为什么想同越南人就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问题搞一个书面文件，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将来考虑，现在就从法律上打定基础，在边界问题上立下有效的法律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现在在和美国作斗争，需要我们给予帮助；将来它们不必要和美国斗争，是否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变了呢？所以需要签订文件，使它们将来不致改口，要有法律效力，永远肯定下来"。很明显，西哈努克对越南人的口头承诺很不放心。

周恩来虽然同情西哈努克的处境，但对越南人不愿以法律书面形式承认柬埔寨

---

① 《周恩来总理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204-01548-01。

② 这一段和下面两段的叙述，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记录》，1964年10月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204-01548-01。

现有边界的态度也无能为力，他只有向西哈努克强调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团结抗美的重要性。他指出：“你们几个国家和党的关系，本质上不会改变，大家都抵抗美国。”“我们共同形成一条统一战线，反对美帝。”他告诉西哈努克，为了推动印度支那三方面的合作，他要举办一个内部酒会，邀请三方代表参加。“招待会是我们内部的，对外不发表，免得引起猜测，这样可以自由一些，交谈交谈，有好处，不搞任何形式，这也表示我们不辜负亲王多留几天的好意”。

10 月 5 日，周恩来安排的招待会在钓鱼台国宾馆 17 号楼举行，出席招待会的有西哈努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范文同、黄文欢、阮基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陈文成、阮明芳，老挝爱国战线党的苏发努冯、富米·冯维希。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在招待会上先后致词。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大家反美的共同目标，指出：印度支那是有光明前途的，帝国主义势力一定会被赶走，印度支那国家一定能够实现和保持它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地位。希望四个国家在今后的会见和协商过程中相互支持。[①] 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设家宴招待西哈努克和夫人等柬埔寨客人。[②]

西哈努克同越南、老挝共产党代表围绕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的谈判的曲折艰难，充分反映了印度支那内部情况的复杂和敏感，特别是柬埔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关系异常微妙。出于反对美国干涉的共同利益的考虑，他们感到有必要保持合作，这个共同利益暂时掩盖了他们之间的领土纠纷。一旦反对美国的共同目标消失了，他们之间围绕领土划分的矛盾就会完全浮出水面，引起冲突，反目成仇，越南战争结束以后的印度支那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越南共产党对中国同情西哈努克的领土诉求的作法心怀不满，这也是造成日后中越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

西哈努克很感谢中国对他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安全方面的承诺。1965 年，他将新建成的一条从金边市区通往波成东机场的大道命名为“毛泽东大道”。[③]

1965 年 4 月，柬埔寨和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先是 4 月 5 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指责西哈努克的母亲在金边开妓院敛财。接着 4 月 28 日美国飞机越过越柬边界，轰炸柬埔寨磅湛（Kompong Cham）省的几个村庄，炸死炸伤柬埔寨村

① 《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在内部酒会上的讲话》，1964 年 10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204-01548-0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420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673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 420 页。

③ 康岱沙：《在柬埔寨的日子》，第 486–487 页。

民。西哈努克一怒之下于 5 月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①] 西哈努克敢于和美国分道扬镳的原因主要是三个：一是中国的安全承诺。二是法国对美国越战政策的批评。法国总统戴高乐公开质疑美国约翰逊（Johnson）政府对越南的军事干涉，使西哈努克相信美国的越战政策不会成功。三是西哈努克身边的法国顾问和助手都鼓励他同美国断绝关系。[②]

9 月底，西哈努克又去北京参加中国国庆纪念活动。29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同他交谈。毛泽东非常赞赏西哈努克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说："你们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拒绝美援，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并且公开的，不是暗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我曾担心拒绝美援后你们经不起考验。"西哈努克表示："我们拒绝美援就好像消了毒一样，就像刘主席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美援像鸦片一样，如果抽上瘾以后，开始不抽时就很困难。经过几个月后就会慢慢好起来。"毛泽东以鼓励的口吻说："这很好，很不容易。"西哈努克向毛泽东详细解释他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他说："西贡和曼谷的敌人对我们帮助很大。开始时，人们不同意与美断绝关系。但美、南越轰炸柬后，人们就同意了。所以开始想不通的现在也想通了。""青年和知识分子对我们是支持的，从去年起他们就要求我拒绝美援，断绝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的报纸也帮我的忙，他们对柬进行反宣传，进行各种污蔑，所以引起我的民族对他们的不满。"[③]

接着，西哈努克又向毛泽东介绍柬埔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在社会方面，西哈努克强调柬埔寨的稳定和团结。在经济反面，他指出："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也有公私合营和私营的工商业。私营企业是否存在，主要是决定于干部，干部不够，只能让他们暂时存在。"毛泽东建议："暂时可以缓和一些，不要太急。"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周恩来当晚为西哈努克安排了什么活动，周恩来回答：观看京剧《奇袭白虎团》。毛泽东借这个话题又指责美国，说：这部戏"是描写朝鲜战争的故事。美国人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西哈努克附和说："美国人自己好战才说别人好战。"毛泽东继续敲打美国："美国人说，东南亚不稳定是中国搞起来的。"西哈努克表示，他要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以正视听。他向毛泽东保证："当然我的声音小，但我要大声在世界上维护正义，恢复真实情况。虽然我说的话、写的文

---

①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pp. 124-125;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pp. 164-165.

② Milton Osborne,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p. 164.

③ 这一段和下两段的叙述都是根据《毛泽东接见西哈努克谈话记录》，1965 年 9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 106-01521-01。

章声音小，但有力量。当然中国不需要我这样的辩护律师，因为全世界人民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11 月下旬，西哈努克派朗诺率军事代表团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商谈如何将中国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物资通过柬埔寨运输到南越的问题。周恩来向朗诺提出："我们知道亲王同情南越解放阵线的抗美斗争，并赠给解阵药品。中国想通过柬埔寨向解阵提供一批粮食、食盐、药品，进一步还想提供一些武器和军用物资。所有运费、手续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大米我们准备用外汇向柬埔寨购买，从柬直接运往南越。食盐和药品由我们准备好，也准备经柬运往南越。"周恩来请朗诺向西哈努克转告："如亲王同意，可以告知陈叔亮大使，双方再进一步磋商具体办法。"朗诺回国向西哈努克汇报以后答复说，柬埔寨一贯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同意协助中国经过柬埔寨向解阵运输物资。在这以后，陈叔亮便奉周恩来之命处理援越事务。柬埔寨运输线路开辟以后，从 1966 年 12 月至 1969 年 3 月，中国用轮船运往西哈努克港转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武器弹药、通讯工程、防化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副食品等共十批，总重量达到 2.6 万余吨。中国的支持对越南取得抗美斗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1967），中国外交中的极左作法对中柬关系造成很大损害，西哈努克一气之下解散了柬中友协，并一度考虑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中柬关系跌到低谷。②1967 年，西哈努克对访问柬埔寨的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说，他不懂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运动。③ 周恩来竭尽全力挽回影响。1967 年 10 月 24 日，他托结束访华、即将前往朝鲜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给金日成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纳赛尔总统传达三点口信：（1）我们一直

---

① 康岱沙：《难忘在柬埔寨的岁月：忆陈叔亮大使外交生涯片段》，载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5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25–27 页。根据法国学者玛丽·马丁 (Marie Alexandrine Martin) 的研究，1965 年 11 月 25 日，朗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就中国通过柬埔寨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运送物资的问题签订了协议。参见 Marie Alexandrine Martin, *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pp.92-93。

②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 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371 页；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49–151 页；David P.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47;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pp. 188-122; Liu Xiaohong.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118.

③ Peter Edwards, *A Nation at War: Australian Politics, Societ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5-1975*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1997), pp. 144-145.

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2) 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3) 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斗争。[①]

10月26日，周恩来又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就柬埔寨方面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进行解释。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的地位的。"周恩来要张岗转告西哈努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作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②] 经过周恩来耐心的解释和劝说后西哈努克打消了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念头。[③]

1969年，中国重新向国外派出大使时，首先选择的五个国家是法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柬埔寨名列其中，说明中国政府对它的重视。西哈努克继续为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穿针引线，比如，1969年，他向中国传递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希望就改善中美关系访华的信息。[④]

结　论

1954至1965年这十一年是奠定中柬"特殊关系"基础的十分关键的时期，中柬两国领导人从彼此缺乏了解到交往日益频繁，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戒备冷漠到友好合作的过程。在这期间，西哈努克先后五次访华，刘少奇和周恩来均对柬埔寨做了回访。毛泽东十分重视中柬关系，西哈努克每次访华，毛泽东几乎都要会见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6页；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73–374页。

②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73–37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6页。

③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7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12页；Don Oberdorfer, *Senator Mansfield: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a Great American Statesman and Diploma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Books, 2003), p. 362.

他。两国关系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直接关注和推动下，发展很快。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前期的中柬关系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中国对柬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要大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柬埔寨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柬埔寨靠近中国南疆，地处印度支那这个冷战的热点地区，经常身不由己地被拖入到越南冲突之中，是冷战双方都非常关注的地方。鉴于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把柬埔寨纳入其反华包围圈，如何防止柬埔寨转向美国阵营就变成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对柬外交是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国际政治中为了打击美国这个主要敌人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中柬关系揭示了冷战时期中国对中立运动看法的变化过程。在 1950 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一度受斯大林的影响，批评中立主义。但是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他们越来越重视中立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由于柬埔寨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又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因此，处理好与柬埔寨的关系有利于扩大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这样的国家为“东南亚新型国家”，并希望柬埔寨也在外交上走他们的路。和中国领导人理解和支持柬埔寨的中立政策相对照，美国决策者尽管在表面上表示尊重中立主义，但在私底下却总是批评中立主义是过于天真的，是自欺欺人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被共产主义利用。[①]

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由于柬埔寨与其邻国（泰国、越南、老挝）都有领土纠纷和冲突，所以，中柬关系也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敏感问题，特别是同中越关系的牵连多、影响大。因此，柬埔寨对中国外交决策人极具挑战性：它既可以为中国的外交运作提供难得的机会和突破，又可以为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潜在的问题和麻烦，尤其是在未来的中越关系方面。

总地说来，1954—1965 年期间，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和保持了一个友好的双边关系，两国间的合作是互利的，给双方都带来益处。从柬埔寨角度看，中国不仅提供经济援助，还在柬埔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施以军援之手，作出安全承诺。从中国角度看，防止柬埔寨参加美国在东南亚组织的遏制中国的条约体系是当务之

① 1950 年代，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中立政策也是持这种明赞成暗指责的态度。参见 Richard Mason, “Contain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Non-Alignment: The Cold War and U.S.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50-1952,”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9-67。

急，中国成功地说服西哈努克坚守柬埔寨的中立底线，使其没有像泰国和菲律宾那样，成为美国反华包围链上的一个环节。中国推动柬埔寨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合作，使柬埔寨成为越南战争中共产党向南方运输人员和武器的通道。此外，由于西哈努克在国际舞台上很活跃，中国通过柬埔寨向世界传递声音，扩大影响。比如，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通过柬埔寨向中立国家表达中国的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台湾、核武器等问题上，西哈努克支持中国的立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关系。1960 年代中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受到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时，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作出过安全承诺。但是，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中立国家，中国不仅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还提供安全保证，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经历中是极其少见，1964—1965 年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的准同盟关系是另外一个罕见的案例。[①]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本文最初发表于《南洋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上。在收入本论文集时增加了内容。我在为写作此文收集资料时，得到沈志华、李丹慧和张静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① 1965 年印巴战争期间，毛泽东曾作出派兵援巴的决定。参见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 年，第 283 页。（杨公素当时担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参加处理印巴危机。）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巴关系的详细论述，详见成晓河：《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变，1962–1965》，载《南亚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0–23 页；成晓河：《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3 期，第 10–23 页；韩晓青：《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从根本上改善中巴关系的原因探析》，载《国际论坛》，2011 年第 2 期，第 45–50 页；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chapter 7.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期西方冷战史研究述评

西方的冷战史研究，可谓卷帙浩繁，方兴未艾。本章侧重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冷战史研究中的几个主要趋势和特点，评价其成就和不足。

西方的冷战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 19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划分。冷战结束之前的研究可以称作是“旧冷战史研究”，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研究可以叫作是“新冷战史研究”（New Cold War History）。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新冷战史研究”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核心观点。

“旧冷战史研究”主要指 1950 年代的“传统学派”，1960 年代的“修正学派”以及 1970—1980 年代的“后修正学派”。“传统学派”比较认同美国官方的说法，认为苏联应该对冷战的起源负责，而美国则是被动介入冷战，目的是为了维护正义，为了保卫自由民主制度，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修正学派”受越战失败的影响，强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检讨和反省。他们修正了“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受到更多的批评，他们对美国政策深感失望，认为冷战不是起源于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美国式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修正学派”学者倾向于接受经济决定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操纵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在全球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后修正派”一方面继承了“修正学派”的论点，另一方面吸收了“传统学派”的说法，认为美苏双方都应对冷战的起源负责，只是苏联所负的责任更大些。“后修正派”学者接受“修正学派”在分析美国外交时使用的“帝国”的概念，但是认为美国建立的帝国和苏联建立的帝国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帝国是“被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是“民主的帝国”，而

苏联的帝国是“强加于人的帝国”（empire by imposition），是“邪恶的帝国”；美国确实在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势力范围，但美国是被西欧国家和日本邀请去当盟主的，而苏联却是通过高压强制手段迫使东欧国家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统治和苏联霸权。[①]“帝国”范畴的使用，有利于学术界从历史比较的角度，从过去帝国的现象和经验中，归纳和总结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兴衰的机理和规律。

“新冷战史研究”就其“新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视野、新角度。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的冷战结束，使学者们能够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头有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看待，重新解释，重新评价。二是新材料，新证据。冷战结束之前，西方的冷战史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材料，尤其是英美两国的外交档案，因此当时的冷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只是美国外交史和英国外交史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冷战全球史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前共产主义国家档案的大量解密和公布，使得冷战研究可以建立在多边的和多国的档案基础之上。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新材料的出现是有其政治背景的。比如，在波兰，冷战结束后成立的后共产主义政府，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希望通过公布前共产党政权的档案和文件，来揭露共产党当政时的罪恶和腐败，以达到进一步贬低和削弱波兰共产党在波兰政界的影响的政治目的。但对于学者们来说，前共产党政府档案的解密，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重新探讨和认识冷战的机会，尤其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冷战的机会。

“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

“新冷战史研究”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今，以2000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波。

第一波产生于冷战结束以后的1990年代。当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一度引起东西方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冲突有所减弱，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一下跌入低谷，处于空前的低潮。前苏联和不少东欧国家纷纷向资本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靠拢。与此同时，南非结束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成立了多种族联合政府，民主化运

① 有关旧冷战史研究三个学派的史学史综述，参见：Charles S. Maier, “Revision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Origin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9 (1970), pp. 313-347; Robert James Maddox,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John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2 (Summer 1983), pp. 171-190。

动也在拉丁美洲取得长足进展，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成立多党制政府。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一度盛行“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人由于战胜了法西斯而对自己的民主制度信心大增那样，[①] 冷战结束时，他们又一次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战胜对手（共产主义）而对自己文化和价值观感到自豪。在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少学者都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而欢欣鼓舞，拍手叫好，自我庆贺，自我陶醉。他们沾沾自喜地认为，冷战的胜利代表了西方自由价值观的胜利，意味着作为西方民主价值观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彻底破产。在政治学领域，出现了“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以及“民主无先决条件论”等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强调，民主国家之间通常不互相侵略，不互相开战；民主制度可以超越民族、宗教、种族、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而普遍存在和适用，民主制度的产生是不需要先决条件的；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代表了人类思想发展的顶点。政治学教授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单向性的，是有结束点的；冷战的结局标志着历史作为一个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互相竞争的过程已经发展到了终点，因为一个真正的、没有竞争对手的资本主义全球文化已经出现，这个文化的基础是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使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进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价值观演变的顶峰。[②]

“西方胜利论”和“民主优越论”也影响了很多冷战史学者的看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回到了“旧冷战史研究”中的“传统学派”的观点上，开始批评斯大林，谴责苏联的外交政策，赞扬西方领导人，为美国的冷战政策辩护。在这方面，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外交史教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他是“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的主要推动者。1991 年，他说服麦克阿瑟基金会拨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著名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成立“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并同时创办《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推动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档案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倡导用多国档案和多边视角研究冷战历史，鼓励不同国家的学者就同

① 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②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福山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曾于 1989 年以文章的形式在保守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上发表。

一个课题一块开会，共同交流，集体讨论。很快“新冷战史研究”就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显学。

在充分利用新近解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加迪斯于1997年发表《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一书。[1] 在这本书中，加迪斯对冷战兴起、冷战中的一些重大危机和对抗、冷战结束的原因做了重新全面评估。他认为，新解密的前苏联政府文件以及来自其它共产主义国家的材料很说明问题，充分验证了过去“旧冷战史研究”“传统学派”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修正派”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像“传统学派”那样，加迪斯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影响，把冷战的起源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认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至于西方阵营的冷战表现，加迪斯认为，美国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做，美国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保卫西方的利益。在论述冷战结束的原因时，加迪斯强调冷战的结束是西方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冷战胜利的英雄是西方的强硬派和保守派，比如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教皇保罗二世。正像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加迪斯是以一种西方胜利者的自信，来重新审视冷战的历史的，他的口气就像一个法官，居高临下，在为一个案子做最后定论和判决：“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战全是共产主义的错，西方的遏制政策是英明的。加迪斯对冷战双方的领导人作了比较和评判。他认为，西方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一般表现得比较理性、冷静、克制和有分寸，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则容易表现的冲动、莽撞、冒险和不理智，他们常常会被革命理想或一时有利的国际局势冲昏头脑，从而作出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而过低估计对手的意志和力量的错误举动。比如，1949—1950年间，斯大林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忘乎所以，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1962年，赫鲁晓夫为古巴革命的成功而陶醉，为了保卫卡斯特罗政权，悍然将导弹运进古巴，引发一场美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核战危机。加迪斯指出，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冒险和挑衅触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冷战危机，威胁世界和平，将人类置于毁灭的边缘。

在加迪斯眼中，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第三世界只是次要战场。他的书以分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争夺和较量见长，尤其是对美国遏制战略的起源和发展见解精辟和独到，而对冷战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却着墨甚少，其研究视角属于欧洲中心论。加迪斯较少涉及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以及这些干涉所产

---

①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生的长期恶劣后果。比如，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冷战中打的一场代价最大、伤亡最惨、创痛最深的战争，其影响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依然非常巨大。但是，加迪斯对美国干涉越南的原因和失败教训，却语焉不详。再比如，除了越南以外，美国在冷战中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还插手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在那里寻找和扶植小伙伴和代理人。这些美国的第三世界盟友往往是军事强人和山寨老大，他们以配合美国反共之名，行独裁统治之实，用美援中饱私囊，并以防共为借口，压制和打击国内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践踏人权，实行白色恐怖。冷战结束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出现政治动荡，内乱频仍，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就是因为冷战中由美国扶植的军人独裁统治遗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对于这些问题，加迪斯的著作给力很少。另外，加迪斯的冷战史著述基本沿袭传统的外交史研究方法，侧重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主要关心美苏之间以及他们和各自盟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互动，主要探讨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与核竞赛，而对冷战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表现和影响关注较少。加迪斯曾经是“旧冷战史研究”中“后修正派”的带头人。冷战结束后，他一个华丽转身，成为“新冷战史研究”的举旗者。

“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沃切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他的观点与盖迪斯的立场接近，他批评斯大林对周围的人充满了不信任，认为斯大林总是希望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周围的地区，见缝就钻。马斯特尼对于北约和华约，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做了平行比较研究，建立了“平行研究项目”。他认为西方阵营，由于其民主决策机制和妥协机制的存在，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这种机制能够调整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而东方阵营缺少这种民主妥协传统，每当阵营出现重大危机，苏联红军总是通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1] 总体而言，“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学者赞扬西方领导人的决策，对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多做批评。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出现于2000年以后，出现在恐怖主义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新背景下。由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重新挑战

①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基督教文明，使西方的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先前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和满足感烟消云散，消失殆尽，西方的信心受到打击和重挫，“历史终结论”、“民主优越论”等一度充斥报刊的学说很快被人遗忘。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在世界上畅通无阻，所向披靡。为什么冷战后的第三世界麻烦这么多、冲突这么频繁、矛盾这么激烈、威胁这么大？带着这些问题，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理解当前第三世界动荡和纠纷的答案。他们认为，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介入和军事干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今日第三世界的反西方运动和骚乱埋下了种子。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外交史教授马休·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他于 2002 年出版《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一书。[①] 在这本书中，康纳利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置于东西方和南北方的双重矛盾中考察，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康纳利详细描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发动争取独立的斗争时，既利用全球范围的美苏冷战矛盾，又利用地区性的种族与宗教矛盾，来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支持，孤立法国。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既争取东方（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比如 1958 年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又积极寻求南方（穆斯林国家和组织）的援助。结果，在法国人的眼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既有共产主义渗透的影子，又有伊斯兰教抵抗基督教的味道。

通过考察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康纳利指出，仅用冷战的眼光来看待 1945 年后的历史是不够的，不全面的。在 1945—1991 这段历史中，除了东西方的对抗之外，还有南北矛盾，阿尔及利亚冲突就是这方面的缩影。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既寻求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和援助，称自己持反帝的立场，又呼吁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南北矛盾的体现。冷战结束后，哈佛大学教授亨庭顿（Samuel Huntingdon）提出“文明冲突论”，一时名声大噪，吸引了很多眼球。这是因为很多人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历史时，只是把这段历史简单地看成是一场自由民主制度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方冲突，而忽视了这段历史中所包括的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南北矛盾。在

---

① Matthew Connelly, *A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45—1991年这段历史中，东西方冲突常常“劫持”和掩盖南北纠纷，而实际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南北冲突要比冷战时的东西方冲突历史更悠远，持续时间更长。实际上，亨庭顿所描述的那些“文明的冲突”，在冷战时期就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人们没有注意罢了。人们如果意识到冷战时期存在的南北矛盾，就不会对亨庭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大惊小怪了。

康纳利著作的意义在于：它向我们提出应该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历史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战后世界的演进中有多种历史进程在起作用，其中，冷战和非殖民化运动是两个主要的进程，我们既要探寻这两个历史进程各自的发展脉络，又要考察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我们应该摘掉冷战眼镜看问题。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史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他于2005年发表《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一书。[1] 此书一问世，就引起冷战史学界广泛关注，好评如潮，获得多个学术书奖。就像康纳利关注第三世界一样，文安立也把目光聚焦第三世界。他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他在写作《全球冷战》一书时，脑子里就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他认为，不了解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争夺，就不能完全把握当今世界的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他批评过去冷战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倾向，认为过去学者们过多强调美苏在欧洲的对抗，过多强调他们之间的军事和战略的竞争，而忽视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忽视研究美苏是如何努力影响和改变第三世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走向。文安立提醒读者，在冷战期间，如果欧洲那么重要，为什么美苏领导人要在第三世界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他指出，实际上，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才代表了冷战的最主要的方面、最核心的问题。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冲突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而第三世界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竞争场所，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场所。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念具有全球适用性，来打击、诋毁对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因此，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代表了冷战冲突的核心和实质，即证明和显示谁代表的制度最

---

①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好，谁代表的制度能更好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社会和经济问题。

文安立指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介入往往和当地的政治斗争缠绕、交织在一起，产生很多与美苏的初衷相矛盾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有他们自己的算盘，有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并不是超级大国的驯服工具和应声虫。在美苏试图利用和摆布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竭力利用超级大国，试图从美苏手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实现现代化，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敌，镇压民众反抗，维持他们的权力和统治地位。结果，常常出现"小国操纵大国"（the tail wags the dog）的现象。冷战发展的时期正是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时候，冷战使非殖民化进程变得更动荡、更艰巨、更充满暴力和破坏性，使得第三世界的动乱、危机和革命，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大国的干涉使得当地社会的矛盾更加复杂，冲突的结局更加扑朔迷离。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冷战争夺，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在后殖民时代对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继续干涉。

在文安立的笔下，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已经超出人们习惯认为的东西方冲突。从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角度看，美苏都代表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希望将西方模式强加给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换句话说，在第三世界领导人眼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实际代表了南北冲突，即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冲突。

"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就是弗吉尼亚大学外交史教授麦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他在 2007 年出版的新作《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和冷战》中[1]，对美国的政策作了很多批评和检讨。在讨论导致冷战结束的原因时，莱夫勒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因为主要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里根的作用是次要的。里根的作用并不在于他对苏联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强硬政策，使戈尔巴乔夫害怕和恐惧，而在于他能够赢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里根在他总统第一任期内，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推动星球大战计划，支持阿富汗的反苏抵抗力量，虽然他在私下也曾致信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连科，建议美苏举行限制核武器的谈判，但里根在第一任期内推行对苏强硬政策只是加强了苏联的不妥协立场。里根并非固执己见到底之辈，他在第二任期内，调整了对苏政策，从强硬转向对话，和戈尔巴乔夫举行多次高峰会议，保持密切沟通，建立相互信任。导致里根在第二任期对苏采取缓和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因素包括：国内为了缓解预算压力；国外为了缓解西欧国家的压力。

① Melvyn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莱夫勒赞扬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人表现了渴望和平的决心和勇气，能够超越他们各自前任的局限性，克服身边一些持强硬观点的顾问的反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核武器问题、常规武器问题、德国问题、东欧问题）达成一致，结束冷战。戈尔巴乔夫做的让步多，但里根也作出一定回应。

总之，“新冷战史研究”第二波，特别是康纳利和文安立的作品，通过其对冷战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争夺的原因、影响和后果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弥补了“新冷战史研究”第一波学者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展现了冷战作为一个全球现象的全面图景，从而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冷战作为全球史的了解和认识。

文化冷战史

在“新冷战史研究”中，除了以上学者侧重从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的角度开展讨论和探索外，还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可以叫作“文化冷战史”（Cultural Cold War）研究的热点。这些学者指出，冷战是一场全方位的较量，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不一而足。比如，冷战双方在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不仅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力量，还尽量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和潜能，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出版商、记者、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演员、运动员等社会精英，在国内和国际的公开场合，宣传各自的文化特色，展示各自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激发本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民心，赢得民意。[①]

很多学者注意到，冷战双方开展的宣传攻势的一个核心就是形象塑造和角色定位。形象塑造和角色定位既是一个国际工程，即向外部世界表明：“我们这个国家代表了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制度以及我们在世界上要扮演什么角色，”也是一个国内工程，即向国内民众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谁，我们具有什么信仰，我们在国际斗争中应该支持谁、反对谁。”

① 关于美国在开展文化冷战时政府和民间合作的论述，参见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W. Scott Lucas, “Beyond Freedom, Beyond Control: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in the Cold War,” in Giles Scott-Smith and Hans Krabbendam, e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0*(London: Frank Cass, 2003), pp. 53-72; Kenneth Osgood and Andrew K. Frank, eds., *Selling War in a Media Age: The Presiden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10)。

西方学者对美国开展的文化冷战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对美国宣传战和心理战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有：美国政府是（1）如何宣传和利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的？如何通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来争取民心和民意（“winning hearts and minds”）？如何影响或引导国内和国外的舆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看法？（2）如何组织和实施宣传战和心理战，如何为行政部门的宣传机构和项目争取国会拨款；(3）如何动员和协调政府、私人基金会和知识分子（包括学者、艺术家等）三位一体，打文化冷战；(4）如何处理同媒体的关系，如何与媒体互动等等。代表性的著作有：

阿克隆大学外交史教授沃尔特·希克森（Walter L. Hixson）于1997年出版的《分开帷幕：宣传、文化和冷战，1945—1961年》。[①] 此书讨论了1953年美国新闻署的建立，描述了该机构是如何通过介绍美国书籍、报纸、杂志、电影等文化商品，来向国外传播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希克森指出，美国新闻署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开展文化冷战的主要工具。他提醒读者，美国新闻署常常是有选择地向国外介绍美国文化，比如不在国外的展览会上展出反映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现象的内容。

肯尼斯·奥斯古德（Kenneth Osgood）:《全面冷战：艾森豪威尔在国内和国外的秘密宣传战》。[②] 此书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宣传战是全方位的，既在国内进行，影响国内舆论，动员美国民众支持政府的冷战政策，争取国会对其冷战政策的支持（主要是拨款）；又在国际展开，向世界各国谴责共产主义暴政，宣传美国价值观，扶植亲美势力和舆论。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外交史教授劳拉·贝尔蒙特（Laura A. Belmonte）:《推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的宣传和冷战》[③]。此书对美国的宣传战进行了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即宣传战究竟说了什么？有哪些主题（themes）？在哪些方面和苏联的宣传针锋相对？通过分析美国政府的宣传战内容，我们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冷战政策，更可以进一步认识究竟什么是美国文化、究竟何为美国人（American identity）？

---

① Walter L. 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② Kenneth Osgood,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8).

③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斯蒂芬·凯西（Steven Casey）：《推销朝鲜战争：宣传、政治和公共舆论，1950—1953》。[1] 此书揭示，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官方和民间媒体在如何报道朝鲜战局的问题上有矛盾，麦克阿瑟将军要为战况报道定调，不喜欢记者独立报道和评论，发表和他的说法不一致的文章，他以“安全”名义，以保护“军事秘密”名义，限制记者的言行。

德国学者杰希卡·基诺—赫希特（Jessica C.E. Gienow-Hecht）在她的《传播不可能：在战后德国作为文化外交的美国记者，1945—1955 年》一书中，[2] 通过对一份在二战后德国出版的报纸《Neue Zeitung》的个案分析，来考察美国文化是通过什么途径在战后德国传播的。《Neue Zeitung》是由一批二战时在美国流亡、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记者创办的。这些人在流亡美国时，曾受到美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后来在编辑和发行《Neue Zeitung》时，在欧洲推广和传播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

2001 年布朗大学教授沃克·伯格翰（Volker Berghahn）出版《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冷战：处于慈善、学术和外交中的歇珀德·斯通》一书。[3] 伯格翰通过研究斯通的个案，来考察冷战中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和知识界是如何三位一体，互相配合与协作，在欧洲推广和传播美国文化的。斯通是记者出身，50 年代初担任美国驻西德占领当局的公共事务部主任，后来又长期担任福特基金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为了抗衡苏联文化的影响，同时为了改变西欧知识界的反美主义倾向，斯通利用福特基金会的庞大经费，帮助欧洲图书馆购买美国书籍、报刊等出版物；资助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资助美国学者去欧洲各国讲学；资助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版著作。伯格翰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在欧洲开展文化冷战的复杂性，即美国既要与苏联争夺欧洲的民心，又要克服西欧知识精英对美国大众文化的蔑视和抵触，美国在欧洲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双重的文化战。

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特伦波尔（John Trumpbour）于 2002 年出版《向世界推销

---

① Steven Casey, *Selling the Korean War: Propaganda,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19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Jessica C.E. Gienow-Hecht, *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Volker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She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好莱坞：美国和欧洲争夺全球电影工业的霸权，1920—1950年》一书。[①] 该书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是如何克服欧洲的阻力在世界上建立文化霸权的，记述了好莱坞在“美国世纪”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该书的后半部分介绍和评价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主要是国务院和商务部）是如何协助好莱坞向国外推销美国的大众文化（特别是电影）的。

美国在亚洲开展的文化冷战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比如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周爱灵（Grace Ai-Ling Chou）以香港新亚书院为案例，研究美国是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和中国争夺影响的。她将研究视角聚焦在美国的几个非政府组织，比如雅礼协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探讨这些非政府机构是如何在美国政府的配合下，在香港资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弘扬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传播的。周爱灵的研究表明，非政府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并不只是简单地充当美国政府的冷战工具，他们的目标和美国政府的目标并不总是完全吻合。比如，美国政府在香港鼓励教育事业发展，就是为了近期的反共目的，为了更好地开展反共宣传。而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既有抗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机，更有普及高等教育、保护学术自由、促进学术繁荣的纯学术追求。他们有时担心，美国政府一味强调反共宣传的重要性会不会妨碍或限制学术言论自由。[②]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之久。在这期间，为了把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忠实伙伴和盟友，美国占领当局倾注大量人力和物力，用美国模式对日本社会的上上下下进行全面改革，其中对日本文化的改造和重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少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触角伸向美国在日本开展的文化冷战。比如，

---

① John Trumpbour, *Selling Hollywood to the World: The U.S. and European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1920-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有关美苏在电影领域进行冷战竞争的新著还有：Tony Shaw, *Hollywood's Cold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7)；Tony Shaw and Denise Youngblood, *Cinematic Cold War: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有关冷战时期美国舞蹈家、古典音乐家、流行乐队和歌手在世界各地传播美国文化的论述，参见：Naima Prevots, *Dance for Expor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8)；David Caute,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Lisa E. Davenport, *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② Grace Ai-Ling Chou. “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of Communism: The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Hong Kong in the 1950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2 (Spring 2010), pp. 3-28;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rill, 2011), chapter 2.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北村博（Hiroshi Kitamura）教授于2010年出版《放映启蒙：好莱坞和战败国日本的文化重建》一书。[①] 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介绍和分析了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是如何通过好莱坞电影来传播美国民主价值观和改造日本传统的军国主义文化的。该书揭示：好莱坞电影为日本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体验，特别是对思想尚未定型的日本青少年，美国文化成为他们成长记忆中的重要部分。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入江昭 (Akira Iriye) 在评论此书时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当年美国电影对日本儿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查阅了自己的日记，发现自己看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是《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时间是1946年3月，他当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入江昭回忆说：老师和同学在看了美国电影后都非常兴奋，都希望日本能变成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入江昭指出：美国通过电影来影响二战以后的被占领国民众的做法不仅仅表现在日本，也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美国文化以电影为载体实现了跨越国界的流动和传播，这种现象正是当今很多关注“跨国历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学者所研究的内容。[②]

在讨论知识是如何在美国国内流动的，即学者如何为政府服务、知识如何转化为政策、学者如何与权力互动等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布卢斯·卡克利克（Bruce Kuklick）的《不清楚的文字：知识分子和战争，从凯南到基辛格》是一个代表。[③] 该书研究了冷战头三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他特别分析了三组知识分子：第一组是为美国空军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工作的一些核科学家和核战略学家，比如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 (Albert Wohlstetter)、伯纳德·布罗迪 (Bernard Brodie) 和汤姆斯·歇林 (Thomas Schelling)。这些人为美国政府提出核战略理论和核威慑理论；第二组是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书的一些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授，比如理查德·纽斯泰特（Richard Neustadt ）和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他们主持了一个领导学研究项目，研究一个称职的总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才能，为政府选拔领导人献计献策；第三组是一些直接在政府中任重要职位的知识分子，比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保罗·尼茨

---

① Hiroshi Kitamura, *Screening Enlightenment: Hollywood an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Defeated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Akira Iriye's Contribution to the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Hiroshi Kitamura, *Screening Enlightenment: Hollywood an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Defeated Japan*, published in *Passport: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 Vol. 43, No. 2 (September 2012), pp. 6-7.

③ Bruce Kuklick, *Blind Oracles: 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ul Nitze)、麦克乔治·邦迪 (McGeorge Bundy) 和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上述这些学者，以不同的途径，或通过智囊团，或通过大学研究机构，或直接任职政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制定出谋划策，提供了诸如“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逐渐升级”（Gradual Escalation）等学说和理念。卡克利克的研究厘清了冷战中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不同遏制策略的学术渊源和来龙去脉，丰富了人们对美国冷战政策思想史的理解和认识。

“文化冷战史”开拓了冷战史研究的视野，是一个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冷战史研究新领域。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而言，它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大多数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的著作，对美国宣传战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对美国宣传战的内容，讨论得很详细，但对美国宣传战同情报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却分析得较少。美国宣传战同情报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是一个很重要但却被忽视的问题。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外宣传部门（比如美国新闻署）和情报收集部门（比如中央情报局）都会参与宣传战的策划和实施，而由于两个部门工作职能的不同，美国新闻署会强调对外宣传，而中央情报局则会利用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收集情报。比如，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都参与了 1959 年美国在苏联举办的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前者注重如何向苏联观众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后者则希望通过和苏联人的近距离接触，来收集苏联情报。[①] 中央情报局经常向美国新闻署提供它所掌握的有关苏联的情报和信息，供美国新闻署在制作反苏宣传节目时使用；它也经常利用美国新闻署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举行的文化活动，来对当地社会进行渗透，收集当地情报。实际上，在美国外交史上，宣传战和情报战经常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负责公共外交的机构“战时新闻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就既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又执行情报收集任务，身兼二职。[②]

第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宣传战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的分析还很差强人意。如何令人信服地说明宣传战的效果和影响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该如何证明美国的文化外交对苏联民众起了美国希望看到的作用？有的学者用参加美国展

① 关于 1959 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详细论述，参见 Marilyn S. Krushner, “Exhibiting Art at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in Moscow, 1959,”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4, No. 1 (Winter 2002); Ellen Mickiewicz, “Efficacy and Evidence: Evaluating U.S. Goals at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in Moscow, 1959,”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3, No. 4 (Fall 2011), pp. 138-171。

②Allan M. Winkler,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览会的观众人数来说明美国展览会的受欢迎程度，但是，参观人数的统计数字仍不能帮助我们满意地回答下面这个关键问题，即美国展览会究竟对苏联人的看法起了多大的作用？参观人数的规模可以表明苏联民众对美国社会的兴趣程度，但是，它并不能反映苏联观众对美国究竟是持负面、还是正面的态度。我们无法确定：在看了美国展览后苏联观众就改变了他们先前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就都变得喜欢美国文化了。苏联观众在美国展览会上向美国解说员提出的问题，或者他们在展览会留言簿上写下的观感，也不一定就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和想法，因为苏联是一个被政府严密管控的警察社会，秘密警察和政府耳目无处不在，苏联老百姓可能随时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正是因为准确判断宣传战效果的证据和材料很难找到，所以，不少学者对文化外交这个课题望而却步。

第三，“文化冷战史”研究的对象仍不平衡。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描述和剖析美国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文化攻势和渗透，而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应以及苏联阵营自己发动的文化攻势，却研究和解析得不够。冷战时期，为了和西方世界争夺民心和影响，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也开展了积极的文化外交，比如，组织“世界和平运动”，举办展览会，发行外文图书和杂志，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对于这些活动的策划、组织、协调和效果，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冷战史”的出现，可以被视作为是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一次“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传统外交史长期被人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研究方法和领域一成不变，讨论来讨论去，只是围着政府决策人的思想和考虑转，只是盯着政府的决策程序，只是满足于剖析政府内部一个部门和另一个部门之间在决策问题上的协商和妥协：政策建议是谁提出的？政策分歧是如何解决的？一致意见是如何达成的？总统是如何最后拍板的？[①]“文化冷战史”的出现是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个好现象，它丰富了外交史研究的手段和内容。它表明：外交史学家们不仅仅只是关心冷战中政府层面上的互动和政策走向，还聚焦国家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关注非政府层面之间的来往，探讨民间对民间的互动。“文化冷战史”既代表了作为后起之秀的文化史对作为“百年老店”的外交史的渗透和影响，又反映了外交史对自己传统研究范围的突破和创新。

---

① 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本章是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稿加工和补充而成。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洪邮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姚百慧教授邀请和安排我在上述学校做讲座。）

参考文献

中文资料

1. 档案文献

《蒋介石日记》，胡佛档案馆

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台北国史馆

江苏省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

2. 公开发表文件集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

《毛泽东文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 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

《杨尚昆日记》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1955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 回忆录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辑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58—65页。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胡志明著，洪左君译：《在中国的经历及其他》，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6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89—201页。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22—32页。

冀朝铸：《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苏为群采访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康岱沙：《在柬埔寨的日子》，载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第474—489页。

康岱沙：《难忘在柬埔寨的岁月：忆陈叔亮大使外交生涯片段》，载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4—28页。

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33—47 页。

康矛召:《外交官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

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9—219 页。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

李越然:《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片断回忆》，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86—98 页。

李越然:《回忆毛泽东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1—14 页。

李越然:《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15—18 页。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罗贵波:《历史的回顾——中国援越抗法与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纪实》，载符浩、李同成主编:《中国外交官丛书：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年，第 150—176 页。

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3—9 页。

师哲:《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一些情节》，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29—32 页。

师哲:《日内瓦会议散忆》，载《人物》，1989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夏道生:《忆周恩来总理 1957 年访问匈牙利》，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23—28 页。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

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141—166 页。

王幼平:《去金边执行特殊使命》，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

交生涯》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6—82页。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1958.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0—14页。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

4. 专著和文章

蔡佳禾：《缓和亚洲局势的"窗口"时间，（1954—1957年）》，载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柴成文、黄政基、张常仪：《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陈波：《冷战同盟及其困境：李承晚时期美韩同盟关系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陈红民、傅敏：《1961年蒋介石应对"外蒙入会案"决策之研究》，作者提交给"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5月9—10日，澳门大学）的论文。

陈红民、赵兴胜、韩文宁：《蒋介石的后半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陈兼、徐伟民：《"冷战新研究史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22页。

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法国近代史》，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陈长伟、王民：《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旅行限制政策研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讨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34—43页。

陈长伟：《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载《百年潮》，2006年第12期，第47—52页。

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陈毅传》编写组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程华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程早霞：《"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策动达赖出逃历史探析》，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3—49页。

成晓河：《中国—巴基斯坦关系的嬗变（1962—1965）》，载《南亚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0—23 页。

成晓河：《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3 期，第 10—23 页。

丹童：《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载《党史文汇》，总第 142 期，2000 年第 1 期，第 35—38 页。

范宏伟：《和平共处与中立主义：冷战时期中国与缅甸和平共处的成就与经验》，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

范宏伟：《缅北蒋军撤台与蒋介石“反攻大陆”：台湾与美国的分歧和妥协》，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78—85 页。

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

《方毅传》编写组编：《方毅传》，人民出版社，2008 年。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高艳丽：《意识形态的悲剧：周以德与中国》，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

顾保孜：《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韩晓青：《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原因探析》，载《国际论坛》，2011 年第 2 期，第 45—50 页。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 6 期，第 30—45 页。

何卫东：《1946—1958 年的印度对华政策》，载《东南亚》季刊，1989 年第 2 期，第 56—61、64 页。

何延虹：《情谊深似海——记周恩来与胡志明的交往》，载《人物》，1991 年第 4 期，第 5—12 页。

何慧：《新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及其变化》，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4 期，2012 年 12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47—62 页。

贺艳青：《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 1955 年前后的中苏关系》，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胡文涛：《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载《史学集刊》，2007 年第 1 期，第 44—49 页。

黄庆华：《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初期的中法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

年第 3 期。

黄庆华:《建交前法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中法建交述略（一)》，载《晋阳学刊》，2013 年第 5 期，第 112—123 页。

黄庆华:《建交前法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中法建交述略（二)》，载《晋阳学刊》，2013 年第 6 期，第 48—60 页。

黄枝连:《探索第三个千年的“天朝礼治体系”—— 关于国际关系形态对“社会情境—五理系统”的促进作用》，载陈奉林、魏楚雄主编:《东方外交史之发展》，澳门：澳门大学，2009 年，第 39—66 页。

黄宗鼎:《越战期间“中华民国”对越之军援关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9 辑，2013 年 3 月，第 137—172 页。

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

江英:《冲突与克制：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

李丹慧:《冷战年代的西哈努克亲王：来自柬埔寨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5 期，2013 年 9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375—409 页。

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载《党的文献》，1997 年第 1 期。

李洪峰:《回顾 1949 至 1963 年的法国对华政策》，载《法国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86—92 页。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 年。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年。

李潜虞:《试论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期间的中阿关系（1958—1962)》，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4 期，2012 年 12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89—110 页。

李群英:《中法建交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因素》，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6 期，第 31—39 页。

李一平、曾雨棱:《1958—1965 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27—36 页。

梁志:《近十余年中国冷战史研究新气象》，载《世界历史》，2012 年第 4 期，第 111—119 页。

刘磊:《万隆会议与中国同亚非国家经贸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7 期，第 70—77 页。

刘子奎、王作成:《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和对策（1961—1964)》，载《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44—53 页。

罗伯特·舒尔辛格:《约翰逊政府、中国和越南战争》，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1955—1971 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潘一宁:《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对柬埔寨中立的干涉（1956—1971)》，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 年第 1 期。

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牛大勇:《“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牛大勇:《60 年代初期美国迫使台湾当局从华南边境和沿海岛屿撤兵问题》，载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387—408 页。

牛军:《未确定的开端：内战末期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14 期，2012 年 12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25—46 页。

牛军:《重建“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1949—1955 年)》，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61—80 页。

潘敬国、张颖:《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91—97 页。

潘敬国、张颖:《周恩来与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开启》，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5 期。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

裴默农：《迎接中印友好高潮的首任大使袁仲贤》，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124—149 页。

裴默农：《从中巴关系看周恩来争取友好邻邦的远大谋略》，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111—127 页。

钱嘉东、王效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述论》，载《党的文献》，2007 年第 6 期。

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

曲星：《试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253—268 页。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沈志华：《 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载《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沈志华：《“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 1 期。

沈志华：《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6 期，第 78—81 页。

[美] 史蒂文 ·M· 戈德斯坦：《聋子的对话：1955—1970 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载姜长斌、[美] 罗伯特 · 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195—256 页。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苏宏达：《“一个中国原则”与“两岸国际共存”并行的可能性评估——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华民国”对法国外交政策为案例研究》，载《美欧季刊》（台湾）2000 年春季卷，第 83—111 页。

孙来臣：《中国东南亚研究述评》，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 年第 4 期。

孙建楠：《权力欲望中的主权想象：试论 1863 年〈法柬条约〉的历史意义》，

载《南洋问题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孔祥琇：《耿飚传》上、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0 年。

唐小松：《肯尼迪政府的“限蒋出笼”政策（1961 年—1963 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10 期。

唐小松：《60 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53—63 页。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夏亚峰：《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载《史学集刊》，2011 年第 1 期。

王栋：《一九六二年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7 期。

王福年：《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概述》，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 5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

王缉思：《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载《世界历史》，1987 年第 3 期，第 31—43 页。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王善中：《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载《历史教学》，1998 年第 7 期。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王文博：《从中法建交谈判看周恩来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谈判艺术》，载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246—252 页。

王文隆：《外交下乡、农民出洋：“中华民国”农技援助非洲的实施和影响》，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 年。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33—45 页。

温荣刚：《美国与老挝 1958 年的补充选举》，《南洋问题研究》，2010 年第 3 期。

温荣刚：《美国干涉与老挝 1955 年选举》，《南洋问题研究》2011 年第 1 期。

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85 年。

谢黎:《我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中法建交谈判记事》，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99—108页。

熊华源:《征战日内瓦会议前夕的周恩来》，载《党史文汇》，1999年第10期。

熊华源:《周恩来和万隆会议》，载《党史文汇》，1987年第6期。

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许文堂:《建交与断交——1964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载黄翔瑜主编:《战后档案与历史研究：第九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159—200页。

徐晓亚等著:《百年中法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阎学通:《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

杨闯:《论周恩来和平共处思想》，载《外交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42—45页。

杨颖奇、经盛鸿、孙宅巍、蒋顺兴、叶扬兵编著:《南京通史：民国卷》，南京出版社，2011年。

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

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杨元华:《中法关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姚百慧:《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第63—77页。

余湛、张光祐:《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5—21页。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曾令保、史实:《中法关系史上的缺憾：戴高乐生前未能实现访华愿望》，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56—161页。

翟强:《院外援华集团和杜鲁门对华政策（1947—1949年）》，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5期，第37—45页。

翟强:《论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1948—1954年）》，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55—62页。

翟强:《越南战争和约翰逊对华政策》，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期，2008年

12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97—116 页。

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和中国》，载《法国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85—91 页。

张勉励：《中国对柬埔寨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探析（1956—1970）》（作者提交给 2013 年 3 月 23—24 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关系史青年论坛”的论文。）

张伟：《从解密档案看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准备》，载《百年潮》，2005 年第 5 期。

张锡昌、王义浩、王泰平、黄志良：《峰峦迭起：共和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载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1—46 页。

张小欣：《1963 年印（尼）马对抗与东南亚地区之大国角力》，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 年第 3 期。

张小欣：《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91—98 页。

张小欣（译）：《东南亚华侨华人与美国亚洲冷战政策》，载《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9 期，2010 年 6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297—310 页。

张秀阁：《巨大的转变：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 年。

张杨：《冷战共识：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1953 - 1961）》，载《武汉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60—68 页。

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载姜长斌、[美] 罗伯特·罗斯：《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年，第 169—194 页。

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章汉夫传》编写组著：《章汉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赵春生：《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赵继珂、邓峰：《美国新闻署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探析》，载《世界历史》，

2013 年第 3 期，第 14—24 页。

赵学功:《肯尼迪政府与 1962 年台湾海峡危机》,《南开学报》, 2005 年第 3 期。

赵学功:《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载徐行主编:《南开学者纵论周恩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734—748 页。

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载《世界历史》，2003 年第 6 期，第 2—22 页。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 年。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 年。

英文资料

1. Archival Collections

National Security File,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as.

Thomson Pape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 Boston, Massachusetts.

Whitman File,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Abilene, Kansa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issouri.

Record Group 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W. Averell Harri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Vietnam/Laos Collection (Porter-Perry-Prados Donatio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Washington, D.C.

V. K. Wellington Koo Papers,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Foreign Office Series (FO 371),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Prime Minister Series (PREM),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2. Published Documents

Burr, William,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945-196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6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3. Memoirs and Diaries

Acheson, Dea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W. Norton, 1969).

Arbatov, Georgi.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Ball, George W. *The Past Has Another Pattern: Memoirs* (New York: W. W. Norton, 1982).

Bohlen, Charles E.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ew York: Norton, 1973).

Burchett, George, and Nick Shimmin, eds. *Memoirs of a Rebel Journalist: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fred Burchett*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5).

Colville, John. *The Fringes of Power: 10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New York, 1985).

De Gaulle, Charles.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and Endeavor*, translated by Terence Kilmarti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

Dobrynin, Anatoly.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Eisenhower, Dwight.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5).

Ferrell, Robert, ed.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Grantham, Alexander.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1965).

Hilsman, Roger. *To Move a Nation* (New York: Dell, 1964).

Holdridge, John.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Johnson, Lyndon Baines.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Lilley, James, with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Romulo, Carlos P. *The Meaning of Bandung*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6).

Ronning, Chester.*A Memoir of China in Revolution: From the Boxer Rebell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Pantheon, 1974).

Rusk, Dean. *As I* Saw *It: As Told to Richard Rus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Shuckburgh, Evelyn. *Descent from Suez: Foreign Office Diaries, 1951-1956* (New York: W.W. Norton, 1987).

Sihanouk, Norodom with Wilfred Burchett. *My War with the C.I.A.: Cambodia's Fight for Survival* (Middlesex, U.K.: Penguin, 1973).

Sihanouk, Norodom. *Shadow over Angkor, Volume One: Memoirs of His Majesty King Norodom Sihanouk of Cambodia* (Phnom Penh: Monument books, 2005).

Sulzberger, C. L. *An Age of Mediocrity: Memoirs and Diaries, 1963-1972*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Trevelyan, Humphrey. *Living with the Communists* (Boston: Gambit, 1971).

Truman, Harry. *Memoirs of Harry S. Truman: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ew York: Doubleday, 1956).

U Nu, *U Nu: Saturday's Son*, translated by U Law Yone, edited by U Kyaw W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4. Secondary Sources

Accinelli, Robert.*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Adamthwaite, Anthony. "Britain and the World, 1945-1949: the view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 1985).

Ambrose, Stephen E. *Nixon: 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 1962-197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Amer, Ramses. "The Ethnic Vietnamese in Cambodia: A Minority at Risk?"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6, No. 22 (September 1994), pp. 210-238.

Amer, Ramses. "Vietnam and Its Neighbours: The Border Dispute Dimens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7, No. 3 (December 1995), pp. 298-318.

Ampiah, Kweku. "Japan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 The Cat Goes to the Mice's Convention," *Japan Forum*, Vol. 7, No. 1 (Spring 1995), pp. 15-24.

Anderson, David L. *Trapped by Succes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1953-196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g Cheng Guan. *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6-1962*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1997).

Ang Cheng Guan. "Southeast Asian Perceptions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01-331.

Antlov, Hans, and Stein Tonnesson, eds. *Imperial Policy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m* (Surrey, 1995).

Armstrong, Charles K.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2, No. 1 (February 2003), pp. 71-99.

Armstrong, Charles K. *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 1950-199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Armstrong, J. D.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sselin, Pierre. *A Bitter Peace: Washington, Hanoi, and the Making of the Paris Agreeme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Asselin, Pierre. *Hanoi's Road to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Asselin, Pierre. "'We Don't Want a Munich': Hanoi's Diplomatic Strategy, 1965-1968,"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 3 (June 2012), pp. 547-581.

Auslin, Michael R. *Pacific Cosmopolitans: A Cultural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achman, David M.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achrack, Stanley D.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Baritz, Loren. *Backfire: A History of How American Culture Led Us into the Vietnam War and Made Us Fight the Way We Did* (New York: 1985).

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isner, Robert L. *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lmonte, Laura A.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Bennett, M. Todd. "It 'Jes Grew:' A Roadmap of the Cultural Turn in U.S. Foreign Relations History." *Passport: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 Vol. 44, No. 3 (January 2014), pp. 20-24.

Benvenuti, Andrea. *Anglo-Australian Relations and the 'Turn to Europe', 1961-1972* (Lond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Benuventi, Andrea, and David Martin Jones, "Myth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Menzies and Engagement with Asia." in *The Journal of Cold Studies*, Vol. 13, No. 4 (Fall 2011), pp. 57-78.

Berghahn, Volker.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She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Bernstein, Bart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Korean Armistice: Prisoners of Repatriation?" in Bruce Cumings, ed., *Child of Conflict: 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 1943-195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Beschloss, Michael R. *The Crisis Years: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1963* (New York: Edward Burlingame Books, 1991).

Beschloss, Michael R, ed. *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1964*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Beschloss, Michael. *Reaching for Glory: Lyndon Johnson's Secret White House Tapes, 1964-1965*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1).

Best, Antony. "'We Are Virtually at War with Russia':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23–40,"*Cold War History*, Vol. 12, No. 2 (May 2012), pp. 205-225.

Bird, Kai. *The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Bird, Kai, and Martin J. Sherwin. *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New York: Knopf, 2005).

Bitar, Mona K. "Bombs, Plots and Allies: Cambod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1958-5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Winter 1999), pp. 149-180.

Blackburn, Robert M. *Mercenaries and Lyndon Johnson's "More Flags": The Hiring of Korean, Filipino, and Thai Soldiers in the Vietnam War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4).

Blang, Eugenie M. *Allies at Odds: America, Europe, and Vietnam, 1961-1968*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1).

Blower, Brooke L. *Becoming Americans in Paris: Transatlan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lum, Robert 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1982).

Borg, 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Boquerat, Gilles. "India's Commitment to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 *Cold War History*, No. 2 (2005), pp. 211-234.

Brady, Anne-Marie.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Brands, H. W. *Cold Warriors: Eisenhower's Gener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Brands, H.W.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World, 1947-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Brands, H.W. *The Wages of Globalism: Lyndon Johnson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azinsky, Gregg A.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 Korea: Koreans, Americans, and the Making of a Democr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Brigham, Robert K. *Guerrilla Diplomacy: The NLF's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Viet Nam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ocheux, Pierre. *Ho Chi Minh: A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ogi, Alessandro. *Confronting America: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unists in France and Ital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Brown, Judith. *Nehru: A Political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Brown, MacAlister and Joseph J. Zasloff, *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Laos, 1930-1985*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Buchanan, Tom. *East Wind: China and the British Left, 1925-19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Buckley, Roger. *US-Japan Alliance: Diplomacy,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Buckley, Roger. "From San Francisco to Suez and Beyond: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52-1960,"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9-186.

Bullock, Alan.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Knopf, 1992).

Burke, S. M. *Mainsprings of Indian and Pakistani Foreign Poli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4).

Busch, Peter. *All the Way with JFK? Britain, the US, and the Vietnam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uzzanco, Robert. *Masters of War: Military Dissent and Politics in the Vietna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arlson, Allen. "Moving Beyond Sovereignty?A Brief Consideration of Recent Changes in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ianxia* Concep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anuary 2011), pp. 89-102.

Casey, Steven. *Selling the Korean War: Propaganda, Politic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19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sey, Steven. "Harry Truma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Policy in East Asia, June 1950-June 1951," in Matray, James I. ed.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Japan,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Kirksville: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85-202.

Castle, Timothy N.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U.S. 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 1955-19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atton, Philip. *Diem's Final Failure: Prelude to America's War in Vietna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Cavoski, Jovan. "On the Road to the Coup: Indonesia between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China," in Bernd Schaefer and Baskara T. Wardaya, eds.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pp. 76-81.

Cavoski, Jovan. "Overstepping the Balkan Boundaries: The Lesser Known History of Yugoslavia's Early Relations with Asian countries (New Evidence from Yugoslav/Serbian Archives)," *Cold War History* (2011), pp. 1-21.

Caute, David.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ce, James. *Aches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ho Create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Chamberlin, Paul Thomas. *The Global Offensive: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nda, Nayan. "China and Cambodia: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 i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9, No. 2 (November 2002), pp. 1-11.

Chandler, David. *A History of Cambodia*, fourth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8)

Chandler, David P.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revise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Chandler, David P.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ng, Gordon H.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man, Jessica. *Cauldron of Resistance: Ngo Dinh Diem, the Unites States, and 1950s Southern Vietn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man, Jessica. "The Sect Crisis of 1955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Ngo Dinh Diem."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5, No. 1 (Winter 2010), pp. 37-58.

Chapman, Jessica. "Staging Democracy: South Vietnam's 1955 Referendum to Depose Bao Dai."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4 (September 2006), pp. 671-703.

Charney, Michael W. "Ludu Aung Than: Nu's Burma during the Cold War,"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5-35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en Jian and Yang Kuisong.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ou, Grace Ai-Ling.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rill, 2011).

Chou, Grace Ai-Ling. "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of Communism: 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Hong Kong in the 1950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2 (Spring 2010), pp. 3-28.

Choudhury, Golam Wahed. *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 and Major Powers: Politics of a Divided Subcontin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Christensen, Thomas J.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ristensen, Thomas J. *Worse than a Monolith: Alliance Politics and Problems of Coercive Diplomacy in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ung, Jae Ho.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Clayton, David.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54*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

Cline, Ray S. *Chiang Ching-Kuo Remembered: The Man and His Political Leg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Council, 1989).

Clymer, Ken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From curiosity to confront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969-2000: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Cohen, Warren I.,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Cohen, Warren I.,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hen, Warren I.,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nboy, Kenneth. *The Cambodian Wars: Clashing Armies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3).

Conboy, Kenneth, and Dale Andrade. *Spies and Commandos: How America Lost the Secret War in North Vietnam*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0).

Connelly, Matthew. *A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orfield, Justin. *The History of Cambo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9).

Costigliola, Frank. "Lyndon B. Johnson, German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73-210.

Costigliola, Frank.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Power in Europe," in Gardner and Gittinger,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Vietnam*, pp. 143-153.

Craig, Campbell, and Fredrik Logevall. *America's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rowl, Samuel E. "Indonesia's Diplomatic Revolution: Lining Up for Non-Alignment, 1945-1955,"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38-257.

Cullather, Nick. *The Hungary World: America's Cold War Battle against Poverty in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llek, Robert.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61-197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Darwin, Joh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Davenport, Lisa E. *Jazz Diplomacy: Promoting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Era*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David-Fox, Michael. *Showcasing the Great Experimen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Western Visitors to the Soviet Union, 1921-194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Davis, Donald E., and Eugene P. Trani. *Distorted Mirrors: American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China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9).

DePorte, A. W. *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e Enduring Alli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Deshingkar, Giri. "India-China Relations: The Nehru Years," *China Report*, Vol. 27, No. 2 (April-June 1991), pp. 85-100.

Devillers, Philippe. "The Laotian Conflict in Perspective," in Nina S. Adams and Alfred W. McCoy, eds., *Laos: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p. 37-51.

Dileo, David L. *George Ball, Vietnam, and the Rethinking of Containme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Dingman, Roger. "Alliance in Crisis: The Lucky Dragon Incident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87-214.

Dingman, Roger. "Truman's Gift: The Japanese Peace Settlement," in James I.

Matray, ed.,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Japan,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Kirksville: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6-72.

Dittmer, Lowell. *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1945-199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Dockrill, M. L. "The Foreign Offic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 June 1950-June 1951,"*International Affair (*Summer 1986), pp.459-476.

Dommen, Arthur J. *Conflict in Laos: 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3).

Dragomir, Elena. "The Perceived Threat of Hegemonism in Romania during the Second Detente." *Cold War History*, Vol. 12. No. 1 (February 2012), pp. 111-134.

Dudden, Arthur Power. *The American Pacific: From the Old China Trad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Duiker, William J. *Sacred War: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a Divided Vietna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Dulffer, Jost.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Decolonization," in Marc Frey, Ronald W. Pruessen, and Tan Tai Yong,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colonization*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2003), pp. 23-34.

Edwards, Lee. *Goldwater: Man Who Made a Revolution (*Washington D. 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5).

Edwards, Peter. *A Nation at War: Australian Politics, Societ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5-1975*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1997).

Edwards, Peter, with Gregory Pemberton. *Crises and Commitments: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Australia's Involvement in Southeast Asian Conflicts, 1948-1965* (North Sydney: Allen & Unwin, 1992).

Efimova, Laris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0, No. 3 (October 2009), pp. 449-469.

Evans, Paul M.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Fardella, Enrico.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urizio Marinelli and Giovanni Andornino, eds. *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rn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17-170.

Farrar, Peter. "Britain'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 Was It a Neglected Opportunity for End the Fighting in Kor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pril 1983), pp. 327-351.

Feigenbaum, Evan.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Feinberg, Mellissa. "Fantastic Truths, Compelling Lies: Radio Free Europe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Slánský Trial in Czechoslovakia."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pp. 107-125.

Fenton, Damien. *To Cage the Red Dragon: SEATO and the Defence of Southeast Asia, 1955-196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2).

Fetzer, James. "Clinging to Containment: China Policy," in Thomas G. Patterson, ed., *Kennedy's Quest for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8-197.

Fineman, Daniel.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Fineman, Daniel. "Phibun, the Cold War, and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of 1950,"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75-300.

Firestone, Bernard J. "Failed Mediation: U Thant,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5 (November 2013), pp. 1060-1089.

Fonseca, Rena. "Nehru and the Diplomacy of Nonalignment," in Gordon A. Craig and Francis L. Loewenheim eds., *The Diplomats, 1939-197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Foot, Rosemary.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 The British Effort to Avert an Expanded War, December 1950-January 1951,"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6), pp. 43-57.

Foot, Rosemary.*Practice of Power: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Foot, Rosemary.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Foot, Rosemary. "The Search for a Modus Vivendi: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hina Policy in the Eisenhower Er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3-163.

Forslund, Catherine. *Anna Chennault: Informal Diplomacy and Asian Relations*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2002).

Foster, Anne L. "Avoiding the 'Rank of Denmark': Dutch Fears about Loss of Empire in Southeast Asia,"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68-83.

Fousek, John. *To Lead the Free Worl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Friedman, Jeremy. "Soviet poli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the Chinese Challenge in the 1960s," *Cold War History*, Vol. 10, No. 2 (2010), pp. 247-272.

Frings, K. Viviane. "Rewriting Cambodian History to 'Adapt' it to a New Political Context: The Kampuche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s Historiography (1979-199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4 (1997), pp. 807-846.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Fursenko, Aleksandr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Gaddis, John Lew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2 (Summer 1983), pp. 171-190.

Gaddis, John Lew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Gaddis, John Lew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Gaddis, John Lew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Gaiduk, Ilya V.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Ree, 1996).

Gaiduk, Ilya V. "Soviet Cold War Strategy and Prospects of Revoluti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in Christopher E.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23-136.

Gallicchio, Marc S. "The Best Defense is a Good Offens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y in East Asi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3-85.

Gardner, Lloyd C., and Ted Gittinger,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Vietnam*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Gardner, Lloyd C. *Pay Any Pric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Wars for Vietnam (*Chicago: Ivan R. Dee, 1997).

Garson, Robe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9: A Troubled Affair*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Garver, John W.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3).

Garver, John W.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Garver, John W.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Gati, Charles.*Failed Illusions: Moscow, Washington, Budapest, an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t*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Giauque, Jeffrey Glen. *Grand Designs and Visions of Unity: The Atlantic Pow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55-196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Gienow-Hecht, Jessica C.E. *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Ginat, Rami.*The Soviet Union and Egypt, 1945-1955* (London: Frank Cass, 1993).

Goh, Evelyn. *Constructing the U.S. Rapproche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oldstein, Martin 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Cranbury,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Goldwater, Barry M, with Jack Casserly. *Goldwa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Goncharov, Sergei Nikolaevich,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opal, Sarvepalli.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1947-19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Gordon, Leonard H. D,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 (December 1985), pp. 637-660.

Gorlizki, Yoram, and Oleg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Goscha, Christopher E. "Vietnam,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and the Meltdown of Asian Internationalism," in Odd Arne Westad and Sophie Quinn-Judge, eds.,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1972-1979*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152-186.

Goscha, Christopher E. "Choosing between the Two Vietnams: 1950 and Southeast Asian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07-237.

Goscha, Christopher E. "Vietnam and the World Outside: The Case of Vietnamese Communist Advisers in Laos (1948-1962),"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12, No. 2, pp. 141-185.

Goscha, Christopher E.,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Gries, Peter Hay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Grubbs, Larry. *Secular Missionaries: Americans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in the 1960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9).

Hall, David K. "The Laos Neutralization Agreement," in Alexander L. George, Philip J. Farley, and Alexander Dallin, eds., *U.S.-Soviet Security Cooperation: Achievements, 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lliday, Jon, and Bruce Cumings, eds. *Korea: The Unknown War (*New York: 1988).

Hamby, Alonzo L. *Man of the People: A Life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Hanhimaki, Jussi.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annah, Norman. *The Key to Failure: Laos and the Vietnam War*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87),

Han Suyin. *Eldest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98-1976*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Hao Yufan and Lin Su, eds.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s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Ashgate, 2005).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2).

Harris, Lillian Craig.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1994).

Harrison, Michael M. *The Reluctant Ally: 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Hart, Justin. *Empire of Ideas: The Origins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Hasagawa, Tsuyoshi.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slam, Jonathan. *Russia's Cold War: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the Wal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 Di. "The Evol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22-248.

Hein, Laura. "Revisiting America's Occupation of Japan," *Cold War History*, Vol. 11, No. 4 (2011), pp. 579-599.

Heinrichs, Waldo. "Eisenhower and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86-103.

Heinrichs, Waldo. "Lyndon B. Johns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30.

Heinzig, Die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Herring, George C.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thir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Herring, George C. *LBJ and Vietn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Hershberg, James. *Marigold: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in Viet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Herzog, Jonathan. *The Spiritual-Industrial Complex: America's Religious Battle Against Communism in the Early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rzstein, Robert E. *Henry R. Luce, Time,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ess, Gary R."The American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the SEATO

Structure of Containment,"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72-295.

Hess, Gary R. "The Unending Debate: Historians and the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 2 (Spring 1994), pp. 239-264.

Higgins, Trumbull. *Korea and The Fall of MacArthur* (New York: 1960).

Hixson, Walter L.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Hoffmann, Stanley.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Viking, 1974).

Hogan, Michael J.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lmes, John W. "Canada and China: The Dilemma of a Middle Power," in A. M. Halpern, ed.,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5).

Holsti, Ole. "The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John Foster Dulles' Philosophical and Instrumental Belief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No. 1 (March 1970), pp. 123-157.

Hunt, Michael H.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Hunt, Michael H.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Hunt, Michael, and Niu Jun, eds. *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s-1960s: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sia Program, 1993).

Immerman, Richard. "'A Time in the Tide of Men's Affairs': Lyndon Johnson and Vietnam,"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7-97.

Immerman, Richard H. *John Foster Dulles: Piety, Pragmatism, and Power in U.S. Foreign Policy*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9).

Inboden, William. *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rwin, Ryan W. *Gordian Knot: Apartheid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saacson, Walter,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Isaacson, Walter.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Iriye, Akira.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2).

Iriye, Akira.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41-256.

Iriye, Akira. *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Jacobs, Seth. *The Universe Unravel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Cold War Lao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Jersild, Austin. "The Great Betrayal: Russian Memories of the 'Great Friendship, '" *Cold War History*, Vol. 12, No. 1 (February 2012), pp. 159-169.

Jersild, Austin. "The Soviet State as Imperial Scavenger: 'Catch Up and Surpass' in the Transnational Socialist Bloc, 1950-196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6, No. 1 (February 2011), pp. 109-132.

Jersild, Austi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Johnson, A. Ross.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 the CIA Years and Beyo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hnson, A. Ross and R. Eugene Parta, eds., *Cold War Broadcasting: Impact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Press, 2010).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Johnstone, William C. *Burma'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Jones, Matthew. *After Hiroshima: The United States, 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 194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urnoud, Pierre. *De Gaulle et le Vietnam (1945-1969)* (Paris: Éditions Tallandier, 2011).

Kahin, George McTurnan.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April 195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6).

Kaiser, David. *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2002).

Kammen, Michael.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Reconsiderat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 45, No. 1 (March 1993), pp. 1-41.

Kan, Hideki. "Dealing with an Increasingly Strong, Confident and Nationalistic Japan," *Diplomatic History* (April 2008).

Kaplan, Law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 The Formative Years*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4).

Kaple, Deborh A.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Karnow, Stanley.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3).

Kaufman, Burton I.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ith Respect to East Asi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04-120.

Kaufman, Victor S. *Confronting Communism: U.S. 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1).

Kaufman, Victor S.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93rd Nationalist Division,"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01), pp. 440-456.

Kearns, Doris.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Keith, Ronald C.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Ken, Danny Wong Tze. "Malaysi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Era: The War in Indochina and Mslaya, 1946-1963,"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58-274.

Kennedy, Andrew Bingham. *The International Ambitions of Mao and Nehru: National Efficacy Belief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ylor, William 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ince 1900*, fif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Khan, Sulmaan Wasif. "Cold War Co-operation: New Chinese Evidence on Jawaharlal Nehru's 1954 Visit to Beijing," *Cold War History*, Vol. 11, No. 2 (2011), pp. 197-222.

Khong, Yuen Fo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Khoo, Nicholas. *Collateral Damage: 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Kim, Donggil. "The Crucial Issues of the Early Cold War: Stalin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 10, No. 2 (May 2010), pp. 185-202.

Kim, Donggil. "Prelude to War? The Repatriation of Koreans from the Chinese PLA, 1949-50," *Cold War History*, Vol. 12, No. 2 (May 2012), pp. 227-244.

Kim, Samuel 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In Search of a Peace and Development Lin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148-178.

Kimball, Jeffrey P. *Nixon's Vietnam Wa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Kimball, Warren. *The Juggler: Franklin Roosevelt as Wartime States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Kirby, William C.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 pp. 870-890.

Kirby, William C., Robert S. Ross, and Gong Li, eds.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Kissinger, Henry. *The Troubled Partnership: 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5).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2011).

Klein, Christina.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Kochavi, Noam. *A Conflict Perpetuated: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2002).

Kochavi, Noam. "Limited Accommodation, Perpetuated Conflict: Kennedy, China, and the Laos Crisis, 1961-1963,"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2002), pp. 95-135.

Kolko, Gabriel.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Kolodziej, Edward A. *French International Policy under De Gaulle and Pompidou: The Politics of Grandeu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Kraus, Charles. "A Border Region 'Exuded with Militant Friendship': Provincial Narrative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49-1954," *Cold War History*, Vol. 12, No. 3 (2012), pp. 495-514.

Krenn, Michael L. *Fall-Out Shelters for the Human Spirit: American Art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5).

Krepinevich, Andrew F. *The Army and Vietn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Krushner, Marilyn S. "Exhibiting Art at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in Moscow, 1959,"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 4, No. 1 (Winter 2002).

Kuisel, Richard F. *The French Way: How France Embraced and Rejected American Values and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Kuklick, Bruce. *Blind Oracles: 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Kulski, W. W.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French Republic*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Kuo, Mercy A. *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3-1960*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1).

Kwon, Heonik. *The Other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Lacouture, Jean. *De Gaulle: the Ruler, 1945-1970*,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Harvill, 1991).

LaFeber, Walt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LaFeber, Walter. *The Clash: U.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Lampton, David M.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Langer, Paul F., and Joseph J. Zasloff. *North Vietnam and the Pathet Lao: Partners in the Struggle for Lao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Laron, Guy. "Cutting the Gordian Knot: The Post-WWII Egyptian Quest for Arms and the 1955 Czechoslovak Arms Deal,"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55 (February 2007).

Lau, Albert, e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12).

Lawrence, Mark Atwood. *Assuming the Burden: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Lawrence, Mark Atwood. *The Vietnam War: A Concise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 Mark Atwood. "Recasting Vietnam: The Bao Dai Solution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5-38.

Leary, William Jr.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Asia*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4).

Lebovic, Sam. "From War Junk to Educational Exchange: The World War II Origins of the Fulbright Progra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Cultural Globalism, 1945-50,"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2 (April 2013), pp. 280-312.

Lee, Chae-Jin. *Zhou Enlai: The Early Yea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Lee Chae-Jin, *Communist China's Policy Toward Laos: A Case Study, 1954-67* (Lawrenc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1970).

Lee, Christopher J, ed. *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 The Bandung Moment and Its Political Alternativ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Leffler, Melvyn P.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Leffler, Melvyn P.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Leffler, Melvyn P., and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Levine, Steven I. "Breakthrough to the East: Soviet Asian Policy in the 1950s,"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96-318.

Li Hua-yu. *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Li Hua-yu. "The Political Stalinization of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One-Party Constitutionalism, 1948-1954,"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2 (2001), pp. 28-47.

Li Mingjiang. "Ideological Dilemma: Mao's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62-63," *Cold War History*, Vol. 11, no. 3 (2011), pp. 387-419.

Lin Hsiao-ting. "U.S.-Taiwan Military Diplomacy Revisited: Chiang Kai-shek, Baituan, and the 1954 Mutual defense Pac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5 (November 2013), pp. 971-994.

Lin Hsiao-ting and Wu Su-feng. "America's China Policy Revisited: Regionalism, Regional leaders, and Regionalized Aid, (1947-49)."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9, No. 2 (December 2012), pp. 107-127.

Lind, Michael. *Vietnam: The Necessary War: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s Most Disastrous Military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9).

Lintner, Bertil. "Burma and Its Neighbors," *China Report*, Vol. 28, No.3 (July-September 1992), pp. 225-259.

Little, Douglas.*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third edi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LiuHong. *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 1949-1965*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1).

Liu Xiaohong. *Chinese Ambassadors: The Rise of Diplomatic Professionalism since 194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Logevall, Fredrik. *Embers of War: The Fall of 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s Vietna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Logevall, Fredrik. "De Gaulle, Neutralization, and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Vietnam, 1963-1964,"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92), pp. 69-102.

Logevall, Fredrik.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Lomperis, Timothy. *The War Everyone Lost-And W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Long, S. R. Joey. *Safe for Decolonizatio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Britain, and Singapore*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1).

Lowe, Peter. *Containing the Cold Wa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Japan, China and Korea, 1948-53*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Lucas, W. Scott. "Beyond Freedom, Beyond Control: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in the Cold War," in Giles Scott-Smith and Hans Krabbendam, eds.,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0*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p. 53-72.

Lumbers, Michael. "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1965-196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6, No. 3 (Summer 2004).

Lumbers, Michael. *Piercing the Bamboo Curtain: Tentative Bridge-building to China during the Johnson Yea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Luthi, Lorenz M.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Luthi, Lorenz M. "Restoring Chaos to History: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0 (June 2012), pp. 378-397.

MacDonald, Callum. *Korea: The War before Vietnam* (New York, 1986).

Mackie, Jamie. *Bandung 1955: Non-Alignment and Afro-Asian Solidarity*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5).

MacMillan, Margaret.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Maddox, Robert James.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Madinier, Remy. "*Lawan dan Kawan* (Friends and Foes): Indonesian Islam and Communism during the Cold War,"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6-375.

Maga, Timothy P.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John F. Kennedy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1-1963," in Priscilla Roberts, 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1), pp. 468-481.

Maier, Charles S.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ier, Charles S. "Revision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Origin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9 (1970), pp. 313-347.

Major, Patrick and RanaMitter.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Towards a Comparative Socio-Cultur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in Rana Mitter and Patrick Major, eds., *Across the Bloc: Cold War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4), pp. 1-22.

Malloy, Sean L. "Uptight in Babylon: Eldridge Cleaver's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7, No. 3 (June 2013), pp. 538-571.

Man, James H.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Vintage, 1998).

Manchester, William.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Boston: 1978).

Marinelli, Maurizio, and Giovanni Andornino, eds. *Italy's Encounters with Modern China: Imperial Dreams, Strategic Ambi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Marks, Thomas A.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Wang Sheng and the Kuomintang* (London: Frank Cass, 1998).

Martin, Marie Alexandrine. *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Martin, Garret. "Playing the China Card? Revisiting France'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63-1964,"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Winter 2008).

Martin, William. *With God on Our Side: The Ris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in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6).

Mason, Richard. "Contain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Non-Alignment: The Cold War and U.S.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50-1952,"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9-67.

Mastny, Vojtech. *Russia's Road to the Cold War: Diplomacy, War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unism, 1941-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stny, Vojtech.*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stny, Vojtech. "The Soviet Union's Partnership with Indi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2, No. 3 (Summer 2010), pp. 50-90.

Masuda Hajimu. "Fear of World War III: Social Politics of Japan's Rearmament and Peace Movements, 1950-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47, No. 3 (2012), pp. 551-571.

Masuda Hajimu. "The Korean War through the Prism of Chinese Society: Public Reactions and the Shaping of 'Reality' in the Communist State, October-December 1950."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4, No. 3 (Summer 2012), pp. 3-38.

Matray, James I.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4).

Matray, James I. ed.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Japan,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Kirksville: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yers, David Allan. *Cracking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McHale, Shawn. "Ethnicity, Violence, and Khmer-Vietnamese Rela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wer Mekong Delta, 1757-1954."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2013).

McLaughlin, Sean J. "De Gaulle's Peace Program for Vietnam: The Kennedy Years." *Peace & Change*, Vol. 36, No. 2 (April 2011), pp. 218-261.

McMahon, Robert J. "Anglo-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Reoccup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vol. 2 (1978), pp. 1-23.

McMahon, Robert J.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onesian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5-194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McMahon, Robert J. "Harry S. Truman and the Roots of U.S. Involvement in Indochina, 1945-1953," in David L. Anderson, ed., *Shadow o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and the Vietnam War, 1945-197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pp. 21-38.

McMahon, Robert J. ed.,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cMaster, H. R. Dereliction *of Duty: Lyndon Johnson, Robert McNamara,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Lies that Led to Vietna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Mead, Walter Russell.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Mehta, Harish C. "Soviet Biscuit Factories and Chinese Financial Grants; North Vietnam's Economic Diplomacy in 1967 and 1968,"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 2 (April 2012), pp. 301-335.

Mickiewicz, Ellen. "Efficacy and Evidence: Evaluating U.S. Goals at the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in Moscow, 1959,"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3, No. 4 (Fall 2011), pp. 138-171.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Vietnam. *Victory in Vietnam: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rmy of Vietnam, 1954-1975*, translated by Merle L. Pribbenow,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Miller, Edward. "The Diplomacy of Personalism: Civilization,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Ngo Dinh Diem,"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76-402.

Miller, Edward. *Misalliance: Ngo Dinh Di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ll of South Vietn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iller, Edward, and Tuong Wu. "The Vietnam War as a Vietnamese War: Agency and Society in the Study of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4, No. 3 (Fall 2009), pp. 1-16.

Miller, Manjari Chatterjee. *Wronged by Empire: Post-Imperial 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in India and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iller, Merle. *Lyndon: An Oral Biograph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0).

Millett, Allan R. *War for Korea: A House Burning, 1945-1950*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Millett, Allan R. *War for Korea: They Came from the North, 1950-1951*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Moise, Edwin E. *Tonkin Gulf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Morgan, Eric J. "Black and White at Center Court: Arthur Ashe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5 (November 2012), pp. 815-841.

Morgan, Kenneth.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Moyar, Mark. *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45-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uehlenbeck, Philip E. *Betting on the Africans: John F. Kennedy's Courting of African Nationalist Lead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ueller, Tim B.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i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5, No. 3 (Summer 2013), pp. 108-135.

Mukherjee, Mridula. "Situating India in Asia: The Nehru Years," in Uyama Tomohiko, ed., *Empire and After: Essays in Comparative Imperial and Decolonization Studies*

(Sapporo: The University of Hokkaid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12), pp. 117-128.

Mukherji, Rahul. "Appraising the Legacy of Bandung: A View from India," in See Seng Ta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8), pp. 160-179.

Munteanu, Mircea.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Romania's Attempts to Mediate the Start of U.S.-North Vietnamese Negotiations, 1967-196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4, No. 3 (Summer 2012), pp. 64-96.

Murfett, M. H. *Hostage on the Yangtz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Myoe, Maung Aung. *In the Name of Pauk-Phaw: 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Naimark, Norman 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athan, Andrew J.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Neher, Clark 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ra*, thir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Neils, Patricia, ed. *United States Attitudes and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Impact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0).

Nelson, Michael.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Newhouse, John. *De Gaulle and the Anglo-Saxo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

Newman, Robert P. "The Self-Inflicted Wounds: The China White Paper of 1949," *Prologue* (Fall 1982).

Niu Ju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atterns in the 1950s,"in Uyama Tomohiko, ed., *Empire and After: Essays in Comparative Imperial and Decolonization Studies* (Sapporo: The University of Hokkaid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12), pp. 81-97.

Nguyen, Lien-Hang T. "The War Politburo: North Vietnam's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Road to the Tet Offensive,"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1, Numbers 1-2

(2006).

Nguyen, Lien-Hang T. *Hanoi's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Nogee, Joseph, and Robert Donalds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88).

Nutting, Anthony. *Nasser* (New York: E. P. Dutton, 1972).

Oberdorfer, Don. *Senator Mansfield: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a Great American Statesman and Diploma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Books, 2003).

O'Dowd, Edward C.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The Last Maoist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O'Neill, William L. *American High: The Years of Confidence, 1945-196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Osborne, Milton.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Osgood, Kenneth, and Andrew K. Frank, eds. *Selling War in a Media Age: The Presiden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2010).

Osgood, Kenneth.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8).

Osgood, Kenneth A. and Brian C. Etheridge,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blic Diplomacy: New Directions in 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0).

Page, D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Canadian Perspectives and Initiatives, 1949-1971," in Paul M. Evans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Reluctant Adversaries: Canad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an Liang. "Whither Japan's Military Potential?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Stance on Japanese Defense Powe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1 (January 2007), pp. 111-142.

Pape, Robert A. *Bombing to Win: Air Power and Coercion in War (*Ithaca: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rker, Jason. "Cold War II: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Reperiodization of the Postwar Era," *Diplomatic History* (November 2006), pp. 867-892.

Parmar, Inderjeet.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arta, R. Eugene. *Discovering the Hidden Listener: An Assessment of Radio Liberty and Western Broadcasting to the USSR during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ath, Kosal. "Hanoi's Responses to Beijing's Renewed Enthusiasm to Aid North Vietnam, 1970-1972,"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 6, No. 3 (Fall 2011), pp. 101-139.

Peck, James. *Washington's China: The National Security World,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6).

Pelcovits, N. A.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New York, 1948).

Pelling, Henry. *Winston Churchill* (New York, 1974).

Phillips, Morgan. *East Meets West* (London, 1954).

Plummer, Brenda Gayle. *In Search of Power: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1956-19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orter, Brian.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t China, A Study of British Attitudes, 1945-195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rados, John.*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5).

Prados, John. *Vietnam: The History of an Unwinnable War, 1945-1975*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Preston, Andrew.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0, No. 4 (November 2006), pp. 783-812.

Preston, Andrew. *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 the NSC, and Vietn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reston, Andrew. *Sword of the Spirit, Shield of Faith: Religion in American War and Diplom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2).

Prevots, Naima. *Dance for Export: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ye, Lucian. "The China Factor in Southeast Asia," in Richard H.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cene* (Ea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1), pp. 216-256.

Qing Simei.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Identity, and U.S.-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Qing Simei.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Changes in Western Embargo Policy Against Chin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1-142.

Qing Simei.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in Korea: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Time of Crisis," in James I. Matray, ed.,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Japan,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pp. 93-118.

Radchenko, Sergey. *Two Suns in the Heaven: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adchenko, Sergey. "The Soviet Union and Asia, 1940s-1960s," in Uyama Tomohiko, ed., *Empire and After: Essays in Comparative Imperial and Decolonization Studies* (Sapporo: The University of Hokkaid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12), pp. 99-116.

Raghavan, Srinath. *1971: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Banglades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akove, Robert B.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Nonaligne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Rand, Peter.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Ribuffo, Leo P. "Moral Judgments and the Cold War: Reflections on Reinhold Niebuhr,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and John Lewis Gaddis," in Ellen Schrecker, ed., *Cold War Triumphalism: The Misuse of Histor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pp. 27-70.

Ribuffo, Leo P.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Elliott Abrams,

ed., *The Influence of Faith: Religious Groups and U.S. Foreign Poli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pp. 1-27.l

Riccards, Michael P. *The Presidenc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ecutive Leadership*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00).

Richardson, Sophie. *China, Cambodia,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berts, Priscilla, ed.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China, Vietnam, and the World beyond 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dgers, Daniel T. "Exceptionalism," in Anthony Molho and Gordon S. Wood, eds., *Imagined Histories: American 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40.

Ross, Robert 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tter, Andrew. "Culture, the Cold War, and the Third World," in Robert J. McMahon, ed.,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56-177.

Ruane, Kevin. "SEATO, MEDO and the Baghdad Pact: Anthony Ede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llective Defense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1952-55,"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16 (2005), pp.169-200.

Ryan, Mark, David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3).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Schaefer, Bernd and Baskara T. Wardaya, eds.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Schaller, Michael.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challer, Mich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challer, Michael. "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 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9 (September 1982).

Shichor, Yitzhak.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choenbaum, Thomas J. *Waging Peace and War: Dean Rusk in the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Schonberger, Howard B.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hulzinger, Robert D. *U.S. Diplomacy since 1900*, six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chwartz, Thomas Alan. *Lyndon Johnson and Europe: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obell, Andrew.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Scott, Andrew. *Allies Apart: Heath, Nixon and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Shambaugh, David.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hambaugh, David.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Shao Kuo-kang. *Zhou Enlai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Shapley, Deborah. *Promise and Pow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bert McNamara* (New York: Little and Brown, 1993).

Shaw, Tony, and Denise Youngblood. *Cinematic Cold War: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Shaw, Tony. *Hollywood's Cold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7).

Shen Zhihua. *Mao,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Trilateral Communist Relations in the 1950s*, translated by Neil Silver, (London: Routledge, 2012).

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heng, Michael M.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Short, Anthony. "British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the Eisenhower Er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6-271.

Silverstein, Josef.*Burma: Military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gn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Simpson, Bradley R. *Economists with Gun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and U.S.-Indonesian Relations, 1960-196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impson, Bradley 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ious Hist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6, No. 4 (September 2012), pp. 675-694.

Smith, R. B.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 R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 1955-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Smith, R. B.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 II. The Struggle for South-East Asia, 1961-6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Smith, R. B. "The International Setting of the Cambodia Crisis, 1969-1970,"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8, No. 2 (May 1996), pp. 303-335.

Smith, Roger M. *Cambodia's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Snyder, Sarah B. *Human Rights Activ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Soman, Appu.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New York: Preager, 2000).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Stairs, Denis. *The Diplomacy of Constraint: Canada, the Korean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Stanley, Elizabeth A. *Paths to Peace: Domestic Coalition Shifts, War Termination,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el, Ronald.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Stockwell, Anthony J. "Insurgency and Decolonization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1 (1987), pp. 71-81.

Stuart-Fox, Martin. *A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ueck, William.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British Policy and American Expansion of the War in Kore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1986).

Stueck, William.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ueck, William. *Rethinking the Korean War: A New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britzky, John.*Confronting Sukarno: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5* (London: Macmillan, 2000).

Sullivan, Marianna P. *France's Vietnam Policy: A Study in French-American Relation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8).

Sutayut Osomprasop. "Thailand and the Laos Crisis, 1960-1962,"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Karine Laplante, eds., *The Failure of Peace: Indochina between the Two Geneva Conferences, 1954-1962*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10), pp. 109-129.

Sutter, Robe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ast Asia*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Szalontai, Balazs.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A New Look at North Korea's Militant Strategy, 1962-1970," *Th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4, No. 4 (Fall 2012), pp. 122-166.

Tan, Seng See, and Amitav Acharya, eds. *Bandung Revisited: The Legacy of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Tang, James Tuck Ho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a Revolutionary Power, Britain's Experience with China, 1949-195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Tarling, Nicholas. *The Fall of Imperial Brita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Tarling, Nicholas. *Brita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Taubman, William.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Taylor, Ian.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aylor, Sandra C. "Laos: The Escalation of a Secret War," in Elizabeth Jane Errington and B.J.C. McKercher, eds., *The Vietnam War as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90).

Taylor, Sandra C. "Lyndon Johnson and the Vietnamese," in David L. Anderson, ed., *Shadow i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and the Vietnam War, 1945-1975*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3).

Teiwes, Frederick C. with Warren Sun.*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Thies, Wallace J. *When Governments Collide: Coerc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Vietnam Conflict, 1964-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Thomas, Daniel C. *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Thomas, Martin. "Processing Decolonization: British Strategic Analysis of Conflict in Vietnam and Indonesia, 1945-1950,"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84-120.

Thomson,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19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0 (April/June 1972).

Tonnesson, Stein. *Vietnam 1946: How the War Beg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Torikata, Yuko. "Reexamining de Gaulle's Peace Initiative on the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5 (November 2007), pp. 909-938.

Toulouse, Ma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From Prophet of Realism to Priest of Nationalism*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Trumpbour, John. *Selling Hollywood to the World: The U.S. and European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1920-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Tsygankov, Andrei P.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ucker, Nancy. "American Policy toward Sino-Japanese Trade in the Post-War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 (Summer 1984).

Tucker, Nancy Bernkopf,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Tucker, Nancy Bernkopf, ed. *Dangerous Strait: The U.S.-China-Taiwan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Tucker, Nancy Bernkopf.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ucker, Nancy Bernkopf.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4).

Tucker, Nancy Bernkopf.*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Tucker, Nancy Bernkopf.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Tucker, Nancy Bernkopf. "A House Divided: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China,"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5-62.

Tucker, Nancy Bernkopf. "Threats, Opportunities, 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 in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s.,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9-134.

Tudda, Chris. *A Cold War Turning Point: Nixon and China, 1969-197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yler, Patrick.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Tyrrell, Ian. *Transnational Nati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1789*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Tyrrell, Ian. *Reforming the Worl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s Moral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Ullrich, Weston. "Preventing 'Peac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Second World Peace Congress." *Cold War History*, Vol. 11, No. 3 (August 2011), pp, 341-362.

VanDeMark, Brian. *Into the Quagmir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Vogel, Ezra F., Yuan Ming, and Tanaka Akihiko, eds. *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Vogel, Ezra.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Vu Tuong, "From Cheering to Volunteering: Vietnamese Communist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ld War, 1940-1951,"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72-204.

Vu Tuong and Wasana Wongsurawat, eds. *Dynamic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Ideology, Identity, and 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Wang Yuan-k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rner, Geoffrey. "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 in John Young,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urchill's Peacetime Administration, 1951-1955*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33-259.

Westad, Odd Arne.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Whiting, Allen. "The Sino-Soviet Split,"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78-542.

Winkler, Allan M.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Wolf, David C. "'To Secure a Convenience': Britain Recognizes China, 195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18 (1983), pp. 299-326.

Woods, Randall Bennett. *Fulbright: A B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Wyatt, David K.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Xia Yafeng.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Xu Guangqiu. *Congress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1949-1979* (Akron: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2007).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ited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Yang Dali.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Yaqub, Salim.*Containing Arab National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Young, John. "Churchill, the Russians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The Three-Power Conference at Bermuda, December 1953,"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86), pp. 889-912.

Young, Kenneth T.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1968).

Young, Marilyn B. *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New York: HarperPerrenial, 1991).

Zeiler, Thomas W. *Dean Rusk: Defending the American Mission Abroad*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2000).

Zhai Qiang. "Buying Time for the Pathet Lao: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Laos, 1961-1962,"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Karine Laplante, eds., *The Failure of Peace: Indochina between the Two Geneva Conferences, 1954-1962*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10), pp. 85-108.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Cambodian Conflict, 1970-1975," in Roberts, Priscilla, ed.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China, Vietnam, and the World beyond 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69-403.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Zhai Qiang. "Seeking a Multipolar World: China and de Gaulle's France," in Christian Nuenlist, Anna Locher, and Garret Martin, eds., *Globalizing de Gaull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rench Foreign Policies, 1958-1969*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0), pp. 181-202.

Zhai Qiang. "Tibet and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50s," i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Summer 2006), pp. 34-53.

Zhang Shu Gu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Zhang Shu Gu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Zhang Yao. "The Making of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ixon's Media Strategy for the US-China Rapprochement,"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9, No. 2 (December 2012), pp. 128-149.

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Brill, 2010).

Zhu Danda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Great Leap Policies, 1956-57," *Cold War History*, Vol. 12, No. 3 (2012), pp. 451-472.

Zubok, Vladislav M.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后　记

我在写作收入在本书的各篇文章时，曾得到许多同行、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他们或质疑我的观点、或指出新的研究线索、或提供有用的资料、或安排讨论的场所，在各方面给了我宝贵的支持，对此，我已经在书中的相关章节的末尾分别表示了谢意。没有前辈学者的指引、提携和鞭策，没有同辈学者的鼓励、支持和推动，就不会有这本论文集作为自己探索冷战历史和中美关系史的一个小结。由于各文写作的背景和因缘不同，常有主题重叠和叙述重复的地方，本次收入时对重复之处已做删减。

在我的众多学友和同道中，沈志华和李丹慧是突出的两位。感谢沈志华热心敦促，牵线搭桥，惠予本人论文集列入他策划和主持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感谢李丹慧指点迷津，诲我不倦，总是将她主编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及时传送到我手中，使我得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国际冷战史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动态。谨书此以记这些年的学术缘分。最后，我要感谢九州出版社王海燕在编辑本书书稿时所表现出的专业和负责态度。

翟强

2013 年 11 月 29 日